

·中国学术百年·

世界语在中国 一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 组织编写

主 编 侯志平
副主编 邹国相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中国学术百年·

世界语在中国 一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

主 编 侯志平
副主编 邹国相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侯志平 主编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9

ISBN 7-5052-0441-6

I. 世... II. 侯... III. 世界语-语言史-中国 IV. H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字核字 (1999) 第 38231 号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编著 侯志平 主编

出 版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发 行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68326644—2554
68326040 (发行部)
责任编辑 刘 铃
封面设计 张延宁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本 850x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00 千
版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5052-0441-6/G123

定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中国世界
语运动无私奉献的新老世界语者！

本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胡 绳 卢嘉锡 柴泽民 陈 原
张企程 陈昊苏 戈宝权

主编

侯志平

副主编

邹国相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兵 王彦京 刘 铃 李士俊
李威伦 南由礼 周流溪 邹国相
侯志平 秦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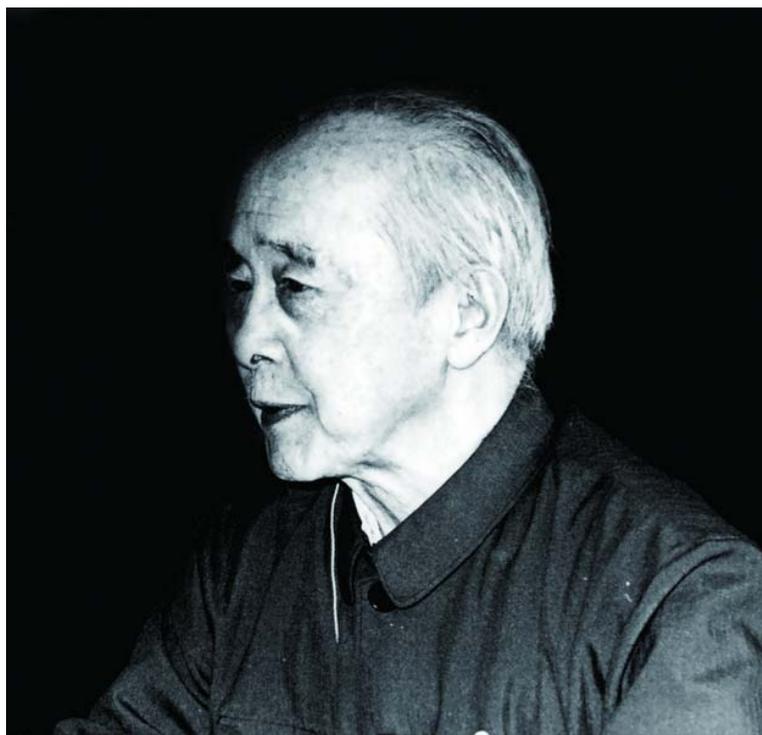
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之一刘师复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之一黄尊生



中国世界语运动杰出的领导人胡愈之



世界语的热情倡导者和支持者巴金



著名世界语翻译家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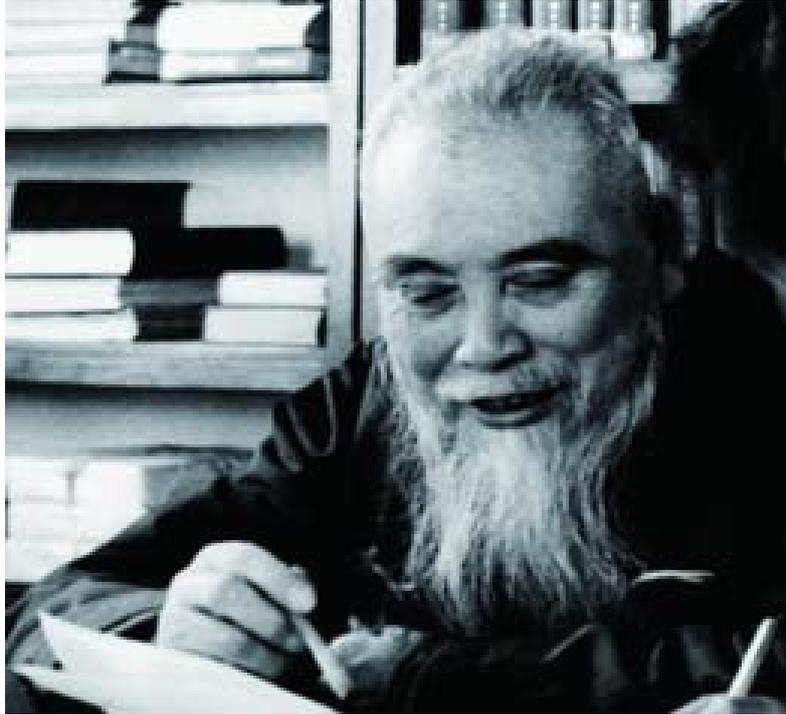
国际主义战士、日本著名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和她的丈夫刘仁



著名世界语者许寿真烈士



著名世界语者冯文洛



著名世界语者方善境



著名外交家、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长柴泽民



1922年鲁迅(前排左三)、爱罗先珂(前排左二)与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会员在一起。



30年代出版的部分世界语刊物。

1913年上海世界语学社成员留影。





1923 年爱罗先珂（后排右起第一人）到南方旅行，同杭州世界语者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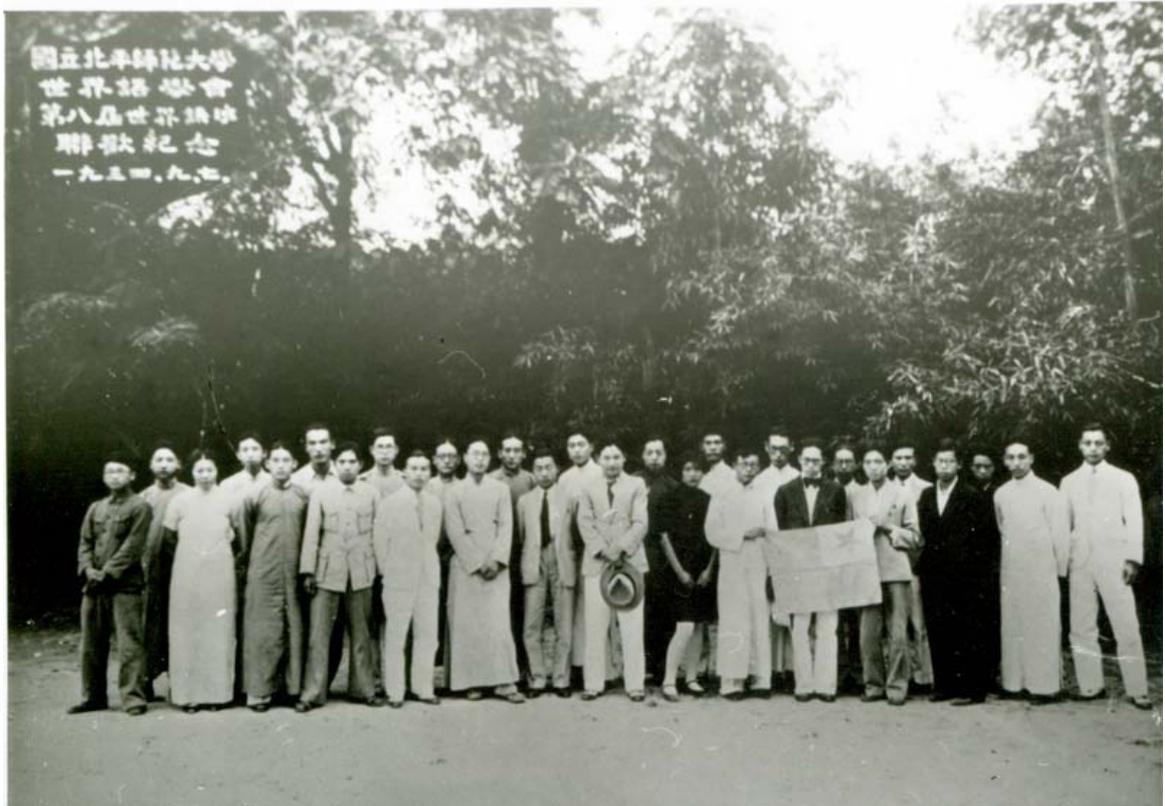
1930 年汉口世界语学会会员大会代表合影。





出席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暨民族解放阵线第 5 次大会的代表在一起。

1934 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世界语学会第 8 届世界语班学员合影。





1933年上海世界语者在一起。



1942年文化工作委员会部分人员（包括部分世界语者）与孩子剧团的演员合影。



1946年中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工作人员在重庆。



40年代出版的部分世界语刊物。



1963年，陈毅副总理（主席台左起第一人），胡愈之（主席台左二）、楚图南（主席台右起第二人）出席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



1979年出席全国第二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1986年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黄华（中）、陈昊苏（左一）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张企程在商讨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筹备工作。



巴金（左一）与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外国世界语者亲切交谈。



卢嘉锡在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举办的世界语讲习班上发表热情演说。



1981年12月6日巴金与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大会。



中国国际电台用世界语对外广播。

1992年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在青岛开幕。





国际世界语协会将“费恩杯”授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本书大部分编委会成员在外文局门前合影。



我還是這一句話：凡是世界語
為形式，而載以真正國際主義
之實質，這才是真正的世界語。
世界語是必要的，是應該有的。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九月

1939年毛主席為延安世界語者協會舉办的世界語展覽題詞

共同語言通聲氣
殊方萬國成一家
世界語誕生
一百周年紀念
楚圖南

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楚圖南為世界語誕生一百周年題詞

重视交流
加强合作

祝贺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创刊十周年

一九九五年元月

卢嘉锡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科学家卢嘉锡为世界语杂志《世界科学技术》题词

懂得世界语
就懂得世界

冰心
一九九四年

1994年著名老作家冰心为世界语题词

目 录

关于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随想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代序	陈原 1
一、世界语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	
(一) 国际语和国际语的历史	3
1. 国际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3
2. 国际语的简史	6
3. 世界语是理想的国际语	7
(二) 世界语的起源和内在理想	8
1. 柴门霍夫创造了世界语	8
2. 世界语主义与世界语的“内在理想”	9
(三) 世界语的特点	10
1. 语音发音与拼读一致	10
2. 词汇丰富, 富有表现力	11
3. 语法简明而无例外	12
(四) 世界语的发展	12
1. 世界语的优越性是其发展的基础	12
2. 世界语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13
3. 世界语国际性组织	14
4. 世界语国际性刊物	17
5. 国际世界语大会	17
6. 各国世界语组织	21
二、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	22
(一) 世界语传入中国的背景、渠道及其代表人物	22
1. 世界语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22
2. 世界语传入中国的渠道及其代表人物	22
3. 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内在理想的关系	23
(二)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	24
1.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分期依据	24
2. 中国世界语运动分期及其特征	25
(三)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30
1. 支持世界语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	30
2.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杰出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胡愈之	32
3. 各个时期杰出的世界语者	33
(四)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回顾和展望	38
1. 中国世界语运动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38
2. 中国世界语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39
3. 中国世界语运动有着光明的未来	40

三、世界语与中国的民族解放	41
(一) 一个纲领性口号的由来	41
1. 时代的呼唤	41
2. 中国世界语者的新思维	42
3.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44
(二) 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世界语者	45
1. 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	45
2. 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	49
3. 重庆和延安的世界语运动	51
4. 参与中国抗战的外国世界语者	53
(三) 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斗争	55
1. 胡愈之和他的《莫斯科印象记》	55
2. 一批世界语者走上革命道路	56
3. 为建立共和国献身的世界语者	57
四、世界语在新时期的新任务	60
(一) 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的创办及其影响	60
1. 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对外刊物之一	60
2. 《中国报道》全面报道中国	60
3. 《中国报道》在读者中的影响	64
4. 《中国报道》的启示	66
(二) 中国的世界语广播	67
1. 中国世界语广播的诞生和发展	68
2. 世界语节目播出时间不断增加	68
3. 节目内容不断更新	69
4. 来自各国听众的支持	70
(三) 用世界语出版各种图书	72
1. 世界语出版工作得到国家支持	72
2. 非常时期的非常出书	73
3. 改革开放后的大变化	74
4. 国内世界语运动的大发展与世界语图书的国内市场	76
五、世界语在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79
(一) 科技、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问题及其解决前景	79
(二) 世界语在国际科技、文化领域的应用	80
(三) 中国科技世界语运动的现状	82
1. 专业性的世界语组织	83
2. 出版世界语的科技、文化著作	84
3. 《世界科学技术》杂志的出版	86
4. 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的国际交流	88
5. 中国著名科学家论世界语	89
(四) 世界语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	91
六、世界语文学与文学语言	94

(一) 世界语文学独特的历史与作用	94
1. 世界语与世界语文学一同问世, 相辅相成	94
2. 世界语创始者柴门霍夫对于文学的重视	96
(二) 世界语作为文学语言的优越性	96
1. 世界语构词巧妙	96
2. 世界语的语序灵活	97
3. 世界语的词语有较大的宽容度	97
4. 世界语的发音悦耳动听	97
(三) 世界语文学的成就	97
1. 萌芽时期(1887—1921)	99
2. 成长时期(1922—1945)	99
3. 成熟时期(1946 到现在)	102
(四) 中国世界语者对于世界语文学和文学语言的贡献	106
1. 翻译和创作	106
2. 中国世界语者对于世界语文学语言的贡献	114
七、世界语与中国的文字改革	116
(一) 世界语和文字改革是怎样走到一起来的	116
1. 世界语运动和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是同时代的产物	116
2. 世界语运动和文字改革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116
3. 用世界语代替汉语汉字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	117
4.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由世界语者介绍到国内	117
5. 世界语者积极参加大众语的讨论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18
(二) 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成果	120
1. 文字改革三大任务取得重大进展	120
2. 《汉语拼音方案》是半个多世纪拼音化、拉丁化运动的成果	122
(三) 世界语运动和中国文字改革发展道路的比较和启示	123
1. 中国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主要特点	123
2. 目标定位至关重要	125
3. 平等协商和团结大多数	125
4. 要有足够的耐心、决心和信心	126
八、世界语在中国教育领域	128
(一) 世界语教学在世界语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128
(二) 中国教育部对世界语教学的重视和支持	128
(三) 世界语教学活动遍及全国	130
1. 世界语教学的形式	130
2. 世界语教学的层次	131
(四) 世界语师资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133
(五) 世界语教材的编写与出版	134
(六) 世界语教学法的研讨	135
(七) 世界语水平测试与考核	135
(八) 世界语教师组织	136

九、世界语集邮	137
(一) 中国发行的世界语邮票及邮资封	138
(二) 中国的世界语集邮组织	138
(三) 中国的世界语集邮队伍和他们的活动	138
(四) 独具特色的中国世界语集邮品	140
(五) 中国新闻界对世界语集邮的反映	141
(六) 中国世界语集邮界的骄傲	142
十、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	144
(一) 早期的学术介绍	144
(二) 正式介绍和研究的开端	146
1. 语言学著作中的国际语和世界语	146
2. 蓬勃开展的世界语学研究	147
3. 国际语学学科定位及名称	148
4. 国际语学研究	151
(三) 近年来国际语学在中国的发展	153
(四) 为保卫世界语而斗争	156
1. “五四”运动前后有关世界语的辩论	156
2. 对基本英语和新国际辅助语的批判	160
3. 80年代以来关于世界语的论争	163
附录	170
一、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1891—1998)	170
二、本书参考书目	201
后记	204

关于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随想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代序

陈原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当世界语传入中国时，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正面临着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危，方药杂投（现代中国著名的出版家和思想家张元济语）的命运，有志之士千方百计找寻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道路。

把世界语引进中国并且使它成为“气候”的最初一批传播者和拥护者，主要是社会改造家，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不持什么主义只是朦胧地憧憬着大同社会，追求者自由、平等、公正的思想者。

教育界和语言学界支持世界语运动的最初一批学者，也都是界里的改革派：教育界里有提倡普及教育以拯救中华的先行者（如蔡元培），语言学界里则是力图把文字还给大众的文字改革家（如赵元任）¹。

可以概括地说，百年来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跟社会改造事业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这是中国世界语运动跟东西各国不同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语运动在中国能够持续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语境——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同时带有朦胧的乌托邦理想——，使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它走过的路总的说是比较平坦的；虽然局部的禁压无可避免，但没有发生过像苏联特定时期（1937至1956）那样对世界语运动的严厉镇压；更没有遭受第三帝国对世界语运动所作的毁灭性打击（1934至1945）——希特勒纳粹党徒指斥世界语是万恶的犹太人语言，是“共产党黑话”，非把世界语者跟犹太人一样斩尽杀绝不可！

当震撼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爆发前后，世界语是作为一种新的思潮被知识界接受的。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中，世界语运动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甚至出现过某种不切实际的过激言论，主张将世界语“拿来”代替祖国语言²以便“毕其功于一旦”地迅速进入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这在世界语运动史里也是少见的。

其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革命力量在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过，所以农民讲习所是尽人皆知了；但是世人却忽略了同时开设的其他讲习所，其中就有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它一直存在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当国民革命势力还没有达到的故都（北京/北平），一群知识者早就创办了一所世界语专门学校，校长是蔡元培，鲁迅曾在这所专门学校里执教。这也都是世界语运动史里罕见的。

即使在武装的革命力量对抗武装的反革命力量的十年内战时期，世界语运动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区（即白区）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为反文化围剿取得辉煌胜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前夜即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日日夜夜，以及其后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广大世界语者，团结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下，做了许多切实的宣传联络工作，争取到世界上无数人群对我的同情和支持，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¹ 赵元任本人在留学美国时曾是热诚的世界语者。

² 著名学者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提出的论点。

至于全国解放后的 50 年间，世界语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注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而且是富有成效的道路；尽管曾经有过两三年（1953—1956）短暂的停顿，那也是因为受到当时所谓的“阵营”的某些外来压力，当时民主德国外事部门口头向我们提出世界语是世界主义的东西，拒绝接受我们的世界语书刊。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随着形势的变化很快又重新开始了。这样的挫折教育了我们，任何情况下我们世界语者都不能气馁，因为历史老人是从来不走直路的。

国内外世界语者强烈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我们的世界语运动开辟了新的场境，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强，无论在国际交往和国际宣传方面，无论在教学研究和创作翻译方面，即世界语者通常所说的 *per Esperanto* 和 *por Esperanto* 用世界语和为世界语方面，都取得了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多更大的成果。中国世协（Ĉina Esperanto Ligo（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简称。）参加国际世协（UEA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国际世界语协会）的缩写，简称。），在组织上跟国际世界语运动接轨，这不能不认为是一项突破性的发展；由是导致 1986 年在北京举办了有 2482 人参加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自从世界语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世界语者梦寐以求的大活动，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实现了。这意味着世界语在两个方面的功能，即通过世界语，一方面让中国了解世界，另一方面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功能，从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请原谅我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勾画出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粗线条过程。我虽然从少年时起就接触世界语，经历了将近 70 年的岁月，但我只是时断时续地参与运动。说来惭愧，我不是一个热诚的世界语者，更不是一个虔诚的 *movadisto*，意为世界语活动家。只不过我还一直保持着对世界语的感情，因为它曾经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因为我接近和追随过的世界语运动前辈（其中包括胡愈之、巴金、叶籁士这三颗“绿星”）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的热诚和献身精神，正如鲁迅先生当年称赞世界语者那种“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的精神，永远激励我前进。我深切地感觉到，一百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引导世人追求和平，追求进步，追求知识，为人的幸福，为人的自由，为人的尊严，为人的美好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充满着艰苦、辛酸、自然也带来欢乐的历程，值得后人回顾——“温故而知新”！我曾多次呼吁有实践经验的世界语同道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部著作是对运动进行科学总结的初步尝试。它是一部集体写作的论文集，由十多位从事运动多年、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理论素养的世界语者执笔。他们在一个总体设计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认真的研究和独立的思考，然后写成文字，每一章节都是根据充实的材料加以分析，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可能其他实践家和理论家对某些论点有不同的意见，这不足为怪，不同的意见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外国称之为学术民主，我们这里通常说的是百家争鸣。1986 年问世的《世界语运动的社会政治面面观》（*Soci-politikaj Aspektoj de la Esperanto movado*, D. Blanke 主编）就是类似的一部集体研究论文集。我想，这样的一部著作，将会受到广大世界语者甚至非世界语者的欢迎和重视，它同时也将把我们的世界语运动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无可怀疑的。

1999 07 05

一、世界语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

(一) 国际语和国际语的历史

1. 国际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世界语 (Esperanto) 是为了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根据人类语言自然演进的趋势, 吸收自然语的优点创造出来的, 作为国际语的杰出代表, 它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然而为什么会有世界语? 它的起源在哪里? 它是怎样诞生、怎样发展起来的? 要想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 还得先从语言的发展和国际语出现的历史背景谈起。

(1) 语言是不断进化的

我们知道,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人类从原始的野蛮生活进化到现在的文明生活,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依靠语言这个工具。有了语言这个工具, 人类才能够思考问题, 积聚并且交换经验和知识, 开展生产劳动和进行社会生活。假如从人类生活中, 除去语言这个工具, 那么人类社会将变成怎样一种情形, 是不可想像的。

《圣经》“旧约”中有一个传说: 古时人类的语言本来是统一的。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有无比的力量, 就开始在巴比伦地方建筑一座通天塔。天神们恐慌了, 他们不得不出一个巧妙的手段来分化人类, 即用分化语言这个办法, 叫人们相互间无法了解。结果人类就在塔下面打斗起来, 自相残杀。塔自然建不成了, 这样才保全了天神们的统治地位。这不过是一个传说, 但这传说却也道出了语言这一工具的作用之伟大。

传说归传说, 其实语言是社会劳动的产物, 并且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社会阶段, 由于各个部落间的接触很少, 同一部落也容易因扩大而分散迁徙, 人类语言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 是有过长期不断分化阶段的。然而,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特别是文字产生以后, 语言有了记录的工具, 语言继续分化的阶段趋缓, 各部落之间的往来接触开始日渐繁密, 各语言间也发生着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现象, 一些使用较少的小语种, 逐渐被广泛普及的大语种所替代。人类语言的自然演进逐渐呈现出趋同的发展态势。

就是说, 语言这个工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在进化的、发展的。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 氏族的方言转化为部落的语言; 部落的语言逐渐进化到民族的语言; 由口头的语言, 进化到书面的文字。为的都是要适应新的社会的新的需要。据统计,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上万种语言, 到 15 世纪时已减少到 9000 余种, 而今只剩下 6000 余种了。

(2) 国际语产生的历史背景

尽管人类语言的发展有趋同性, 然而这个过程是相当缓慢的。在我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里, 6000 种语言已是相当的繁多和庞杂的了。这情形正和在巴比伦塔下打斗着的古人一样, 各民族都在说着不同的语言, 用着不同的文字。这种语言上的分歧, 带给了人类许多的不幸。固然, 人类间的相互敌视, 各民族的彼此争斗和残杀, 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本原因, 可是语言的隔阂却增加了无数的仇恨和盲目的搏斗。因语言分歧, 各国文化难于融洽沟通, 这就严重阻碍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往,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改变这种相互隔阂和分裂的局面, 人们很早就幻想能有一种简单易行的、大众化的国际交际工具

——国际语的出现。这一美好的理想曾吸引和激励过许多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

然而国际语问题真正获得社会意义，则是在 19 世纪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以后的事情。这是由于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发达，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使经济迅速发展，人类交通更为便利，交往范围不断扩大，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从而打破了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的封闭圈。在从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国际关系是较少的，即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而一城与一城之间，常常都是老死不相往来，而今则有铁道，有飞机，朝发巴黎而夕可以抵君士旦丁或者维也纳，至于电报则在几点钟间，可以绕遍全球五大洲，虽有崇山之隔、重洋之阻，而可以互通声息，从此，人类之间的种种阻隔被打破了。

一方面，交通的发达使人“一日千里”，无线电话“瞬息可以走遍全球”，地球仿佛是变小了，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触频繁；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一天天发展，随时随地都有国际会议举行，但一开起会来，赴会的几十国人，你英文，我法文，他荷兰文，彼葡萄牙文，这便如苏州人、宁波人、厦门人、长沙人、福州人、广州人、海南人等聚于一堂，如果没有一种公共的普通话，这便如何得了？国际交往的频繁、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送技术的突飞进步，处处都要求克服语言分歧的障碍，于是，反映在语言上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语言隔阂成为国际交往中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了能够彼此沟通，人们不得不去学习多种语言文字，以致耗费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劳力和物资等等。假使能以学习外国语言所浪费的时间、精力去研究科学，相信人类的知识、成就必能比现在增加不少。而且对于个人来讲，要学会一二种外国语，不仅是浪费，而且是苦事。假若世界上的书籍都是用一种全人类所能了解的语言写的，那一定是便利多了。近代人发明了机械以节省劳力，发明了火车、轮船和飞机以缩短旅程，而今却唯独这语言从中作梗，严重妨碍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因此，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在现代生活中能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所必需的国际语，以适应世界经济、科技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呼唤下，各种国际语方案才应运而生。

所谓“国际语”是指那种不受国家和民族局限、便于国际交流的语言，它与本世纪初人们所幻想的“世界共同语”——即世界通用语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创造新的国际语的人，并不是要用新的语言去取代各个民族语言，而只是要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媒介语言推荐出来，以利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交流，弥补民族语在国际交往中的缺憾。

可见，国际语在近代的出现，显然和邮政电报、汽车、轮船一样，都是社会交际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就像氏族公社发展为部落时，需要有其内部的通用语“部落语”；在各大部落发展为民族国家时，也要有其内部的通用语“民族语”。现在当人类的经济、文化都突破了民族界限向国际化迈进的时候，语言的发展当然也要向超民族的国际语的方向前进了。

如今世界正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全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试看谁能说某一处的证券市场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物价，谁又能说某一国的经济政策不会影响到全世界呢。在这密切联系的世界中，一种能为各国、各民族所接受的“国际语”就显得特别需要和重要了。

(3) 国际语的中立性原则

有人说：任何一种语言，也就是任何一种民族语，只要大家都同意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它，语言的矛盾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创制一种国际语呢？

的确，用某一国的民族语来充当国际语，在语言应用的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历史地看，民族语言在国际间的运用，是从民族的经济发展开始的。如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拉丁语，在整整近十个世纪的历史阶段中，在西方世界扮演着通用语的角色。18 世纪的法国，工业发达，拿破仑时代由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扩张，使法语在国际交往中一度盛行，不但曾独占当时国际上的外交讲坛，甚至成为西方各国的宫廷、贵族以及所谓“上流社会”的公共语言。18 世纪

末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两国的工业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英美势力在全世界的扩展，使英语（现在事实上是美语）在国际交往中广为流行。然而上述现象都不是由于大家的同意或选择，而是当时某一国家政治、经济力量扩展的结果。它带来的后果是在国际交往中厚此薄彼的不平等，和对其他语言的歧视，因此，遭到了各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对。所以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拉丁语就马上为各新兴国家所唾弃；同样，法兰西帝国的衰落，也立即使法语在国外的光辉逐渐暗淡；在前苏联影响下，俄语曾在东欧各国、各民族中广泛推行，随着苏联的解体，它也正经历着拉丁语和法语的同一历程。只有英语，在一定的地区（如前英国的殖民地国家），一定的范围内（如许多国际会议），发挥着国际语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撑，在当代最尖端的国际交流工具英特网上，更是大行其道。有人惊呼，美国人正在用最现代化的“武器”——电脑和网络蚕食欧洲、乃至世界民族的文化。

那么，英语能成为通用的国际语吗？回答是否定的。且不说在世界范围里，就是在英语世界，英语也难以成为一种统一的语言。美国英语就不同于英国英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英语也不同于英美英语；还有正争论不休的黑人英语究竟算不算英语，尚无定论。这些不同英语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发音，更在于词法和句法，有时其变异性大于同一性。难怪有人在发问：“英语姓什么？”实际上，世界各地“洋泾浜英语”到处流行。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多元化的、多种民族文化并存的世界，各民族语言都是各自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厚重载体。在当代，国际格局多级化的态势更加明显，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要求民族平等和反对语言歧视的呼声，已经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强烈得多。哪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不急于挣脱过去所谓宗主国的语言枷锁呢！哪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外交家还甘愿接受某一外国语为本国的外交语言呢！因此，把英语作为通用的国际语，而让其他民族语言相应退居其后，不但遭到德、法、西、俄等大语种国家的反对，并且，在许多独立国家中和一些国际事务中，英语也经常遭到各种形式的抵制。否则，联合国为什么不能把英语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呢？！现在，即使在国际互联网上也已不是英语独霸天下了，而出现了汉语、德语、法语、西语、俄语、日语、韩语等各种民族语争相上网的局面，这其中也有本书介绍的世界语。应当指出的是：英语在当今的国际交往中比较流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此，英语不能成为通用的国际语，而且任何民族语也担当不了这个角色。

很显然，只有中立的、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丝毫没有霸权气味的语言，才能长期承担国际语的任务，进而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发展，而成为真正的世界通用语。然而这种超越民族的、理想的、中立语言在现实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它只能是人为创制的语言。就是说，只有人造的国际语才能真正坚守中立性原则。

几百年来，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仁人志士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希望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除了保持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外，还有一种共同的中立语言，以便于彼此交流思想、沟通感情、消除隔阂和误解，从而促进彼此间的平等和睦、友好相处、共同进步。国际语的实现就是这种理想追求的结果，它不但为谋旅行及工商业交往之方便，同时还为“国际心理”的养成和各民族思想情感的沟通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看，国际语的产生实在和近代一切的社会理想的发生有着同样的重大的意义。

人类社会实践表明：有共同语言的民族，即使不属一个国家，在交往中容易产生一种和谐的情谊，这主要是语言的作用。人类社会向着高度发达的方向，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那种世界大同的社会，各民族的交往与协作将更为广泛，要求有共同语言的趋势也必将更为强烈。这就决定了国际语的存在不但必要，而且有着宏伟的广阔的前景。

2. 国际语的简史

国际语理想的产生是相当早的。在古代中国就有“书同文，车同轨”的理想，即我们的祖先希望有统一的文字以便交流，希望有统一规格的道路以利交通。17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培根、柯明斯基、傅立叶，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语言学家舒哈特、萨丕尔、叶斯泊森等人，都探讨过国际语问题。莱布尼茨甚至长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曾提出过用逻辑和代数方法去构拟国际语的设想，因而被称为“国际语之父”。

限于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这些早期的国际语问题研究多为哲学性的、数理性的，主要是由理论推导而来，现实需要相对地说不迫切的，对其和现实民族语关系的考虑也是不充分的，因而仅仅是一纸方案而已。虽然这些方案因脱离实际而失败，但其功绩在于：论证了人类需要一种国际语，这种国际语形式要简单，易于学习，而且要有丰富的表达力。以后有不少哲学家、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

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市场的形成，各国贸易往来和人民交往的频繁，对国际语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各种国际语方案如雨后春笋。这些方案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新文字，而是以现有的民族语言材料为依据，经过整理而成，这就把国际语的研究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这些方案大多是以一种民族语为基础，或者以某几种同系的民族语为基础，不能照顾到全欧洲，更不用说欧洲以外的人民。所以这种国际语只能算作日耳曼族、斯拉夫族或其他民族的“国际语”。

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造国际语方案大约有500多种，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创造语(a priori)：纯粹是个人主观创造出来的，即是前面讲的属哲学类派。如苏格兰教育家达尔加诺(G. Dalgarno)的象征语(Ars Signorum)、法国音乐家胥德尔(F. Sudre)的索来索语(Solresol)、法国学者波拉克(L. Bollack)的蓝语(Langue Bleue)和福斯特神父(P. Foster)的逻辑语(Ro)。由于这些语言纯粹是个人主观发明创造的，脱离实际太远，因而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类是仿造语(a posteriori)，它是吸收自然语言中的一部分材料，经过加工整理简化而成。最著名的有六种：

(1) 世界语(Esperanto)，具体阐述见后。

(2) 无屈折拉丁语(Latino sine Flexione)，由意大利数学家皮阿诺(J. Penao)于1903年创造的。它的词汇完全采用拉丁语，读音以古拉丁语为标准，实际上它是一种简化的拉丁语，由于难学很快被淘汰了。

(3) 伊多语(Ido，即世界语的后代)，是由法国的波弗朗(L. de Beaufront)和古都拉(L. Couturat)于1907年联合创造的，它实际上是以世界语为基础经修改创制的，是一种改良的世界语。在全盛时期，曾有21个国家建立了宣传中心，并设有国际学院，出版机关刊物，但是由于语法太复杂，最后被淘汰。

(4) 奥克西丹塔尔语(Occidental)，由爱沙尼亚学者瓦尔(E. V. Wahl)于1922年创造，它是尽量保持罗曼语族外貌的一种方案。

(5) 挪维阿尔语(Novial = nov 新 + international 国际 + auxiliary 辅助 + language 语言)，由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 Jespersen)于1927年创造的，它是伊多语和奥克西丹塔尔语的折衷方案，该语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西欧语言的样式，在词汇上选用了国际化的印欧语系词汇，语法属分析型。由于是语言学家书房的产物，实际上是昙花一现，很快被人遗忘。

(6) 英特林瓜语(Interlingua)是美国语言学家高德(A. Gode)于1951年发明的。

第三类是混合语类，是介于仿造语和创造语之间，它的词汇是来自自然语，语法是人为创造的。混合语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沃拉普克语(Volapuk = Vola 世界, puk 语言)，它是德国神父约翰·马丁·史莱耶尔(J. M. Schleyer)于1879年创制的，其全盛时期曾经拥有283

个团体，20多万信徒，曾用25种文字印过316种课本，发行杂志25种。这种语言的词汇多取自拉丁语和英语，但借入的词根被任意改动。它的语法是一个演绎性很强的系统，名词有四个格，动词带人称后缀，等等，都过于复杂。沃拉普克语中人为规定的东西太多了，方案的缺点太显著了，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尖锐的批评。它的支持者们提出修改方案，企图使它完善起来，但史莱耶尔把沃拉普克语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拒绝对他的语言作任何修改，于是他的信徒转而支持其他国际语方案，这种语言也随之消亡了。但是无论如何，沃拉普克语向世界证明了人造语作为国际语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创造这类语言的经验教训，因而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世界语（Esperanto）属第二类即仿造语类，它是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博士（L. L. Zamenhof）于1887创造的。柴门霍夫在公布这种语言方案时使用的笔名是“Doktoro Esperanto”（意为“希望者博士”）。人们为了把它与其他国际语方案区别开来，就把这种语言叫 Esperanto。在本世纪初，当它传入中国时，有人曾把它音译成“爱斯不难读”语，也有称“爱世语”、“万国新语”的。以后人们借用日本人当时的意译名称，叫它为“世界语”。现在日本已改用音译名称，但中国一直沿用至今。实际上称 Esperanto 为“世界语”是不准确的，容易造成它就是“世界通用语”的误解。不过，中国世界语者仍坚持用“世界语”这一名称，大概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国际语理想的矢志不渝的追求。因为他们坚信，Esperanto 就是理想的国际语。世界语的语法较之沃拉普克语大大简化了，它有合乎逻辑结构的词汇，很快就有了大批热心的追随者，后来还出现一批数目可观的文献。许多世界文学名著都被翻译成世界语。曾经是沃拉普克语者的好些人，都转为了世界语者。为了改进世界语、修改世界语，人们曾做了无数次的努力，但结果都失败了，其中包括后来来自成一派的、由波弗朗和古都拉创立的伊多语。所以世界语是仿造语言中最成功、流行最广的国际语。

20世纪以后出现的一些国际语方案，其设计主要是为了科技上的应用。它们强调认字，而不是着眼于积极的交谈。以后，1936年又有国际图形语，1950年有反巴比伦语，1951年有国际辅助语协会的中介语（Interlingua, IALA）。后来还有好些别的方案（包括迟至80年代出现的演绎语 Emsighay 和归纳语 Adli）。但是没有一个方案能取代世界语—Esperanto 的。

3. 世界语是理想的国际语

人造语也经历了一番优胜劣汰的竞争。在世界语（Esperanto）发表以前产生的数百种国际语方案中，由于它们本身的技术上的缺点，特别是它们虽然注意到中立足于各民族语的原则，却未能注意正确对待各民族语的历史遗产。其中一些企图完全离开语言传统去创造某种新的符号系统，以执行语言的功能；也有些想以某一民族语为基础改造成新的比较合理、简易的语言，事实上回到了某一民族语改革的道路。因此，那些方案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无法成为国际间共同的交际工具。所以它们大都流行不广，寿命不长。

世界语作为几百种人造语言中的一个典型语言，堪称是最理想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它之所以能从一种个人的方案变成为一个国际群体的活生生的语言，是因为它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不受种族、民族的干扰，是一种共同所能接受的中立语言，并且它能适应国际现实的需要，正确地处理国际语与民族语的关系，所以易于为各国人民所接受。世界语至今受到青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具有严密完整的语音、语法、词汇体系，比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好学。其表达力之强可与自然语言相媲美，这在世界语一百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因此，世界语最终战胜了同时代的各种人造语，成为当今在各国人民间多方面使用的一种国际辅助语。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世界语是一种易学、易懂、科学的语言。它吸收了印欧语系中诸语言

的长处，摒弃了它们的短处。世界语诞生以后，它又和当代各民族语言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它是作为各民族的辅助语言进入国际交往的，它是为适应国际交往的方便而诞生，并随着国际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益丰富。由于它的宗旨是促进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支持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和广泛使用。不仅如此，世界语还受到各国语言学家们的关注，不少语言学家盛赞世界语的宗旨和科学性，并带头学习世界语，成为本国世界语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世界语诞生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作为一种国际的中立语言，它有助于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创造更和谐的世界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现在任何人要研究国际语，都不能不研究世界语。在世界语身上，寄托着国际语的希望。

（二）世界语的起源和内在理想

1. 柴门霍夫创造了世界语

拉扎罗·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azaro Ludoviko Zamenhof）于1859年12月15日生于波兰格罗德诺（Grodno）郡的比亚韦斯托克（Bjeloostok 波兰原名为 Biatystok）。当时这地方是沙皇俄国的属地，住着俄罗斯、日尔曼、波兰和希伯莱等四种民族，他们各操各自的语言，其中犹太人占66%，然而却是最受压迫的民族。由于语言隔阂，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时有发生。柴门霍夫就是出生在这个民族杂居而民族之间又互相敌视的地方，他的童年时代也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正是这种生活造就了柴门霍夫伟大的一生——为人类的友爱与和平奋斗终身。

少年的柴门霍夫曾为同一国土上的居民之间如此生疏而感到痛心，也为整个世界的相互仇恨而觉得痛苦。他常常想，如何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彼此仇恨呢？假如各民族都能够互相很好地了解，假如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严重阻碍彼此自由交往的语言壁垒，那该多好啊。为此，他决心为打破这民族之间的壁垒而努力。于是他开始考虑选择一种各民族都能接受的语言。哪一种语言才能被全世界采用？波兰人憎恨俄文，俄国人不要德文，德国人不容忍法文，法国人拒绝英文。怎么办呢？假如人人除了自己的语言以外，都学会一种国际的语言，到那时候，他们都能够借助它互相沟通、互相了解，从而消除彼此间的误解、隔阂和仇恨，那多好啊。

1869年至1873年，柴门霍夫在该城的一所小学读书。这时期他就有了建立人类博爱大家庭的愿望，由于他的特殊天赋，这种愿望很快同创造国际语方案的行动结合起来。创造超民族的、中立的国际语反映了犹太人的无依靠感和渴望人类互相了解的心愿。1873年12月，他家迁居到波兰首都华沙，所以这年年底他转到华沙语言中学读书。他的父亲是中学的外语教师，所以他也很喜欢语言，能流利地讲俄语、波兰语和法语，这三种语言是他童年时代就已掌握了。在这所中学里，他又学会了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八种语言，这为他日后创造国际语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当他还是个16岁的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国际语的研究了。他通过种种试验，设想了许多种新的语言方案，其中包括以古代拉丁语为基础的方案。然而各种方案都存在着难以掌握的庞大的词汇量而无法采纳。后来他从俄语的词缀得到启示，终于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即通过添加词缀的办法来构成新词，这样一来，那庞大的、令人烦恼的词典似乎在柴门霍夫的眼前缩小下去了。1878年当他上中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完成了国际语的方案，并于同年12月5日和七八个青年学生举行了这种语言的诞生仪式。但是，他太年轻了，才刚刚19岁，此时要正式发表他的著作还为时尚早。1879年7月，他中学毕业了，便到莫斯科大学学医，这时他答应父亲在大学读书期间暂不搞他的新语言，并把有关研究

材料交给父亲保存。1885年他大学毕业后，取得了行医证书，开始从事眼科医生的工作。他一方面行医，一方面进一步精炼完善了他所研制的语言方案，并制定了简明的16条文法规则。1887年7月，在他未来岳父的资助下，他自费出版了这种新语言方案《第一书》(Unua Libro)。柴门霍夫在《第一书》中声明，他放弃一切个人权利，他只愿做这个新语言的创始人，而把创造和丰富它的权利交给了世界人民，所以他创造的这种语言在千百万人的实际应用中日益丰富完美，逐渐流行于全球，这种语言就是现今被我国称之为“世界语”的国际辅助语。

1888年，柴门霍夫发表了《第二书》；1890年，他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出版了《世界语读本》、《世界语字典》、《练习题集》以及《哈姆雷特》等世界语译著。1903年，他的《世界语基础模范文选》出版，为世界语文学语言树立了典范。

柴门霍夫是在1887年《第一书》发表后结婚的，为生计所迫，一直到1897年，他先后在华沙等地四处奔波，以行医为生；1898年初，他在华沙犹太区安家，在那儿继续从事医务行业，同时，他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和应用，直到1917年4月14日因心脏病去世。柴门霍夫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人类的相互了解和国际和平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后人的爱戴和敬重。每到他的生日来临，全世界的世界语者，不分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位高低，不分职业，不分肤色人种，都自发地集聚在一起，召开纪念会，以缅怀和悼念他，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少有的。

世界语一经问世，就以其反对民族歧视、促进人类相互了解和世界和平为其宗旨，并以其科学性、实用性和丰富的表达力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语言没有被强权政治所扼杀，没有被野蛮的战争所摧残，也没有被世俗偏见所禁锢。它很快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学习世界语的队伍不断壮大，知音也越来越多，以至形成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广泛的群众运动，这是学习任何语言所没有的。

2. 世界语主义与世界语的“内在理想”

世界语运动所以能成为具体的事实，全因为除了文字以外，又有世界语的独立的理想和精神的缘故。这种理想和理想就是“世界语主义”和世界语的“内在理想”。1905年在法国布伦开第1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时候，曾通过著名的《世界语主义宣言》，在这宣言里所说的“世界语主义”，包括下列五点内容：

(1) 世界语主义是在全世界推广使用中立人类语的一种主张，这个语言“不干涉各国人民的内部生活，也毫不企图排斥现存的各种民族语”；它可以给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互了解的可能；它在各民族互争语言特权的国家内，可以作为各种团体的调和语言；对各国人民具有同等意义的著作，可以用它来发表。这个或那个世界语者联系于世界语主义的任何其他理想或希望，完全是个人的事，世界语主义对之不负责任。

(2) 由于现代全世界的研究者对于国际语必须是人工的语言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人再表示怀疑，由于最近数百年来创造的无数草案都仅仅提出了理论的计划，可是真正完成的、各方面经过试验的、完全有生命力的而且在各种关系上最为适用的，只有世界语这一个语言；国际语理想的朋友们，意识到理论的争论将会毫无结果，只有实际工作，才会达到目的，所以很久以前，大家便都团结在世界语这一个语言的周围，并努力推广它、丰富它的文献。

(3) 由于世界语作者，一开始就永远拒绝了有关这个语言的一切个人权利和特权，所以世界语无论在物质上，无论在精神上，“不是任何人的私有物”。

这个语言素材的主人是全世界，谁都可以用这个语言出版东西，或者出版这个语言的一切他所希望的著作，和在一切实活动中使用这个语言；至于可以认为是这个语言的精神主人的，则永远是那些在世界语者间认为是这个语言最优良最有才能的作家们。

(4) 世界语没有个人立法者，也不依赖任何人。世界语创造者的意见和著作，就和任何

别的世界语者的意见和著作一样，仅仅是个人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性。

每一个世界语者唯一必须遵守的世界语基础，就是《世界语基础》那本小书。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那本书里做什么改动。如果有人违背了那本书中的规则和模范，他永远不能以“世界语作者愿意这样或劝告这样”作辩护。一切不能以《世界语基础》中的材料适当表现的概念，每一个世界语者都有权利按照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去表现，就和在任何别的语言中所作的一样。可是，为了这个语言的完全统一性，所有世界语者应该尽可能摹仿世界语创造者各种著作中的文体，他是为世界语工作最多、使用世界语最多、也是最清楚了解世界语精神的人。

(5) 每一个懂得世界语和使用世界语的人，都可以称为世界语者，不管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应用它。每一个世界语者最好加入某种世界语者活动的团体，但不是强迫的。

所谓“世界语主义”——世界语者所信守的规则就只是这几条。所以“世界语主义”并不是什么艰深的理想，实在是谁都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有一部分的世界语者，为柴门霍夫自己的人格所感动，把世界语的事业，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和一种爱世界、爱人类的广泛的教义。

社会生活的产物，常常伴随着某种社会理想。世界语也有其伴生的理想，那就是“人类爱”。开始它还是朦胧不清的一个理想，以后就具体化为“人类一员主义”。“人类爱”或“人类一员主义”，就是世界语的“内在理想”。柴门霍夫想以这种理想为基础规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关系。这是在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为其直接感受到的痛苦而设想的一个救治药方。这个药方虽然未触及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然而它有助于激励人们反对、斥责社会罪恶，并努力追求一种人类的新社会。

世界语是世界语主义的物质体现，是人类社会进步重大课题的实践，绝大多数世界语者在使用世界语的同时，也实践着世界语主义的主张，他们团结在绿星（绿星：世界语的标志，它象征希望）的旗帜下，彼此间视为有共同理想的战友与兄弟，提倡仁爱、友善、理解与奉献。

（三）世界语的特点

一切自然形成的民族语，在构造上总免不了有许多约定俗成的“例外”，因此缺乏规律性。世界语由于是“人造语”，它以自然语为原料，但经过了人工的科学整理。所以它的构造从构词以至语法，都有高度的规律性。简单而整齐，周密而合理。这种构造上的高度规律性，使得世界语比任何一种民族语都易学、易读、易写、易懂，从而有利于推广。世界语的科学性与容易学习的特点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

1. 语音发音与拼读一致

世界语采用 28 个拉丁字母，其中元音 5 个：a e i o u，与汉语拼音音形相似；辅音 23 个，其中有 12 个与汉语拼音音形相似：b c d f k l m n p s t z，其余 11 个与汉语拼音也很相似，例如：世界语 ĝ=汉语 zh，ĉ=ch，ŝ=sh，ĥ=h，j=y，ĵ=r 等。发音是一字一音，且无变音和不发音字母，怎么读就怎么写，重音永远在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所以，世界语的发音与拼读在拼音字里是最容易的，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很容易掌握。例如：bona（好的），bonulo（好人），diligenta（勤奋的），diligentulo（勤快人）等，拼读很易于掌握。

世界语语音优美、动听，富有节奏感，这主要是因为其元音丰富，大多数单词都是用元音结尾，特别是字母中有响亮的 r 音，听起来十分悦耳，给人一种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的韵味。

2. 词汇丰富，富有表现力

世界语词汇的简炼规则可归纳出以下几点：

(1) 规范词尾，使之在句子中的功用一目了然，既便于学习掌握，语法功能又强。名词词尾用 **o**，形容词用 **a**，副词用 **e**（少数除外），动词不定式用 **i**，现在时为 **as**，过去时为 **is**，将来时为 **os**，假定式为 **us**，命令式为 **u**，宾格加 **n**，复数加 **j**。即使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却可通过词尾知道它是哪一类单词，而且还可以知道它在句子中扮演什么角色。

(2) 前缀与后缀的规范与使用，使之构词能力极强，一个词可以派生出很多词，这就大大地减少了基本词汇的数量。一般记忆 500 个左右的常用词根，就完全可以进行语言交流了。例如：词根 **bel**（美）和前缀 **mal**（相反、...的反面）结合，就构成 **malbel**（丑）；加现在时动词词尾 **as**，**malbelas**（丑、不漂亮）；加名词词尾 **o**，**malbela**（丑，丑恶、丑陋）；加形容词词尾 **a**，**malbela**（丑的，丑恶的，不好看的）；加后缀 **ul**（人），**be lu lo**（美男子），**malbelulo**（丑男人）；加后缀 **in**（女性），**belulino**（美女），**malbelulino**（丑女人）；加后缀 **ig**（使成为），**beligi**（使美丽，修饰，美化），**malbeligi**（使变丑，使不好看，丑化）；加后缀 **-ej-**（场所），**beligejo**（美容所）；加后缀 **-aĵ-**（表示物、事），**belajaĵo**（装饰品，美的事物），**beligaĵo**（化妆品）；加后缀 **-et-**（表示小，指爱称），**beleta**（不太漂亮但却讨人喜欢的）；加后缀 **-eg-**（巨大），**malbelego**（极丑）；加后缀 **-ist-**（表示职业地、经常地、爱好或从事某种事的人），**beligist(in)o**（化妆师，美容师）。

世界语的词缀在世界语语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简化了又丰富了世界语本身。它省去的是大批不必要的新词，丰富的是世界语的表现力。

(3) 创建相关词表，把人们常用的代词、副词和形容词归入该表，便于记忆和使用。

世界语相关词表

词类	i-	k-	t-	ĉ-	nen-	
	不定	疑问，关系	指示	集合	否定	
代词	-u	iu	kiu	tiu	ĉiu	neniu
	个，人	某（人）	谁，哪个	那个（人）	每（人）	没一个（人）
	-a	ia	kia	tia	ĉia	nenia
	性质	某种的	哪样的	那样的	各样的	一样也没有的
	-o	io	kio	tio	ĉio	nenio
	事物	某事物	什么	那事物	一切	什么都没有
	-es	ies	kies	ties	ĉies	nenies
	所有	某人的	谁的	那人的	每人的	无人的
副词	-e	ie	kie	tie	ĉie	nenie
	地方	某处	何处	那里	到处	无处
	-al	ial	kial	tial	ĉial	nenial
	原因	因故	为什么	所以	各种缘故	无缘无故
	-am	iam	kiam	tiam	ĉiam	neniam
	时间	某时，曾经	何时，当...时	那时	时刻，永远	从未，永不
	-el	iel	kiel	tiel	ĉiel	neniel
	方式	某样的	怎样，如	那样，如此	用尽方法	绝不
	-om	iom	kiom	tiom	ĉiom	neniom
	数量	一些，有点	多少	那么多	所有的	毫无，毫不

(4) 世界语的词汇大部分来自印欧语系的拉丁语族、日耳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即大量采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英语、俄语等已经是国际通用的词根，但世界语

词汇规则好记，所以学会世界语，再学上述民族语，在记忆词汇上就容易得多。这对于学过一种欧洲语言的人，这些词根不需要再记忆，只须按世界语的读音去读即可。

2. 语法简明而无例外

柴门霍夫只规定了 16 条语法规则，掌握了这 16 条语法规则，就能正确地遣词造句。世界语革除了西方语言中复杂的语法规则，删掉了不必要的性、格、人称等语法变化。所以学会世界语，再理解任何一门西方语言，就不觉难而容易接受多了。拿时态来说，英语的时态十分复杂，变化多端，很不容易掌握，而世界语的时态只有 12 种词尾，一学就会。比起任何一门自然语来说，世界语语法的特点一是严谨，二是简练，三是自由。所谓严谨，世界语的句子成份严格按照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来界定，句子成份的语法特征鲜明；所谓简练，民族语中复杂的语法现象，在世界语中都用简捷的形式来表达，如复杂时态、被动语态、复合句的连接等；所谓自由，句子结构与语序的编排没有教条式的规定，也没有“约定俗成”的东西，只要用好成份特征，其句子由你根据需要任意编排。因为世界语有宾格词尾“n”，使主、谓、宾一目了然，即使颠倒句子词序，意思也十分清楚。

总之，有了这几个优点，世界语可以算得最完备的人造语了。

（四）世界语的发展

1. 世界语的优越性是其发展的基础

世界语从诞生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在数千种语言中应该算是最年轻的语言之一，但它的发展速度却是比较快的，影响范围遍及全球。目前全世界学习和应用世界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千多万，它所取得的成功十分引人注目，它在国际交往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要归功于世界语本身的优越性。

(1) 世界语不是民族语，而是中立的国际辅助语，它不干涉各民族的内部事务，也不企图取代各民族语，它只是在进行国际交往时为各民族提供一种语言辅助工具，因此，任何一个民族使用它，都不会伤害本民族的民族感情，所以易于被人们接受。

(2) 世界语读写统一。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没有不规则的变音或不发音的字母，重音永远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所以学会了发音自然就会念出世界语所有的单词，也为人们的记忆减轻了不少负担。

(3) 世界语虽然不是自然形成的语言，而是人工创造的语言。它的创造是建立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基础上，吸收了欧洲各主要语言的长处，去掉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而采用了其合理的部分。由于它拥有广泛的多种民族语言基础，使人感到并不完全陌生，在感情上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例如它的相当一部分词汇是采用国际通用的词根，加上前缀、后缀或词根的拼合来构成新词，因此，学习一千多个世界语词根，就能造出三、五千个新词。记世界语单词要比其他民族语言省力很多。

(4) 语法规则只有 16 条，富于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没有不规则变化，比较容易学习和掌握。

(5) 语言表达比较丰富，有准确和细腻地描述事物的特点。这不但已在文学艺术上有所体现，而且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到之处。

世界语正是由于具有上述公认的优越性，才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成为一种完善的国际辅助语。世界语之所以能够战胜同时代的各种人造语，也全因为其构造完善的缘故。与英语、

法语等民族语言相比较，世界语是容易学习的，因为它扬弃了不合理的繁琐，避免了不必要的困难，想方设法用尽可能精简的手段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许多人都认为世界语完全可以与自然语言相媲美。因而它的诞生和发展可以说是语言学上的一大成功。

2. 世界语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由于世界语是一种“国际性语言”，所以很明显地形成了一个世界语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各种民族、各种种族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最初世界语运动仅限于一个或几个国家，后来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最初主要还是在欧洲，进而推广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世界语的应用范围也扩展到了各个领域。

很快，世界语就活在了千万人的口头上，应用于数以万计的书刊出版上，应用于各国人民的国际通信上，荡漾在许多国家广播的电波上。很多世界语者依靠它旅游世界各地。丰富的世界语文学书刊使它具有强大的文学传统。在有几十个国家几千个世界语者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中，从大会讨论到分组活动，从大会大学的学术报告到一切文艺节目的解说、表演都用世界语这一种语言，使之成为唯一不用翻译的国际会议，它为各种国际会议中语言障碍的解决提供了典型和良好的范例。

现在，世界上已有 100 多个国家有学习和推广世界语的组织。在国际上除了世界上最大的最权威的世界语组织国际世界语协会外，还有 100 多个专业性的世界语者国际组织，如：世界语者教师协会、医学协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新闻记者协会、语言学者联合会、数学家协会、地理学家协会、法学家协会、音乐家协会、艺术家协会、作家协会、教科文同盟、哲学协会、商业与经济联盟、计算机学会、建筑家协会、旅游协会、铁路员工联合会、邮政电信职工协会、无线电爱好者协会、摄影录音工作者协会、鸟类学团体、围棋协会、童子军、象棋协会、盲人协会、集邮家协会、素食协会、佛教协会、天主教同盟、基督教联盟、伊斯兰运动、瑜伽学会、宠物学会、道学会等等。这些国际世界语机构的总部大都分布在欧美各国，都是由国际上该领域权威人士担任领导。这些机构都出版总计有百种之多的专业性世界语期刊，举办年会、学术会议和各种活动，使世界语在科技文化交流、旅游、经贸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

用世界语进行国际交往，最普遍采用的是国际通信。国际世协内设有专门机构，向全世界的世界语者提供通信服务；国际世协在世界各大城市共委任了 2100 多位联络员，他们提供包括通信在内的多项服务，各个国家级的和地方的世界语组织也都把组织国际通信作为一项工作；世界语刊物一般都有“征求信友”栏目；整个世界语的国际通信网络，可以说是国际世界语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 100 多个专业性的世界语国际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的世界语协会和庞大的世界语国际通讯网络，是各国世界语者走向世界的最好“接口”。此外，还有其他多种交往形式，可供人们选择，例如：参加各国举行的世界语大会和国际大会，学术活动，经贸旅游，文学竞赛，应邀考察、讲学，信友互访，建立绿色家庭，与国际世协的 Interreto³ 联网等等。

关于世界语在文化、科技、新闻、广播、出版、邮政、教育、文学、旅游、通讯、经贸等领域的应用情况，将在本书有关章节作详细的论述，从已知的成果看，人们不难看出，世界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充分证明世界语的发展已深得人心，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成功的实践。现在世界语已逐渐取得一些国际性组织的重视以及部分国家政府的承认，这是世界语生存、成长的自然结果。但世界语本身的生命力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和国际交流活动中的成果则更为重要。

一百多年来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世界语作为国际交往的语言工具，它完全能够起到国

³即 internet 互联网。

际辅助语的作用。但目前，这种作用常常被享有语言霸权的英语所代替，这是由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现实所决定的。人们对人造语的世俗偏见和旧的习惯，也影响世界语的推广和应用。但是，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向着越来越有利于国际语的方向发展。从政治方面看，随着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民族不分大小，国家不论强弱，在国际交往中要求一律平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联合国为例，现在使用英语、法语、汉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六种工作语，已经给翻译、出版增加了不堪重负的工作量，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但是要求增加日语、德语和其他民族语的呼声越来越高。从经济方面看，现在正处在生产大发展，经济大循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从科技发展方面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及时沟通信息，掌握情报，开展科技成果的交流，但是主要的障碍还是语言问题。全世界各个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给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造成很大的困难。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解决国际语的问题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迫切，而世界语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1954年12月10日在第4届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蒙得维的亚决议，正式将国际世界语协会列为教科文组织B级咨询关系单位；1997年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又一次确认并与国际世界语协会建立了正式的业务关系。（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 en oficialaj rilatoj kun UN kaj Unesko）。80年代以来，联合国更重视这一点，安南秘书长曾多次致电国际世界语大会，肯定国际世界语协会在这方面的工

3. 世界语国际性组织

根据国际世界语协会1999年出版的《年鉴》统计，现有专业性国际世界语组织共80多个，其中已加入国际世协的有9个，同它有合作关系的38个，还有2个属全世界世界语者青年组织（TEJO）的成员。其他35个与国际世协没有正式关系。现择其主要者简要介绍如下：

（1）国际世界语协会（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简称UEA）。成立于1908年4月28日。协会章程宣布：国际世界语协会是个中立的世界语组织，正式语言是世界语；其宗旨是：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各种联系提供方便，创造一种加强该会成员团结的坚固纽带。成立初期，它的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协会的机关刊是《世界语》（Esperanto）。1908年召开的第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柴门霍夫说：“国际世界语协会无疑是我们运动中最重要机构。”

成立三个月后，国际世协已拥有会员1300人，在各国的联络员近400人。到1914年有7000多个会员。在5年内为会员提供的服务达45000多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世协利用其在中立国瑞士的方便条件并通过在各国的联络员，为交战国的居民免费转寄信件、衣服、食品、药品，寻找亲人，护送青年和儿童等。这种人道主义的服务每年达十余万次，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高度评价。

从1955年起，国际世协的总部转到荷兰鹿特丹。根据荷兰法律，国际世协是财团法人。1980年，又通过了新的章程，规定其宗旨是：为解决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问题而努力；便于人们之间的各种精神的物质的联系，不管其国籍、种族、性别、宗教、政治和语言的差别；在会员中培育一种团结的坚强感情并启发他们对其他人民的理解和尊敬。

国际世协由集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集体会员即作为国际世协会员国集体加入的会员。凡承认国际世协章程并每年交纳会费的各国世界语组织、中立的国际专业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都可加入国际世协，成为集体会员或个人会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是1980年在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被接纳为国际世协集体会员的。到1998年为止，国际世协在120个国家中，共有个人会员7360人和集体会员12812人，共20172人。1956年，全世界世界语者青年组织成为国际世协的青年部。

国际世协的最高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会员国的代表、个人会员选举的代表以及由前两种代表所选举的有经验的世界语者组成。执委会的任务是：制定协会总的行动方针；决定协会的章程；选举协会的领导机构；规定领导机构的活动；批准协会的预算和审查财政情况；决定协会的各种会费；表决接纳申请加入协会的各国世界语组织和国际性专科世界语组织；推选协会的名誉主席、名誉会员以及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国际世协的最高荣誉职务是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目前共有 12 人。我国的巴金、胡愈之、陈原分别于 1981 年、1984 年和 1986 年被推选为该会委员。国际世协领导机构对执委会负责。执委会和领导机构任期为 3 年。

(2) 世界语研究院 (Akademio de Esperanto)。它是世界语的语言研究机构。1905 年由柴门霍夫建议创立，当时叫语言委员会 (Lingva Komitato)，由 96 人组成。柴门霍夫任临时主席。1906 年通过了章程并选出专职主席。成员增至 102 人，分布在 26 个国家。它的任务是保护和维持世界语的基本原则，并检查它的发展。它分公共词汇、语法、技术词汇 3 个工作组，还设内务、专用名、造词、口语和检查等项工作。1908 年改为世界语研究院，并在巴黎出版《正式杂志》(Oficiala Gazeto)，后改称《正式公报》(Oficiala Bulteno)。1992 年出版院刊《文献》(Aktoj de la Akademio)。1964 年通过新院章，院士限定在 40 人左右，其中有任 9 年的，有任 5 年的，由院士们投票产生。1925 年中国的黄尊生当选为委员 (院士)，1956 年黄再次当选。1983 年李士俊当选。1986 年谢玉明当选。

(3) 全世界超民族协会 (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 简称 SAT)。1921 年成立，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现有会员 3000 人左右。每年七、八月份举行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由 7 人委员会作年度活动报告，出版机关刊《超民族主义者》(Sennaciulo) 和社会政治、文学类年刊《超民族杂志》(Sennacieca Revuo)。最近三、四年在我国发展会员十多人。

(4) 全世界世界语者青年组织 (Tutmonda Esperantista Junulara Organizo, 简称 TEJO)。成立于 1938 年，1956 年成为国际世协青年部，现在 40 个国家中 (包括中国在内) 设有分部，到 1998 年止，共有集体会员 1959 人和个人会员 728 人。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每年举行国际青年世界语大会。出版季刊《国际世界语者青年组织》(TEJO tutmonde) 和双月刊《接触》(Kontakto)。

(5) 世界语者世界和平运动 (Mondpaca Esperantista Movado, 简称 MEM)。1953 年在奥地利成立，现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它的宗旨是：应用世界语，服务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6) 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联合会 (Internacia Fervojista Esperanto Federacio, 简称 IFEF)。成立于 1909 年，现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团体会员国 24 个，个人会员 1461 名。1953 年加入国际世协，成为该会的专业组织。总部设在丹麦。它的宗旨是：在铁路管理方面和铁路员工中间推广、应用世界语。该会出版会刊《国际铁路员工》(Internacia Fervojisto)。

(7) 全世界世界语者新闻记者协会 (Tutmonda Esperantista Ĵurnalista Asocio, 简称 TEĴA)。成立于 1948 年并与国际世界语协会合作。其宗旨是为从事新闻工作的世界语者服务。每年在国际大会上召开年会。出版会刊《国际新闻记者》(Internacia Ĵurnalisto)。

(8) 集邮家世界语协会—世界语收藏者之友社 (Esperanto Ligo Filatelista / Amika Rondo de Esperantaj Kolektantoj, 简称 ELFAREK)。成立于 1968 年，1996 年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其宗旨是为世界语集邮、收藏服务，让集邮者了解世界语。出版会刊《绿色放大镜》(La Verda Lupeo)，主要报道新旧世界语邮品及其他有关邮票展览等。

(9) 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 (Internacia Ligo de Esperantistaj Instruistoj, 简称 ILEI)。成立于 1949 年，该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关系，在 26 个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有分支组织，会员 746 名，1990 年加入国际世协。其宗旨是推动世界语教学，培养师资，组织考试，致力于现代学习用品。出版会刊《国际教育学杂志》(Internacia Pedagogia Revuo) 和

《青年朋友》(Juna amiko), 均每年4期。

(10) 世界语者残疾人协会 (Asocio de Esperantistaj Handikapuloj, 简称 AEH)。成立于1991年, 1996年与国际世协建立合作关系, 现有250名会员, 其宗旨是在残疾人中间推广世界语, 使他们有可能参加到世界语运动中来。出版月刊《残疾人通讯》(Informilo de EH)。

(11) 国际邮政电信职工世界语协会 (Internacia Poŝtista kaj Telekomunikista Esperanto-Asocio, 简称 IPTEA)。成立于1966年, 1968年开始与国际世协合作。其宗旨是在邮政、电信界推广、使用世界语, 出版会刊《纽带》(Interligilo), 主要报道邮政、电信方面的专业问题, 同时也载有集邮、技术新闻等文章, 季刊。

(12) 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 (Universala Medicina Esperanto-Asocio, 简称 UMEA)。成立于1908年, 并同时加入国际世协。在6个国家有分支机构, 在19个国家有联络员, 现有350名会员。其宗旨是在医学界推广使用世界语。出版会刊《国际医学杂志》(Medicina Internacia Revuo), 每年出两期, 和不定期刊物《医学快递》(Medicina Kuriero)。

(13) 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协会 (Internacia Scienca Asocio Esperantista, 简称 ISAE)。成立于1907年, 该会为国际世界语协会的专业组织, 下设天文、经济、语言学、地理、化学、计算机、数学、专业名词中心等分会。其宗旨是在科学技术界推广使用世界语, 大约250名会员, 在18个国家(包括中国)中有联络员。出版会刊《科学杂志》(Scienca Revuo)。每年两期, 每期登载各种科学论文及知识性文章。

(14) 国际世界语者围棋协会 (Esperantista Go-Ligo Internacia, 简称 EGLI)。成立于1979年, 同年与国际世协建立合作关系, 现有会员大约150名左右, 分布在28个国家, 会址设在日本东京。该协会宗旨是: “用围棋来宣传和推广世界语, 用世界语来发展围棋。” 该会的代表大会, 通常每年在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召开。该会不定期出版会刊《借围棋推广世界语, 借世界语推广围棋》(Esperanton per Goo, Goon per Esperanto)。

(15) 国际世界语者无线电爱好者协会 (Internacia Ligo de Esperantistaj Radio Amatoroj, 简称 ILERA)。成立于1970年, 并同时与国际世协建立合作关系。其宗旨是在无线电界使用世界语, 在无线电爱好者中推广世界语。出版季刊《协会简报》(ILERa Bulteno)。

(16) 世界旅游协会 (Monda Turismo, 简称 MT)。1970年成立于维也纳, 1992年加入国际世协。其宗旨是用世界语为旅游服务, 方便世界语者, 在组织和参加旅游中体现世界语的价值。会址设在波兰比得哥什。出版会刊《世界语旅游》(Esperanto Turismo)。

(17) 世界语作家协会 (Esperantlingva Verkista Asocio, 简称 EVA)。1983年7月, 在第68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成立, 1984年与国际世协建立合作关系。其宗旨是鼓励世界语文学活动, 提高世界语文学创作水平, 使社会各界承认世界语文学的价值。在月刊《源泉》(Fonto)杂志中开办《协会专栏》, 每年两次。

此外, 还有一些国际性的学术、文化、教育、科学等专业世界语团体。例如: 国际世界语者农业专家协会 (Internacia Ligo de Agrikulturaj Specialistoj Esperantistoj, 简称 ILASE), 国际世界语者艺术家协会 (Universala Artista Ligo de Esperantistoj, 简称 UALE), 国际圣经学者和东方学者协会 (Internacia Asocio de Bibliistoj kaj Orientalistoj, 简称 IABO), 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 (Ligo Internacia de Blindaj Esperantistoj, 简称 LIBE), 国际世界语者骑自行车者运动 (Biciklista Esperantista Movado Internacia, 简称 BEMI), 国际哲学学会 (Filozofia Asocio Tutmonda, 简称 FAT), 佛教世界语者协会 (Budhana Ligo Esperantista, 简称 BLE), 新生物术语引进协会 (Asocio por la Enkonduko de Nova Biologia Nomenklatur, 简称 NBN), 世界语者绿化工作者协会 (Asocio de Verduloj Esperantistaj, 简称 ACE), 国际基督教世界语者联盟 (Kristana Esperantista Ligo Internacia, 简称 KELI), 国际民族解放委员会 (Internacia Komitato por Etnaj Liberecoj, 简称 IKEL), 国际天主教世界语者同盟 (Internacia Katolika Unuiĝo Esperantista, 简称 IKUE), 国际法律学者世界语协会 (Internacia Esperanto Asocio de Juristoj,

简称 IEAJ), 世界语者教友会 (Kvakeria Esperantista Societo, 简称 KES), 国际世界语者自然主义者组织 (Internacia Naturista Organizo Esperantista, 简称 INOE), 国际汽车司机世界语俱乐部 (Internacia Esperanto Klubo Aŭtomobilista, 简称 IEKA), 国际世界语者摄影、电影、录音爱好者协会 (Internacia Ligo de Esperantistaj Foto-Kino-Magnetofono-Amatoroj, 简称 ILEF), 国际世界语者语言学者联合会 (Internacia Unuigo de la Esperantistoj Filologoj, 简称 IUEF), 国际世界语者数学家协会 (Internacia Asocio de Esperantistaj Matematikistoj, 简称 IAdEM), 音乐世界语协会 (Muzika Esperanto-Ligo, 简称 MEL), 世界语鸟类学团体 (Ornitologia Rondo Esperantlingva, 简称 ORE), 童子军世界语协会 (Skolta Esperanto-Ligo, 简称 SEL), 国际世界语象棋协会 (Esperanta Ŝak-Ligo Internacia, 简称 ESLI), 国际世界语者素食协会 (Tutmonda Esperantista Vegetara Asocio, 简称 TEVA), 世界语元老俱乐部 (Veterana Esperantista Klubo, 简称 VEK), 巴赫教世界语协会 (Bahaa Esperanto-Ligo, 简称 BEL) 等等。

4. 世界语国际性刊物

世界语国际性刊物有数十种, 这里介绍的只是其中有特色的几种刊物。

(1) 《世界语》(Esperanto) 杂志: 国际世界语协会机关刊, 创刊于 1905 年, 月刊。主要报道国际世界语运动消息, 辟有《书评》、《新书消息》、《青年之页》、《地方消息》、《专科报道》等栏目。在荷兰鹿特丹出版, 发行约一百多个国家, 7000 多份。

(2) 《世界语先驱报》(Heroldo de Esperanto): 创刊于 1920 年, 是国际世界语运动报道性刊物, 原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 现在意大利出版。3 周刊, 每年出版 17 期。设有《国际语言问题》、《读者通讯》、《书评》、《我们的摄影》等专栏。

(3) 《一月间》(Monato): 1980 年创刊, 系政治、经济、文艺性的独立的世界语刊物, 经常还刊载科技方面的文章, 每年出版 11 期。由比利时 Stafeto 出版社出版。

(4) 《源泉》(Fonto): 1980 年创刊, 系世界语美学、文学刊物, 专门刊登小说、诗歌、剧本等世界语原作和译文以及文艺评论。在巴西出版。

(5) 《和平》(Paco): 系政治、文艺性刊物, 由各国轮流出版。主要宣传各国对和平问题的观点。我国曾在 60 年、61 年、62 年出版过三期, 并成为它在中国的代销人。1987 年在波兰举行的第 72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 曾决定授予《中国报道》和平奖章和证书, 以表彰它对和平的贡献。

(6) 《联合国与我们》(UN kaj Ni): 国际世界语协会所办刊物, 1976 年创刊, 不定期出版, 专门报道联合国方面与世界语有关的消息。

(7) 《世界语在亚洲》(Esperanto en Azio): 由国际世协亚洲委员会主办, 季刊, 专门报道亚洲世界语运动情况。

(8) 《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 1950 年创刊, 月刊。内容主要介绍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国内外世界语运动以及国际文化交流, 在北京出版。

5. 国际世界语大会

国际世界语大会是国际世界语运动中最重要活动, 也是各国世界语者的盛大集会。大会每年轮流在各国举行一次。从 1905 年迄今共召开了 84 次大会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

在世界语问世之后十多年间, 各国世界语者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的, 世界语能否在国际交往中作为口头交流工具还没有得到证实。1904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 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近二百多名世界语者先后在法国的加来港和英国的多佛

港举行会议，讨论了世界语的有关问题。这是第一次用世界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国际世界语会议。会议表明，世界语易讲易懂，是有效的口头工具。这次会议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并决定第二年举行第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第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由法国世界语者筹办。于1905年8月7日至12日在法国的滨海布伦市举行，来自20个国家的688名世界语者出席了大会，其中包括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以及著名的世界语作家格拉波斯基、卡贝、贝尔蒙特等人。在该市小剧院举行的开幕式上，柴门霍夫用世界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剧场里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向世界宣告：在国际交往中世界语可以成为有效的口头交流工具。柴门霍夫本人参加了第1至第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从1933年开始，国际世界语协会负责筹备国际世界语大会。大会章程规定，凡服从大会章程，遵守大会东道国法律、不从事有损于大会的活动并交纳大会会费的世界语者都可以参加大会。

国际世协会员国在获得本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支持后，可向国际世协提出举办大会的申请，由国际世协领导机构决定开会的地点和日期。

大会由国际世协主办，由东道国的大会组织委员会筹备。国际世协领导机构决定大会的会费、财政预算、日程、议题和主要内容。组织委员会主要负责大会的场地、文艺、娱乐、游览、宣传报道等项的准备工作以及与会者的食、宿、行的安排工作。国际世协大会常设秘书也参与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并进行协调。

大会一般在每年的7月底或8月初举行，为期8天（从星期六至星期六），由大会主席团主持。主席团由国际世协领导机构、国际会议大学校长、东道国世界语协会主席、大会组委会主席、全世界青年世界语者组织主席组成。

从1908年第4届大会起，历届大会都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大会设有最高监护人，大多由东道国的元首、议长、政府首脑或他们的副手担任。大会还设有荣誉委员会（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也设荣誉委员会，对内我们称国家委员会）。由东道国的一些政府部长、副部长、各界知名人士和学者组成。

参加大会的各国世界语者的一切费用由本人自理，大会的筹备经费主要来自与会者的会费和大会的其他收入。

为期8天的会议共有一百多项议程，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外，其他的活动都是同时或交叉进行，与会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任意选择参加。各种会议在以各国著名的世界语者名字命名的会议室进行。

大会议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工作会议：国际世协领导机构和执委会会议；国际世协各委员会会议；大会议题讨论会；世界语研究院会议；各国世界语协会负责人会议；国际世协在各国的联络员会议；青年世界语者讨论会；各种专业世界语组织的会议等。

庆典活动：开幕式；闭幕式；东道国领导人或市长招待会。

文化教育：国际会议大学（即学术报告会）；国际世界语会议；文艺或演讲竞赛；世界语教学法讨论会；崔氏教学法讲习班；世界语训练班；会话；世界语考试等。

文艺演出：民族文艺晚会；国际文艺晚会；音乐会；世界语喜剧表演；放映世界语影片等。

娱乐性活动：相识晚会；宴会；舞会；游览；青年晚会；下届大会情况介绍（包括放映介绍东道国和大会城市的影片或幻灯片）；世界语物品大拍卖等。

当然，各届大会的具体议程因条件和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条件具备的话，大会期间还同时举行国际儿童世界语会议。至今已举行了30多次。13岁以下的、能讲世界语的儿童可以报名参加。

到目前为止，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欧洲举行了 73 次，在北美举行了 4 次，在亚洲 3 次（日本、中国、韩国），在拉丁美洲 2 次（巴西、古巴），在大洋洲（澳大利亚）1 次。参加大会的一般有一、两千人，最多的超过 5000 人。

兹将历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址与代表人数列表如下（有 * 号者为中国派代表参加）：

届次	年份	大会会址	代表人数
1	1905	法国布伦	688
* 2	1906	瑞士日内瓦	1200
3	1907	英国剑桥	1317
4	1908	德国德累斯登	1500
5	1909	西班牙巴塞罗那	1500
6	1910	美国华盛顿	357
* 7	1911	比利时安特卫普	1800
8	1912	波兰克拉科夫	1000
9	1913	瑞士伯尔尼	1203
10	1914	法国巴黎	报名 3739，因欧战爆发 未开成
11	1915	美国旧金山	163
12	1920	荷兰海牙	408
13	1921	捷克布拉格	2561
* 14	1922	芬兰赫尔辛基	850
15	1923	德国纽伦堡	4963
* 16	1924	奥地利维也纳	3054
17	1925	瑞士日内瓦	953
18	1926	苏格兰爱丁堡	960
19	1927	波兰但泽	905
* 20	1928	比利时安特卫普	1494
21	1929	匈牙利布达佩斯	1200
22	1930	英国牛津	1211
23	1931	波兰科拉科夫	900
24	1932	法国巴黎	1650
25	1933	德国科隆	950
26	1934	瑞典斯德哥尔摩	2042
27	1935	意大利罗马	1442
28	1936	奥地利维也纳	854
29	1937	波兰华沙	1120
30	1938	英国伦敦	1602
31	1939	瑞士伯尔尼	765
32	1947	瑞士伯尔尼	1370
33	1948	瑞典马尔默	1761
34	1949	英国伯恩默思	1534
35	1950	法国巴黎	2325
36	1951	西德慕尼黑	2040
37	1952	挪威奥斯陆	1614
38	1953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	1760

39	1954	荷兰哈勒姆	2353
40	1955	意大利波洛尼亚	1687
* 41	1956	丹麦 哥本哈根	2200
42	1957	法国马赛	1468
43	1958	西德美因茨	2021
* 44	1959	波兰华沙	3256
45	1960	比利时布鲁塞尔	1930
46	1961	英国哈罗盖特	1646
47	1962	丹麦哥本哈根	1550
48	1963	保加利亚索非亚	3472
* 49	1964	荷兰海牙	2512
50	1965	日本东京	1710
51	1966	匈牙利布达佩斯	3975
52	1967	荷兰鹿特丹	1265
53	1968	西班牙马德里	1769
54	1969	芬兰赫尔辛基	1857
55	1970	奥地利维也纳	1987
56	1971	英国伦敦	2071
57	1972	美国波特兰俄勒岗	923
58	1973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	1638
59	1974	西德汉堡	1651
60	1975	丹麦哥本哈根	1227
61	1976	希腊雅典	1266
62	1977	冰岛雷克亚未克	1199
* 63	1978	保加利亚瓦尔纳	4414
* 64	1979	瑞士卢塞恩	1630
* 65	1980	瑞典斯德哥尔摩	1807
* 66	1981	巴西巴西利亚	1749
* 67	1982	比利时安特卫普	1899
* 68	1983	匈牙利布达佩斯	4834
* 69	1984	加拿大温哥华	802
* 70	1985	西德奥格斯堡	2311
* 71	1986	中国北京	2482
* 72	1987	波兰华沙	5946
* 73	1988	荷兰鹿特丹	2321
* 74	1989	英国布赖顿	2280
* 75	1990	古巴哈瓦那	1617
* 76	1991	挪威卑尔根	2400
* 77	1992	奥地利维也纳	3033
* 78	1993	西班牙巴伦西亚	1863
* 79	1994	韩国汉城	1776
* 80	1995	芬兰坦佩雷	2443
* 81	1996	捷克布拉格	2972
* 82	1997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1224

* 83	1998	法国蒙彼利埃	3133
* 84	1999	德国柏林	2712

6. 各国世界语组织

根据 1999 年国际世界语协会出版的《年鉴》统计,已经加入国际世协的各国国家级世界语组织有 60 个,还有许多未加入的。现将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亚、非、拉地区各国世界语组织简介如下:

(1) 欧洲、北美、大洋洲地区:这是世界语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世界语者最集中的地区,共有近 40 多个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世界语组织,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士、冰岛、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希腊、卢森堡、马耳他、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安达卢西亚、爱尔兰、南斯拉夫、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美国、加拿大、魁北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2) 亚洲地区:现在共有 17 个国家建立了国家级的世界语协会,这些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以色列、柬埔寨、黎巴嫩、马来西亚、蒙古、孟加拉国、新加坡、泰国、土耳其、尼泊尔等。

(3) 拉丁美洲地区:拉丁美洲地区的世界语运动也比较滞后,但近十年来,有些国家随着经济的强大,其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快,例如巴西、阿根廷、古巴、墨西哥、智利等国,不仅早就建立了国家级的世界语组织,而且近年来,世界语活动也相当活跃。建立全国世界语组织的国家还有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卡尔特韦耳、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等。

(4) 非洲地区:非洲地区是全世界世界语运动发展比较迟缓的地区。鉴于这种情况,国际世界语协会已把协助非洲发展世界语运动作为新世纪战略重点之一。建立全国世界语组织的国家有:贝宁、科特迪瓦、加纳、喀麦隆、马尔加什、南非、坦桑尼亚、多哥、扎伊尔等。

二、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

(一) 世界语传入中国的背景、渠道及其代表人物

1. 世界语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但一次次地失败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封建经济的解体，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发，出现了资产阶级性的政治改良运动。为了寻求救国的法宝，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向西方学习，向日本学习，对外国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事物都感兴趣，努力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希望改变中国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理想王国”。这是世界语传入中国时的历史背景。

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在“社会主义”旗帜掩护下获得很大发展，迷惑了不少渴望革命的青年人。一些在欧洲和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加以宣传。当时，世界语运动在无政府主义比较发展的德国、法国、俄国十分活跃。柴门霍夫想通过世界语达到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的思想，也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他创造的语言被无政府主义者看作是宣传无政府主义、联络全世界志同道合者的有力工具。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热情宣传世界语的思想基础。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既存在着民族矛盾，也存在着众多的方言，由于语言问题给相互之间的交往带来许多不便。

为了沟通思想和增进相互了解，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创造“大同语”的理想。近代的康有为就主张“全地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这种理想，是许多人所追求的。这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2. 世界语传入中国的渠道及其代表人物

据所查到的史料记载，世界语是通过三个渠道传入中国的。

一个渠道是俄国。在沙皇俄国占领下的海参崴市，于1891年建立了“太平洋”世界语俱乐部 (Esperanto Klubo “Pacifiko”)⁴。该俱乐部出版一本12种文字的注释世界语课本。一些懂得世界语的俄国商人便把课本带到哈尔滨，并在那里传播。1905年，一位俄国人在上海开办世界语讲习班，陆式楷等人参加学习。⁵1906年，陆式楷组织上海世界语学社，开办夜校，传授世界语，并同各国世界语者建立通信联系。1909年，他同盛国成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会 (Ĥina Esperanto-Asocio)。

另一个渠道是日本。20世纪初，一批留日学生，如刘师培、张继等人，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 (Oosugi Sakae) 先生学习世界语，并在东京出版《衡报》(Egaleco) 和《天义报》(Justeco)，一方面宣传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刊登介绍世界语的文章。1908年，《衡报》这样写道：它是亚洲第一份提倡世界语的刊物。这种语言是使各国革命者们互相了解的最方便的工具。⁶《天义报》当时还经常刊载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材料。1908年，刘师培等人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传习所。

³ DOIČIEKO: 《亚洲世界语运动指南》(Gvidlibro pri Esperanto Movado en Azio), 87页, 日本横滨, 海鸥书社 (Mevo Libroj), 1995。

⁵ 周庄萍: 《世界语五十年》, 39页, 上海, 上海世界语协会印行, 1937。

⁶ Ulrich Lins: 《危险的语言》(La Danĝera Lingvo), 第1版, 第158页, 德国 Gerlingen, Bleicher 出版社, 1988。

第三个渠道是法国和英国。1907年，一批留法学生，如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和当时中国驻法使馆商务随员张静江在巴黎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La Tempoĵ Novaj) 中文周刊，大力宣传世界语。

1908年，留英学生杨曾诰开始学习世界语，经常给国内友人寄赠世界语书刊，并写了《万国新语》等书，介绍世界语。同年，一位留法学生许论博到广州开办世界语讲习班。1909年，留法学生华南圭在巴黎创办《中国语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Ĥina Esperanta Scienca Literatura Revuo)，用世界语介绍科学和文学，共出版5期。

此外，早期在国内传播世界语的还有刘师复、区声白、黄尊生等人。他们1912年在广州平民公学附设世界语夜校向许论博学习世界语。当年，许论博、刘师复被选为广州世界语学会正副会长，不久又被国际世界语协会聘为广州的正副联络员。1913年，刘师复在广州创办《晦鸣录》杂志(La Krio de Koko)，后来更名《民声》(La Voĉo de la Popolo)。该刊主要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但用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世界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上述这些世界语的初期传播者中的主要人物，如刘师培、张继、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刘师复、区声白、黄尊生等，早年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无政主义思想早已被历史所否定，但他们把世界语传入中国所起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3. 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内在理想的关系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能与世界语结缘，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呢？当然，这不是毫无内在联系的偶然巧合。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内在理想从思想渊源到内容都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两者的结合是不足为奇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内容极其庞杂，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外，还包括其他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队伍影响很大。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形成于法国和德国，出现了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同世纪60年代在俄国兴起，出现了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在俄国传播很广，影响很深。此后，1887年，世界语诞生了，开始在欧洲传播，主要是在德国，稍后在法国和俄国。世界语内在理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俄国世界语者的思想影响。“很显然，他们对这个语言的影响是很大的。给世界语以特殊精神，给运动以一种特有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贡献最多。”⁷“俄国同志们，对这个事业中促成人间友爱方面的继续坚持，在各国世界语者间，创造了那个十分美丽富有诗意的情感，这个情感，稍后，人们就叫作‘世界语主义内在理想’。”⁸从上述情况来看，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内在理想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世界语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进步的交际工具。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且在于能沟通民族之间、革命者之间的相互理解。⁹这可能也是他们把世界语引入中国的原因之一。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把无政府主义同中国的封建孔孟的和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同思想”、“大同世界”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幻想建立“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无争无尤，无怨无竞，怡怡然四海皆春，熙熙然大同景象”的社会。¹⁰这种观点在柴门霍夫的人类一员主义中找到了共鸣。柴门霍夫在1905年第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说：“在

⁷ E. 普里瓦：《世界语史》，中文第1版，第82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⁸ E. 普里瓦：《世界语史》，中文第1版，第8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⁹ Ulrich Lins：《危险的语言》(La Danĝera Lingvo)，第1版，第158页，德国 Gerlingen, Bleicher 出版社，1988。

¹⁰ 彭英明：《评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文汇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

我们的大会上，不存在强大的民族和弱小的民族；也不存在有特权民族和无特权民族……我们大家都觉得如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一般，如同一个家庭成员一般……我们的大会为全人类的真正大同做了贡献。”¹¹ “我们要誓死战斗，要让全人类实现大同”¹² 柴门霍夫认为，世界语不仅仅是语言交际工具，而且包含着一种理想。在 1906 年，他曾这样说：“这种理想——你们都能深深地感觉到它——是各民族的友爱和正义。”¹³ 在这次大会上，“一种莫名的平等和友爱，充满了各种不同出身的善良人们之间。‘爱’流向这个具有联合功能的语言，而赋予它以翱翔的羽翼。”¹⁴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一切要“适于人性、合于人道”。¹⁵ 虽然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两种思想是视二而一的，但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起着破坏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内在理想是想通过世界语，打破民族隔阂，消除民族间的歧视，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了解和友谊，有利于世界和平，同时也推动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和使用。

(二)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

1.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分期依据

研究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中国世界语运动分期问题。究竟如何划分，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对中国世界语者来说，是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分期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在于要考虑到世界语的特点及其在各个时期的任务。在这里我们提出三条标准，其中第一条是主要的、基本的，但其他两条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分期的依据。

(1) 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及其所形成的历史时期赋予中国世界语者的任务，是划分中国世界语运动时期的主要的、基本的依据。著名的世界语作家、理论家英国的威廉·奥尔德在《世界语现象》一书中说：“世界语运动的历史是非常使人感兴趣的、有些使人惊奇的研究课题。它十分复杂，因为它的内容或多或少包罗全世界，而且这种语言和世界语者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各国政府，取决于政治环境。”¹⁶ 在中国更是如此，世界语运动不能脱离社会、政治环境。中国世界语者的绝大多数是进步事业的追求者和参与者。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映印着中国近百年重大政治变革的足迹。每次重大政治事件后所形成的时期，都改变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方向和任务。例如：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标，之前（除 1931 年以前），是以世界语为工具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它所揭露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它歌颂的是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而之后的近 30 年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争取世界和平服务。

(2)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分期问题上，还要考虑世界语本身的特点。世界语的发展，除语言的特性外，是依赖于世界语运动的。没有世界语运动，就没有世界语。而世界语运动不是一个单纯的推广语言的运动，而主要是一个推动人类进步的社会运动。正如 1996 年《'96 世界语运动布拉格宣言》所阐明的：“我们的运动是民主传播的运动”，“是超越民族的教育运

¹¹ 埃德蒙·普里瓦特：《柴门霍夫的一生》，中文第 1 版，第 47 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该书的作者即是《世界语史》的作者 E·普里瓦。

¹² 柴门霍夫：《在第 1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柴门霍夫演讲集》中文第 1 版，第 49 页，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

¹³ 柴门霍夫：《1906 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2 届世界语者大会上的演讲》，见《柴门霍夫演讲集》中文第 1 版，第 51 页，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

¹⁴ E·普里瓦：《世界语史》，中文第 1 版，第 96—97 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¹⁵ 彭英明：《评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文汇报》1980 年 2 月 25 日，第 3 版。

¹⁶ William Auld：《世界语现象》(La Fenomeno Esperanto), 第 61 页，荷兰鹿特丹，国际世界语协会，1988。

动”，“是有效的语言教学运动”，“是提供学习第二种语言以提高传播水平机会的运动”，“是维护语言权利的运动”，“是维护语言多样性的运动”，“是为实现人类解放的运动”。¹⁷ 由此可见，一方面，中国世界语者所从事的运动是属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另一方面，世界语运动是以语言为工具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教育运动，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运动。因此，它的分期不可能完全与社会历史分期相吻合。

(3)中国世界语运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世界语运动，有其自己的特色。除了运动初期的一段时间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它是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与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息息相连的。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语运动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叶籁士等同志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出版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报道抗日战争和解放区的情况，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语运动和工作成了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这一点也是我国世界语运动分期的依据之一。

2. 中国世界语运动分期及其特征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把中国世界语运动划分为四个时期：

(1) 从20世纪初世界语传入中国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止为第一个时期：为世界语理想而奋斗。

(2)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止为第二个时期：为中国解放而使用世界语。

(3)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止为第三个时期：用世界语为祖国服务，为争取世界和平服务。

(4) 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起至今为第四个时期：用世界语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服务，为保卫世界和平服务。

四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初期世界语的传播者和学习者受柴门霍夫的世界语主义和人类一员主义的影响，偏重于追求和宣传世界语理想，而忽视语言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出单纯为世界语理想而奋斗的倾向。同时对世界语和民族语的关系认识模糊，有的甚至错误地主张以世界语替代汉语，

当时一些传播世界语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内在理想视为同一物，因此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也宣传世界语，其实是把世界语作为一种主义加以宣传的。当时的《进化》杂志有这么一段话：“先生(刘师复)的主义，是什么样的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详细来说，却有世界语主义，不信宗教主义……这种种的主义是枝，而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干，有了干自然会生出枝了，这是不易的道理。”¹⁸ 他们宣传超越社会条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而把世界语看作是追求理想社会和大同世界的奇妙语言工具，自然这种传播世界语是脱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

早期世界语传播者黄尊生先生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过去六七年¹⁹，我全部精神都放

¹⁷ 《'96世界语运动布拉格宣言》，载《世界》杂志，1996(10)，第16页。

¹⁸ 凌霜：《师复主义》，载《进化》杂志，1916(3)，第1页。

¹⁹ 根据原文的上下文，“过去六七年”是指1927年以前的六七年。

在世界语上面，由世界语而想到人类和平，世界大同，一切都向着最美好的境界去追求，而今捐款失败，在一往无前中，忽然碰了一壁，倒退回来，睁开眼睛，便清清楚楚见到了眼前的现实，即中国社会的现实，使我在思想上起了一个转折……世界语祈求人类和平，是一朵社会的鲜花，必须有一个够得上水准的社会背景，然后才可以培植。”²⁰ 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语的发展既决定于社会条件，又决定于社会实践。

还有一些初期世界语传播者违背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原则，没有弄清世界语和民族语的关系，又受了康有为大同语的思想影响，提出了排斥民族语的口号。“康的大同语思想排斥民族语，幻想建立统一的世界国和人类大同……那时既没有语言的多样性，也没有国界……”²¹

留英学生杨曾诰也在《论中国人采用世界语作民族语文的必要性》的论文中主张：“抛弃汉语，用世界语代替之”，“把世界语作为民族语”。这种乌托邦式的宣传世界语，对当时的中国世界语运动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很显然这种主张是脱离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不过，初期的世界语者大多数都是出自爱国热情，希望通过世界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国。

在这一阶段，中国世界语运动在世界语理想推动下发展很快。一些大中城市和许多大学建立了世界语组织，出版世界语课本，开办各种世界语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曾认为，要推广世界语必须首先培养世界语的师资，所以他以教育部的名义下达通令，将世界语正式列入师范学校课程，推动了世界语在全国学校的教学活动和中國世界语运动。这些都为后来的中国世界语运动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中国世界语运动同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相结合，同现实生活相结合，走上了与人民群众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的正确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唤起中国人民觉醒，激发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使中国人民认清了它的侵略面目，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随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接着又向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化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广大进步世界语者同中国人民一道投身于抗日斗争中去。中国世界语运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向前发展。

中国世界语者不仅是以推广世界语为宗旨和追求社会进步的人，而且也是爱国主义者，有的甚至是革命者，因此，他们把参加抗日斗争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汉口世界语学会首先联合全国的20多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同一年，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并出版《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发表告世界语大众书，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这是中国世界语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开端。1932年，镇江世界语学会会刊《黎明》（Mateniĝo）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评论。黄尊生在回忆录中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陷沈阳。翌年又爆发‘一·二八’沪战。沪战未熄，而伪满洲国之政权已树立，全国沸腾。广东国民大学世界语会乃发表世界语宣言，讲述事变之经过，邮寄全世界各国，请主持公道。接到各国复书200余封，均表深切同情。为伸张正义，在民大开一展览会，陈列各国来函，观

²⁰ 根据原文的上下文，“过去六七年”是指1927年以前的六七年。

²¹ Ulrich Lins: 《危险的语言》(La Danĝera Lingvo), 第1版, 第158页, 德国 Gerlingen, Bleicher 出版社, 1988。

者印象甚深,都谓民大做了一件极重要而且极有意义的事。”²² 1933年,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提出一个纲领性口号:“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这一口号反映了广大中国世界语者的心声,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世界语运动主要特征。

中国世界语者对抗日斗争的热情极高而且态度鲜明,对胜利充满信心。1934年第35期《世界语之光》杂志发表了一篇佟峻峰的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批评一些世界语者的和平幻想的文章,这篇名为《警钟》的文章说:“企图用不抵抗的和平主义或是感化主义去消灭或制止战争,这只是徒然的幻想罢了。这种超人超世向凶残的帝国主义克己复礼的‘感情’!除了有心无心地拥护帝国主义的人以外,没有人相信在现社会残酷的制度里会产生超人的‘感情’,更不会有世界语主义所幻想的‘绿色天下!’”这篇文章最后说:“中国民众的团结与武装足以倾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这不但是绝对的可能,而且是历史证明的。”

中国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斗争,但主要形式还是国际宣传。“中国世界语者协会的性质,毕竟和一般的(团体)不同,自有其特殊任务,所以他们主力的工作,还是发展在国际宣传上。”²³ 当时出现了不少对外宣传刊物和图书,进行抗日宣传,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它们的文章大量被转载,使那里的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同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情况。荷兰世界语者还利用刊物上的材料,举办中国抗战展览会,为中国苦难儿童捐款等。

在这一时期,有的世界语者还组织和参加战时服务团、抗敌演剧宣传队,走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还有的世界语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或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活动;还有的世界语者直接参加抗日部队,在前线杀敌。这些世界语者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播下绿色的种子,甚至在紧张的抗日前线或在监狱里仍坚持传播、教授世界语。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为延安“世界语展览会”题了词,对当时和后来在中国传播世界语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心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国共合作解体,对其管辖区实行法西斯统治,把世界语视为“革命”和“共产党”的同一物,限制世界语活动,使世界语运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解放区的世界语者,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忙于革命工作和战争,只好暂时放弃心爱的世界语事业。在国民党统治区,只有个别城市的世界语者坚持出版刊物,往国外寄发通讯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发动内战的罪行。他们的宣传文章,有的先后转载在保加利亚、日本等国刊物上,使国外读者更多地了解到中国解放战争的真相和进程。但经过几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世界语的新时代。

胡愈之同志对这一时期的世界语运动作了科学的总结,他说:“不应该忘记,在我国,世界语运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之下成长起来的,是在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营中发展起来的。在三十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光荣名录中,有着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²⁴

第三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中国世界语工作和运动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轨道,以对外宣传为主,出版世界语书刊,开展世界语对外广播,以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同时有重点的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世界语组织,适当地发展世界语运动,其总目标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和和平环境。

北京刚一解放,胡愈之同志就几次召开世界语者座谈会,研究讨论如何更好地用世界语为新中国服务,建立全国性的世界语组织,出版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等问题。1950年,《人民中国报道》(后改名为《中国报道》)创刊;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这为新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起步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²² 黄尊生:《我与世界语运动》,载《老世界语者》杂志,1996(16),第6页。

²³ 《中国世界语者救亡活动》,载《中华晨报》副刊《绿洲》,1937年11月第20期,马来亚。

²⁴ 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第1版第9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北京。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一方面担负起用世界语面向全世界的对外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全国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协调、指导工作。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世界语的对外宣传工作，继《中国报道》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之后，在 60 年代相继成立了中国国际书店世界语科、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组和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世界语对外宣传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世界语组织都无法相比的。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世界语工作呢？因为它们看到了世界语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以及世界语可以发挥的优势和独特的作用。一是充分利用世界语的覆盖面广的特点：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世界语者，有 80 多个国家的世界语者订阅《中国报道》杂志，有 70 多个国家世界语者收听到中国国际电台的世界语广播。（请见本书有关章节）二是充分发挥世界语的国际辅助语的作用：我国对外宣传不可能出版各种民族语的书刊，例如东欧各国，过去只有俄文书刊在那里发行，后来被禁止，只有世界语书刊“给他们透点新鲜空气”²⁵。三是充分利用世界语刊物的民间性和民间渠道，在中美建交之前，英文书刊很难进入美国，官方的书刊被认为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但只有世界语书刊能以民间交流的方式，通过民间代销人，把书刊寄到读者手里。四是充分掌握世界语者的心理：他们对世界语情有独钟，喜欢读世界语的书刊，听世界语广播，不喜欢外国的、甚至本国的民族语书刊和广播。《中国报道》、世界语广播、世界语图书就是利用这些优势在对外宣传战线上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的。

在这一时期，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还派代表团或代表参加了第 41、44、4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及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的全国世界语大会，同时接待来华的许多世界语者和专家。通过这些交往，促进了与各国世界语者的友谊，增进了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同情和支持。

这一时期的最初几年，我国世界语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各地建立组织，开办世界语班，发展会员，出版学习用书等。但到了 1954 年，由于东欧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拒收我国世界语刊物，全国世协停止工作，刊物停止出版。虽然 1957 年又恢复了工作，但全国运动处在停滞状态，直到 1963 年才出现了转机。这年 7 月，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同时召开了第 1 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当时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不仅参观了展览会，而且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肯定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的成绩，批评了工作中的“左”倾思想，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他的讲话大大推动了这个世界时期的世界语运动的发展。这之后不久，中国教育部正式下文，规定世界语可以作为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以及晋升职称的第二外语，开办了全国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培养了一批世界语教师，先后在 10 多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课。为培养世界语的专门人才，教育部还批准在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两期世界语班，为我国对外宣传战线培养了一批世界语的专职干部。1964 年年底世界语对外广播开播。

但好景不长，1966 年至 1976 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同其他文化领域的情况一样，全国世协的领导同志遭到批判，工作被迫停顿下来，不少世界语者遭受批斗和迫害。因此，全国世界语运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中国报道》大量刊登宣扬极“左”的文章，刊物发行严重受挫。中国世界语运动在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只强调用世界语作语言工具进行对外宣传，不重视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抑制国内世界语工作和运动的开展，致使国内世界语运动受到很大影响。

第四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搞好对外宣传工作，积极开展世界语运动，使其走向世界，发挥世界语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中外文化科技交流以及各国人民之间友谊中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全面发展阶段。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中国世界语运动。当时摆在中国世界语

²⁵ 陈毅：《陈毅同志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 年 7 月 25 日），载《学习材料》，第 5 页，上海世界语协会，1982 年 11 月。

者面前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制定方针，明确任务。

1979年8月，召开了第2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会议肯定了建国以来的世界语工作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新时期世界语工作的任务。这次会议以后，全国世界语运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经过近十年的实践和探索，1988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在陈原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时期方针：“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以世界语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贡献力量。”这一方针摆脱了“左”的思想干扰，强调了“立足国内”，要发展国内运动；同时强调“面向世界”，要参与国际世界语活动，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搞好服务。进入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为了探讨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我国世界语运动问题，于1993年8月和1997年12月，分别在承德和广州从化召开了第2、第3次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会议。与会同志通过讨论问题，交流情况，总结经验，一致认为：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面对挑战；要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要开拓财源，增强经济实力；要加强队伍建设，培养骨干，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上述几次会议主要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解决方向和任务问题，无疑推动和保证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健康、稳步发展。

在这个时期的初期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势如破竹，迅猛异常。除西藏和贵州外，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建立了世界语组织，有的大中城市，甚至县城，也建立了世界语组织。据统计，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的各类世界语组织达150多个。为了同国际各专业世界语组织开展对口活动，还成立了科技、医学、铁路、教师、集邮、青年等世界语协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楚图南、胡愈之等10位知名人士发起的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于1981年12月成立。它的成员有17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政界、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等部门的知名人士。这个组织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为推动我国世界语运动，为提高世界语在国内外的地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82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正式成立，不仅出版了大量的对外图书，还出版了大量对内学习用书，以满足人们学习世界语的要求；全国各地出版社、世界语协会也编写、出版了大量供学习用的书刊。各种形式的世界语学校和世界语班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学习者竟达40余万人。在这一时期，还多次举办世界语的文化、文学、科技、旅游、教学等专业性的研讨会，推动了中国世界语运动正逐步地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1985年、1991年和1995年，分别在云南昆明、河北唐山和四川重庆召开了全国世界语大会，定期讨论全国世界语工作和改选全国世协领导班子，使全国工作走上正规化、经常化的道路。今年将在广西桂林市召开第4次全国世界语大会，总结20年来世界语运动的成绩和经验，为21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展确定方向，制定蓝图。

在用世界语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方面，我国世界语者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报道》杂志、世界语的对外广播、世界语图书、《世界科技》等，都及时地报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我国的重大政治活动、我党和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以及在各项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读者和听众反映强烈并对我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赞叹不已。

中国世界语运动正在逐步地走向世界，扩大和加强与国际世界语组织和各国世界语组织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是时代赋予中国世界语者的光荣任务。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1980年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每届有2名中国世界语者担任该会执委会委员，先后担任委员的有陈原、张企程、叶君健、刘铃、谭秀珠、邹国相、李玉萍、刘俊芳、戴颂恩、于涛等。胡愈之、巴金、陈原被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这是该组织最高的荣誉职务，全世界仅10人左右；叶籁士、张企程被选为该会终生荣誉会员。李士俊、谢玉明被推选为国际世界

语研究院院士。邹国相、王建兵、戴颂恩、于涛先后担任亚洲世界语运动协调委员会委员。1983年，国际世界语协会授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费恩杯，以表彰它在发展中国世界语运动所取得的优异成绩。1986年、1992年和1996年，分别在北京、青岛和上海举办了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和第1届亚洲世界语大会，报名参加3次大会的国内外世界语者达3500多人。此外，还举办5次国际科技世界语会议和2次中日韩青年世界语者研讨会。自1978年开始，我国每年都派世界语代表团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还多次派人参加一些国家的世界语大会和国际性世界语研讨会。在这一期间，我们还接待了瑞典议会议长、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以及柴门霍夫的孙子等贵宾。通过这些活动，密切了中外世界语团体和世界语者的关系，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促进了各国世界语者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了解。

(三)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自从世界语传入中国以后，在世界语运动的各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和许多同情和支持世界语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他们的大力支持、忘我工作和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1. 支持世界语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

蔡元培 (1868—1940)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他在德国留学期间(1907—1911)自学世界语，并支持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宣传世界语，对世界语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说：“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吾人学外国语，难于西人，而既学欧西一国语以后，再学第二国语，便与西人无异。今使第一次所习者为最易习之世界语，则有助于学西不鲜。”²⁶

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曾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后来又通过议案，促进其通令实施，并要把世界语推广到小学中去。他还在檀香山的太平洋教育会议上建议“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此语翻译各国书籍”²⁷，获得大会通过。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该校将世界语先后列为选修课和正式课程，并聘请俄国世界语者爱罗先珂授课。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和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他亲自担任会长和校长。

1924年，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亲眼看到了世界语在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的作用。回国后，在他支持下，成立了世界语编译委员会，翻译出版了一部分世界语书籍。

蔡元培先生不仅对世界语有深刻的认识，而且积极热情地推广世界语，尤其在中国世界语教学方面起了先锋作用。他对世界语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鲁迅 (1881—1936)

鲁迅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1902—1909)，曾在东

²⁶ 侯志平：《蔡元培与世界语》，《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文第1版，第121—122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北京。

²⁷ 侯志平：《蔡元培与世界语》，《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文第1版，第122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北京。

京《民报》会馆听过张继的世界语讲座，回国后积极倡导推广世界语，发表题为《渡河与引路》的文章，支持世界语。20年代初期，他翻译俄国世界语盲诗人爱罗先珂的著作，并把他介绍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亲自前去听他的世界语讲演。1923年至1925年，他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义务任教《中国小说史略》。他经常鼓励世界语者积极从事世界语文学翻译和介绍工作。除在他主编的刊物上为他们提供译作发表园地外，还亲自为译者联系出版社，甚至为出版社先垫付制版费，为译者先支付稿费。为支持开展世界语活动，他多次资助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上海世界语学会的会刊《世界》杂志。

1936年8月，鲁迅先生在函告《世界》杂志关于世界语的意见时说：“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年了罢。但是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²⁸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对世界语的价值和作用，对世界语者的为人，作出了那么高的评价，不仅对世界语者是巨大的鼓舞，而且推动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和中外文学交流。

陈毅 (1901—1972)

陈毅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作为主管外事的副总理，是比较了解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的情况的。1956年7月，是陈毅副总理批准同意恢复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工作并复刊《中国报道》杂志的，他还批准派代表团参加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966年，陈毅副总理又批准《中国报道》杂志由双月刊恢复为月刊。

1963年7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同时召开了第1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陈毅副总理先是参观了展览会，又过了3天，出席了座谈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赞扬世界语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时说：“世界语工作我很佩服，国务院、中共中央很感谢。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做的，要大发展。”²⁹

他批评有的人对世界语所持的偏见，他说：“有人批评世界语是改良主义运动，不是革命的，因此不值得我们去做。他们说世界语搞好了，帝国主义也消灭不了，世界革命也不会成功。这是‘左倾’的空谈。难道不搞世界语工作，帝国主义就会消灭？”他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世界语工作的意义，他说：“世界语工作为什么要做呢？因为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喜欢这个工作。讲到世界语，就是同志。不管黄种、白种，也不管信仰不同，一讲世界语，就可以坐下来谈几分钟，谈几十分钟。这工作就值得做，有群众嘛。那里有群众，就要到那里去工作。要跟他们一道做工作。”他还指出：“要搞世界语，就要培养一些人，要世代传下去，不要使它绝种”。陈毅副总理的讲话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时的中国世界语工作和运动出现两种倾向：只搞对外宣传工作，不搞国内工作；只强调政治的一面，否定世界语的特点和针对性。陈毅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因此，他的讲话是具有指导性的。在他的讲话推动下，在此后的两年里，中国世界语工作和运动可以说，达到了这个时期的高峰。教育部发通知在大学设置选修课，开办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中国国际电台开始世界语广播；各地相继成立世界语组织，开展各种世界语活动；派代表团出国，加强同国际世界语组织的联系等等。

²⁸ 侯志平：《鲁迅与世界语》，《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文第1版，第117—118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北京。

²⁹ 陈毅：《陈毅同志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7月25日），载《学习材料》，第5页，上海世界语协会，1982年11月。

楚图南 (1899—1994)

楚图南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于本世纪初受蔡元培、鲁迅的影响，于1919年在北京学习世界语。几十年来，他始终关心和支持在中国推广、使用世界语，高度评价世界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和柴门霍夫的崇高理想。1981年，他同胡愈之、巴金等十位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并任会长。他多次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该会工作，给我国世界语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世界语之友会会长身份接见不少世界语贵宾，其中有：瑞典议会议长英·本格森、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主席梅田善美、秘书长芙洛拉·萨波·费尔索和总干事西·米洛耶维奇等，同他们讨论如何发挥世界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和建议联合国采用世界语为工作语言之一等问题，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世界语界的声望。在他担任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亲自参加有关会议，多次过问大会筹备工作，为大会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

他在百忙中总是尽可能地出席北京各世界语单位召开的会议，参观展览，一见面就鼓励大家努力工作，多作贡献。他经常勉励年轻同志向老一辈世界语者学习，做无名英雄。

他在重病住院期间，还关心世界语之友会的工作，并嘱托要推选一位新会长接他的班，继续把工作搞好，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不断前进！1996年，世界语之友会推选柴泽民同志为第二任会长，柴泽民会长像楚老那样，热情支持世界语，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2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杰出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 —— 胡愈之

胡愈之 (Hujucz, 1896—1986) 于1913年在浙江绍兴自学世界语。从这一年起至1986年逝世的73年间，他不屈不挠地从事中国世界语运动，无私无畏地开拓、领导、捍卫这个事业，为之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世界语的宣传家、组织家和实践家。他不愧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杰出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

1920年，胡愈之同志与陆式楷、斯托帕尼等人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此后他系统地发表了大量论述世界语的文章，并从事世界语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1931年，他从法国回国途经莫斯科，由当地世界语者接待，游览了七天，回国后写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和世界语者投入民族解放事业和进步文化事业。1931年，胡愈之与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左翼文化团体，同时加入了无产者世界语者国际 (Internacio de Proleta Esperantistaro)。该联盟以无产阶级立场宣传、普及和运用世界语，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语运动；用世界语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准，并增进全世界无产的团结。该联盟开办世界语班，出版刊物，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他参加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同时从事世界语的宣传工作。1941年至1947年，他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主编《南洋商报》、《南侨日报》等，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宣传、推广世界语。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为创建全国世界语组织和对外宣传刊物，多次召开世界语者座谈会。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50年5月《人民中国报道》创刊，1951年3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直至1986年逝世。他亲自三次主持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发表指导性的讲话。1981年，他同楚图南、巴金等十位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1982年，他主持理事长会议，决定在中国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同年，由于他对中国和国际世界语运动的突出贡献，被推举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正如陈原同志所说的：“胡愈老毕生从事世界语的宣传和实践，从1913年他学习世界语起到1986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一天放弃过世界语。”

世界语是他的希望，是他的‘梦’，是他的理想化身。”³⁰

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对推动我国世界语工作和运动起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当中国世界语工作和运动遭到挫折和危机时刻，总是他首先站出来，去奔走呼号，去战斗，直至胜利。是他力挽狂澜，使运动起死回生；是他 1956 年向有关部门打报告，恢复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工作和《中国报道》的出版；是他邀请陈毅副总理参观世界语展览会和出席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开幕式并讲话，纠正了世界语对外宣传和世界语运动的“左”倾思想；还是他十年动乱刚一结束就同有关领导商量恢复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工作并加强其领导。80 年代以后他又推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和在中国召开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他的主要世界语著作有：《世界语四十年》、《国际语运动》、《国际语的理想和现实》；主要译著有：《为跌下而造的塔》、《春日小品》、《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3. 各个时期杰出的世界语者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各个时期，一大批世界语者默默无闻地工作，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无私奉献，深得后人的赞许。他们之中，有的是在积极宣传世界语、从事世界语活动方面；有的是在编写教科书、词典或从事世界语教学方面；有的是在创作或翻译文学，促进中外文学交流方面；有的是在创作或翻译科学著作方面；有的是在举办世界语刊物或世界语广播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限于篇幅，在本节中我们只能介绍他们中的一部分杰出代表。

刘师复 (1884—1915)

刘师复(Sifo)是中国早期的世界语传播者，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1904 年他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2 年他在广州平民公学附设的世界语夜校跟留法回国的许论博学习世界语。1913 年，他在广州创建晦鸣学社，一方面宣传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宣传、推广世界语。1912 年，他与许论博共同创立广州世界语学会，被选为副会长。不久，国际世界语协会聘许、刘二人为广州正副联络员。1914 年，他致书于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提议采用世界语。1913 年至 1915 年，他主编《民声》杂志，每期辟 4 页宣传、推广世界语。刘师复在世界语刚刚传入中国就首先在国内出版刊物，大力宣传、推广世界语，建立世界语组织，这是功不可没的。他的墓碑祭文全用世界语雕凿而成，反映了他为世界语理想而奋斗的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

黄尊生 (1894—1990)

黄尊生 (Kenn Wong) 1912 年在广州跟许论博学习世界语。他不仅积极从事世界语教学活动，而且多次参加国际世界语会议，进行世界语实践活动。他同其他世界语者一起在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市)、广州市开办世界语班、世界语讲习所，为广东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人才。1926 年，他作为广东大学教授在广东全省教育会议上提出一项将世界语列入各级学校教学的建议，获得大会通过。他曾出席过 1922 年日内瓦的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1923 年威尼斯的国际世界语商业会议、1923 年瓦伦西亚的第一次伊比利亚半岛世界语大会、1924 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世界语大会，1924 年陪蔡元培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第 16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后又出席了 1925 年巴黎的国际世界语科学会议和同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17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926 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任教，以后又兼任广州市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所长。1955 年出席在意大利波洛尼亚第 40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等。他曾担任国际语言委员会委员、

³⁰ 陈原：《记胡愈之》，中文第 1 版，第 6 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

国际世界语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世界语研究院院士、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等职。他还在 1925 年第 17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国际世界语夏令大学作过孔子哲学思想的学术报告，受到好评。

黄尊生先生是中国早期活动在国际世界语舞台上的积极分子和优秀代表，为早期在中国传播世界语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他的世界语著作有：《中国与世界语问题》、《国际世界语教育概况》等。

乐嘉煊 (1907—1950)

乐嘉煊 (Joŝaŝien Ĉoĉa) 在大学期间学习世界语。1929 年，与方善境、傅平、薛诚之发起成立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后来成为汉口世界语学会的负责人之一。1930 年 12 月，与沈旭初、李志民组成世界语者中华全国步行团。从 1931 年 1 月 19 日起，途经长沙、广州、佛山、澳门、香港、深圳、汕头、漳州、厦门、福州、嘉兴，到达上海，沿途宣传世界语。1931 年 11 月，与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1932 年，创建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编辑《世界语初级讲义》。1933 年，同叶籁士、程正、周庄萍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将世界语函授学社、世界语讲习班、世界语书店作为协会的事业，把《世界》改为协会机关刊。他后来成为协会专职人员，主持教学、书刊发行，担任会计、编辑、校对、刻印、收发、文书等工作。1935 年，编辑《世界语科学小丛书》，首卷《天文学》出版。1937 年，创刊、编辑《世界语》杂志。1938 年以后，分别在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战的国际宣传工作，同时宣传、推广世界语。1946 年以后，业余从事毛泽东著作、重要社论的世界语翻译工作。他是开展世界语运动的实干家，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世界语事业，受到郭沫若的称赞。

冯文洛 (1901—1979)

冯文洛 (Venlo Fon) 在 30 年代初自学世界语。1938 年到甘肃天水教书，曾在当地开办世界语班。1939 年，他与叶籁士等同志共同创建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并同许寿真、张闳凡等主持学社的校务、教学等工作。五年间，函授学社先后招生 2300 多人，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培养了一批人才。在此期间，经常为《中国报导》杂志译稿，进行宣传抗日活动。1950 年《人民中国报道》创刊后，曾担任主编、编委，从事中文稿编审、外文改定稿工作。1951 年以后，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常务理事。1963 年和 1964 年，他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兼任世界语教师，从事世界语教学工作，为 11 所高等院校培养了一批世界语教师，为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社、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书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专业工作者。这些专业工作者后来成了这些世界语对外宣传部门的骨干，有的已成为主要负责人。1966 年以后，他调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组担任图书译文的改定稿工作，负责《毛泽东选集》(1—4 卷) 的全部改定稿工作；同时负责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对外广播稿的外文改定稿工作。冯文洛同志为我国世界语的图书、期刊、广播的对外宣传，为培养世界语人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界语中文大辞典》、《世界语语法》、《世界语初级讲座》等。

方善境 (1907—1983)

方善境 (Tikos) 1924 年学习世界语。1929 年，同肖从云、傅壁城、徐豪生、薛诚之创建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出版会刊《光明》，不久该“同志会”更名为“学会”，出版《希望》杂志，是学会和会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该学会首先联合全国 20 多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32 年，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和无产者世界语者国际，因此他受到反动当局的逮捕。1933 年他从苏联世界语刊物上翻译“中

国语书法拉丁化”一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引起了文化界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众语运动和汉字拉丁化问题的讨论,并积极对基本英语开展批判。1938年,在汉口创办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世界语刊物《东方呼声》,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来该刊迁至香港,坚持出版至1940年。1939年,与《远东使者》杂志合作,出版《鲁迅小说选》的第一部世界语译本。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同上海世界语者一起,竭尽全力恢复上海世界语协会,当选为理事,并创办《人民世界》杂志。1951年,当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1958年,调中国报道杂志社工作,从事翻译、外文改定稿工作,曾主持《鲁迅小说选》的编译工作。曾任中国报道杂志社翻译组组长、编委会编委、顾问等职。1976年,借调外出文出版社,参加《毛泽东诗词》世界语译文的定稿工作。1978年以后,自发地积极从事宣传、推广世界语活动,发起世界语翻译练习活动,油印《进修与资料》、《北方棱镜选读》、《世界语和我》、《国际语理想的本质和前途》等材料,寄送给全国世界语者。1981年,亲自发起创办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并担任校长,招生达5—6万人之多。方善境同志对用世界语宣传抗日,对世界语的对外宣传工作,对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界语六讲》、《世界语初级课本》、《世界语活页文选》等。

叶籁士 (1911—1994)

叶籁士 (Jelezo) 1927年在上海学习世界语。1931年,与胡愈之、楼适夷、张企程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并编辑出版《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寄发世界各国。30年代,上海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他是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主编会刊《世界》,与张企程编辑过《世界语》、《中国怒吼》等杂志。他曾积极投身30年代中期的汉字拉丁化问题的讨论,并作了大量的实际工作。1938年至1941年,他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并出版世界语半月刊《中国报导》,发行到63个国家的850个城市。1939年,同冯文洛等创办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一方面团结世界语者进行抗日活动,一方面培养了一批世界语人才。1949年,积极重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并编辑《人民世界》。1952年调北京工作后,参加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代理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还是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叶籁士同志长期担任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呕心沥血,作了许多开拓性工作。

叶籁士同志解放前,一直在上海、武汉、重庆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从事抗日对外宣传工作;同时积极热情地宣传、推广、教授世界语,对推动解放前世界语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追随著名社会活动家胡愈之掀开了当代中国世界语运动新的一页,这是将世界语跟进步与民主运动相结合的一页”。³¹

在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领导职务期间,他不仅参加协会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而且“十分关心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的工作,不时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积极建议,例如,他竭力主张全国世协办机关刊物,并建议仍以《世界》为刊名,继承30年代的光荣传统”。³²他为中国世界语事业和文字改革事业奋斗了一生,为此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中国世运的光荣史册。

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界语文选》(第一册)、《世界语谚语》、《叶籁士文集》等。

叶君健 (1914—1999)

叶君健 (Cicio Mar) 是中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1931年通过上海世界语函授学社学习世

³¹ 陈原:《叶籁士—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一块“磁铁”》,《叶籁士文集》,中文第1版,第407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北京。

³² 张企程:《含泪送别叶籁士》,《叶籁士文集》,中文第1版,第405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北京。

界语，并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的部分活动。1932年用世界语发表小说《岁暮》(Je la Jarfino)，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933年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习，1936年毕业。在武汉期间，一面参加汉口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一面通过世界语同外国世界语者通信，获得了许多进步的世界语书刊，从中吸取了营养，并继续用世界语进行创作。1936年5月赴日本留学，经常参加日本世界语学会的活动，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和著名世界语者中垣虎二郎、三宅史平、绿川英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日本警察以“危险分子”驱逐出境。后从上海到武汉，参加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他积极参加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用英语和世界语为抗战工作。在香港，他同几位作家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对外文学刊物《中国作家》，向世界介绍中国，解释中国发生的事件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用世界语创作了《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翻译了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抗日作品《新任务》和《中国战时小说集》，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1944年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邀，到英国各地演讲，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1947年创作《山村》，被英国笔会评为当年“最佳小说之一”。他是第一个用英文写有关中国小说的中国人。在以后数十年，这部小说被译成20多种文字。1985年，国际著名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将它译成世界语，被国际世协列为“东西方丛书”之一，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好评。

解放后，他回到了祖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主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上，同时积极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安徒生童话全集》曾获得丹麦女王授予的国旗勋章。

叶君健一生积极宣传世界语，参加世界语活动，为我国的世界语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曾任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报道杂志社顾问、国际世界语协会执行委员。他多次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曾任国际会议大学校长。他积极参与中外文化交流，为增进中外世界语者的相互了解作了不少工作。主要著作除以上提到的外，还有《土地三部曲》、《寂静的群山》、《雁南飞》、《白霞》等。

徐声越 (1901—1986)

徐声越 (Saint Jules Zee)，又名徐震E。1928年学习世界语，其后致力于世界语的翻译和创作，用世界语向国外介绍中国古典名著和新文学作品，先后翻译《野草》、《火光在前》、《和平最强音》、《中国诗歌选译》等文学著作，还参与了《新事新办》、《中国文学作品选 (1949—1959)》、《鲁迅小说集》中的部分作品的翻译和审订工作。30年代匈牙利世界语大诗人卡洛采³³曾将他的诗作收入《九人诗集》。国际世界语协会出版的《世界语文选 (1887—1981)》收入了他创作的7首诗作。他在世界语文学方面的成就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增添了光彩。

徐声越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汉语大词典》顾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华东师范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1951年、1979年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1982年任上海世界语协会顾问。

巴金 (1904—)

巴金 (Bakin) 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文学家艺术家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1年接触世界语，被柴门霍夫的理想所激励，写了一篇题为《世界语之特点》的文章，宣传世界语。1924年，在南京自学世界语。1928年，游学巴黎，在那里结识了胡愈之，两人结成永恒的友谊，开拓了中国世运

³³ K. Kalocsay, 中文译名也有译作卡洛柴的。

的新时代。1929年至1932年，曾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担任过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并为学会编辑《绿光》杂志。在此期间撰写了“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世界语文学论”等著作，热情宣传世界语。1929年至1951年，从世界语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小说、诗歌、戏剧，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这在中国的世界语者中是少有的，是我国世界语者的骄傲。他翻译的作品有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意大利的《过客之花》、日本的《骷髅的跳舞》、尤里·巴基的世界语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俄国的《丹东之死》等。1951年，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1980年，当选该会副会长，同年率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981年，当选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1981年，同楚图南、胡愈之等10位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世界语之友会。1982年，当选上海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1986年，担任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1996年，担任第1届亚洲世界语大会组委会名誉主席，并书面向大会致词祝贺。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世界》杂志顾问。他为世界语奋斗了70多年，对世界语的感情却始终未减。在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后，他说：“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人类公用的语言。”他在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在把外国文学作品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方面，作了开拓性工作和突出贡献。

主要著作：《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其著作《寒夜》、《春天里的秋天》已译成世界语出版。《家》的世界语译本也即将出版。1995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善述编辑的《巴金与世界语》一书，该书收集了巴金有关世界语的论文、书信和世界语的译作。

张企程 (1913—)

张企程(Ĉ. Ĉen) 1928年在上海学习世界语，随后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上海世界语者协会。1931年，与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等同志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主编过《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30年代，同叶籁士编辑过《世界》和《世界语》杂志，后投身抗日宣传工作；1950年，参与创办《人民中国报道》杂志。他历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中国报道》总编辑、《世界》主编、国际世界语协会执委会委员。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世界语之友会名誉会长、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会员。

在主持中国报道社和全国世协工作期间，他积极改进刊物，注重刊物质量和世界语特点，受到读者欢迎；主动开展对外活动，加强和密切了同国际世界语协会和其他国际世界语组织的关系。在他主持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1980年加入了国际世协，筹备了1986年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成功地召开了这次大会，多次率代表团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促进了中外世界语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他为发展中国世界语事业，加强中外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已经作出，并且正在继续作着自己的贡献。

他曾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集(1949—1959)》和世界语国际通讯集《世界的呼声》，曾与他人合译《列宁传》，译著有《印度尼西亚民歌选》。他还在《世界》杂志、《中国报道》杂志上发表过大量的世界语方面的论著和编译文章。

陈原 (1918—)

陈原 1931—1932年在广州市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学习世界语，此后曾多次开办世界语班并教授世界语。1933年以后，曾在《世界》上发表不少文章，其中有《记广州的人力车夫生活》、《她们怎样能活下去?》等。30年代中期，是广州中山大学踏绿社负责人，与余荻一起编辑出版《中国报导》(Informilo el Ĉinio)、《正义》(Justeco)、《走向新阶段》(Al Nova Etapo)，为抗日战争进行国际宣传，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51年以后，先后当选为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理事长、会长和国际世界语协会执委会委员等职。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世界语之友会名誉会长、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陈原同志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领导职务，积极指导协会工作，使其健康发展。他既是全国世协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又是胡愈之理事长领导下的贯彻者。协会的不少报告是由他亲自起草或修订的。1963年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就是胡愈之和他等人审查后作了重大修改后才获得成功的。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是在他亲自领导下取得圆满成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新时期的方针，是1988年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他为了中国世界语事业奋斗不止，至今仍在为中国世界语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原同志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兼总编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出版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语言和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记胡愈之》、《陈原书话》、《陈原散文》、《陈原语言学论著》等。

(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回顾和展望

1. 中国世界语运动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强大动力。世界语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世界语运动，而且也依赖于社会环境。一百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是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

(1) 世界语传入中国后，除了初期的一段时间外，中国世界语运动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它的壮大而壮大的。世界语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社会也为它提供了发展条件。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把世界语工作和运动纳入国家工作的轨道，为它提供了人力、物力和政策的支持，使其不断发展。如果没有宽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国的世界语运动是很难发展。正如胡愈之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语非常重视，没有党的领导，世界语在中国不可能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世界语，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支持世界语。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世界语者，但党和政府这样重视世界语的恐怕只有中国。”³⁴

(2) 近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的国际交往正日益增多，为我国使用世界语，为发展我国世界语运动，为加强、拓宽我国世界语的国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且在国际上，世界语的使用范围也正在扩大。这些条件，我们已经利用了，而且还要充分利用。

(3) 我国世界语运动发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我国各社会团体和有关部门对世界语作用和价值的认同，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合作，如各省市社科联、科委、宣传部、学校、青年团、工会、妇联、图书馆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曾多次与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工会、社科联等单位联合开办世界语班，举行世界语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在社会上收到了良好的反响。

(4) 我国世界语运动，有着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一方面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经常发表文章和讲话，支持世界语；另一方面是新闻、出版、广播部门的人士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世界语者或世界语支持者，十分愿意发表有关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方面的消息、文章、著作等。这种优势有利于我国推广世界语，发展我国世界语事业。

³⁴ 胡愈之：《在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世界》杂志第1期，第4页，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87。

2. 中国世界语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世界语运动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而又光荣的道路。我国世界语者为了自己的事业，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障碍和挫折，甚至遭受了迫害和牺牲，为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 中国世界语运动与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它是中国进步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它服务于祖国，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始终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相结合，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相结合，与争取世界和平相结合——它的实践性和革命性正是我国世界语运动最基本的经验。

(2)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百年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我国的世界语工作和运动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世界语运动所以有今天繁荣的局面，就是因为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我们世界语者必须牢记这一条经验。

(3) 争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对世界语工作和运动的理解和支持，是中国世界语者的优良传统。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效应，如：在政治界，有毛泽东、周恩来、彭真、陈毅、胡乔木、姚依林、黄华、楚图南、周谷城、胡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在文化教育界，有鲁迅、蔡元培、郭沫若、巴金、茅盾、冰心、叶圣陶、夏衍、赵朴初、白寿彝等名流的鼎力相助。在科技界，有周培源、卢嘉锡、周光召和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令国际世界语界所注目。今后，我们要继承这一传统，争取更多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就一定兴旺发达。

(4)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世界语运动要走民办公助的道路，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这里的“公助”不仅指国家拨活动经费，提供办公场所和其他物质条件，而且主要是给予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政策上的扶持。“民办”不仅指靠世界语组织和个人自力更生解决经费问题，而且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推进我国世界语事业向前发展。

(5)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世界语的事业是广大世界语者的共同事业。我们的事业要靠大家做，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结的人越多，我们的事业就越发达。哪里团结得好，哪里运动就兴旺；那里团结不好，哪里就扯皮事多，运动就停滞不前。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谦虚谨慎，共同进步，这应该成为中国世界语者的座右铭。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 50 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不仅积累了上述的宝贵的经验，而且也有一些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1) 中国世界语运动经历过几次重大挫折，例如，在十年动乱期间，世界语图书、刊物和广播成了宣传极“左”思想的政治工具，因此受到读者和听众的批评；那时不仅协会工作和全国运动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许多世界语者遭到批判和迫害。

在这之前的中国世界语运动中，曾出现严重的跛足现象，即只重视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不重视世界语运动，这一条是值得吸取的教训，在实际工作中要防止“左”的思想的干扰。世界语工作和世界语运动犹如汽车的左右车轮，两者应相辅相成，密切配合，协调发展，才能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向前发展。

(2) 当前我国缺少世界语骨干力量，尤其缺少年轻世界语人才，这是制约我国世界语运动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说明，我们在世界语人才的培养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缺憾。当务之急是我们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语理想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善于团结别人又有较高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以及世界语水平的中坚分子。我们还应在科技工作者中发展世界语者，加强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应用。

(3) 世界语的宣传工作还作得很不够，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世界语不了解，有的甚至存在

着种种误解和偏见，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特别是新闻媒体加强世界语的宣传，为世界语运动创造较好的舆论环境。

3. 中国世界语运动有着光明的未来

近百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同中国人民一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跨入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又伴随着建设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继续前进着。我国世界语运动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加快，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只要我们中国世界语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承世界语前辈们的光荣传统，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积极贯彻新时期世界语运动的方针，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以世界语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我们就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世界语事业的光辉未来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世界语与中国的民族解放

(一) 一个纲领性口号的由来

1. 时代的呼唤

从世界语传入中国直至 20 年代末, 当时学习世界语的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宣传学了世界语可以“阅五十余国之书报”, “直接阅彼邦之科学书, 得新知识”, 希望借助世界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 以振兴国家。另一部分世界语者主张用世界语与各国同志通消息, 以传播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以刘思复为代表的一部分世界语者, 一面提倡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 一面从事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更多的世界语者则向往民族平等和睦的“大同世界”。他们由于受柴门霍夫人类一员主义和世界语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现实采取中立主义态度, 存在着为世界语而世界语的倾向。在国际世界语运动史上, 人类一员主义思想统治了相当长一段时期。1908 年 4 月, 国际世界语协会成立于日内瓦, 这是最早的世界语运动的国际组织。随后各国的世界语团体, 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这个国际组织, 成立伊始都是持中立主义, 即对宗教、政治、性别、种族保持中立立场, 主张为世界语运动而从事世界语运动。他们把世界语当作宗教一样宣传着, 用柴门霍夫所倡导的人类博爱的内在理想来赢得人们的认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欧洲和亚洲, 一些国家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苏醒了。他们知道只有和命运相同的人联合起来反抗强暴者和压迫者, 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于是世界语在这些阶层中间, 便成为一种很好的联络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各国劳工世界语运动, 便很迅速地发展了, 他们借着世界语国际通信, 成为各国无产者沟通感情、交换斗争经验的工具, 从实质上进一步拓宽了世界语的应用领域。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西方各种新思想, 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等各种思潮被介绍到中国。阶级压迫的思想是一部分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刚刚接触的新观念。对世界语者群体来说, 和平主义的思想已经根植大多数人的头脑中, 几乎还没有人想过用世界语为改良社会去做些什么。尽管西方社会劳工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 但对于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众来说, 工人运动的兴起还需要一个过程。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进政党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25 年在上海发生的反对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 导致流血冲突的“五卅”事件,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一次早期活动。这起事件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与国内政治斗争结合的开端。

从当时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中可以见到一点端倪。当时上海的六个世界语团体向全世界发出的一份“抗议书”。抗议书中说:

“吾等谨以上海市民之名义, 以中华人民之名义, 以世界人道主义者之名义, 对于上海租界巡捕残杀无道之行为, 提出严重之抗议……

此次暴行为人类历史中, 神的地球中所永难洗刷之一大污点。又因此次暴行为现代人类共同之耻辱, 故将此次事变之真相不加丝毫之渲染, 公平陈述于全世界公众之前, 此实吾等应有之职责而义不容辞者也。

正义与真理初不因武力与强权而改变, 故吾人甚类全世界主张公道爱好真理之人民一读吾等之抗议书而加以良心上之裁判。吾等希望正义与真理, 在现世界当犹有存在之余地。读

者能加以公正之判断，将见公道自在人心而吾等之愿足矣。……”³⁵

接着，这个抗议书中便把“五卅”事件的前因后果据实作了报导。事后胡愈之将国外世界语界的反应整理后写成“五卅事件与世界语界”一文，发表在《绿光》第4卷第1号上。他在文章最后写道：“从这次事件我们有两种感想：(1) 五卅惨案一事，在世界语界，已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可见公道自在人心。(2) 爱国运动必须注意对外宣传，而对外宣传不可忘了一件紧要的工具——世界语！”由此可见这是中国世界语者参加政治斗争的第一步，而且这也清楚地显示了在震撼全国的流血事件面前，中国世界语者的立场。这种改变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的社会现状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愈来愈推向与社会运动相结合、与祖国的命运相结合的道路。

2. 中国世界语者的新思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国际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两大阵营：即作为压迫者的少数资产阶级，和被压迫着的无产阶级。这种对垒，当然毫无例外地也要反映到世界语运动中来。于是在代表“中立主义”的国际世界语协会之外，出现了好几个国际组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全世界超民族协会，简称 SAT。

全世界超民族协会于 1921 年在巴黎成立，是一个世界语者的左翼组织。这时工人阶级要求解放，需要国际团结，他们把世界语看作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加强国际团结的工具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1929 年该组织的会员已经达到 6329 人，同年国际世界语协会的会员人数有 9113 人，二者实力已势均力敌。在全世界超民族协会的所有会员中，苏联有 1987 人，德国 1835 人，苏德两国的会员人数占全世界超民族协会的 60% 以上。后来因为它的领导成员所倡导的超民族主义，即否定一切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引起了苏联、德国等左翼会员的反对。于是这些左翼会员，组织了另一支国际团体，即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 (IPE)。1931 年全世界超民族协会在荷兰举行第 11 次大会时，左翼会员便正式宣告脱离这个组织，另行成立了一个组织——统一委员会 (IUK)。在成立当时，就得到各国进步世界语者的拥护。1932 年 8 月统一委员会在柏林召开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成立大会，到会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行动纲领是：将世界语运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统一并领导各国无产阶级世界语团体；完善国际人造语理论、扩大世界语的应用领域；把革命斗争、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其思想基础。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会刊《国际主义者》和各种书籍以外，最重要的是发动了“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这一种形势，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后，汉口世界语学会联合全国 20 个世界语团体发表了宣言，向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他们维护和平、主持正义。该宣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地的世界语组织或个人都对日本侵略者表示谴责，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与支持。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第一个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世界语组织——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简称语联，世界语名称为 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即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亦称普罗世界语者联盟，“普罗”是 proleta 的音译)。它于 1931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成立。“语联”成立的报道刊载于当时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 1931 年 12 月 14 日的《文艺新闻》上，内容如下：

³⁵ 《世界》1936 年第 5 期第一版《纪念五月》

国内青年世界语者多人，外受国际新兴世界语运动的影响，内感文化工作的迫切要求，觉得世界语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也只有适应这个新的时期，世界语运动才有它本身存在的意义。因此，发起了一个 CPEU（中文名称用“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于本月3日在北四川路新雅茶室举行第一次发会式，到会者有胡愈之、张明理、乐嘉煊、陈世德、覃净子、适夷等十余人。由胡愈之、适夷等相继发言，阐明世界语的新任务与意义，在全场一致的决议下，规定纲领四条，并产生临时执行委员五人，组织临时执委会；推定胡愈之担任书记，适夷组织，张明理传播，包叔元国际通信，陈世德研究等部。决定目前工作为创设讲习班，及设立国际通信部，发行杂志。最后推定适夷起草宣言及章程，在下届会议提出。

这里提到的张明理即张企程，包叔元即叶籁士。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这个名称，就这次见报用了一次，以后没有再用了。语联在上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领导下的一个团体。在文总的领导下有“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等左翼文化团体，语联是最后也是最小的一个加入“文总”的组织。语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世界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初期中立主义思想愈发显出分野。

语联成立以后，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对内方面，出了一本名为《中国普罗世界语者》的机关刊物，在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并组织了一些工人世界语讲习班；并以乐嘉煊的名义于1932年7月成立了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及一个世界语书店，主要工作是编写世界语教材、批改课卷；对外方面加入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并开展了世界语国际通信工作，主要由张企程负责。除此以外，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的左翼世界语组织也开展了广泛的联系，日本、德国、法国以及苏联和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都成为语联的很好伙伴。语联的工作在国外都得到了热烈的反应，特别是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和各国的进步世界语组织给了这个组织很大的支持。这样，语联的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除了上海以外，当时在北平和武汉也都有语联的组织。武汉的语联成立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北平的语联主要在各大学的学生中进行活动，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把青年学生引向革命的道路，它在“一·二九”的学生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语联的工作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一共存在了五年多时间。在这期间，由于组织工作严密，机构始终未被破坏。1936年初，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总要求所属各联盟解散。当时对外国际宣传工作需要加强，语联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直至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后，语联才告结束，并决定一部分成员到大后方继续工作。

语联开拓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它把世界语同中国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革命世界语者所抱有的国际主义理想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世界语运动同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世界语真正发挥了它的进步作用，把当时脱离现实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引上了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正确道路。可以说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的成立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转折点。

另一方面“九·一八”这个反面教材不仅教育了广大中国人民，也教育了中国的世界语者。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打碎了新世界语者头脑中的和平主义和人类一员主义的“美好理想”，使他们走上了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3.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历史悠久的上海世界语学会连同世界语书店毁于炮火。王鲁彦、巴金、索非等人编出了九期《绿光》，想把学会恢复起来，未能如愿。1931年12月成立的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并不是一个能够进行公开活动的组织。世界语本身对外并没有政治色彩，中国世界语运动内部也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进行公开合法的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成立一个公开活动的组织迫在眉睫。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为了引起公众对世界语的兴趣，1932年12月17日至18日语联以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名义举办了一个世界语展览会。会场设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饭店二楼。开幕当天在上海的大报上刊登了大字广告。配合这次展览，世界语刊物《世界》(La Mondo)创刊号也问世了，在展览会上散发。与举办展览会同时，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书店，经销国内外世界语书刊，收订中外世界语刊物。展览会获得意外成功，参加人数达一千人，绝大多数是还没有学过世界语的年轻人。这时成立一个群众性的世界语团体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Sanhaja Esperantista Ligo)诞生了。这个协会一成立，就把函授学社、世界语书店、世界语讲习班等接过去作为协会的事业，把《世界》作为协会的机关刊，另外还成立了世界语图书馆和巡回教授团，向一些大学派遣世界语教师。

1933年9月10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这次大会的宣言是这样的：

……

我们一致认为世界语运动不能是超社会的，而世界语者也决不是超人。所以在努力于世界语运动之际，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和一切社会文化运动一样，我们的世界语运动也受着时代的动荡，而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火也像打击着一切民众一样打击着我们世界语者酷爱和平的心。尤其是在各帝国主义者瓜分下的中国，世界语运动所受的痛苦也更深且大。我们认为中国民众的奴隶状态，实为发展中国世界语运动最大的障碍，而帝国主义者之奴役中国，更与我们世界语者爱平等的理想相远。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世界语者当致力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实为天经地义。而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世界语，为谋中国之自由平等而世界语，实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当前的急务。³⁶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提出的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中国世界语者的心声，博得了他们热烈的赞同和支持，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后起的世界语团体大都接受了这个口号。而运动一般取向，大体都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一致。1933年6月23日北平的《世界语之光》创刊，青岛的《世界语》、绍兴的《绿焰》、成都的《绿帜》、太原的《播种者》、吴淞同济的《小世界》等也相继问世，从这时起以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个口号一直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

1934年4月5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从同孚路大中里14号(现在的瑞金一路)迁往卡德路嘉平坊12号(现在的石门二路)。这是一所二层楼房子，楼下作办公室，楼上改建成教室。门口挂起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牌子。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成立以后，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就完全分开了：协会会所不放任何引起国民党特务怀疑的物品，比如：语联的文件、国际来信、国外通讯的来稿等等，所有这些都放在语联会员的家里。协会的日常活动完全公开，开办世界语班，每次都在《申报》、《新闻报》等上海老牌报纸上刊登封面广告。此外，世界语书店除出售一般的世界语书籍外，还出售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基

³⁶ 《世界》1933年10月号

础》、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等书籍的世界语译本。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性组织,实际上却起着一个全国性团体的作用。据1933年9月的统计,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有会员393人,其中156人是上海本地的,其余分散在全国各地。《世界》纯订户有412人,如果加上会员和函授学员的订数,一共有2500多份。³⁷《世界》成为联系全国世界语者的一份导刊,每期封面上印有的“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也成为全国世界语者的行动指针。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个口号,明确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与国家共命运的呼声,在中国世界语者的思想上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愈发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世界语者在使用世界语时的倾向性,彻底与中立主义、和平主义分道扬镳。在这个纲领口号被广泛认可之后,对过去和平主义、人类一员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无情批判的文章常常可以见诸报端。1935年1月号《世界》刊出的《一·二八三周年纪念》这样写道:

在我们回忆一·二八的惨痛,抚着我们民族的新的创痕的时候,我们不得想不到我们世界语运动在一·二八中所受的损失。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前上海世界语学会,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毁去了它的会所、它的文件与藏书。同样使我们痛心的,是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的先进胡愈之先生的数千册可贵的世界语书籍也都化为了灰烬!而我们更应该想到,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是日益加紧,帝国主义的杀机是有增无已,眼见得我们世界语自由和平的理想,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所摧毁!我们作为和平的战士的世界语者,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一员的中国人世界语者,在这沉痛的纪念日,该怎样警惕自励,负担起我们的使命来:以世界语谋中国的解放!以世界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一·二八事变诚然给了我们巨大的耻辱与损失。倘使我们只知道从帝国主义的炮火中拾些灰烬回来,供在屋里,关起大门来,销声匿迹了,而不知道以更坚决的步伐向前奋斗,与帝国主义者算清这笔血债,则这将是我们的永远的耻辱,永远的损失。

中国的世界语者们!现在已不是我们高唱世界语主义,空谈和平理想的时候了!现在该是我们实际应用起我们这有力的工具:为了中国民族!为了人类!

中国世界语者在思想上彻底摒弃了和平主义和人类一员主义的羁绊,真正开始走上了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二) 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世界语者

1. 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有良知的世界语者就开始把世界语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虽然那时还没有明确的口号作为行动纲领,但是凭着中国人的良知,许多中国世界语者站了出来,为捍卫国家独立而呐喊。

《希望》(La Espero)是汉口世界语学会主办的一份月刊,1930年1月由会刊《光明》改编而来。“九·一八”事变以后,1931年第8—9期合刊上头版刊出了世界语文章:《全世界人民请注意,世界和平正在受到威胁》,该文以第一速度、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世界语者揭露了日本军队暴行。文章详细报告了日军侵占沈阳、长春、吉林的经过,并进一步描述到:“3000名居民和80到90人被杀,实际人数远不止这些,因为有的尸体被日军以各种方式掩埋,外界记者不允许去日军占领区报道”,“日军占领长春以后,持续了5个小时的射击”,“除此以外,

³⁷ 《世界》1933年10月号

日军还派出飞机观察并投掷炸弹，死伤无数”。文章旁边还配有图片及说明，“日军占领沈阳兵工厂后在大门前大书‘非日兵出入者，即射杀之’”，“日军在沈阳城内以机关枪任意射华人之状”，“东北军飞机被日军强夺去后，涂改颜色符号”等。这篇文章在结尾向全球世界语者呼吁道：“人类需要和平！日本侵略者滚回去！一切罪行都要偿还！”同时还向国内世界语者疾呼：“此次帝国主义来侵，凡为人类，莫不同心痛恨。对于全世界民众，我中国世界语学者，实有一种表示之必要。本会发起，拟联合全国世界语团体，同时发表一宣言，散发于各国世界语学者，以暴露事件之真相。”

1931年第10期《希望》刊出了闻名国际世界语界的《我们的宣言》(Nia manifesto)，宣言中详细陈述了日军入侵东北的经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大和国”，在宣言结尾向全球世界语者呼吁道：

我们虽然充满了友谊，想到日本人民也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是我们的弟兄，但凡是危害世界和平，污辱人类历史，尤其虐待我们人民之一切极端爱国狂与帝国主义者之卑劣行为，我们决不犹疑而完全准备应战。

我们等待着各国人民之同情与赞助尤其是诚恳的日本人。

《我们的宣言》共印了8500份，分寄欧美各国，对日本、朝鲜两国的世界语团体和个人也寄去了一千多份，很快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各国人民强烈的声援。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世界语团体和个人也有不少来信声讨军国主义的暴行。据1932年12月的初步统计，《我们的宣言》曾被译成8种外文，在14种国外报刊上发表；同时收到来自日本、苏联、保加利亚、德国、奥地利、荷兰、法国、捷克、英国、新西兰等国的世界语团体和个人来信70余封。

1931年第10期在《我们的宣言》刊登同时，《希望》月刊辟出一个世界语新栏目“来自中国”，每期向世界报道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第一次刊出的就是描写国民党军队不抵抗，爱国学生游行抗议的状况。在以后的《希望》月刊上还陆续刊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现状》、《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中国苏区现状》、《上海‘一·二八’抗战》、《给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一封信》、《中国苏维埃现行政体一览》、《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世界语者应担负怎样的任务》等多篇有影响的文章。

与此同时，作为上海世协机关刊的《世界》杂志同时问世，它实际上起着引导全国世运方向的作用。它的进步倾向十分明显。1933年7月，法国著名革命作家巴比塞受国际反战大会的委托打算率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在上海与宋庆龄一起召开一个由各国代表参加的反战大会。1933年4月号的《世界》杂志就以《纪念柴门霍夫，欢迎巴比塞》为题表明上海世界语者的态度。同期还发表了胡愈之的文章《巴比塞与〈世界〉》。这篇文章描述了作者在法国留学时有一次见到巴比塞的情景。在这期上还同时刊出了30多位读者围绕“我们为什么欢迎巴比塞”和“世界语者应该怎样反对战争”这两个题目而进行的讨论。这次欢迎巴比塞行动实际是一次对读者弘扬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教育运动。希特勒上台以后，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遭到破坏，《世界》杂志多次加以抨击，并提出了“打倒法西斯”的口号。1934—1936年是《世界》杂志极其活跃的一段时期，在刊物上经常可以见到向外介绍中国抗战的消息。1934年第1期刊出了《中国世运现状》一文，在文中作者表明中国世界语者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坚定立场：

由于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并不断向中国腹地入侵，中国民众觉醒过来并起来反抗。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了，以前并不为人们所知的世界语，现在正加入到这场斗争洪流去，并已得到外界的关注。帝国主义的枪炮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引向一条新的道路也并非偶然。

自 1933 年第 10 期起,《世界》开辟了新栏目《中国怒吼》(Ĉinio Hurlas),在该栏目的编者按中,是这样写的:

中国正忍受着煎熬,它怒吼着,抗争着。这是怎样的痛苦、怒吼和抗争啊,中国世界语者有责任将之告诉给国外同仁,也有责任让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在痛苦、怒吼和抗争,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更能代表中国的现状。《中国怒吼》——这就是我们的新栏目,我们将通过它向国外世界语者传达中国的呼声。

这个栏目主要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在当时是极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1936 年以后沿用《中国怒吼》这个名称,改为独立刊物,16 开 8 版,每月一期。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以后,改为每 10 天一期。

1934 年第 9 期《世界》发表了题为《受压迫的朝鲜人——中国的前车之鉴》一文,告诫中国千万不能放弃抗日,只有斗争才是中国人的出路。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后,1934 年第 11 月号《世界》以《进一步迈向和平的胜利》为题报道了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情况,并在其后紧接着介绍了《苏联的真相》。1935 年 2 月号在头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1936 年 1 月号刊出了长文《华北沦陷了》,文章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和《塘沽协定》,把华北的大片土地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行径。1936 年 7 月的《世界》在头版以《东北人民的苦难》告知世界中国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

《世界》从 1932 年 12 月 15 日创刊,到 1936 年 12 月停刊,历时 4 年零一个月,共出刊 49 期,对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7 年爆发全面抗战以后,北平、上海相继陷落。更多的世界语者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世界语成为有力的国际宣传工具。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1937 年《走向新阶段》(Al la Nova Etapo)在广州创刊。

1938 年 3 月,方善境、傅壁城在汉口创办了《东方呼声》(Voĉoj el Oriento)杂志,宣传抗日斗争。9 月迁至香港,直到 1940 年终刊,共出刊 34 期。《东方呼声》全部用世界语编印。刊头印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的口号。这个刊物大量刊登解放区和八路军方面的消息和文章,有些材料是直接来自解放区来的,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东方呼声》曾发表过一篇讨论中日问题举行国际民意调查的文章,得到各国世界语者和非世界语者的热烈响应,至少有八种外国报纸译载了这篇文章。荷兰的世界语者曾用《东方呼声》寄去的材料,举办了一个中国抗战展览会,捐款救济中国难童。《东方呼声》在 11 个国家建立了代理处,在各国许多城市有义务推销员。同年 5 月 20 日,国际和平运动中国分会广州中心世界语组创办了《正义》(Justeco)杂志。同月,匈牙利世界语者布劳恩(Braun,中文名字叫蔡岩)在香港创办《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加强了抗战的国际宣传。

1938 年广州国际分会出版了《在轰炸下的广州》(夏衍著)、《战火中的中国》、《日本人说话了》(鹿地亘等著,绿川英子译)。8—10 月还出版了《中国通讯》(Informilo el Ĉinio)。《中国通讯》每周六出版一次,报头上有一句口号“拯救中国就是拯救和平!”,一共出了六期。在通信稿上曾登载了宋庆龄在广州电台播发的致世界青年的演讲词,日本朋友鹿地亘反对日本侵华的文章,八路军和其它游击队抗敌故事等多种内容。

在众多宣传抗战的世界语对外刊物中,1939 年创刊的《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举足轻重。

《中国报导》是叶籁士等一批进步世界语者在郭沫若同志亲自主持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及其前身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利用世界语向国际上宣传抗战的国际性刊物。该刊为半月刊,铅印,16 开,每期印五至九千份,主要寄发国外,大约发行 63 个国家

和地区，在 850 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许多同情中国抗战的世界语者成为《中国报导》的代
销人。它的总的任务是宣传我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
其它方面的情况。刊物突出报导了敌占区人民万众一心，同时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人进
行各种斗争的英雄事迹和故事。

1939 年 6 月 1 日《中国报导》发刊词说：

“如今人类和平和国际正义正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破坏，它正把全球引向中世纪
般的荒蛮之中。为了保卫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所有热爱和平的民族和所有个人有责任共同
起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与这种势力斗争。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用鲜血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是令人痛苦的，但中国人民相信，
胜利终究属于我们。

中国人民一向热爱和平，过去几年中，中国正大踏步迈向民主国家和现代社会，但是中国
迈向进步对日本法西斯全球称霸的企图无疑是一重大障碍，他们想通过战争来满足自己的贪
欲，中日战争的起因便源于此。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欺骗世界说什么并没有强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有的只是来对抗中
国的共产主义云云。

在正义的世界面前，他们的自我标榜是徒劳的，恶毒的宣扬只能令人生厌。

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世界和平。整个世界同情中国，并
渴望得到中国抗战的消息，对世界来说，《中国报导》承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们坚信，所有
热爱和平的人会同情和帮助中国，携手抗击人类和平的共同敌人。同样我们还相信所有读者
会像关心和支持中国一样支持我们的杂志。³⁸

时事评论一般为刊物的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时的一些战事走向和国际动态作出评论。
曾发表过《抗击日本到底》、《为最后的胜利而继续战斗》、《汪精卫失败》、《美国不应
向日本妥协》等多篇有力的评论文章。对当时鼓舞斗志、批判卖国投降行为都起到了很好作
用。根据当时由于敌强我弱，国际上有人发出“中国必亡”的论调，《中国报导》适时节译刊
载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使各国世界语者正确了解中国抗战的形势和战略、战术及
其前景，增强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从而在国际上对支援中国抗战起到积极作用。蒋介
石及其下属将领的抗日讲话和言论，在刊物上也时有转载，以利于“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

第二部分是一些简明扼要的数字报告。用数字说话，让事实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战争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每期《中国报导》均辟有专栏介绍日军半月来的损伤情况，从
中日双方交战次数、日军死伤数、击落敌机数、缴获敌人战马、枪支、大炮、坦克、子弹等
多个方面介绍最新战况。

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敌占区人民的抗战情况。如曾刊出过湖南、湖北交界的抗日战士常
常到日军哨所摸营、抓舌头的《活捉他们》、《广西学生服军役》、《中国空军讲述柳州空
战》、《昔日教授今日成了游击队的头》等。

第四部分报道了中国优待日本俘虏的情况。《战俘 Ichiro Sato 说》、《日本战俘捐款》、
《日本战俘在战俘营中找到平静》、《从厌恶战争到反对军国主义》、《三个日本战俘》、
《中国的日本战俘》、《日本战俘故事》、《日本战俘的“博爱村”》、《我又有了思想》。

第五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民兵、游击队等武装开展抗日斗争的故事。
有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运动》、《中国的游击战争》、《鄂北游击队的行动》、《华

³⁸ 《中国报导》1939 年 6 月 1 日出版第 1 号，编者按《为了和平而战》

北工人在战斗》、《游击队如何炸了三座桥》、《东北抗日联军的年轻人》、《华北的农民也进步了》、《满洲活跃着游击队》、《400 万件冬衣送给游击队》、《日本军队在山西有麻烦》，以及介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战斗经验的《前线的艺术家们》等。

最后部分是介绍中国建设成就的文章。被人们认为落后地区的贵州、云南、宁夏、新疆等地的经济、文化等发展均有多次报道。

1944 年秋天，《中国报导》的排字房被撤消，为了使《中国报导》不致停刊，老世界语者翟健雄自告奋勇筹办排字房，成立“世界出版社”，为了解决经费困难，《中国报导》从 1944 年 10 月缩小版面，从 16 开改为 32 开，从半月刊改为不定期出版。半年之后，即 1945 年 3 月，政治部下令撤消文化工作委员会，³⁹《中国报导》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终刊了。

2. 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

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即“Proleta Esperanto Korespondado”的中译名，是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 (Internacio de Proleta Esperantistaro) 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世界语报道各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打破帝国主义的新闻垄断，传播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息，以增进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和互相支援。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的总部设在柏林，各国支部都有分社。分社的任务一方面是将本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编成世界语新闻稿，印发总社和各国分社；另一方面各国分社将总社和其他分社发来的新闻稿，择要译成本国文字，在本国的进步报刊乃至工厂的墙报上刊登，或者在一些群众集会上宣读，或者印成传单在群众中散发。

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的新闻稿最初用钟灵印字机印刷，初期刊名为《中国普罗世界语通讯新闻稿》(Ĉina PEK Bulteno)。1936 年 4 月，《中国怒吼》(Ĉinio Hurlas) 创刊，并取代了原有的《中国普罗世界语通讯新闻稿》，同年 7 月改为铅印出版。并沿用了《中国怒吼》这个刊名。《中国怒吼》源自一个苏联的剧本。苏联作家特利亚柯夫写了一个关于中国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剧本，名为《怒吼吧！中国！》。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又很贴切，所以就被采用了。1936 年至 1937 年间的出版情况是：1936 年第 1 卷出版 6 期，1937 年第 2 卷出版 5 期，1937 年第 3 卷出版 4 期。1937 年 10 月以后，《中国怒吼》每十天就出版一期，分发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中国普罗世界语通讯新闻稿》的材料来源，除了特约专稿外，主要采用中国工人通讯社 (CWC) 发来的材料，全部是用英文编写、用薄纸打字复写的新闻稿，其中常有有关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息报导。中国工人通讯社是党的对外宣传机构，他们按期向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分社供稿。此外，当时一些进步外国人士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中国呼声》及一些公开的中文刊物也是重要消息来源。

《中国怒吼》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政论性文章。1936 年 7 月 20 日出刊的第 1 卷第 1 期对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作了客观剖析，开篇《向全世界呼吁》中说：

“今天日本对华战争不仅是对人类和平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而且也是为了铲除人类共同的敌人，所以这是一场全球合作共同对抗人类恶魔的斗争，而其中中国只是这场斗争的急先锋。我们请求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不要只给我们以深切的同情，还要参与到这场对抗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来。”

³⁹ 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1940 年在国民党政府迫害下，在第三厅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和全体进步人士退出三厅。后经国共两党谈判，又重新组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编制上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实际工作仍继续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志领导，在国统区内进行革命文化工作。“文工会”于 1940 年 10 月 10 日成立，到 1945 年 4 月被蒋介石下令解散。

1936年9月20日的《中国怒吼》又发表了《致全球世界语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请求各国的世界语者多给编辑部写信，并积极向当地媒体推荐《中国怒吼》，并把转载《中国怒吼》文章的杂志或报纸寄给编辑部。该信还请求世界语者广泛征集本国人民对日本侵略中国所持的看法，并积极在当地成立“中国之友会”。在该期第二版刊出了《东北失去了五年了》一文，文章介绍了上海、北京等地学生冒着危险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抗日，并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以及反动政府不抗日、压制学生爱国要求的事实。“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在全国一片抗日的呼声下，《中国怒吼》及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声明，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日的态度。1937年11月30日第5期《中国怒吼》，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答邹韬奋等民主爱国人士的一封信，信中清晰传达了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停止内战的鲜明态度。西安事变之后，针对国内外的种种谣传，《中国怒吼》发表了《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之前景》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团结起来了》等评论，对澄清国内外种种谣传，团结各个阶层一致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1937年10月25日出版的《中国怒吼》在头版又刊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信守诺言，为国家民族之大义作出巨大的牺牲。声明中说为了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放弃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并为了统一全国政治力量，取消了苏维埃政权，改编了红军的名称及番号，在战时委员会的调遣下成立国民革命军。

在《中国怒吼》刊出的第二部分内容中对东北沦陷后，东北当时状况以及东北军民奋起救亡作了大量报道。1937年4月1日刊出了《满洲的奴化过程》，详细介绍了东北各省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学校里禁止教授汉语，不准阅读中国历史、地理书籍，强制灌输日本文化等奴化教育。1937年7月刊出了《满洲发生了什么事》，向读者展现了当时东北各省四处开设烟馆，农村的肥沃土地上种植鸦片，中毒的烟民意志薄弱，青年进医院日本医生首先给注射鸦片针剂等状况，揭示了日本侵略者不但企图从思想上控制中国人，而且从体质上摧毁中国人的险恶用心。1936年9月20日第1卷第3期登出了《日本总司令给驻东北关东军的密电》，该文证明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原材料，抢占中国市场，迫使中国降低对日关税，压迫中国政府镇压反日行动，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等一系列行动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在对东北的报道中对东北军民的抗击日寇的宣传占有重要篇幅。《赵尚志——中国新英雄》是1936年8月20日出版的《中国怒吼》刊出的一篇文章。该文赞颂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赵尚志的英勇事迹。日伪警察局对他又恨又怕，并开出八万块大洋要悬赏捉拿他。在该刊还登出过《东北军抗击日军》、《东北抗日战士生活》、《东北义勇军的团结》等多篇文章。

对全国救亡及抗日运动的介绍是《中国怒吼》宣传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可以说《中国怒吼》对全国各阶层人士在抗日中的表现作了全方位的报道。1936年9月20日刊出《中国救亡运动现状》，指出中国已无路可走，要么向日本投降，要么奋起反抗。该文中插入的中国地图向人们警示，日本在一步步进入中国腹地。广大民众开始意识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全国救亡怒潮风起云涌。同一期还刊出《天津学生的文化运动》一文，介绍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学生们为了唤醒民众，利用假期义务开班向百姓介绍时局，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1936年11月30日第1卷第5期还登出了沈钧儒等民主文化人士于1937年11月23日因要求抗日被反动当局逮捕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8月20日出版的《中国怒吼》刊出了《可贵的奉献精神》一文，该文介绍了上海的许多民族救亡团体，自身境遇并不好，但是为了支持抗日，宁愿自己艰苦一些，也要在这场斗争中站在最前列。除此以外，还报道了一些地方的抗日情况，《中国怒吼》曾先后刊出过《宁波的盐业工人的反抗》、《太原的救亡运动》、《山东醒来了》等文章。

对红军及苏区军民抗日的报道在该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红军及红色政权在当时属于非法，所以对苏区的报道也不能过于公开。1936年8月20日刊出的《陕西的屠杀事件》，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在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小镇里胡作非为，屠杀了几十名农民的卑劣事件。1936年11月30日刊出的中国共产党给邹韬奋等民主人士的一封信，是较

为全面直接刊登共产党人言论的一次努力，在该文的编者按中对毛泽东的身份也作了简要介绍。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以后，对共产党的介绍更为直接详细。1937年4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1期《中国怒吼》刊登了《陕西的现状》一文，指出在陕西主要有三支部队，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和陕北的红军，随后用一半的篇幅介绍了红军官兵一致、军民鱼水情、公平交易等情况，并介绍了著名女作家丁玲及延安的各所大学。在随后的1937年5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又登出了Eterno先生的《红区来信》，并说这可能是第一封来自苏区的世界语者的来信。该文以世界语者的眼光说“这里有着真正的同志友谊……现在人们正万众一心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3期《中国怒吼》全文刊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清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机前的大义之举。在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国怒吼》上发表了宋庆龄女士对英国工党的讲话，要求英国及全球有正义感的人民来帮助中国人民，制止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绿川英子还为该刊写过《爱与憎》、《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的曙光》等文章。《中国怒吼》对外报导了当时苏区军民的斗争和救亡运动，这些都是国民党企图封锁的。这份刊物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欢迎，德国的《红旗》、法国的《人道报》都曾转载过不少消息。

第四部分是《中国怒吼》对世界各地世界语组织及个人来信摘登。在固定栏目《信箱》上刊出，每次登出七至八封来信，主要是国外世界语者对收刊情况的反馈、建议、征友等。这个栏目还是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与国外对应组织联络的一个渠道，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分会向奥地利、法国、巴塞罗那等无产阶级世界语组织留下的一句话提示，有的是关于对他们合作的感谢，有的是索要对方出版的某期杂志，有的是对兄弟组织出版的刊物提出的建议等等。

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还从收到的各国的新闻稿中，选译对我有用的材料，转给国内进步报刊发表。当时不少进步刊物，都发表过由该渠道译出的材料。苏联米丘林斯克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发来了关于米丘林事迹的新闻稿，中国分社译出后交给《世界知识》发表，这是国内关于米丘林的最初的报导。关于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的斗争，也译过不少材料。西班牙内战时期，在国际纵队中有一支由各国世界语者组成的队伍，由西班牙世界语者曼加达(R. Mangada)将军率领，战斗在马德里前线；内战期间西班牙出版了两种世界语刊物，报导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掌握不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材料。

中国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同日本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之间，保持了同志般亲密的关系。当时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侵略，中国分社通过《中国怒吼》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把绿川英子写的要求日本人民起来反对侵华战争的呼吁传到日本去，日本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把这些材料译成日文传播到日本人民中去。中日两国分社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遭到封闭才告中断。在北京档案馆里现在还保存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劫获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通讯分社给北平世界语协会寄来的关于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材料。

1935年5月北平世界语协会编辑国际通讯刊物《无线电》(Radio)出版，该刊经常向国外报道北平和全国救亡运动情况，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1936年《无线电》还在继续出版。北平地处国防前线，救亡运动受到压制，但是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世界语者仍然把北平学生反对日本侵略，掀起救亡运动的情报，通过《无线电》和国际通信，告诉各国读者。随着北平的沦陷，《无线电》被迫停刊。

3. 重庆和延安的世界语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许多世界语者也来到武

汉。这时郭沫若同志在筹建第三厅，⁴⁰ 叶籁士是在三厅较早工作的世界语者，后来到三厅来的又有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等几位同志，于是三厅下设的第七处的世界语工作就开展起来了⁴¹。后来日军逼近汉口，工作又转移到重庆。三厅在赖家桥建立了一个简陋的排字房和印刷厂。1939年创刊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该刊发行到四、五十个国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三厅的成员主要是一些世界语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国民党不能容忍他们的进步活动，1940年撤消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职务。三厅同仁纷纷提出辞呈，要与郭沫若共进退。国民党陷于被动，被迫另行组织一个与三厅平行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世界语者们随同郭沫若和其他文化人就进入这个新的机构继续进行原第三厅所做的工作。

当时在文工会做对外宣传工作的世界语者除了有叶籁士、乐嘉煊、先锡嘉等人外，还有绿川英子、刘仁夫妇。文工会的地址分城乡两处，城区在天官府，乡下办事处在赖家桥全家院子。从30年代末三厅时候起，直到1945年4月文工会被蒋介石撤销为止，世界语者一直坚持世界语国际宣传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的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1940年叶籁士同志还和版画家丁正献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木刻选集》(世界语版)，随同《中国报导》一起发行，宣传中国抗战。绿川英子是《中国报导》半月刊主要撰稿人之一，她用世界语写了大量文章和诗歌，她的长诗《失去的两个苹果》还由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胡风译成中文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文艺刊物《七月》上，并编写了译后记，把绿川英子介绍给中国读者。

1940年3月，叶籁士、钟宪民、乐嘉煊、冯文洛、刘仁、先锡嘉等几位世界语者发起成立了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Koresponda Esperanto Lernejo, 简称KEL)。当时向重庆市教育局登记备案，由秦德纯任社长、钟宪民为副社长，叶籁士为教务主任，刘仁为总务主任。函授学社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和青年组领导，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世界语，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共同抗日。冯文洛、许寿真、张闳凡、曾禾尧先后担任教员。学社成立期间共招生2300多人，学生遍及全国18个省，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了便于函授，学社首先出版的是《世界语战时读本》。这本书是在1939年开办世界语函授班时由钟宪民一课赶一课地油印编写而成。到1940年开办函授时，它就正式铅印出版了。接着出版的是《世界语战时读本讲义》，这本书就语法方面辅助函授学员对读本课文的了解。1942年又出版了《世界语语法》(冯文洛编)，从而完成了函授世界语初级班的全部教材。1943年开办世界语中级班时，就以当时出版的《世界语文选》第一册(叶籁士编)作为课本。

学社除了函授世界语外，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工具书。1942年订正再版的《现代中文世界语辞典》⁴²和1942年出版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⁴³是抗战时期出版的唯一的两种较完备的世界语工具书。

在1942年到1945年期间，学社先后出版的世界语书籍还有叶籁士编注的《各国谚语选集》、许寿真编的《世界语歌曲集》、苏联E. Drezen著的《柴门霍夫评传》(张闳凡译)、钟宪民编的《世界语初级语法》、亚克编的《世界语分类词典》等。

由于出版经费短缺，有些世界语书稿不能铅印出版，学社便以油印方式供应全国的世界语者，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中国世界语者》(Ĉina Esperantisto)杂志。它最初几期(1—3期)由许寿真编辑刻印的。后因他离开重庆而中断。1942年张闳凡参加学社工作以后，又恢复了刊物的出版。它前后共出版了10期左右，这个约为一年两期的油印刊物在当时起到了团结全

⁴⁰ 三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简称。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中共中央提名，周恩来同志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为第三厅厅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这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内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

⁴¹ 当时政治部第三厅下设第五处、第六处和第七处。第五处主管一般宣传，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第七处主管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三厅的主要工作是向外宣传中国抗日情况。

⁴² 周庄萍、徐文、郑竹逸合编，其第一版是1935年由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

⁴³ 冯文洛编，原分七个分册陆续出版，1944年出齐，全装为上下两册

国世界语者、促进世界语运动的作用。

抗战时期，重庆是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基地。在陕甘宁边区，随着一批追求进步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到来，世界语也被传播进来。延安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在30年代前，这里谈不上有世界语运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部分世界语者跟随党中央来到延安。“七·七”事变以后，党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办起了我党第一个世界语班。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世界语者王玉福任教员。学员们同抗大其他学员一样，在窑洞前支起黑板，露天上课，没有课本，就靠背诵来掌握单词和语法。

1938年4月，随着世界语者的增多，一项建立世界语组织的计划摆在面前。延安的世界语者认为：“世界语是全世界被压迫大众和弱小民族彼此间相互联络团结的最好工具，尤其是在目前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时期，无论在中国或西班牙，世界语在国际宣传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防文化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加紧团结，增强力量，扩大世界语运动，促进国防文化起见”，世界语者协会的建立“已成为迫切的需要”。⁴⁴在边区文化协会和抗日救亡协会工作的王玉福、黄乃、王仲方等世界语者的积极努力和吴玉章的支持下，1938年5月6日建立了我党在解放区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会址随边区文化协会设在大砭沟（即文化沟）内。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世界语运动便逐步兴盛起来。

1939年，庄栋从西安来到延安。在黄乃、王仲方等人的协助下，积极开展了推广世界语的工作。庄栋在西安时，和地下党员许寿真、郑竹逸等世界语者共同创办过西京世界语协会。到延安后，庄栋被编为世界语专职干部，并担任了理事长职务，在边区文协领导下开展工作。1939年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Jan-an Esperantisto)杂志。该刊后来发行到各解放区，同时也寄给国内外的世界语者，用世界语及时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情况和日本侵略军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真反共假抗日的嘴脸，及时翻译发表了党中央的抗日方针和策略，以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为了扩大世界语在边区军民中的影响，促进延安和边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1939年12月15日值柴门霍夫80周年纪念日，在杨家岭举办了世界语展览。在筹备展览期间，延安世协的同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他们的这一计划，并请他为展览会题几句话。毛泽东对举办世界语展览表示了热情的支持，很快派人送来了他的亲笔题词。毛泽东的题词写于12月9日。他在题词中再次重申了他对世界语的支持：“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展览会于12月15日如期开幕。它向观众提供了国内外世界语书籍、信件、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世界语报道等上百件展品，展览会获得了圆满成功。一些看过展览的人纷纷报名参加学习世界语。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延安世协成立了教育研究部、组织联络部、函授顾问部、编辑出版部和翻译小组。为活跃大家的文化生活，还成立了世界语俱乐部。世界语协会的专职工作人员也由一人增加到四人。

1940年7月14日，在世界语诞生53周年之际，约300名会员在延安女子大学礼堂召开了会员大会，通过了“致全世界世界语同志的信”和“致全国世界语同志的信”，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前，延安世协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从事世界语工作，他们在边区文化协会、抗大、鲁艺、自然科学学院、社会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边区医院、八路军医院、八路军印刷所等单位举办世界语学习班或建立世界语小组。同时，他们还还对延安以外的地区开展函授教学，坚持常年招生。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垦期间，许多附近部队的干部和战士也报名参加了学习。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发展，世界语者大多数都奔赴前线，为全国的解放离开了延安，延安世界语运动随之沉寂下来。

⁴⁴ 见《世界》1993年11—12期，侯志平：《毛泽东与延安世界语运动》

4. 参与中国抗战的外国世界语者

在中国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世界语者把世界语作为有力的国际宣传的工具，出版了《中国怒吼》、《东方呼声》、《中国报导》等刊物。这些世界语刊物向世界各国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国际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在中国的一部分进步的外国世界语者也投身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他们中有绿川 英子、安偶生、布劳恩等人，他们在中国的抗日活动至今被中国人民所传颂。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世界语名 Verda Majo，意为“绿色的五月”。1912年3月7日，她出生在日本山梨县猿桥的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里。1929年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6月，她开始学习世界语，并同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JPEU）京都支部取得联系。她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组织女高师文化小组，同奈良地方的左翼工会、文化团体接触频繁。1932年10月她刚20岁时，就因“思想问题”的罪名被反动当局逮捕，又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当时离毕业只差3个月。从这时起，她开始了从事世界语运动的生活。

1935年她为日本世界语学会的《东方评论》杂志写了《日本文学小史》，1936年春，由于世界语的关系，她结识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刘仁，同年秋，未经家庭同意，她宣布与刘仁结婚。1937年1月刘仁先期回到上海，接着绿川英子就变卖了一切书籍和衣物，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同年4月15日秘密地乘上英国轮船离开日本。

到达上海后不久，绿川就同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取得了联系，并公开参加它的外围组织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各项活动。她为《中国怒吼》写稿。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她目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种种暴行，为《中国怒吼》写了《爱与憎》，1938年6月8日的《新华日报》还转载了这篇文章。她指出，使这许多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祸首，不是日本，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她说：

“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那里有我的双亲、弟兄和姊妹，并有亲戚和朋友以及许多不可忘记的人们。

我爱中国，我的新家乡，这里我有许多亲挚的活跃的同志。

我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作为一个世界语者和爱好世界文化的我，我愿保卫中国的文化，不为日本强盗所掠夺。同时我是一个女性，人类一分子，也本能地希望和平。

我有可能时，将加入中国的军队中去，因为他们是为着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日本的人民，并且他们的胜利，是保证东方前途的光明的。

我对日本的弟兄们大声疾呼地呈请：“不要白流掉你们的鲜血，你们的敌人不是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爱憎分明，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信心。她鼓励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侵华战争。她说：

“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甚至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而感到羞耻。”

不久以后上海沦陷，1937年11月27日，她和刘仁在叶籁士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一年以后又辗转到了武汉，并在此担任对日广播工作。虽然在武汉前后不过三个月，但她后来在《在

战斗的中国》一书后记中写道：“这段时间仅有三个月，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紧张啊！”

武汉沦陷以后，敌人查明了这个操流畅日语的“怪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东京《新新闻》于1938年11月1日刊出她的照片，骂她是“娇声卖国贼”，是“赤色败类”，日本军国主义者甚至要逼她的父亲切腹自杀。

离开武汉后，绿川英子经桂林等地到重庆。这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时候。这时她始终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和文艺界的抗战活动，她为《新华日报》写稿，协助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的编辑工作，并撰写了《在五月的首都》、《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日本学生的侧面》、《他们在战斗中前进》、《致全世界世界语同志》、《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等文章。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遵周恩来指示，绿川英子和刘仁参加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工作。后因人工流产感染，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在佳木斯去世，刘仁也于同年4月22日病故。绿川去世时年仅35岁。

安偶生是另一位在中国抗战时期十分活跃的外国世界语者。安偶生，世界语名Elpin，1907年生于朝鲜黄海道，他是暗杀日本侵华司令伊藤博文的抗日义士安重根的侄儿。从小受抗日救国和民族独立思想的影响，这决定了他后来抗日反帝、救国独立的人生道路。1927年左右开始学习世界语，并且积极参加了中国世界语运动，1939年到重庆参加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所属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他在上海讲授世界语，以后又成为《世界》、《远东使者》、《东方呼声》及《中国报导》等刊物的撰稿人。1939年起，他同一批中国世界语者联手翻译了鲁迅的小说，后由当时的香港远东使者社、东方呼声社合印成《鲁迅小说选》，其中《狂人日记》、《故乡》、《白光》均系安偶生所译。他还把朝鲜作家柳致贞的戏剧《牛》译成世界语向中国介绍。他在诗歌、小说、散文、通讯等文学领域都有世界语原文创作或翻译作品。

布劳恩 (Braun)，中文笔名蔡岩，著名匈牙利世界语者。因为香港的印刷工价比欧洲便宜，1935年被匈牙利《文学世界》社派驻香港印世界语书。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5月创办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际世界语杂志《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杂志取名为《远东使者》，就是要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向世界客观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情况。

蔡岩的名字十分中国化，而且与一些中国世界语者关系密切，许多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世界语者。《东方呼声》和《远东使者》合作出版了第一个世界语译本《鲁迅小说选》。全书由蔡岩定稿。原计划要出世界语版的《中国文选》，《鲁迅小说选》也是作为该文选的第一分册出版的，并且还曾请茅盾同志选定了篇目，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三) 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斗争

1. 胡愈之和他的《莫斯科印象记》

胡愈之 1896年9月9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11年，他到绍兴府中学堂念书，与当时在该学堂执教的鲁迅有着师生之缘。1913年自学世界语，之后积极参加世界语运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胡愈之目睹了工人群众横遭枪杀，极为愤慨，第二天他亲笔写了抗议书，与文学家郑振铎等七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那时白色恐怖严重，他被迫流亡到法国，虽然他还不不懂法语，但是通过与法国世界语团体联系，他得到他们的帮助，解决了生活和学习问题，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

当时，法国的世界语者大多是觉悟的工人群众，其中有法国共产党员。他经常参加他们的小组学习活动，接触了法国觉悟的工人，这使他更深入地了解到法国社会的面貌，从自己的经历中使他深切体会到了世界语的实用价值。

1930年，由于法郎升值，靠从国内汇寄稿费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胡愈之不得不离开法国，归国途中，他通过世界语者的联系游历了德国、波兰和苏联。

胡愈之在德国访问了设在柏林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机关刊《国际主义者》编辑部。在离开巴黎前，他就开始借世界语作访问苏联前的准备。从国际工人世界语团体的年鉴中，找到了几个苏联世界语者的地址。他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并请求他们给予帮助。

1931年1月27日胡愈之从法国经过德国到达莫斯科。胡愈之到达莫斯科，本来只有过境签证，按规定在莫斯科的停留不准超过八小时。依靠苏联世界语同志的帮助，到达莫斯科当日，胡愈之就会见了苏联世界语者同盟总书记、著名世界语活动家、《柴门霍夫评传》和《世界共通语史》(Historio de Mondlingvo)的作者德雷仁(Ernest Drezen)。莫斯科世界语者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德雷仁代表苏联世界语者同盟莫斯科分会致词，对胡愈之来访表示欢迎，其中说道：“目前苏联和中国国交虽尚未恢复，但这两大民族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不久必定能重新携手。这两大民族共有六万万的人口，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陆地，一旦联合起来，世界和平方有保障。而使这两个民族联合，国际公用语 Esperanto 实在是唯一必需的桥梁。”

依靠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胡愈之在莫斯科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拜谒了列宁墓，还到一些工厂、国营农场、商店、大学、小学、托儿所、大剧院以及一些工人住宅区进行了考察，参加了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会，接触了工人、农民、学生、作家、教授等各方面的人士，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后，胡愈之把在苏联七天的感受写成《莫斯科印象记》，首先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连载，每周一段，轰动一时。后来该文集录成册，1931年8月该书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到1932年10月该书已重印了五版。《莫斯科印象记》冲破了新闻封锁，第一次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当时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寻求救国之路，正象作者在《苏联大观》序言中指出的：他们“不但要从苏联研究中，找寻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想从这社会主义的‘雏形国家’的描写中，找寻他们的未来生活的憧憬。”

这就是这本书当时受到人民大众热烈欢迎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它报道了人民大众渴望知道的东西，显现了一些他们所向往的理想国家的雏形。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和进步青年奔走相告，争相传诵。有不少人读了这本书开始学习世界语，走上革命道路。

2. 一批世界语者走上革命道路

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有一批青年学习世界语后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例如前一章介绍的著名世界语者叶籁士、叶君健、陈原、张企程、乐嘉煊、冯文洛就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一机部情报研究所前所长汤逊安、著名作家姚雪垠、楼适夷、徐懋庸、我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内蒙古政协前副主席杨令德、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数学家孙克定等从青年时代就学习世界语，接触进步思想，以后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或成为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在本章里，我们还要介绍几位普通的世界语者的事迹。

先锡嘉，四川乐山人，1915年生。1932年至1938年在上海美商柯达公司当职员。1934

年5月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开办的讲习班学习世界语。1938年11月至1945年11月，在周恩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同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一起从事世界语国际宣传工作，参与编辑《中国报导》刊物。1945年以后在上海任中苏文化协会助理秘书。以后一直在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文化服务部工作，曾任上海中苏友好协会附设俄文夜校、俄语广播学校副校长、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党组成员。他一直是上海世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担任全国世协理事。

陈世德，学习世界语始于1923年，30年代初，他在上海“电政同仁公益会”的会报当编辑，在该报上由他开辟了“世界语专栏”。1931年底，他参加了“语联”的成立组织工作，并被选为“语联”研究部的负责人。1932年，因为有人告发，组织上把他转移到扬州仙女庙。在这里，他又组织世界语的学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陈世德的活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33年他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仍搞世界语，经常往来于扬州和苏州之间，世界语为他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组织流亡宣传队，途经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达到湖南长沙，沿途宣传抗日，他同当地的世界语者合作，于1938年建立了长沙世界语协会，该会还作为湖南省文化界抗战后援会的一个团体会员。在这一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一面从事邮政工作，一面开展世界语和抗日宣传活动。长沙沦陷后到达重庆。1945年以后，从事工会工作，团结进步工人，开展进步活动。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为迎接解放军进城，他同工人一起，保护仪器设备，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史平，1938年开始学习世界语。当时随一批青年工作者从武汉来到西安，紧张工作之余，在诗人张光年的带动下，学起了世界语。1938年秋冬，他工作的抗敌演剧二队，战斗生活十分艰苦，山外就是日本侵略军的炮声，但是这批年轻人学习世界语的劲头丝毫不减。1940年他们和重庆的世界语者开始联系，经常读到重庆出版的《中国报导》，还看到来自南斯拉夫、匈牙利的世界语杂志，大大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当时日本世界语者绿川英子的文章，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5年1月，他们在国统区开展工作，史平和其中12个同志被捕，在狱中还组织世界语学习小组。一年后，史平获释，对世界语矢志不渝。80年代，他成为湖南省世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湖南世界语运动作出了许多贡献。

沙地，原名萨溉东，蒙古族。1938年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徐特立、曹瑛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宣传和救护伤兵的工作。沙地在徐老的影响下对世界语产生了极大兴趣。后来，他被调到湖南祁阳，在长沙世界语协会负责人郑旦同志的帮助下，初步掌握了这一语言。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为了宣传抗战，争取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他利用世界语与国外世界语朋友联系，介绍我国抗战形势。1940年秋，他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于是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调皖南新四军工作。同年十月从军部第一批出发东进，在过江的途中他和世界语者孙克定同路行军，他们组成了世界语学习小组，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习。1940年年底在沙地的倡导下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世界语小组。解放后，他成为外交学院的法语教授，仍孜孜不倦传授世界语。

3. 为建立共和国献身的世界语者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一批世界语者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丁克，原名邓克强，广东惠阳人。其父邓乃燕是一位民主革命家。当年与廖仲恺、朱执

信一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组织民军，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在广东惠州战役中指挥战斗，英勇牺牲，时年38岁。邓克强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进步文化活动，是明治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的负责人，并参加中共东京特别支部地下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在留日学生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利用日本世界语学会会址的有利条件，参加开展世界语学习班的学习活动。

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驻扎柳州）党政委员会上校视察、荣誉军人管理处生产科上校科长等职。1944年秋天，日军进犯桂林，国民党军队仓皇撤退，丁克不幸牺牲殉职。

陈黄光，原名锡光，号再华，笔名白明，浙江平阳县敖镇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开明绅士，在家创办有名的敖江公学。陈黄光7岁入敖江公学，15岁以后在私塾里专修国文，17岁时考入温州艺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半年后转学到上海自治学院就读，不久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半年后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28年冬毕业。在大学里，陈黄光结识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世界语者，同时自学了世界语，积极参加世界语运动。他翻译的一首世界语诗《汽犁》曾在《世界》上获奖。1929年，陈到广州市培正中学任国语教员。陈在当地参加各种进步文化活动，还发表了大批作品和译作，成为当时有名的作家、剧作家。他还通过世界语将不少外国文学名篇和苏俄政治、文艺理论等方面文章翻译过来。他任广州东山世界语学会会长。并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集会，宣言被各大报刊所报导和转载。他们创办了世界语刊物《绿波》，还在培道女子中学开办世界语夜校，不断推广世界语。他是抗日名曲《奋起救国》的作者，谱曲是何安东。1933年在上海和潘凡同志一起入党。1934年11月26日在知用中学被捕。1935年1月24日凌晨被国民党杀害于黄花岗的荒坡上。临刑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何子成，又名何自成、何尧、何志成，山东青岛人，回民，早年毕业于山东青岛大学。后流亡到重庆。1941年8月去宁夏，任宁夏中学事务主任兼高中一年级历史、地理教师。他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派到宁夏的特派员。他在课堂上不仅宣传世界语、柴门霍夫生平，讲学习世界语的意义，而且经常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给学生秘密传阅《新华日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呐喊》、《阿Q正传》和世界语书刊《暴风雨中的低语》等。在此期间组织中共宁夏邮电支部。那时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经费是极端困难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世界语不仅不予支持，还百般刁难阻碍世界语的传播和发展。为了支持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何子成发起了为学社募捐世界语出版基金的活动，并亲自写倡议书，发表在油印刊物《中国世界语者》上。倡议很快得到全国各地世界语者的响应。学社利用大家的捐款出版了《世界语中文大辞典》（第一版）第一至第六册和其他九种世界语书籍。

1942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他，并用酷刑折磨他，但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和组织。1943年4月17日晚被杀害，年仅33岁。

许晓轩，学名永安，字小轩。1916年10月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长篇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江苏仙女庙（今江都）人。家里曾开过木行，弟兄二人。他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因欠债、失业、流浪、忧闷而早逝，这给晓轩细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他萌发了要为穷人找活路的志向。他发奋读书，在书中寻找答案。他把名字由“小轩”改为“晓轩”，表达了自己追求理想的信念和实现抱负的决心。迫于生计，许晓轩停止了学业，在仙女庙震泰钱庄当了学徒。1934年左右，结识了镇上电报局报务员陈世德，并参加了他组织的外语讲习班。晓轩在这里学到了英语、世界语和新文字。在陈世德的热情关怀和熏陶下，

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国家、民族的生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晓轩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因为陈世德被捕，组织破坏，1935年许晓轩来到无锡，在无锡经人介绍进了无锡公益铁工厂做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随铁工厂转移到重庆，并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地下党活动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白公馆集中营。他坐牢九年，宁死不屈，牺牲时才34岁。

许寿真 (Eltunko)，共产党员。著名世界语者。早在30年代初，许寿真就懂得了世界语。那时他在潼关服役于旧军队中。那里，当时有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借阅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并向他宣传世界语。受此影响，许寿真开始自学世界语。

1934年夏，他请假到上海，并参加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办的世界语学习班。后来他回到西安，参加了西安世协，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编印了刊物《西安世界语者》。

1939年冬他到重庆，并在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工作，成为学校负责人冯文洛的得力助手。许寿真还在生活书店和其他一些地方办了世界语班。他虽然没有固定的收入，但仍以极大的热情搞好学校的工作。1940年他创办了《中国世界语者》，并倾注了许多心血。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镇压革命力量，许寿真被迫离开重庆。

其后十年，他一直以成都为中心从事世界语运动。在这里他团结一些年轻的世界语者，开世界语课，办世界语展览，组织四川大学语言协会，并结识了一些外国的进步的世界语者。他创办了世界语刊物《新闻记者》、《中国音乐》和《漫画》，以此向外国世界语者介绍中国的实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阴谋，报道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那时他是国际新闻记者协会会员，经常在保加利亚世界语刊物《国际文化》上发表文章，报道中国人民对民主和平的渴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许寿真是天才的世界语者，他精通音乐、诗歌。他世译了许多中国歌曲，如：《兄妹开荒》、《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他说，世界语是世界人民的音乐的语言，应该用它把中国人民的歌声传到全世界。1946年成都绿星合唱队表演了他世译的歌剧《兄妹开荒》，成都电台播送了这个节目。由于歌词是世译的，并且声韵鲜明，所以很适合歌唱。当时保加利亚电台也播送了这个歌剧的片段。

1935年他因从事抗日宣传，被国民党西安政府逮捕。他的父亲通过亲友打通了与当局的关系，当局提出要是许寿真表示悔改的话就可以释放他。许寿真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悔改的！”后来，反动派降低了一点条件，只要他在保证书上签字表示不再从事革命活动，就可以释放。对此他也坚决拒绝了。1937年下半年国共合作抗日，许寿真才获得释放。

1948年国民党发动了反共内战，许寿真再次入狱。狱中他继续宣传世界语。他千方百计地设法获得人民革命战争的消息，写在手纸上，在狱中传阅，鼓舞狱中难友坚持斗争。这些行动被敌人发现后，他受到残酷的折磨，但他怎么也不屈服。

1949年12月6日，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大批屠杀政治犯。押赴刑场时，许寿真拒绝登上刑车，后来惊恐万状的特务用力将他推上车，驶向事先选好的刑场——成都西郊十二桥。许寿真看见已经挖好的大坑，便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特务把他猛推下车，用铁锹、十字镐乱打，并用东西堵住他的嘴，匆忙把他活埋了。这位年仅35岁的革命者就此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另一位世界语者杨求真。

许寿真、许晓轩、丁克、何子成、杨求真等人是中国世界语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用鲜血实践了世界语载之以真正革命之道、真正国际主义之道这一原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四、世界语在新时期的新任务

(一) 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的创办及其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它意味着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旧制度已经灭亡，同时也标志着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新的中国的诞生。中国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震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且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也是一个“奇迹”。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它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对内又进行哪些变革？这些政策和变革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世界语者意识到自己在新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心继续发扬以世界语为祖国服务的光荣传统，提出要办一份报道性的对外刊物，以便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维护世界的和平。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拓者、文化出版界的领导人胡愈之的赞同和全力支持。

1. 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对外刊物之一

1949年10月，一份由老世界语者张企程起草的关于出版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的报告被送到主管国际宣传的领导机关——国际新闻局。当时领导国际新闻局的新闻总署署长是胡乔木。他在青年时代学习过世界语，对世界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十分了解。他立即批准了这份报告，而且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国际新闻局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可以出版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等等的外文书刊，但不可能出很多东欧国家语文，例如波兰文、匈牙利文等等的书刊，而正好世界语在那些国家相当流行，因此用世界语办一个刊物，出一些书籍，在这些国家发行，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⁴⁵

1950年5月1日，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正式创刊。丰富的内容立即受到各国读者，特别是东欧国家读者的欢迎。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同情并关注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也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刊物一出版，各国的贺信和订单纷至沓来。许多读者不仅自己订阅刊物，还动员他们的世界语朋友订阅。这份刊物很快在50多个国家拥有了自己的读者。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头三年杂志上一半以上的文章被各国读者译成民族语，在本国的报刊上转载，这再次显示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的独特作用。《人民中国报道》是我国解放后创办最早的对外宣传刊物之一。70年代初，《人民中国报道》的中文名称被简化为《中国报道》，外文名称未变。

2. 《中国报道》全面报道中国

《中国报道》从创刊就确立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全面报道中国，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以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半个世纪的事实证明：它完全兑现了自己对读者的承诺。

⁴⁵ 张企程：《〈中国报道〉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载《中国报道》1990（5），13—14页。

(1) 向读者介绍中国的概貌和自然风光

中国地大物博，自然风光绮丽，名胜古迹繁多，人文景观和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但是《中国报道》的读者，对中国了解甚少。为了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编辑们拟定了许多外国人感兴趣的题目，例如中国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名胜古迹、旅游风光等等，为此，《中国报道》发表专文向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山脉、平原、盆地、河流、湖泊、草原、温泉、海岸、海港以及物产、气候和资源情况。对充满奇异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海南岛，也进行了专题报道。该刊还从1983年第1期起至1988年第12期止，用6年的时间开辟“中国百题”专栏，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行政区划、国土、民族、民族区域自治、传统节日、传统历法、货币、度量衡、二十四节气、民族乐器、算盘、象棋、筷子、中国酒、中国菜、药膳、丝绸、茶叶、文房四宝、古典园林、十大风景名胜、珍奇动植物、中国人的属相、中国人的姓名、中国人的礼节、中国的佛教和佛教名山、中国的邮票、碑刻、石窟艺术、传说中的龙、凤和瑞兽等。

80年代以后，为了配合国家旅游业的发展和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的变化，《中国报道》先后设置了“中国风光”、“中国之旅”、“珠江三角洲纪行”、“中原黄河行”、“大运河纪行”、“长江万里行”、“长城万里行”等专栏，用二百多篇文章和数百幅精美的图片，对我国的名山大川、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如果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可以说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和旅游指南。

(2) 向读者介绍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为了使外国读者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中国报道》十分重视关于中国历史知识、文物考古方面的介绍。为此，该刊从1977年第3期起至1981年第12期止，专门设立了“中国现代史讲话”专栏，把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事件、人物都作了介绍。

接着该刊又从1982年起至1984年止，新辟“中华五千年”专栏，用整整三年时间，发表了34篇文章，并配以大量的图片，向读者讲述了从原始人类到清朝灭亡的中国古代史。作者以时代先后为序，用生动的笔法，讲述了每个朝代从盛到衰的简要历史，突出了每个朝代的历史特点，评述了各个朝代的帝王将相、农民领袖以及诸多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受到读者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该刊从1989年第2期开始到1991年第3期止，专门设置了“西南丝路”专栏，共发表22篇文章、150多幅图片，对在国内也鲜为人知的南方丝绸之路作了详尽的报道。

1992至1993年间，该刊又开辟了“唐蕃古道”专栏。该专栏详细讲述了公元641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朝国王松赞干布，开辟唐蕃古道，促进汉藏人民成为一家的历史。

“西南丝路”、“唐蕃古道”两个专栏的成功报道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于是从1996年起，编辑部又用三年的时间推出“丝绸之路”专栏，共发表32篇文章、350多幅照片，对神秘的丝绸之路沿线奇特的自然风光，众多的古城遗址，精美绝伦的历史文物，高超的石窟艺术，多彩的民族风情和宗教习俗，以及改革开放后这些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市建设新貌，都作了生动而有趣的报道，真实感人，令人叹服。

《中国报道》对最能体现文明古国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和遗址也不惜篇幅，给予大量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有的是对某种中国事物的集中介绍，如《中国古代的陶瓷》、《中国古代丝绸》、《中国古代青铜器》；有的是介绍考古方面的新发现和新成就，如《秦始皇陵

铜车马的出土》、《失而复得的故宫珍宝——金编钟》；有的是对古迹和文化遗址的考证和探讨，如《三千五百年前的江南居民遗址》、《谁是北京最早的居民？》、《第一只鸟出现在哪里？》等等。

为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中国报道》还以专栏形式，介绍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古迹，例如 1988 年至 1990 年，该刊设立“紫禁城”专栏，对故宫这座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皇宫建筑群，作了详尽的介绍。从这些文章和图片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这座皇宫的金碧辉煌和巍峨壮丽，了解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而且可以欣赏到保存在这座皇宫里的许多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这些文章把人和物以及历史事件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了有趣的报道，受到读者青睐。

（3）向读者报道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民风民俗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没有民主；人们的政治权利能否得到保障；能不能自由地信仰宗教；人民享受哪些社会福利和保险；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的生活怎么样；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是否受到尊重，这一类问题，历来是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根据这一特点，《中国报道》把如实反映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民情风俗作为自己刊物特点之一。几十年来，这份杂志通过多种形式致力于这方面的介绍和报道，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回答读者普遍关心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例如，该刊曾发表过《关于中国职工劳保福利的情况》、《北京怎样解决城市住房问题》、《中国对残疾人的照顾》、《改革给中国职工带来什么》、《城市低收入者生活有保障吗》等文章。

其二，设立一些专栏，报道中国人的普通生活状况和心态，例如该刊从 1982 年至 1984 年设置的“我的生活”专栏，由一些普通中国人自己撰文，叙述自己的生活。他们中间有的是工人、农民、医生、护士、售货员、市民；有的是学生、科技工作者、教师；有的是职员、邮递员、飞行员、政府官员。他们叙述的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读起来倍感亲切。

1985 年以后，该刊又陆续推出“当代中国人”专栏（1985）、“社会一角”专栏（1989）、“民居民俗”专栏（1991—1992）、“大街小巷”专栏（1992—1994）、“社会管窥”专栏（1994—1997）、“妇女儿童之页”专栏（1995—1996）、“小镇采风”专栏（1996—1998）、“青年之页”专栏（1997—1998）。这些专栏的文章从多角度、多侧面描述了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世界语者历来认为各民族应当和平相处，互助互爱，主张各民族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他们的风俗习惯更应当得到尊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是否享受这些权利，自然成为读者关心的问题。作为用世界语出版的《中国报道》，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几十年来，它一直把民族问题的报道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每年该刊都要发表一批文章，刊登一批照片，报道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生活情况。通过这些报道，可以了解到，中国对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政策，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享有的自治权和自决权。

为了帮助读者具体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各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民风民俗，《中国报道》在最近 20 年里，先后设立了“中国的民族”专栏，对 55 个民族的起源、人口、分布区域、经济文化状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民情风俗作了简要的介绍。“在少数民族地区”专栏，对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变化和各民族的节日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4）向读者展示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她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称著于世。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辟了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以后郑和下西洋，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人类的文化宝库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文化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中国报道》历来的报道内容表明，它都十分注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闻到东方文化诱人的芳香。以1988年至1998年10年为例，该刊设立的文化性专栏就有18个，其中“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文化探秘”、“民间工艺”、“舞台艺术”、“当代美术”、“中国邮票”等专栏，特别受到读者喜爱，有的连续开设了好几年。

《中国报道》介绍的中国文化，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包括中国古代的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古代的船舶技术和冶炼技术；古代的计时器、计量器、地震仪和计算工具——珠算；中国的足球运动和乒乓球运动；发明于中国的围棋和象棋；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服饰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含茶文化和酒文化）和烹调艺术；中国的园林艺术和建筑艺术；中国的石窟艺术和宗教文化；中国历朝历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古道、驿站和文化名城；中国文字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等等。

在文化艺术方面，该刊的介绍更是丰富多彩。中国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戏剧、杂技、木偶、皮影、篆刻、建筑艺术和盆景艺术、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工艺美术和文学艺术，都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介绍。

以音乐、舞蹈为例，该刊介绍了许多中国的演奏和打击乐器，如唢呐、芦笙、马头琴、铜鼓、锣、箫、笛、编钟等。对悄然兴起的摇滚乐，流行全国的卡拉OK和迪斯科音乐，响彻全国的流行歌曲，该刊也作了报道。在舞蹈艺术的介绍中，中国民族舞、现代舞、芭蕾舞都是该刊经常性的题材之一。

对于中国戏剧、曲艺、相声和小品，《中国报道》作了许多报道。打开这本杂志，人们可看到各个时期京剧、川剧、豫剧、粤剧、汉剧、黄梅戏以及话剧、歌剧的代表作、著名艺术家的剧照和相关介绍。对于中国许多地方剧种的历史、特点和艺术风格，包括它们的服饰、道具、化妆、语言、音乐特色都有程度不同的介绍。

对于中国的绘画、书法和雕刻艺术，该刊更是介绍得比较充分。有关这方面的各种艺术种类、流派和代表人物都作过报道。

对中国工艺美术品的介绍也是如此，驰名中外的各具特色的瓷器和陶器，灿如云霞的丝绸，令人倾慕的漆器，巧夺天工的刺绣，精巧轻盈的风筝，各式各样的扇子，传神入化的民间工艺品（泥人、脸谱、年画、剪纸、编织、木偶等），五光十色的烟花爆竹，在杂志中都历历在目。

《中国报道》从创刊之日起，就十分重视中国文学作品的介绍，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民间故事、寓言、幽默、谚语等等。可以说，凡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比较知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在这份刊物上作过或多或少的报道。

（5）向读者报道中国前进的步伐

创刊于1950年的《中国报道》，可以说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它像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长的过程，记载了它曲折的经历和前进的足迹。

从政治方面讲，国内各个时期的运动和政治改革，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整风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届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以及改革开放和一些政治性的话题，诸如多党合作制、法治建设、反腐倡廉、民主化进程等等，刊物都进行了正面的或侧面的报道。

就外交而言，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尼克松访华、中美、中日、中欧首脑互访、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等等，也都有相关报道。

就经济建设而言，更是该刊关注的重点。从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到8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获得全面、高速、稳步增长；

从各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蓝图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介绍；从钢铁、煤炭、石油、纺织、化工、塑料、建材等工业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成就到粮食、棉花、油料、糖料、水产、水果的持续丰收；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到边疆石油的开发、沙漠的绿化和草场的建设，都可从这本刊物中找到文字性和图片性的报道。

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舆论尤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发展的轨迹，该刊或约请知名专家撰稿，或派出自己的记者亲临采访，对这方面的内容作了大量深入的介绍和报道。以近几年为例，该刊先后设立了“改革纵横”（1993）、“经济了望”（1994—1996）、“中国经济”（1997—1998）等专栏，这些专栏中的文章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营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高科技产业的开发、外汇管理体制、新税制、加强中西部建设和农业的基础地位、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等等问题，该刊往往用外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叙述方式，阐述理论，解释政策，提供相关背景资料。

《中国报道》还擅长用典型报道的方式反映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该刊于1985年至1986年设立“开放城市”专栏，报道了沿海、沿江、沿边19个城市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1994年设立“长江两岸”专栏，报道了长江沿岸各个城市、港口的改革开放情况。1995年设立“环渤海纪行”专栏，报道了渤海湾经济圈的兴起和发展前景。

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国报道》十分重视我国科技工作者在科学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并给它们一席之地。从六、七十年代的断手再植、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到八、九十年代器官移植、运载火箭送卫星上天、“银河”亿次计算机的诞生；从航天遥感技术的应用、小麦、水稻的品种改良、核电站的建立到超导体、对撞机、高级机器人的问世；从抢救大熊猫的科学试验、南极北极的考察、深海探矿到中文信息的处理、国际互联网络的推广应用，该刊都作了详尽的报道。

3. 《中国报道》在读者中的影响

《中国报道》编辑部每年都要收到上千封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信件。许多读者把《中国报道》亲切地称作“我们的杂志”，他们为刊物倾注了自己的一片爱心。下面是来自世界各国读者的反应。⁴⁶

欧洲读者认为，《中国报道》极好地报道了中国。德国读者格尔哈德·卡尔霍夫说：“我是贵刊多年的老订户。我非常喜欢这本刊物，因为它极好地报道了中国。我经常向我的学生介绍刊物中一些有趣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图片。”荷兰读者杨·C·J·托恩德在来信中写道：“刊物的内容是多样的，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方面的事情，比如有关经济、历史、地理状况等等，社会生活也没有被忽视，涉及音乐、舞蹈、歌曲以及体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在贵刊也占有一席之地。文字也用得恰当，且简单易懂，即使是科技方面的文章也是如此。最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贵刊人们可以了解现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它展示了许多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事物，并向西方世界证明现实的中国和有些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法国老读者卢多维克·埃尼赞认为：“《中国报道》是最漂亮的世界语杂志，因为它向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工农业、文化艺术等领域及其他事件的消息，报道了世界语在中国、在全世界的活动情况。文章通俗易懂，选题多样而稳妥，总之，无可挑剔。我利用贵刊广泛宣传世界语和中国。”

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的国际世界语协会历来对《中国报道》长期坚持出版给予很高的评价。曾任国际世协总干事的西莫·米洛耶维奇先生在给中国报道社的一封信中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报道》为在世界各国的读者中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及

⁴⁶ 所引用的读者反应都摘自1995年5月中国报道杂志社编辑的创刊45周年“读者反应专辑”和1998年4月编印的“《中国报道》杂志最新读者调研材料”。

社会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数以千计的世界语读者来说，它过去是，现在仍将是了解贵国的窗口。你们国家有着绚丽多彩过去。现在她真正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贵国对许多人来说，是遥远的和陌生的，由于贵刊的存在，这个距离缩短了，人们对中国也比较了解了。”

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报道》有关改革的文章非常感兴趣。读者亚·科列恩科夫说：“说心里话，有关改革的文章是非常有趣而切合实际的。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他们需要一种模式，而中国的模式无疑是成功的。没有过多的框框，就可以使人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大概这正是中国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秘诀，从而使大量的中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另一名读者斯·科尔达在来信中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进行了对比，他说：“从前，我对中国人的感觉是，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在很多年里，前苏联为了友谊宁肯亏着自己也要帮助中国。但是现在读了贵刊，我才知道，中国正在以每年10—12%的增长速度阔步前进，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并不断扩大开放区域。铁路和公路网遍及全国。科技、医疗、文化、体育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均收入有很大增长，几乎人人都能养活自己。中国在各方面都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政策，并有机地把资本主义的要素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毁掉了任何东西，而是注重生产。非常遗憾，前苏联缺少像邓小平那样的有智慧的务实家。请原谅我在此重复你们已普遍熟知的事实。我实在是羡慕中国。我为中国人而高兴。每当谈起贫困生活和改革时，我总要把中国作为范例。”

东欧地区的读者在来信中普遍反映《中国报道》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主要来源。波兰读者斯·罗曼说：“中国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而目前《中国报道》则是我们唯一能够了解中国的刊物。没有谁能够比《中国报道》的读者更了解中国。”保加利亚读者叶·多·卡尔乔夫斯基说：“我了解中国的最主要途径是《中国报道》。此外，也有一些国内报刊，但从中只能得到政治事件的信息。《中国报道》给了我们各种信息。”曾任匈牙利世界语协会秘书长的奥斯卡·普林茨在来信中写道：“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有几代人通过贵刊了解了中国。我们匈牙利人通过贵刊对中国有了很多了解，我们甚至从你们的刊物上可以了解到其他任何地方都了解不到的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祝愿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中国报道》取得更大的成功！”罗马尼亚读者伊雷内·苏奇说：“我们奥拉戴世界语协会衷心感谢你们寄来的刊物，收到它们我们就像得到了热乎乎的面包一样。从刊物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历史，以及世界语界的一切情况。我们进行了有组织的阅读，刊物从一双手传给另一双手，使每个会员都有幸拜读贵刊。”塞尔维亚读者约万·内斯奇说：“我要告诉你们，我是贵刊众多的老订户之一。每年我都精心地把贵刊装订成册，并把它们保存起来，准备以后给我的孙子看。”立陶宛读者安·瓦科维丘斯在阅读了《中国报道》以后，就中国和本国的改革进行了比较，他说：“我清楚地看到，你们这本在西方人看来是在进行宣传的刊物，确实反映了贵国的现状。因为我也有过生活在类似你们的社会制度的经历，虽然那种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它在很多方面还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读了贵刊的一些文章，我只有叹息：唉！这些我们也曾拥有过，但现在已经消失了。十年前，资本主义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到达的天堂，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天堂时，我们看到，这只是对社会的少数人而言的。我认为，你们所走的无痛苦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比我们现在经历的经济休克疗法要更人道。”

《中国报道》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世界语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在这里，不妨也引用几封读者来信。

《中国报道》日本代销人森真吾先生是这样评价这份刊物的，他说：“《中国报道》努力为各国读者介绍各种信息和问题，特别是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独特的中国人民的五千年文化和现代生活。《中国报道》用世界语打开了认识今日中国的窗口，并成功地在中国与各国世界语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马达加斯加读者弗莱德兹说：“对我来说，《中国报道》简直是无法离开的朋友。工作之余，当我感到疲劳时，我就欣赏一

下刊物的图片，疲劳随之减轻了。当我烦恼时，就阅读其中的文章，烦恼也随之消失了，甚至我的非世界语同事们也对贵刊发生兴趣，常常和我一起欣赏。”巴西世界语协会主席弗·马·奥利韦拉在写给《中国报道》编辑部的信中说：“在近半个世纪中，《中国报道》以其兴趣盎然的文字和富有吸引力的图片使数以千计的读者得到满足。《中国报道》在巴西的订户一致称赞贵刊，因为他们通过贵刊不仅了解了世界语的应用，而且增进了对中国传统、风俗、历史和艺术的了解。”澳大利亚世界语协会秘书长雷·罗斯在《中国报道》创刊45周年时，代表澳大利亚世界语协会发来贺信，贺信说：“你们以高质量的世界语杂志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你们幅员广大的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情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不断激励在贵国和其他国家有《中国报道》读者的地方，建立世界语组织。《中国报道》通过世界语，在增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来，《中国报道》通过世界语坚持报道中国，增进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因此该刊的读者对《中国报道》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中国报道》的出版。有的经常为杂志撰写稿件或提供当地的世界语活动信息；有的向自己的世界语学生介绍这本刊物，鼓励他们订阅。南斯拉夫一位工人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钱来购买刊物，向一些世界语小组推荐这本刊物。一些发达国家的世界语者，每年都向杂志社设立的“读者订刊基金”捐款，好让编辑部为那些无钱订阅这份刊物的读者赠送刊物。有几位高龄读者甚至表示，要成为这份刊物的终生订户，以支持刊物的长期出版。还有许多国家的读者，把刊物上的文章译成本民族语，在本国报刊杂志上发表，借以证明世界语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相互了解方面的作用。有不少读者还把刊物装订成册，以便长期保存。波兰电台和古巴电台经常在该电台选播《中国报道》的文章。

更有这样一位比利时老人，他的名字叫查理·吉斯林（Charles Ghiselin），生前他立下遗嘱，决定将他的全部遗产捐赠给《中国报道》。吉斯林先生是《中国报道》的老读者，生前独身，以种花、卖花为生，一生十分简朴。他通过长期阅读该刊，对中国有了很深的感情，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所以，他决定将《中国报道》作为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1989年，老人因病不幸逝世。公证人按老人的遗嘱，办理了遗产过户手续，实现了老人生前的心愿。这一生动的事例说明，用世界语出版刊物，在促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4. 《中国报道》的启示

从以上对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创刊的背景、内容和在读者中的影响的介绍中，人们似乎应当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世界语作为一种语言交际工具，完全可以表达中国的各种事物，完成“报道中国”的各项任务。这些事物，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还是思想的物质的；所反映的内容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科技的，它都能很好地传情达意，使读者得到很好的理解。《中国报道》历年来的读者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和任何民族语一样，同样可以发挥其语言交际功能的作用。

第二、《中国报道》现发行83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发行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56个，就一种文版的刊物发行国数之多，在我国的对外报道刊物中，除用英语出版的刊物外，还没有任何一种民族语可以与世界语匹敌。这充分说明世界语已经是一种有效的、活生生的国际语。事实上它正在发挥着国际语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其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正如飞机、轮船、火车在推广初期使用还不十分普遍一样，但当人们认识到它们的作用时，就会逐渐被人们接受。

第三、由于世界语者热爱和平，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同时又爱好世界语，所以他们

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有利于人们去订阅世界语杂志和购买世界语书籍，又有利于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这是任何一种民族语都无法达到的。在这里，让我们引用前任北美世界语协会主席唐纳德·哈洛的一封信来说明这一点。1995年他在给《中国报道》创刊45周年的贺信中这样写道：

尊敬的朋友们：

在197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美国人对现代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在1980年以前的另一个时期里，美国人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即使到了现在，美国人对现代中国的了解也知之甚少。

然而很幸运，有一些美国人‘例外’，这就是订阅《中国报道》月刊的美国世界语者。在过去的45年里，甚至在订阅《中国报道》需要在美国政府当局登记注册的困难时期，美国世界语者通过《中国报道》了解了现代中国。中国的诗歌什么样？普通的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中国人会创作诗歌，而美国的世界语者能在《中国报道》上读到它。中国民用汽车有多少？普通美国人甚至怀疑中国有民用汽车，而美国世界语者通过《中国报道》了解了它的具体数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何处？普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新疆在哪个洲，即使知道，有的人也认为，新疆是一片不值得一看的荒凉地区，而美国的世界语者通过《中国报道》已经阅读了许多介绍这一美丽地区的文章并观赏了丰富多采的照片，而且有几位世界语者已经存钱准备有朝一日访问这一地区。中国的航天领域发展如何？普通美国人可能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已成功地把美国休斯顿公司生产的卫星送入了轨道。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当然，还有其他语种的期刊，特别是为我们讲英语的人而出版的期刊，但普通的美国人根本不看用英语出版的这些杂志，一旦看到，也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他们通过报纸和电视，从那些主要是政治性的，并且总是带有倾向性的文章和评论中了解到他们要了解的一切。然而，45年前一位贤明睿智的中国世界语者发现，虽然美国人不关注中国人，即使是会讲英语的中国人，然而世界语者关注世界语者，即使前者是美国人而后者是中国人。

在过去的45年里，我们中的一些幸运者通过《中国报道》杂志了解了几乎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倘若没有这样一本杂志，对于我们美国世界语者来说，如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世界地图上的中国只是一片空白。希望在未来的45年中，在《中国报道》杂志那些勤奋并富有责任心的摄影师、记者和编辑的关照下，我们美国世界语者能够帮助我国的同胞或多或少填补这一空白。

(二) 中国的世界语广播

在世界语诞生后35年，即1922年，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XYZ电台和英国伦敦广播电台分别进行了试验性世界语广播。

几十年来，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家广播电台播送过世界语或有关世界语的节目。1942年4月，国际世界语协会和瑞士无线电及电机学会在日内瓦举办了一次有40个广播公司和团体的工程师与代表参加的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广播电台播送世界语节目，至少每周一次，并建议它们举办世界语广播讲座。决议指出：“世界语已在实用中被证明易学易懂，便于清晰收听，而且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听众。”尽管这个没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实行起来十分艰难，但却也从未停止过。至1995年，全世界有14家广播电台办有世界语节目，多在欧洲。在亚洲，越南和朝鲜曾开办过世界语广播，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而终止。

中国的世界语广播正式开播于柴门霍夫诞辰77周年之际，即1964年12月19日。

中国的世界语广播由中国唯一对外的国家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称北京广播电台，1978年启用现名。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到1999已连续进行了35年，而且将继续播送，这在国际世界语运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

世界语广播在中国对外广播宣传中发挥着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同时在中国世界语工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1. 中国世界语广播的诞生和发展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曾经发挥过特殊的进步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世界语工作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随着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的创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成立，世界语对外广播也被提到世界语工作的日程上来。

50年代末，当时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的叶籁士、秘书长陈原和几位老世界语者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进行世界语广播试播。

60年代初，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文化部副部长胡愈之参观北京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听众工作展览后提出：现在是该办世界语广播的时候了。胡愈之的意见得到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领导和有关中央部门领导人的重视。世界语广播筹备工作即着手进行。由老一辈世界语者冯文洛挂帅，在北京广播学院设立世界语班，开始培养世界语广播干部。

1963年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肯定了世界语在对外宣传工作中的成绩，并指示要抓紧培养世界语干部，进一步做好各项世界语工作。这次会议的召开加速了世界语广播筹备工作的进行。

1963年秋和1964年初，北京广播学院的两个世界语班的学生先后毕业，世界语广播专业人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5名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广播电台，开始了紧张有序的世界语节目试播工作。经过一年的练兵，1964年12月19日，中国的世界语广播正式开播。

世界语广播开播初始，编辑部仅有5名成员，以后又有9位同志先后加入这支队伍。70年代后，有4位同志因种种原因调离了世界语编辑部。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以及各地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把国际电台世界语广播视为自己的广播，他们经常向编辑部提供稿件，给予多方帮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也对中国世界语运动起着推动、促进作用。每逢国内重大世界语事件，如全国世界语大会，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会议，各地世界语协会重大活动，国际电台世界语编辑部均派出记者前往采访，并在节目中加以报道。世界语节目在国内许多地方都可以清晰听到。许多中国世界语者坚持收听世界语广播，提高了自己的口语会话水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编辑部与国际世界语协会等国际世界语组织，各国世界语协会和世界语者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一些有世界语广播的国家或地方电台和世界语刊物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得到它们的协助。

2. 世界语节目播出时间不断增加

1964年世界语广播初期，每周对欧洲播出两次，周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播出，周日重播，每次30分钟，使用3个波长。1965年初，周六、周日两套节目均改为新制作节目。不久，又增加了对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方向的播出。节目时间、内容同对欧播出，亦使用3个波长。1979年10月，世界语广播增为每日播出。每周一、三、五、六制作4套新节目，二、四、日重播前一天节目。1980年增加了对拉丁美洲方向的广播。至此，世界语广播每天播出4次，分别对4个方向，每次节目30分钟。自1988年起，对每周二、四、日重播节目的新闻部分

重新制作，仅重播专题节目。1991年起，每日首播时间从早4时改为晚19时。1998年，节目全面改版，每天内容全新。

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节目每天对欧洲、东南亚及大洋洲、东北亚、拉丁美洲4个方向用8个波段各播出一次，每次30分钟。合计每周播出时间为28小时。广播的总时数在全世界14家电台中仅次于波兰电台，名列第二，但就覆盖面积而言，在各家广播电台中占据首位。而且实际上，除接收地区外，在北美和非洲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亦有听众收听到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可以说，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及影响面是世界性的，这一点一直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称赞。

3. 节目内容不断更新

世界语广播开办的前15年间，一周仅作两套节目，世界语节目只能是期刊式的。一般，一套节目除开始曲、结束曲外由新闻、专稿和音乐三大块组成。新闻不追求时效，绝大部分为国内重要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件，如四届人大，党的九大，中苏论战及有关文件，世界语广播均用了较大篇幅进行报道。其中一些报告、文章的译文后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对外发行。

1979年后节目增容，每周制作4套新节目。在此前后，世界语广播挂牌设立了若干专题节目，包括《听众信箱》、《世界语在前进》、《中国文化》、《在中国旅行》、《音乐》、《文学》、《中国话讲座》、《今日中国》。

世界语广播部从1982年开始，实行专题节目编辑责任制。每个专题都由一位编辑负责，完成编、采、译全部工作。

世界语广播目前开设的专题节目还有：《中国经济纵横》、《社会生活》、《世界之窗》。

《世界语在前进》节目是世界语广播部第一个专题节目，开办于70年代初。节目报道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现状、历史、各阶段的代表人物、中外世界语界的友好交流以及国际世界语运动的情况。形式有新闻、报道、人物专访。节目中除我播音员的声音外，尽量播出我国和外国世界语者的声音。《世界语在前进》节目全部靠自编自采。80年代以后，每年夏天，世界语部都派记者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归来后在《世界语在前进》节目中进行详尽、持续报道。这在各国世界语者当中、尤其是那些没有参加大会的世界语者当中，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世界语在前进》也因此成为世界语广播的重头戏。

《文学》节目是世界语广播另一特色节目，从1984年开播。节目采取编年史的方法，从中国上古时代开始，先简要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概况、特点、主要人物和主要作品，然后选播一些代表作，包括诗、词、歌、赋、话本、戏剧等。目前，先秦至晚清文学已介绍完毕。现正插播世界语文学作为间歇，下一步将根据听众要求，介绍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还准备介绍藏、蒙、朝、满、回、苗、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学。《文学》节目的深度和广度及译文的精度是有目共睹的，充分显示了世界语作为一种语言的魅力。

《在中国旅行》介绍中国山水风光，各地风土人情，各种旅游设施，推荐各种精选的旅游线路，为各国朋友来访提供咨询服务。

《中国文化》介绍中国的文化、教育、艺术、考古等基本情况和最新成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

《中国经济纵横》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工农业成就等，展示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社会生活》介绍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民风民俗以及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新人、新事和新的精神风貌。

《世界之窗》题材广泛，介绍中国之外的各类事物，为各国听众打开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

《听众信箱》是一个服务于听众的节目。除每月报告听众来信情况外，还摘播各国听众来信，转达他们的各种意见、建议和要求，满足他们的其他愿望和要求，例如寻医看病、购物、访友等。

《音乐》节目播送中外音乐、歌曲、各种音乐故事，以及中外世界语歌曲和中外世界语者演唱的歌曲。

至今，每年世界语广播部自编自采的稿件占全部播出专稿的三分之一以上。世界语编辑部成为一个融编、采、译、播、调研为一体的广播编辑部，世界语编辑部每位同志都能用世界语采访和写稿，成为多面手。

4. 来自各国听众的支持

中国世界语广播的诞生和发展是和世界各国世界语者的支持分不开的。在正式开播以前，一些国家的世界语者就殷切希望中国电台开办世界语广播。日本世界语者曾为此开展签名活动。

世界语节目从一开播就引起各国世界语者的强烈反响和热情欢迎。对欧方向世界语广播开播以后，亚洲、拉丁美洲的世界语者也热切希望能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对东南亚、东北亚和拉丁美洲3个方向的世界语广播。这样，中国世界语广播的听众遍布于亚、非、拉美、欧、大洋五大洲70多个国家。这是除了英语广播之外，其它外语广播中听众国家、地区最多的。它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38种外语广播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一度，世界语广播编辑部的听众来信数量在全台各语言组来信中占第10位左右。至今，世界语广播部每年收到1000封左右来信。这些来信向编辑部报告收听效果，提出节目内容改进意见，对我们工作给予鼓励。它们表达了各国世界语者对中国世界语广播的信任和支持。

许多听众不仅自己热情收听广播，还组织听众俱乐部，集体收听；有的听众还通过出海报、办展览、出售广播节目盒式带等方式，热情宣传中国的世界语广播。

德国听众费舍尔这样说：“你们孜孜不倦地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编织了友谊的纽带，把你们伟大、光荣的国家同我的祖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罗马尼亚听众拉兹尔·格博来信说：“我每天晚上都收听你们的世界语广播。你们的节目总是那么有趣，向我们介绍了友好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工作，这一切使我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地理上的距离。”

在日本，中国的世界语广播成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留下了许多佳话。1987年，日本朋友从我们的广播中得知常州市世界语协会成立的消息后，便与常州世界语协会联系，促成了日本的高（木规）市和中国的常州市结为友好城市。从此，两市的世界语者之间友好交往频繁，两市的文化、经贸交流不断。

比利时听众阿尔伯特在信中这样写道“几乎每天晚上同一时间，我都坐在收音机前收听你们的节目，这使我更加接近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应该说，你们的几个关于中国的节目堪称珍品，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的高质量的工作。”

德国的康德先生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世界语广播的忠实听众，他说：“你们的广播是我了解中国最快的、最直接的窗口，每天收听你们悦耳易懂的广播，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精神享受，而且也是学习中国人民历史的重要课堂。收听你们关于中国文学的介绍，美丽风光的描述，各种民间艺术和生活习惯的介绍，政治、经济、教育和国内外消息的报道，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

中国的世界语广播陪伴无数世界语者走过漫长人生，使他们对世界语，对人类进步和相互

理解加深了认识，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

意大利马尔科·弗兰佐尼 1974 年时还是 9 岁的孩子。在父亲指导下，开始收听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并写信报告收听情况。20 年后的而立之年，他来信说：“借助于世界语广播，我得以了解你们这个美丽国家的历史、地理、艺术和生活，我还了解了贵国人民至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特别欣赏你们在中国，在全世界为推广世界语所作的不懈努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而且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应该成为世界语的旗手。这是中国人民对全人类应作的贡献。”

一位叫雷·柏森的英国听众在祝贺国际电台世界语广播 30 周年时来信写道：“中国世界语广播 30 周年在世界语的全球发展史中，是一个清晰而重要的标志。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对在世界各地切实传播中国的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尽管中国电台有 43 种语言的广播，世界语广播占据特殊的位置，它能覆盖一些小国，而在这些小国里，很多人并不掌握通常广播所使用的语言。”

荷兰老听众路易特·斯塔豪威尔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去我对中国事物的了解局限于散见各处的中国餐馆，公园中的中国月季或来自西方的报道。对一种文化的无知，往往使人们过于匆忙谈论什么‘那些疯狂的人’。当他们有所知时，便会深入到那些奇异的、遥远的国家，和那些有着不同文化的，未被认识的人民。”

中国电台的世界语广播不仅得到各国世界语者的赞誉，而且受到历届国际世界语协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国际世界语协会前秘书长匈牙利人芙洛拉·萨波费尔索博士在任时与中国电台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为中国电台记者采访国际世界语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早在中国世界语广播开办初期，她即给予了充分肯定。1986 年 8 月，当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举行时，她在国际电台召开的听众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近 15 年来，我按时收听你们的广播。你们的广播使我能够接触到中国的文化，中国社会的发展，并能够使我跟国际电台的代表、跟中国世界语者交上朋友。中国的世界语广播对传播有关中国的消息、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对世界语在新闻学中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前任国际世界语协会会长、韩国经济学家李种永教授也是中国世界语广播的忠实听众。他经常收听节目，热心提出建议，提供各种世运消息。历年来，他作为国际世协会长的新年贺词都早早寄达国际电台，供其播发。李种永教授在中国世界语广播播出 44 篇有关在芬兰召开的第 80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录音报道后说：“芬兰坦佩雷第 80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之后，全世界很多世界语者每天都在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关大会的报道，为此，国际世界语协会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在致中国第 3 次世界语大会的贺信中写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是在世界上收听最多、最广泛的世界语广播。”

国际世界语协会前会长汉弗莱·汤金教授在任时曾撰文赞扬中国世界语广播，他这样写道：“今天，它（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数量仅次于华沙，而覆盖面之广又超越华沙居首位。这个电台的世界语口音质量很好，堪称全世界世界语广播的楷模。”

“全世界世界语广播的楷模”，这是汤金教授对中国世界语广播的美誉，也是各国世界语者寄予中国的希望。

（三）用世界语出版各种图书

1. 世界语出版工作得到国家支持

世界语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母语，而是需要学习的外语，学外语离不开课本、字典，也就是离不开书籍，所以世界语的传播、推广离不开书籍。书籍是保存和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是主要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工具，而世界语传播的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同时也通过书刊创造、积累着世界语自身的文化。从及时传播来看，期刊具有明显的优势，从长期积累来看，书籍更有着重要作用。各国世界语者历来都很重视图书出版工作。但世界语主要流行在民间，一般只能靠社会团体或个人筹资，零星出版一些世界语图书，专门出版世界语图书的机构在各国都很少见。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语书刊出版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不仅很快出版了《中国报道》杂志，也逐步开展了世界语图书的出版工作。自从《中国报道》创刊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以后，北京出现了一批拿国家工资的专业世界语工作者。他们肩负着对外介绍中国的任务，成为世界语书刊出版工作的主力军。世界语书刊发行数量有限，出版成本和对外发行费用都很高，入不敷出都由国家补贴。这样优越的条件是其他国家的世界语者很难得到的。

《中国报道》的工作者，除全力办好刊物以外，也力争出版一些世界语图书。1952 和 1953 年，他们首先把刊物上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和诗歌汇编成册，出版了《新事新办》、《和平最强音》、《幸福》等书籍。1954 年《中国报道》停刊，图书出版也停了。1957 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恢复工作，《中国报道》复刊以后，也更积极地开展了图书出版工作。《中国报道》停刊以后，有一位世界语者被调入专门出版外文图书的外文出版社做生产管理工作，后来也成为出版世界语图书的有利条件。从 1957 年到 1965 年，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编辑部 and 外文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出版了一大批世界语图书。其中有全国世协编辑的《中国文学作品选 1949—1959》、《鲁迅小说选》等重点书。这是中国首次出版这样几十万字的大部头的世界语图书。《中国文学作品选》介绍了新中国头十年文学方面的新成就，也反映了新中国的新面貌。鲁迅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首先介绍他的作品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期间，大部分是利用外文出版社的中文选题，由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编辑部组织翻译成世界语文本，然后交外文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有《阿诗玛》、《不怕鬼的故事》等；关于中国基本知识的有《中国地理概述》、《中国针灸疗法》等；还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毛泽东著作；《列宁主义万岁》、《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论战的一系列文件等政治书籍；此外也出版了一些画册、明信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中国风光》、《职工文化生活》、《中国摄影作品选集》、《北京城市建设新面貌》和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摄影画册；《我要读书》、《西厢记》、《巧媳妇》、《东郭先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连环画；《小鲤鱼跳龙门》、《鲁班学艺》、《猴子捞月亮》、《骄傲的将军》、《金斧头》等儿童画册；《北京风景》、《金鱼》、《中国工艺品》、《齐白石小品》、《人物小品》等明信片。

到 1966 年初，用这种“业余”兼顾的方式已经出版了各类世界语图书共 101 种，总计印数 67.4 万余册。书中传播的新中国的新思想、新气象使外国人耳目一新，就连儿童画册也是内容健康引人向上的，所以我们的图书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部分选题多次再版，有些选题还被外国读者译成本国文字，在当地出版。这不仅在中国世运史上是盛况空前，在国际世界语界也是颇引人注目的。虽然从数量上看，世界语不如英语作用大，但英语书刊也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能看得懂或愿意读的。而世界语在各国都有相当一部分读者群，由于对世界语有着特殊的感情，都喜欢读世界语书刊。实践证明，在对外传播上，世界语是有效的工具之一，

而且不受国别限制，有着其他语文代替不了的独特作用，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并不是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的。

为了更多、更好地出版世界语图书，建立一个常设的专业的世界语图书出版机构很有必要。1966年，在外文出版局、中国报道社和全国世协的大力支持下，外文出版社决定由本社的世界语者刘铃带领一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成立世界语翻译组，又从中国报道社调来著名老世界语者冯文洛负责改稿定稿，由他们专门从事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同时中国报道社和全国世协也停止了出书业务。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常设的专业的世界语图书出版机构，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 非常时期的非常出书

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翻译组成立以后，随即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对外宣传工作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革命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出版毛泽东著作被认为是最革命的行动，任何人不敢阻碍。外文出版社抽调了一大批翻译力量，在友谊宾馆成立了“毛选翻译室”，专门从事毛泽东著作各外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世界语翻译组也参加了世界语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图书主要产品是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文件。“文革”期间，世界语版的毛泽东著作出了67种（包括《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单篇文章的袖珍单行本），政治文件32种，共99种，总印数达64万余册。当时似乎要向全世界普及毛泽东思想，“红宝书”在国外似乎也最好人手一册，于是世界语版的《毛主席语录》一次就印了7.5万册，大大超过了世界语图书的一般发行量。虽然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是值得对外介绍的，但要求外国人也像中国人那样普遍学习毛泽东著作是不切实际的。

“文革”初期的狂热高潮过后，外文出版社也知道，对外单纯出政治书籍是不行的，世界语组当然也明白，这对国外世界语者来说更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也陆续恢复出版一些文学作品、中国基本知识书籍和图片画册。但内容上仍然要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世界语组也出了鲁迅的小说全集和他的《野草》；《中国地理知识》、《洞庭人民公社》、《红旗渠》、《中国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介绍中国的书籍；《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收租院泥塑群像》、《农奴愤——大型泥塑》等美术画册；《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今日西藏》、《杂技剪集》等摄影画册；《地雷战》、《南征北战》、《半夜鸡叫》、《闪闪的红星》、《白求恩在中国》等连环画；《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延安》、《韶山》、《北京风光》、《桂林山水》等明信片以及《刘胡兰的小故事》、《红小兵的故事》、《刘文学》、《三号了望哨》、《小马过河》等儿童画册。大部分选题都是相当突出政治的，但为了照顾读者面，也出了些政治性不强的，毕竟外国读者不可能都是“革命左派”。

“文革”后期直到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路子出书：既保证以毛泽东著作和政治书籍为主，又适当照顾读者面。1976年，外文出版社又在友谊宾馆集中了一批翻译力量，先后进行了《毛主席诗词》和《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翻译定稿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又从全国各地借调一些世界语者来参加。各地不少世界语者为《毛主席诗词》提供了自己的译稿，北京的方善境等人组成的定稿小组在此基础上广泛研究、参考了大家的意见，经过仔细推敲，作出了最后定稿，这是集中了全国世界语诗词翻译者的智慧的结晶。《毛选》第5卷也是各地调来的世界语者共同努力的成果，但定稿后因形势变化没有出版。在此期间，世界语翻译组还出版了数十种图片画册和一些其他书籍。

外文出版社是个规模相当大的出版社，有庞大的编辑、美术设计、出版部门和二十几种外文的翻译室组，出版世界语图书有不少便利条件，许多工作不需要世界语者自己动手，有

关部门都可以分担。但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编辑部提供的中文选题是各种语文通用的，很难考虑某一种语文的特点。为了加强世界语图书的针对性和更好地协调世界语编、译、出版、发行之间的关系，必须从体制上进行适当的改革。

3. 改革开放后的大变化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也迈上了新台阶，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1979年，经过酝酿协商，将外文出版社的世界语翻译组并入中国日报社，由中国日报社全面负责世界语书刊的出版工作。世界语在外文出版社只是一个“小”语种，永远成不了重点，很难突出自己的特点，而在中国日报社世界语是唯一的语种，所有书刊都是为世界语读者出的，自然更有利于加强世界语图书的针对性。中国日报社随即成立了图书编辑组和图书翻译组，后来又撤消了这两个组，实行编译合一，成立图书部。1981年又经国家出版局批准，建立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也逐步更加正规化系统化。

国际世界语界本来有个好传统：无论国家大小，各国都把本国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出版，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平等交流。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高尔基、泰戈尔以及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等的作品都有世界语的译本。尤其是一些弱小民族，国外很少有人懂得它们的文字，通过世界语的渠道，更容易使它们的优秀作品走向世界，有不少它们的作品就是这样传入中国的。

中国日报社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彻底改变了以毛泽东著作和政治书籍为主的出书方针，大量出版了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和图片画册，也广泛介绍中国基本知识，还包括一些科技读物。不仅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还有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寒夜》；郭沫若的《屈原》、《虎符》；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日出》、《雷雨》；叶君健的《山村》；杨沫的《青春之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此外还精心编译了两大卷《中国文学作品选 1919—1949》和《中国文学作品选 1949—1979》，集中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作。为了使出书更加系统化，用国外流行的便于随身携带的袖珍开本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小丛书（如《阿凡提的故事》、《智慧囊》、《幸福鸟》、《宝船》、《牛郎织女》、《蝴蝶泉》、《牧童与仙女》等）和微型小说小丛书（如《献你一束花》、《桔红色的伞》、《特别奖金》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学术经典是我们的国宝，自然更应该向国外介绍，但翻译难度很大，需要有高水平的译者付出多年的心血。现在，由国际世界语研究院中国院士谢玉明用十年功夫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世界语译本以及另一位院士李士俊翻译的《聊斋志异选》、王崇芳翻译的孔子的《论语》都已经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在中国和国际世界语图书出版界都是值得赞叹的重大成果。此外还有《中国神话故事》、《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古代笑话》、《苏阿芒诗集》等等。在介绍中国基本知识方面，出版了《中国概貌》、《中国四十景》、《中华五千年》、《中国近代史题话》、《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家》、《中国医药史话》、《中国陶瓷史话》、《太极拳》、《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中国少数民族婚俗》、《北京导游》、《保健食谱》、《家庭实用中国菜谱》、《中国小百科》等。中国人物介绍有《周恩来传略》。科技书籍有《菌儿自传》、《智慧的火花》、《谈天说地》、《中国保护动物图谱》、《昆虫形态图解》、《人体解剖学名词》、《微生物遗传学词典》、《汉世英法中医学术语词典》、《世界语科学论文集》等。印刷精美的大型摄影画册有《中国之旅》、《“世界屋脊”上的西藏》、《奇花异木》、《北京风景集萃》等，这些都代表了我们的印刷水平和出版能力，在国际世界语界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出版。此外还有大量的各色各样的儿童画册和明信片，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也是发行量较大的，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截至1998年底，建国50年来总共出版对外世界语图书427

种，1627万字。

这一时期的世界语图书，不仅是品种多了，更重要的是出书的指导思想转变了，又实行了编译合一，由世界语者直接参与并主持编辑工作，这样就能更多地为读者着想，关心他们的需要，考虑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以平等交流的态度与他们对话，为他们服务。不仅制定选题计划时充分考虑读者的情况，加强针对性，在编译过程中也千方百计地为读者着想，如何能更便于他们的理解。因为中国人熟悉的事物外国人不一定了解，往往需要更多的说明。我们多做一点，读者就方便一点。有时一幅插图或地图也能给读者很大帮助，至少能增加一些亲切感。例如出《骆驼祥子》时，书中涉及许多老北京的地名，外国读者很难搞清楚，有关编辑就专门为这本书绘制了一幅老北京地图，标明书中涉及的所有地名。前言、后记、作者小传、人物表、插图等等，该加的一定要加。尤其是注解，对外国读者是必不可少的。不仅编中文稿时适当加注，由于实行了编译合一，在审定外文稿时，凡是译文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也可以直接用世界语加注，读者来信中就曾对我们书中的注解表示特别满意和感谢。经过这些努力，初步解决了加强出书针对性的问题。

国外报刊和读者来信中经常有对中国世界语图书的评介，从这些评介中不难看出世界语图书的出版对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所作的特殊贡献。首先，读者对中国的文学书籍十分喜爱。葡萄牙读者 W.S.读了《中国诗歌选译》来信说：“中国古代诗歌证明了中国文化发源悠久，正当我们的先人们还在森林和海滩上游荡不定时，中国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加拿大的 J.T.说：“《中国诗歌选译》非常有趣，很值得一读。现在读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仍可感到他们的情感和思想至今还有生命力。我觉得在我和古人之间，现代和古代之间是一脉相通的。‘诗的语言’是难以理解的，然而《中国诗歌选译》的语言表达力却丰富而生动，而且易于理解。”波兰一位小学教师 S.K.来信说《鲁迅小说集》“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集。人们可以看出，小说的作者真实地反映了你们特有的人生观。小说文字清楚，易于理解，纯粹是柴门霍夫式的语言。”一位波兰的技术员 K.S.在信中提到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时说：“我是在长途旅行的车厢里阅读这本书的。它在我偶然相遇的旅伴中间引起了兴趣，并展开了关于这本书以及世界语和中国的讨论。对在座的多数人来说，你们的国家是带有异国情调的，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在他们的邀请下我介绍了我与中国的某些交往和中国的情况。我的介绍使他们对于中国有了一些了解，并且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世界语又获得了新的赞助者。这本书的译文清晰，也很有趣，很好地反映了原作的气氛。”荷兰读者 J.豪温对《虎符》和《山村》两本书写了长篇读后感，他说：“从这个剧本（指《虎符》）中不难看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形象。这本书不仅使我们了解了人的恶劣行径，同时也了解了有关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山村》是一部看了使人又高兴又激动的书。我似乎同书中的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可以摸得到的接触。读者也好像生活在书中的某间小屋里。……正直的、非剥削者的读者是不会不爱中国的。”

读者对中国基本知识类的书籍也颇感兴趣，认为它们是了解这个文明古国的桥梁。读了这类书，不仅可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也有助于克服偏见。世界语刊物《对话》1984年第2期说：“由于有了北京世界语广播和《中国报道》以及世界语图书的出版，中国对于许多世界语者来说是最知名的国家之一。”有一位读者1983年到我国四个城市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游览了《中国四十景》介绍的四十处名胜中的十二处。他在评介这本书时说：“从这本小书中我了解到在其他材料中省略掉的关于这些地方的主要特点，还读到了有趣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使我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得到了充实。”前苏联的布洛尼斯拉夫·楚平就《中国四十景》来信说：“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各个风景区介绍得相当详细。插图很美。内容丰富、有趣。语言明白易懂。如果地图是彩色的就更好了。注释、索引和历史纪年表对阅读本书大有帮助。装订和开本还是令人满意的。印刷是高质量的。”西班牙读者 J.C.来信说：“直到现在，我不知道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所有的西方人都该

读一下《鸦片战争》这本书。”《一月间》杂志 1995 年第 11 期刊登了德国斯特凡·毛尔对《中国小百科》的评介，文中说：“我很喜欢吃中国的面条，……我要感谢《中国小百科》，它相当细腻地告诉我们，用筷子可以更容易把这种美味的怪物送进嘴里。……的确，你可以从这仅仅三百多页的书中了解到这个伟大国家的地理、历史、自然、文化和其他方方面面。”德国读者汉斯·狄德在来信中说：“我喜欢你们的图书和简易读物，因为依靠它们的支持和帮助，我可以顺利地人们在人们当中开展工作，我们这里有的人仍然存在着对中国人的偏见。”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儿童画册备受各国读者青睐，销路最好，再版次数也最多。据《匈牙利生活》1990 年第 6 期报道，匈牙利世协 1989 年共出版 15 种匈文图书，其中就有 4 种是从中国世界语图书翻译成匈文出版的。它们是《大熊猫到我家》、《骄傲的小花猫》、《美丽的空想家》和《鸟儿的家》。每种印数达 22000—35000 册。该刊 1990 年第 8 期对此又作了详细报道。有关文章在谈到翻译出版这些图书的思想时说：“中国儿童画册早在几十年前就深受各国世界语者而不仅仅是儿童的青睐。看起来这些书好象属于世界语文化，但我们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财产，也常常是最好的宣传品。1988 年底，匈牙利世协开始有了试图翻译出版这些图书的想法。因为当时儿童书市场充满了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格调不高的画报和图书。同这些书籍相反，中国图书却毫无恶意和敌视心理，放射着传统美德的光芒。”奥地利读者 L.P. 也来信说：“请继续你们的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因为这是世界语书籍市场的畅销书。”1987 年 5 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参加了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现在是克罗地亚首都）举办的国际书市，送去展销的图书很快售完，不得不将准备赠送的部分图书也出售。7 月，当地将举办世界语文化节，国际书店又赶运去一批中国世界语图书，但文化节开幕前就已被抢购一空。事实证明，中国出版的世界语图书还是很受国外读者欢迎的。

近 20 年来，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也与国外合作出版过一些图书。例如为国际世协代印过《Plena Analiza Gramatiko de Esperanto》（《世界语分析语法》）、《Esperanta Antologio Poemoj 1887-1981》（《世界语诗选 1887—1981》）；为芬兰代印过《Venĝanto》（《复仇者》）；将欧洲出版的《Internacia Komerca Ekonomika Vortaro en 9 Lingvoj》（《九种语文国际贸易经济词典》）增加了中文、日文（日文译文由日本世界语者提供）出了 11 种语文的亚洲版；还有为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诞生 70 周年，与日本著名世界语作家宫本正男共同编辑的《Verkoj de Verda Majo》（《绿川 英子文集》）等等。

4. 国内世界语运动的大发展与世界语图书的国内市场

由于书刊对外发行的费用较高，除了外文出版社、中国日报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等国家资助的专门机构以外，一般单位很难承担，他们所出的世界语图书，主要都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建国初期，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北京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语初级讲座》、《世界语中文大辞典》、《世界语新词典》等一批课本和词典；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了《世界语六讲》、《世界语翻译研究》、《世界语讲习班课本》、《注释世界语文选》、《柴门霍夫大会演讲集》、鲁迅的《野草》、刘白羽的《火光在前》等书以及十几种世译汉的各国文学作品；西北农学院世界语学会也出版了《世界语之钥》、《世界语是什么？》、《世界语基础课本》、《世界语新读本》、《兄妹开荒》（歌曲）等一批世界语图书，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在 50 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没有条件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世界语运动，总的看来，为国内出版的有关世界语的图书寥寥无几，从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初，每年只有一两种，从“文革”到 70 年代末，竟成了完全空白。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了，世界语运动得到了发展的条件，全国各地的世界语者也逐渐活跃起来，纷纷成立了地方世界语协会，开办了不少世界语学习班和函授学校。由于“文革”期间知识被贬低，知识分子遭批斗，学习的权利被剥夺，所以“文

革”以后人们特别渴望知识，热衷于学习，甚至有点饥不择食，什么都想学。而且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又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当人们发现世界语比较容易学，又可以通向世界，就大大激发了学世界语的热情。报名参加各种世界语讲习班、函授班、刊授班以及广播、电视学习班的人非常踊跃，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招生报名的竟达 15 万人，北京出现过上千人的讲习班，不得不在大礼堂上课。80 年代的短短几年间全中国约有 40 万人次报名学习世界语，这是国际世运史上从未见过的。这么多人学习世界语，自然需要大量课本、读物和工具书，这就带动了世界语图书的出版。仅在 80 年代，全国各地（包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各类世界语图书达 160 余种，而解放前 40 年才出了 220 多种。过去世界语图书一般只印一两千册，而现在常常是数以万计。一些函授学校出版的课本、字典印数更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至 1998 年止，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各种世界语课本、读物、会话、语法、词典、歌曲、世界语总论、世运史、世界语人物、文学作品、通信、科技著作、旅游、翻译研究等书籍共 200 多种，而改革开放前 30 年间只出了 35 种。主要出版单位有：

中国报道社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它们虽然以出版对外书刊为主，但对推动国内世界语运动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它们为国内读者出版了冯文洛的《世界语初级讲座》、李士俊的《世界语自修课本》、William Auld 的《世界语进修课本》(Paŝoj al Plena Posedo)、《柴门霍夫演讲集》、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柴门霍夫的《世界语谚语集》、Kabe 的《世界语原文小词典》、张闳凡主编的《世界语汉语词典》以及《汉语世界语词典》、《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巴金与世界语》、《叶籁士文集》、《胡愈之与世界语》等 40 多种书籍。重庆世界语协会和《世界语学习》编辑部出版了 7 种课本和《伽利略》、《屠格涅夫散文诗选》、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世界语情感表达法》、《世界语中级语法》、《世界语语法漫谈》、《世界语教学辞典》、《伊索寓言》、《日本童话选》等共 22 种书籍。

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出版了 8 种课本和《世界语故事选》、《异国故事选》、《咱们来说世界语》、《国际语理想的本质和前途》、《国际语理想历史概要》、《世界语两地书》等共 18 种书籍。

北京世界语协会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世界语读本》、《世界语幽默 100 例》、《世界语读物选》、《你讲世界语吗？》、《世界语趣味会话》、《世界语语法和构词》、《世华词典》、《世界语史》、《柴门霍夫的一生》、《世界语科学小品集》等共 12 种书籍。

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出版了 6 种课本和《世界语阅读文选》、《浅谈世界语句型分析》、《世界语表达法拾零》、《绿星歌声》、《世界语诗歌简史》、《春日之歌》等共 12 种书籍。

黄石世界语协会和黄石世界语函授班出版了 4 种课本和《世界语九百句》、《世界语语法详解》、《漫谈世界语》、《世界语者们》、《绿心》、《方善境纪念文集》、《世界语诗词格律》等共 11 种书籍。

安徽世界语协会、安徽世界语广播函授校和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出版了《世界语广播教材》、《专科世界语教材》、《世界语异国故事选》、《世界语阅读文选》、《世界语口语实践》、《世界语词汇辨析》、《汉世词典》、《柴门霍夫时代》等共 9 种书籍。

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及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出版了魏原枢等人的《世界语教程》、《世界语小故事》、《世界语三百句》、《世界语语法》、《世界语语音》、《旅游中国》；华东师大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潘狄书等人的课本《世界语初阶》、《世界语》。

长春世界语协会与当地有关单位合作出版了《初级世界语趣味故事复述教材》、《十种语言对照词源学词典》、《世界微电脑——朋友还是敌人？》、《国际地质——第 27 届国际地质大会世界语论文专辑》、《你知道地球吗？——地球科学通俗讲座》、《七记耳光——一个失业青年工程师的轶事》，侧重于科技方面。

广东世界语协会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原的《六十年重温〈世界〉》、叶树滋的《世界语科普读物集》、方善境的《学译手记》、《儿童世界语》（共4册）、莉迪娅的《海那边》以及《世界语》（广播电视试用教材）。

此外，一些知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出版了部分世界语书籍。还有一些地方出版社，如漓江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延边大学出版社、远距离音像教育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学术期刊出版社、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北门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也出版了数十种有关世界语的书籍。与此同时，各地世界语组织，如山西世界语协会、安徽世界语协会、广西世界语学会、山西科技报、山西世界语专科学校、山东省世界语协会、内蒙古世界语协会、云南世界语协会、福建世界语学会、沈阳世界语协会、广西交通世界语学会、江苏世界语协会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出过一些世界语图书。台湾光启出版社1980年也出过一本《华世辞典》。

80年代中国的世界语热潮，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超常规发展，自然不可能持久。到了80年代末，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问题，注重经济效益，世界语运动出现退潮，世界语图书出版也随即降温，从1988年到1997年，面向国内市场的世界语图书只出了20多种。

国外出版的世界语图书，国内市场上很难见到，因为进口的图书价格太高，一般中国读者难以承受。许多世界语者都渴望能读到国外的书，这对于加强中外交流、了解世界和提高世界语水平都大有益处，很有必要。过去中国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一般人也缺乏版权意识，一些热心的世界语者也曾设法影印过少量国外的世界语图书。后来有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书更加正规化，版权意识也逐步加强，在出版国际世协的《世界语分析语法》(Plena Analiza Gramatiko de Esperanto)、W. Auld的《世界语进修课本》(Paŝoj al Plena Posedo)、M. Boulton的《事实与幻想》(Faktoj kaj Fantazioj)等书的时候，都事先征得国外有关单位或作者的同意。他们对中国的情况表示理解，都愿意无偿地允许我们翻印。

通过世界语把国外的作品译成中文出版，介绍给国内读者，对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少著名的老作家、老世界语者如巴金、胡愈之、王鲁彦、周作人、孙用、钟宪民、劳荣、魏荒弩、李奈西、卢剑波、张闳凡、周尧、金克木、叶籁士等都参加过这项工作。解放前曾出过近70种文学类书籍，但解放后只在50年代出过近20种，以后就出得很少了。看来我们在加强对外传播的同时，对于交流和引进还重视不够。

五、世界语在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 科技、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问题 及其解决前景

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交通工具的现代化，通讯手段的日臻完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明显缩短，整个人类好像居住在一个“地球村”里。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而这种交往离不开语言这个媒介。但是，世界上除各国纷繁复杂的方言外，还存在着近三千种语言，极大地阻碍了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往与交流。

以科学技术的交流为例。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在历史上，人类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断地利用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进步。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以至常常成为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志。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发现人类在经历了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之后，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出现，迎来了自动化的，即微计算机化的新时代。科学技术在各种领域里都出现新的飞跃，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科学论文在各种语言的刊物上发表，每一分钟有一种新书出版，每天问世的各种新专利也达千种之多。一个科学家要获得某一门科学的知识、资料、新的信息，必须阅读各种书刊，随时搜集有关资料，了解这门科学在各国的新发展。要做到这些，光靠一种外语是不够的，必须懂得多种外语才行。但是要掌握所有外语是不可能的，这对科学家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除少数科学家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能够掌握几门外语外，大多数的人很难做到。其结果自然是阻碍了各国科学技术之间的交流，延缓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从而也妨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如果全世界的科学家能用同一种语言发表自己的科学论文和科研成果，阐释自己新的发明创造和专利，那将给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带来多大的方便！也许有人说，现成的英语就能作为这种理想的国际语，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和科技资料都是用英语发表的，在许多国际科技讨论会议上，英语也被作为主要的工作语言之一。必须承认英语在当今的国际科技交流中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但是，由于英语难学，加上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从长远来说，英语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国际共同语。而世界语正是为了解决国际交往中的语言困难而被创造出来的。与英语等民族语相比，正是在下述几个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

世界语诞生 112 年来的实践证明：它结构合理，简单易学，可以节省学习者许多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它具有丰富的表达力，无论用于日常交往，还是文学创作和翻译，以及发表科学著作，都能得心应手，大量的世界语的科技著作和刊物的出版证明，它完全可以充当和发挥任何一种民族语的交际功能，在国际科技交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它是中立的人造语，对使用它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构成歧视，解决了因使用语言所带来的民族感情问题。许多事实表明：世界语是国际文化、科技交流的有效工具，是促进各国科学家进行友好交往、建立友谊的桥梁。

以国际会议为例。由于语言不通，各种国际会议一般都需借助翻译，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浪费，而且降低了工作效率。据资料显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尽管幅员不大，它们使用的语言同源相近，易于互通，但它设在布鲁塞尔的总部，每年需雇用上千个笔译和口译人员，翻译的人数多于会议代表，用于翻译的支出一年耗资上亿美元。现在联合

国使用 6 种工作语言，各种文件需要译成 6 种文本，大会辩论需要同声翻译，每年用于翻译的支出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每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开会，从大会进行的议题讨论，到各种专题报告会，以及文艺演出全部用世界语，这为大会节省了多少人力和资金。世界语的这一作用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多次亲笔致函国际世界语大会，肯定世界语在国际交流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支持世界语的宣传与推广。

（二）世界语在国际科技、文化领域的应用

早在世界语问世不久，一些著名科学家就向法国科学院提出了世界语可以为科学服务的报告，并建议在国际科技交流中采用世界语。1904 年巴黎的哈希特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第一本世界语的科学期刊。1905 年数学专业词典和文选问世。1907 年国际世界语者科学协会成立，出版机关刊《科学杂志》。该协会现在下设经济学、天文学、鸟类学、语言学、化学、计算机教学和地质学分部，每个分部都有自己的出版物。1908 年国际世界语医学协会成立。1909 年国际世界语者铁路员工联合会成立。在此期间各国出版了 115 种科技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1910—1912 年间出版的三卷本用世界语编写的非欧氏几何学。本世纪 20 年代出版了用世界语编写的有关解剖学的著作《植物的生命》和科普著作《我终于懂得了无线电》（*Fine Mi Komprenis la Radion*）（E. 艾斯博格著），它们已被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 20 种语言。这是世界语者把国际语引入科学领域的尝试。此后，1923 年 4 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了公共商业语国际会议，专门讨论了商业贸易中的语言问题。会议认为：世界语对于国际交通是最适合、最简单和最经济的方法；提请各商业学校中教授世界语；请求承认世界语作为电报中的明语的权利；讨论了世界语在旅游上的应用。同年，《国际医学杂志》创刊。1925 年在召开的国际无线电学会上正式通过决议，把世界语作为国际间无线电话、交通、广播以及杂志提要、翻译和国际大会的辅助语。1925 年 8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17 次世界语大会上举办了第一期暑期大学，通过这样的大学进行科技、文化讲学和交流，以后形成了传统，它对推动世界语在科技、文化领域的应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年 10 月，世界语被万国电政联合会正式承认为“明语”，同拉丁语一样被公约承认为国际语。这一决议从 1926 年 11 月正式生效。本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各种有关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专科性的世界语词典相继出版，其中有《音乐术语词典》、《航海术语词典草案》、《数学词汇及文选》、《商业尺牍》、《化学词汇》、《旅游用语手册》、《摄影学词典》、《解剖学词典》、《鸟类学词典》、《集邮词典》、《药剂学词典》、《军事及红十字会词典》、《医学词典》、《考古学词典》、《汽车学词典》、《机械学词典》、《物理学词典》、《地名词典》、《商业词典》、《航空学词典》、《无线电词典》、《百科字典》等。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各国都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重视科学技术的开发，世界语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应用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其标志之一是一批新的国际科技世界语组织相继成立。有关这些国际组织的情况已在第一章中的“世界语国际性组织”中谈到。

这些国际性的世界语专业组织有的召开年会，有的出版刊物，有的进行专业性的信息交流，有的合作编辑相关专业的词典，大大推动了世界语在科技、文化领域的应用，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例如，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于 1977 年、1979 和 1981 年，分别在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先后举行了专门讨论世界语应用问题的国际医学会议。1988 年该会的口腔小组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了有 175 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1989 年 9 月，在瑞士卢家诺举行了

第4届幼年精神病及相关学科的国际大会。该会出版的会刊《国际医学杂志》经常刊登有关医学领域的新信息和新成果。

最近50年来,用世界语与民族语对照的科学技术词典和专业术语词典也纷纷出版,这些词典有:两种语言的《综合工艺词汇》,三种语言的《化学词典》、《计算机词汇》、《昆虫形态图解》、《微生物遗传学词典》、《人体解剖学名词》,四种语言的《法学词典》和《中医术语词典》,六种语言的《邮政词典》、《大地测量学词汇》和《图书情报文献学词典》,八种语言的《鸟类词典》,十种语言的《词源学词典》,十一种语言的《国际贸易经济学词典》。这些词典所收集的词汇量大大超过了许多国家出版的同类科技词典。

世界语和多种民族语对照的词典一般都是由各国比较知名的专家学者并精通世界语的人集体编纂而成的,所以词汇比较丰富,世界语的对应词也比较准确、规范,例如由布达佩斯出版的五种语言对照的《计算机词典》就是来自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有关专家集体合作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出版的《世界语插图大词典》收集了大量的科技词汇和专业术语。它对世界语科技词汇的规范起了很大的作用。

教科书、科技著作和科普作品的编写和出版从60年代以来有了显著的增长。到80年代末期,还出版了30个学科的高等院校的教科书和教程,计有物理、化学、化学专业词汇、数学、生物学、昆虫学,医学、国际语言学,地质学、地理学、光技术、体育以及其他的分支学科等。

8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出版的世界语教科书《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是译自英语的有关文献,这本教科书是为非洲的教师和学生选编的。

在专门的科学大会上使用世界语始于1979年。这一年在巴西的马里利亚召开了第1届国际科学词典大会,世界语是仅次于葡萄牙语的重要工作语言。自1980年开始,由非世界语的国际性科学团体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把世界语作为工作语言的情况越来越多。1980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9届国际控制论大会把世界语和英语、法语、德语一起作为大会工作语言。1981年在保加利亚斯维希托夫召开的国际生态会议的工作语言和出版语言之一是世界语。同样,在苏联塔林召开的国际风景保护大会用五种语言出版了风景保护小词典,其中包括世界语。1982年,匈牙利约翰·纽曼计算机协会组织的国际计算机大会获得很大成功,为250位与会者所提供的六册共一百多份研究报告全部用世界语发表。1985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控制论大会把世界语作为工作语言之一。1986年在美国锡拉库萨召开的第4届国际生态学代表大会上采用英语和世界语作为工作语言,后来出版的这次大会的报告集用世界语发表的文章要比用英语发表的文章多一倍半。1988年和1989年在保加利亚皮萨尼兹进行了两次国际音乐研讨会,其工作语言是世界语。

1989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首届国际术语学研讨会,与会者就术语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讨论。同年4月,第7届国际方法论研讨会也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以后形成了定期的专业性活动。

1981年国际世界语协会与匈牙利世界语协会签订协议,在布达佩斯成立了世界语科技出版中心,以推动世界语科技出版工作的开展。

1985年在圣马力诺共和国成立了圣马力诺国际科学院(Akademio Internacia de Sciencoj San Marino),其正式官方语言为世界语。该院下设控制论、哲学、人文科学、结构科学、自然科学和形态学6个分部,每个分部又包括若干学部。该院每年组织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和考试,凡论文答辩成功的参加者能得到各种科学职称。世界语的知识是成为该院院士和取得文凭的一个条件。

1986年4月,由21位国家科学院院士和7名特邀优秀学者创建的科米纽斯国际科学院(Internacia Scienca Akademio Comenius)在世界著名的科学中心瑞典的乌普萨拉成立。该院

唯一的工作语言是世界语。它的目的是用世界语培植各门科学。

198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语咨询活动中，正式成立了国际语言学协调委员会（Internacia Kunordiga Komitato de Interlingvistoj），其宗旨是交流有关这个学科活动的信息，制订共同活动计划，其中包括词典学、目录学和信息流通等。

1990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第3届国际经济学家研讨会，生态学和经济学成为大会的主题。

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对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应用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每年7月末到8月初，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世界语者趁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机会，就本专业的有关信息和成果与同行进行直接交流，不仅增进了科学家之间的友谊，也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及时交流，到1999年，国际世界语大会已召开第84届。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掌握世界语，必将使世界语在科技方面的应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从而推动科技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和繁荣。

在最近50年里，世界语进入各级各类学校也是重要特征之一。因为学校是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从学生时代就掌握世界语的科学家，一定会对科技世界语运动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由比利时世界语者 Germain Pirlot 编辑出版的《各国世界语教学的法律地位》小册子统计，世界各国高等院校开办世界语班的数量，1970年为16个国家30所大学，1980年增到19个国家51所大学，到1988年上升到24个国家108所大学。由教育部明文规定可在学校里进行世界语教学国家和地区有34个，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英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中国、芬兰、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匈牙利、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南斯拉夫、加拿大、哥伦比亚、韩国、古巴、墨西哥、荷兰、挪威、新西兰、波兰、圣马力诺、苏联、南非、瑞典、瑞士、美国。

（三）中国科技世界语运动的现状

我国自古是文明古国，科技发明最早，且发明最多，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致使中国经济落后，科技发展缓慢。到了当代，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之我们长期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我国经济 and 科技发展滞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对外又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科技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语言障碍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近20年来，为了同各国加强交流，全国掀起了学习外语的热潮。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向苏联学习，在我国的各级学校，普遍开设了俄语课，英语次之。现在，英语被国人视为第一外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次之。人们普遍认为，学会英语可以走遍天下，要开展科技交流，只要学好英语就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在非英语国家，英语就行不通，不用说进行科技交流，连日常的交往就遇到诸多困难。其次，对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为了科学研究，他必须掌握各国的有关信息，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因此懂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至少掌握两三门外语，但这对大多数科学家说来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中国的科学家更是如此。因为中国的语言和西方语言相差甚远。无论是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由于这些语言太复杂，学习起来相当困难，正像外国人学习汉语一样，好多人学了半辈子还是不能应用，或者应用时不能得心应手。这就大大妨碍人们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开展学术交流。有鉴于此，从本世纪以来，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国家要富强，必须发展科技；科技要发展，必须要开展交流；科技要交流，必须掌握语言工具。英语、俄语等外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是可以学的，学得越多越好，但对大多数人说来，要学会一门外语的确不容易。世界语既然好学，就应该学，特别是科技人员，多学会一种语

言工具，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他们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一再倡导大家学习世界语，并身体力行。一边学世界语，一边办刊物，推广世界语。早在 1909 年，一批留学法国的学者就创办了《中国语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在这份杂志中一半的篇幅是有关科普知识的文章，足见他们对应用世界语进行科技交流的重视。我国著名昆虫学家周尧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即用世界语出版刊物，开办研究所，与国外同行进行科技交流。我国世界语者在 30 年代从世界语《科学杂志》翻译文章在国内报刊发表。苏联著名植物学家米丘林的科学研究就是通过世界语最早介绍到我国来的。米丘林研究所就用世界语进行国际交流。50 年代初，在周尧、路进生教授的倡导下，西北农学院的 20 名教授发表宣言，号召科学家采用世界语进行科技交流。周尧教授还于 1979 年创办国际性的《昆虫分类学报》，其部分论文附有世界语的摘要。以后他又用汉世两种文字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中国向昆虫世界进军》。他还在国际科技研讨会上带头用世界语宣读自己的论文，在一些科学杂志上用世界语发表自己的论著。但是，由于中国科技界懂得世界语的人太少，在 80 年代之前，真正用世界语进行科技交流的科技工作者并不多。80 年代以后，随着学习世界语的科技工作者的增多，中国的科技世界语活动才逐渐开展起来。

1. 专业性的世界语组织

近 20 年来，一批专业性的世界语团体相继成立，为科技世界语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中全国性的组织有：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中国医学世界语协会、中国集邮世界语协会、中国围棋世界语协会，这四个协会都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分会。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中国会员组，是部分教师组建的群众团体，但还未取得正式的法人地位。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的一个专业性的群众团体，下设医学、地学、经贸、食品科技、美学科技和青年等 6 个分会。地方性的世界语组织包括综合性的和专业性的两种，前者如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世界语学会、广西科技工作者协会、长春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学会、金昌市科技世界语协会。后者有新疆世界语协会医学会、山东省世界语协会医学会、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医学组、呼和浩特铁路局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长春市医学世界语学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世界语协会医学会等。上述世界语组织成立后，广泛开展了世界语活动，有的在科技人员中举办世界语班，培养世界语人才；有的出版世界语书刊，为科技工作者提供科技读物，同时为他们发表论著提供园地；有的召开专业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有的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用世界语写作的专业论文；有的通过世界语同国外同行建立联系，交流信息和资料。这些都为我国科技世界语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以中国医学世界语活动为例。早在 1984 年，一批医学工作者就成立了中国医学世界语通讯小组，此后医学世界语者在一些全国性的世界语会议上组织专业座谈会，一方面进行学术交流，一方面探讨如何推进中国的医学世界语活动。1986 年在该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医学世界语学会，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同年 7 月，学会筹备会在北京举行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协助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成功地组织了该会的年会。会上波兰克拉科夫哥白尼医学院向中国医学世界语学会筹委会颁发了尼古拉·哥白尼奖，表彰了该会在医学界推广世界语所取得的成绩。此后，该会的成员在《新疆医学》杂志上连载“医学世界语讲座”，在医务工作者中推广世界语。该会还出版会刊《医学通讯》，加强同全国医学世界语者的联系。该会的一些成员还编辑、出版世汉对照的《医学世界语文选》（电脑打字油印，共二辑）、《我们的身体——通俗人体解剖物理学》（日本西成甫著，赵中勤、郭叙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94 年中国医学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暨第 1 届全国医学世界语会议在山东枣庄举行，标志着中国医学世界语运动迈入了一个新阶段。目前该会有会员 200 多人，分布在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还成立了 11 个地区医学世界语组织。该会成立前后，在历

次全国世界语会议上，在第 5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和第 1 届亚洲世界语大会上，都召开了医学专业的学术座谈会。此外，该组织的成员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除出席一些国际医学世界语学术讨论会外，从 1984 年至 1994 年间在《国际医学杂志》上共发表近 100 篇论文，1988 年崔之骏还获得了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颁发的 Shinoda 奖。该会还将编写《汉世英法中医学术语词典》列入自己的计划，这本词典已于 1997 年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

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成立于 1993 年。在成立之前，已在北京、沈阳、哈尔滨、郑州、上海、兰州、广州、成都、济南、柳州等 10 多个铁路局成立了世界语小组。这些小组曾多次召开会议，就正式成立全国性组织进行商讨，并经常与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联合会保持联系。1987 年，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联合会接纳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小组联合会为其成员，这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其后，他们每年坚持召开年会，交流信息和经验，并编写了多篇有关铁路的世界语论文和译作在国际相关杂志上发表。1996 年 8 月，在上海举行的第 1 届亚洲世界语大会上召开了铁路专业会议和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年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韩祖武和李森分别发表了“21 世纪的亚洲铁路”和“21 世纪和中国铁路”的论文；德国的汉斯先生作了“德国铁路世运和国际铁路联盟的年会”的报告；日本的信木直典和柴田日交作了“日本铁路状况和日本铁路新成就”的报告。

类似医学、铁路专业世界语团体活动的情况还存在于教师、集邮、科技等世界语团体中，本书已在有关章节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2. 出版世界语的科技、文化著作

用世界语著述或翻译的科技著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本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天文学》一书。六、七十年代，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部分科普著作和介绍中国地理、针灸、太极拳的书籍，如《中国地理概述》（任育地著）、《中国地理知识》（外文出版社编译）、《太极拳》（外文出版社编译），但数量极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于 1981 年成立后，为满足部分科技工作者的需求，促进世界语在科技领域里的应用，相继出版了一部分科技著作，其中有综合性的科技文选、科普著作、专业著作和多种民族语与世界语对照的词典。科技文选类的著作有《世界语科技文选》（伊帆、东阳选注），共计选入了 35 篇文章，内容有科普知识，科学幻想和新技术等，涉及天文、物理、海洋、电子、医学等十几个学科与专业。这些文章选自国外的世界语刊物《人与宇宙》、《一月间》、《接触》、《希望》、《东方评论》、《科学杂志》。《世界语科学论文集》（克里斯特·基塞尔曼 Christer Kiselman 编）作为柯米纽斯国际科学院文集第 1 卷出版。书中包含英、法、德、意、日、丹麦、瑞典、荷兰、西班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立陶宛、塔吉克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的 20 位著名科学家的 19 篇论文，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法律、美学、语言学、天文、地质、考古、数学、化学、生物、种子病理学及控制论等多门学科。这些论文的作者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一流的世界语者，包括一些名家在内。这是一本迄今为止内容非常丰富、学术价值和语文水平很高的世界语科学论著之一。它是经过中外世界语者近 6 年的共同努力编撰而成的。前中国科学院院长，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光召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尽管科技合作与交流是那么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是那么频繁，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语言障碍。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却为人类解决语言障碍问题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途径。一百多年来，世界语由于它结构合理、简单易学，已经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掌握、所使用。如果它能 为国际大家庭所认识，真正成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那该节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国际间的合作与交往将会多么方便呀！世界语的发展在于广泛应用。除了在政治、文学、旅游上应用以外，在科技上的应用应该大大提倡。”

科普类的著作有：《菌儿自传》，它是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奇的代表作之一。《智

慧的火花》(王梓坤等著),收集了80年代以来66篇优秀科普小品文,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宇宙飞行、遗传工程、原子能、半导体等现代科学,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保护动物图谱》(陈效一主编),介绍了中国部分珍稀动物的情况。

《谈天说地》(力强编),主要介绍宇宙、天文方面的有关知识。

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的有关著作有:《中国陶瓷史话》(赵鸿声编著)、《中国古代科学家》(曹百龙、张庆珍编)、《中国古代哲学家》(侯爵良编)、《中国少数民族婚俗》(天星编)、《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力强编)和《中国小百科》(中国报道社编)。《中国小百科》介绍了有关中国的地理、自然、气候、河流、人口、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介绍中国烹调艺术、传统医学方面的书籍有:《保健食谱》(翁维健等编著)、《家庭实用中国菜谱》(中国报道社编)、《太极拳》(中国报道社编)、《中国武术》(朝花出版社编)、《祝你健康》(刘才盛编译)、《中国医药史话》(甄志亚等编)。

有关专业性的科技著作有:用世界语—拉丁语—汉语对照出版的《昆虫分类图解》(H. 施太因曼、L. 佐博里拉丁语原著,李克希世译汉译改编),用世汉对照出版的《未来教育科学入门》(赫·格·弗兰克著,安文铸译)。《未来教育科学入门》一书是教育控制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对了解当今世界上教育科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世界语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综合类词典和专业性词典。综合类词典有《世界语汉语词典》,这部词典由张闳凡任主编,经过了31位世界语者5年多的努力才编成。这部词典收词共45660条,其中包括许多我国特有事物和科技词汇。另一部中型词典是《汉语世界语词典》,由谢玉明、曾倩仪等编著,收词4万多条,其中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常用词汇。此外还出版了《世英汉分类词典》。

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专业性的词典有:《十一种语文国际贸易经济词典》(荷兰F. 孟尼克斯马主编),这11种语文依次是英语、世界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葡萄牙语、瑞典语、日语、汉语。该词典所收词汇附有准确的释义,以英语和世界语两种文字作释。拉丁语、英语、法语、世界语、汉语5种语文对照的《人体解剖学名词》是李克希和法国著名眼科专家Andre Albault编译的。由于其语种多,使用方便,适用范围广泛,受到医学界的欢迎。它不仅可作为解剖学者和临床医生的工具书,也可作为解剖学有关学科人员及翻译人员的参考工具书。由世界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对照的《微生物遗传学词典》是由美国R.A.柳文教授编著,徐森荣汉译的一部词典,除收入微生物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专业术语外,还收集了有关真核动植物的普通遗传学和生物化学中最常用的术语,共收词697条。该词典以世界语字母顺序排列,有世界语和汉语两种文字释义。这本词典的出版填补了微生物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没有专业词典的空白。《汉世英法中医术语词典》是由顾建华任主编,余汐满、彭健君任副主编的一部中医术语的专门词书,共收常用中医术语7千余条,它是由20名中医工作者历时4年编纂而成的。有了它更有利于将中医这个宝库介绍给更多公众和医学工作者。

除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分世界语的科技著作,如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向昆虫进军》(周尧著)、《机器世界》(匈牙利Sandor Szhalmari著,李奈西汉译)。《机器世界》是一本科幻小说,用汉语世界语对照出版。学术期刊出版社出版了世英汉法德西六种文字对照的《图书情报文献词典》(美国杜格·波特曼著,陈珊汉译),共收词1300余条,范围包括图书、情报、出版、印刷、文献学等各个方面。正文按世界语词条的字序排列,其下列出英语、汉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对应词,每个词的词义、注释用世界语解释。词典选词精当,反映了图书情报文献学的最新发展。桂林出版社出版了英世汉对照的《常见花卉名册》,书中介绍了中国常见花卉800多种。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周尧教授编著的《中国盾蚧志》,书中有世界语摘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世

界语科普读物集》(叶树滋编著),该书共收集了30篇科学小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还出版了《英世生物学词典》(日本野村忠纲原著,曾定之、王建周等编译)。丹麦种子病理学学科创始人尼尔高德博士的世界语原著《植物的生活》一书也被译为汉语、丹麦、瑞典、芬兰、保加利亚、波兰、葡萄牙、挪威等文字出版。

此外,一些世界语组织也出版了部分科技著作,其中有《国际地质学》第8卷,它是由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和国际科学世界语者协会地学分会联合编辑的。它收集了6个国家的22篇有关地球科学的论文,其内容涉及当前国际地质科学的前沿,诸如地震预报、工程地震、地震区划、工程地质、构造物理、活动构造以及青藏高原的隆起等,都是当前地学界十分关注而又比较活跃的课题。其作者大部分是在上述领域享有一定声望的中国地球科学方面著名学者。通过此书,读者可以对当前世界上地球科学发展的现状,特别是中国地球科学的状况有一个较全面而清晰的了解。安徽省大学教学科研咨询公司和《世界语者》杂志社出版了《汉语世界语科技词典》(张金梁主编),涉及地质、地理、矿业、气象、农业、水利、天文、航空、航海、宇航、冶金、铁路、渔业、无线电、电工、机械、化学、建筑、计算机、动物、植物、生物、生理卫生、解剖、心理、医学、电影、美术摄影、军事、数学等领域有关专业词汇。广西交通世界语学会编辑出版了《简明科技世汉词典》(梁梓明主编),其内容涉及了公路、铁路、水路、航海、航空以及相关专业的科技词汇。广西民族学院、广西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出版了世界语、保加利亚语、俄语和汉语对照的《数学专业词典》(保加利亚D·丹妮娃原著,王海涛编译)。长春市世界语协会、长春地质科学技术开发基金会等5个单位为庆祝国际青年年、国际和平年、国际语言年,出版了世界语信息交流系列丛书,其中有《国际地质——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世界语论文专辑》、《你知道地球吗?——地球科学通俗讲座》(匈牙利E·杜蒂斯博士著)、《十种语言对照的词源学词典》(英国L·贝斯腾著)、《世界微电脑——朋友还是敌人》(布罗茨科·佩特尔主编)。

3. 《世界科学技术》杂志的出版

世界语从本世纪初传入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还没有专门用世界语正式出版的科技刊物,有关科技方面的文章常常散见在一些用中文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中。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80年代的同名刊物《世界》,50年代初的《人民世界》,刊有少量的科技性文章。

在对外报道刊物中,世界语月刊《中国报道》在报道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成就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创刊49年来,它经常反映中国工业、农业、医学、航天、航空等各个领域的科技发展动态和信息,有时还发表文章介绍某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或者介绍某项新发明、新创造,这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和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应用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报道》毕竟是一本综合性的以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科技方面的文章只能占一部分,还远未能满足广大科技专家和学者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由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编辑出版的《世界科学技术》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该刊办刊的目的在于:“把世界语引进和应用于科技领域,为老一辈世界语学者、专家,为懂世界语、愿意用世界语进行学术交流的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科技世界语爱好者提供发表学术论著、研究成果和创作、翻译各个不同学科和科技文章的园地。”它将致力于科技世界语的推广、普及和提高工作,为适应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内外科技学术交流服务。

《世界科学技术》1985年创刊,初期刊名叫《世界科技》,后更现名。每年4期,用世界语、汉语两种文字对照出版,主要刊载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其内容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地学、海洋、动植物、生态、园艺、食品、环境保护、水利、能源、计算机、互联网络等诸多领域,可以说几乎涉及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该刊

也发表经济、贸易、社会发展、文化等方面的文章，但数量较少。到 1998 年止，该刊共出版 54 期，共发表 930 篇论文和文章。这些论文和文章，既有利于中外科学技术的相互交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有利于科技世界语的推广、普及和提高，从而实现了创刊时该刊对读者的承诺。

《世界科学技术》十分重视我国科研成果和信息的介绍，先后发表了近二百篇文章，有的文章是全面介绍某个领域的发展状况的，如《中国的植物生理学概况》、《中国的天文学研究》、《汉字机器处理和传送技术》、《中国的高科技开发》、《火炬计划——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21 世纪的中国将成为世界级科技强国》、《中国宇宙开发之现状》等等。有的是报道某项具体研究成果，如《最优杂交水稻在我国培育成功》、《我国制成一台天文望远镜》、《‘不粘伤口’纱布研制成功》、《我国中药抗癌研究获重大突破》等等。有的是对某些自然现象提出新的学说，如《地球弹跳触发地震》等。

《世界科学技术》对中国医学成就，特别是对传统医学的介绍是不遗余力的，如它发表了《中国肝癌的纵向病因学研究》、《脑内移植手术在我国获得成功》、《从免疫学的观点探讨针灸治疗艾滋病》、《人工智能与中医专家诊疗系统》、《中医治疗重症肌无力》、《针刺配合康复法治疗中风偏瘫初探》、《针灸、推拿辩证论治腰腿痛》、《刺血拔罐疗法治疗急性腰扭伤》、《肿瘤的非药物疗法初探》、《蒙医及其用药特点》等等文章。有关气功的、太极拳健身和治病文章也经常在这本刊物中能见到。这些文章对国外同行了解我国医学成就很有帮助。

《世界科学技术》把普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重要任务之一，它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各种科普知识，诸如《细菌与人类》、《火树银花话烟花》、《智能机器人》、《激光唱片》、《昆虫知多少》、《危险的杀手——空气中的微粒》等等。与此同时，它也十分重视新兴学科的介绍，诸如遗传工程、人工智能、卫星通讯、信息数学、微激光器、无土栽培、克隆技术、核技术的应用等等。

在《世界科学技术》杂志上还刊登了 150 篇外国学者的科学论文。这些学者分布在美、俄、英、法、德、意、荷、比、澳、瑞典、波、匈、乌克兰、捷克以及日本、印度、伊朗等 21 个国家。论文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食品科技、营养健身、环境保护、水产养殖、海水淡化、能源开发、生物技术、地震预报、计算机、机器人、天文、地学、化学、数学、医疗等等。它还转载了法国 C. 贝坦的《电子计算机词汇》（英世汉对照，连载 16 期），以后它又依据德国 R. 艾科尔兹主编的《世界语分类词汇》编译了《世英汉分类词汇》（连载 18 期）。

《世界科学技术》杂志还开辟了“科技与世界语论坛”、“科技术语讨论”和“世运动态”专栏，一方面就世界语应用于科学技术的众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刊出一些实际应用的范例，例如前面提及的英世汉对照《电子计算机词汇》和《世英汉分类词汇》，同时对科技世界语运动方面的信息给予了及时地报道。这些文章对人们认识世界语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际意义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世界科学技术》出版以后受到国际科技界的世界语者和世界语组织的广泛欢迎，在 70 多个国家拥有自己的读者。日本读者出口京太郎在评论这本刊物时说：“你们的杂志对环球世界语大家庭和对当今重要的科技领域应用世界语作出了重大贡献。运用世界语对在这个领域普及知识和传播信息是很有价值的。”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深圳福音医疗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存正的一篇学术论文“宇宙三能场与人体三能场”在《世界科学技术》1991 年第 1 期发表后，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世界语信使报》于同年 11 月 25 日出版的第 1850 期第 3 版《书目提要摘记》栏中把这篇文章选入了“用国际语（世界语）编写出版的有趣和有意义的文章”之列。从此，国内外与沈存正联系和交流络绎不绝。德国西门子公司工程师鲁道夫·戈贝尔在读了沈存正的文章后，精心构思，创作了一幅生动、形象地描述这一理论的示意图，发表在国际人类学运动协会出版的《通报》上。以后《世界科学技术》随即在

1993年第3、4期上加以转载。沈存正又把它收入《沈存正宇宙三能场理论文选》中。总之，通过相互交流，促进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国际世界语协会高度赞扬《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在促进中外科技交流和将世界语应用于科技领域的努力，并希望与国际世界语科学协会和国际经贸专业团体加强联系和合作，在科技世界语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表彰《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对科技交流和科技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贡献，1993年，法麦基金会授予它法麦国际基金奖⁴⁷。1994年，格拉波夫斯基基金会授予它格拉波夫斯基国际基金奖⁴⁸。

4. 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的国际交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世界语科技工作者与国际上的同行的交流还只限于个人之间。80年代之后，随着学习世界语的科技工作者的人数增多和世界语的专业科技组织的出现，逐渐纳入了有组织地进行交流。

我国的医学、教师、铁路员工、青年、集邮、围棋等世界语协会与国际上相应的世界语团体，常年加强信息沟通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推动本行业世界语活动的有关问题，其合作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这方面的详情可见本书的有关章节。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及其开展的科技世界语活动。

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成立于1984年6月15日。其背景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间经济、贸易、文化、科技、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许多人都希望能掌握一门外语，全国掀起了学习外语的热潮。各地世界语组织因势利导，纷纷办起了世界语的面授讲习班、函授学校和刊授学校。一些地方的省市电台、电视台也举办了世界语讲座，数以万计的人报名参加了学习。各地的世界语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这一形势引起了我国一批老科学家的关注。1984年夏，以贝时璋、汪德昭、周明镇、刘东生、蒋丽金、贾兰坡、叶笃正、叶连俊、谈镐生为首的30多名学部委员和著名科学家联名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建议在中国科学院系统成立科技世界语协会，组织科技人员学习世界语，以世界语为工具，推动国际间的科技交流。这一建议得到了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的赞成。他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支持协会创办《世界科学技术》杂志，同意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国际科技世界语大会，促进中外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加强世界语在科技领域的应用，并欣然同意担任该协会的名誉会长，并在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科技人员学习世界语。他曾多次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技世界语大会开幕式，向大会表示祝贺，亲切会见外国科学家，同他们就开展世界语科技活动交换意见。后任院长周光召以及副院长严东生、孙鸿烈、王佛松、李振声、胡启恒等也十分支持世界语科技工作的开展，严东生、王佛松还先后兼任中科院世界语协会会长职务。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老院长，如曾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胡克实、张稼夫、张劲夫也对世界语的科技交流活动以及世界语事业给予肯定和亲切的关怀。国家科委及其领导人对中国科学院世界语协会在北京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出版《世界科学技术》杂志，以世界语为工具，广泛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由于国家科委和中科院领导对科技世界语工作的重视，40多位科学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应聘成为中科院世界语协会的顾问，其中包括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声学家汪德昭，古生物

⁴⁷ 法麦国际基金奖是由阿洛伊斯·梅内尔斯（Alois Meiners）于1988年建立的一种奖金，旨在通过发放补助金的方式支持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流，发展科学技术，以增进相互了解。对从事上述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有关组织和人士给予奖励。

⁴⁸ 格拉波夫斯基国际基金奖是以著名世界语作家格拉波夫斯基命名的一种奖励基金，它以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的方式，支持世界语文化的发展，尤其支持世界语写作的或翻译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并给予青年作者以鼓励。

学家周明镇，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地质学家刘东生、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化学家蒋丽金，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陈颀，气象学家朱岗昆，沉积学家叶连俊，力学家谈镐生，药学家黄量，冰川学家施雅风、中国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其中有些科学家还在《世界科学技术》杂志上撰写论文，或在国际世界语科技大会上宣读自己的学术论文。

由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于1986、1988、1990、1994、1996年在北京先后举行过5次。出席会议的各国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上千人，提供的论文一般都在100篇至300多篇。论文的内容大部分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少部分是有关社会科学领域和经济贸易的，其中涉及本学科一些重要课题的新观点、新创见和新成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发展，同时也可以感到在国际经济大循环、科技大交流中和平和友谊是多么的重要。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代表都会强烈地感到世界语正是连接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也是科技交流的有效工具。

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有时还派代表团出席一些国际性会议，或开展一些国际科技交流活动。1987年7月，协会组团参加第6届国际医学世界语会议。中国代表第1次与会，宣读论文，开展交流，受到热烈欢迎。协会代表沈澄如荣获尼古拉·哥白尼奖状和奖章。1998年7至8月，在北京举办了首届国际世界语针灸班。1991年10月，协会与有关方面合作，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市成功地举办了“中国周——中国工业技术与产品展览会”，有全国12省市120个厂商参加。

5. 中国著名科学家论世界语

中国科学家是怎样看待世界语的，特别是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是怎样评价世界语的，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一番。因为从他们的认识中，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得到许多启迪。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卢嘉锡**以科学家特有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审视世界语，倡导世界语与科技相结合，把世界语引进和应用于科技领域。他说：“世界语的理想，是促进人类相互了解，保证社会共同进步。我们应该支持世界语的推广和普及。人人都学会了，都能应用了，国际交流就方便多了。”他还指出：“作为语言工具，世界语需要科学，作为学术交流工具，科学更需要世界语。”他认为：“世界语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国际科技交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990年5月，他在第3届国际科技世界语学术会议的书面发言中着重指出：“我们中国科学院一贯重视和支持世界语的推广和应用，不仅过去重视，现在重视，将来也一样重视和支持。我们所以重视和支持世界语，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世界语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世界语在促进国际团结友好合作中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它能发扬时代的精神，适应社会的需要，很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他号召青年一代“为了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大家都来学习和使用世界语。”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为了鼓励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开展工作，推动科技世界语运动向前发展，纷纷发表讲话或题词，表达自己的意见。著名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教授在一次讲话中说：“人类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要得到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使之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共同语言。我认为，只有世界语能够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他强调指出：“共同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文化交流，有利于经贸合作，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人类幸福，所以世界语不仅要提倡，而且还要推广普及。”曾担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鼓励世界语科技工作者要“怀大志，攀高峰，为人民，多奉献！”著名化学家**蒋丽金**教授年逾七旬，她积极地参加世界语的科技交流活动，在初步学习世界语后，用世界语在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1998年她给《世界科学技术》杂志题词：“大力推动世界语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语言。”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以89岁高龄写了“世界语尽速发扬光大”的题词，以表示自己为世界语事

业的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运筹学家**许国志**是我国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研究和应用的奠基人之一。他用诗一样的语言鼓励世界语工作者要坚持不懈地作好基础工作，他写道：“十年磨一剑，所贵在坚持，欲建摩天厦，先需固地基。”

中国科学院前顾问**张稼夫**在给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的信中写道：“想使世界语成为公认的第二外语的先决条件，我以为是世界语能够表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各个方面的东西，包括出版百科全书那样的著作，以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世界语了解和掌握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大家愿意看的东西多了，学习、研究的兴趣也就大了，掌握世界语的人多了，世界语的发展就前途无量了。”

著名声学家**汪德昭**教授在给《世界科学技术》创刊号题词时，写下了如下的内容：“全球性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在人类明天的历史上，可以相信，世界语的功勋，必定是辉煌的。”

著名力学家**谈镐生**教授说：“把世界语引进科技领域，是一个方向，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是有前途的。科技人员应该普遍学会世界语，用世界语开展科技交流。”

著名小麦育种学家**李振声**教授在第2届科技世界语学术会议的致词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世界语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繁荣，邮电交通的发达、全球信息的快速传递，人与人之间的国际交往已经变得十分容易、十分方便。现在存在于客观现实世界唯一的障碍是语言。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的国际通用语言，正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一百年来它已经为千百万人所掌握，今后必将为更多的人所使用。特别是世界语结合科技、经济、贸易、旅游、文化交流，肯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需要世界语，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和平友好交往也需要世界语。人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世界语只有与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才有强大生命力，才能发挥巨大作用。为了振兴中华、走向世界，为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应该在世界语诞生的第二个百年中，大力推广普及世界语，使更多的人学习、掌握、使用它；应该创造更有利的学习和应用的环境，使更多的科技人员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世界语的语言水平，更好地投身到用世界语进行科技交流的活动中去，努力为四化建设、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教授说：“为了搞好经济改革，必须科技交流；而世界语就是各国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的必要工具。”

著名核物理学家、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光召**教授1995年1月给《世界科学技术》杂志的题词是：“交流科技，增进友谊。”寄托了他对年轻世界语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

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在第2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开幕式上代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致词时说：“众所周知，科技是世界性的，科技成果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进行科技交流、科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要交流，要合作，必须用语言。世界语，顾名思义是世界性的。如果有更多人都会用世界语，对促进科技交流和合作将会起很大作用。”

著名古生物学家**周明镇**教授认为：“世界语只有和人类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世界语也像打电话、看电视那样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工具。只要我们艰苦努力，做过细的工作，不断地、经常地把它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西北农业大学教授**周尧**一生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和应用，他在给《世界科学技术》杂志的题词中这样写道：“太阳不独照临于高山，其光辉也普及于幽谷。科学是人类之共同财富，其论文应当用世界语发表，使全世界各民族都有均等享受之权利和机会。”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在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开幕式的致词中指出：“世界语，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希望的语言。人们希望它在国际交往中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它能打破语言障碍，为促进世界和平、团结合作提供方便，也可以为推

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他认为世界语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显示出它真正的价值。“希望它能在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促进新学科、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产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 世界语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

柴门霍夫博士创造世界语的目的，就是沟通民族间的思想感情，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因此这种文化交流成了必要性。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任何民族语起不到的作用，是达到上述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世界语一问世，柴门霍夫就用世界语翻译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学、戏剧作品，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乔治·丹丁》、席勒的《强盗》等，从此开始在各民族世界语者之间流传。与此同时，在教育、科技、旅游、集邮等方面也开始了交流活动。这种国际性的交流在世界语运动中占着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世界语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悠久的历史渊源流长，光辉灿烂，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吸引着世界各民族的人民和世界语者。近百年来，中国世界语者致力于把中国优秀文化介绍到国外去，同时，又把外国优秀文化介绍进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此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早在世界语传入中国初期，以世界语为媒体的文化交流就开始了。1925年，我国著名世界语者黄尊生先生在第17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首届世界语夏令大学上向来自世界各国的900多名与会者作了《孔子之教育哲学及其政治思想》的学术报告，使人们了解和认识孔子思想的伟大，获得良好效果。1936年，我国世界语者徐方西先生将克罗地亚著名作家丁克·西姆诺维奇的作品《环》从世界语翻译成中文，并印刷出版。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克罗地亚小说，而且成了克罗地亚图书馆的珍藏本。谁也没有想到，60年后的1996年10月，它会成为克罗地亚议长弗·帕夫莱蒂赠送我国领导人乔石、荣毅仁的贵重礼物。这本书是中克早期文化交流的见证，它紧紧地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了。

以世界语进行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范围广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每年在世界各国轮流举办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可以说是每年一次国际文化交流盛会。

每届大会都安排多项文化节目，如：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的国际大学，参加学术报告的都是各国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以文化为主的大会议题讨论；还有各种专业会议，新图书展示介绍的图书节，民族文化报告会等活动。中国世界语者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例如：1980年，叶君健同志在国际大学上作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特征》的报告；1980年和1986年，陈原同志分别在两届国际大学上作了《人类语言的相互接触与相互影响》和《人民、语言和文化》的学术报告；1986年，周尧和李士俊同志在国际大学上分别作了《蝴蝶来了》和《中国民歌初探》的学术报告；1994年，刘才盛同志在国际大学上作了《丝绸之路》的学术报告；1997年，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教授在第82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作了《孔子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学术报告。我国世界语者还多次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的议题讨论。例如：1979、1980、1981和1987年，刘铃、曾禾尧、谭秀珠和李士俊分别在大会议题讨论中作了《语言歧视——难以容忍的不公平》、《反对民族、妇女等歧视》、《中国普通话》和《中国通过世界语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报告。上述这些学术报告使与会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现状、研究成果和观点。

2. 1978年以来，中国世界语者多次参加了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1978年，中国木偶艺术团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市举行的国际木偶节，用世界语演出了

《大闹天宫》，由于精湛的表演艺术和流利的语言而获得 3 项奖励，之后又在南斯拉夫的其他 5 个城市演出，轰动一时，评价极高。1987 年、1992 年和 1995 年，李士俊同志分别在克罗地亚的文化节上、第 5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上和应邀访日时，作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问题》、《蒲松龄与他的聊斋志异》和关于中国诗歌的学术报告。1989 年，石成泰同志在访日期间作了《世界语中的李白》的报告。1992 年，李任同志在第 5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上作了《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报告；同年，邹国相同志在俄国海参崴举行的“太平洋·语言·文化·合作”的研讨会上作了《促进太平洋地区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报告。

1994 年，于涛同志在欧洲青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眼中的欧洲》的讲演。1998 年，王汉平同志应邀访问日本 12 个城市，作了《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等报告。这些活动和报告，均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并使他们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3. 通过结成友好城市，进行科技、文化交流和互访活动。

目前已有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成都、长春、苏州、宁波、洛阳、常州、唐山、湛江等 20 多个城市的世界语组织同外国友好城市的世界语团体建立友好和文化交流关系。现在举 3 个例子加以说明。常州市世协和日本高槻市世协于 1986 年 1 月建立联系，通过这一联系，促成两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从一般的世界语组织领导人和世界语者的互访，已发展到市长和政府官员间的互访；从一般的世界语教学交流，已发展到政府间的经济、科技、文化、商贸、金融、城建、新闻、社会福利等多项目的交流和合作。据不完全统计，在结为友好城市的 10 年中，常州市派出 54 批的 271 人次前往高槻市进行交流访问，其中包括 3 次市长率团访问。高槻市派出 73 批的 1052 人前来常州市进行交流访问，其中包括 8 次市长率团访问。天津市世协与日本神户世协建立了友好协会关系。1991 年 5 月，神户市举行神户节。天津市世协在市政府和津沽画社大力支持下，选送 100 幅书画，70 多件邮票、纪念封、雕塑纪念品，40 多件风筝、纯丝方巾等物品，以供展出，为节日增添了光彩，倍受欢迎。唐山世协应捷克世协请求，提供有关资料，举办了唐山图片展览，介绍了唐山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和成就。

4.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其他世界语组织多次接待重要的外国文化和旅游团。

1958 年，日本著名文化人士土歧善磨先生率团来访，1973 年又率文化代表团来访，受到郭沫若、廖承志、胡愈之等人的热情接见和宴请。代表团回国后，又促成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的回访。在互访中双方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1978 年、1980 年和 1989 年，德田六郎先生 3 次率日本世界语代表团来华访问，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并在上海会见了巴金，在北京会见了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回国后，他们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并辟谣“巴金在文革期间迫害致死”的谎言。1987 年，日本大本青年海外文化交流团一行 63 人来华访问，在上海、青岛、北京同世界语者进行了多方面的世界语和文化交流活动。日本梅田善美先生曾 20 几次率世界语文化旅游团来华访问，每次都有文化交流项目，其中一次是专门沿着国际主义战士、日本世界语者绿川英子的足迹旅游，了解她的英雄事迹，考查中国的民风民俗。还有一次，他率团来华访问期间，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研讨会，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此外，还有英国、美国、法国等的世界语者组织旅游团来华访问，也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5. 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也是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1986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世协举办了 5 次国际世界语科技会议。第 1 次会议有 18 个国家的 300 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加，对各个领域的科研成果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收到良好效果。1991 年，为纪念鲁迅诞辰 110 周年，上海世协举行了《鲁迅与世界语》的学术研讨会，有日本、韩国、中国的 30 位多世界语者参加。与会者就鲁迅与世界语的关系、鲁迅著作

和思想在各自国家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1994年，在北京举行了《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50多位巴金学术研究者和北京文化界人士200多人出席。许善述、李士俊、杨葭莼、王彦京等同志参加了研讨，并提交了论文。1995年，第14届中日韩青年世界语者研讨会在天津举行，研讨会的议题是《青年与传统文化》。三国与会者就青年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增进了彼此了解。1997年，在广东中山市举行了世界语文化旅游研讨会，有14个省的7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致力于用世界语作桥梁，建立网络，以旅游促进中外文化、科技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地方世界语组织协助有关单位，接待了德国控制论专家 Brank、瑞典数学家 Kiselman、韩国农业专家李种永等来华讲学，得到我国学者好评。李种永先生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获得我国农业部嘉奖。甘肃省世界语者黄银宝通过世界语的渠道从国外引进西瓜品种，培育出适合当地生长的西瓜品种“绿星”；他还引进荞麦加工技术，为当地农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找到了出路。因此，他被授予“全国先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光荣称号。陕西世界语者王天义第一个在国内引进温水养殖甲鱼的技术。通过世界语的桥梁作用，有的省、市组织代表团出国考察，谈判贸易；还有的中国产品，如青岛的手表、抚顺的骨透磁带、北京的按摩录相带等，销售国外。

此外，1989年，在山东泰安世界语组织帮助下，中波合拍了世界语片《皇帝出巡》和《十亿人温饱后的欢乐》，并在华沙播放，收到很好的效果。

6. 有一些外国世界语学者对中国古老文化、艺术,对少数民族的风俗、宗教等十分感兴趣,专门来我国考查研究。

例如：南斯拉夫的塞凯依先生、芬兰的萨碧兰小姐专门到内蒙和西北地区考查，回国后写了不少文章，刊登在当地报刊和世界语杂志上，使外国读者了解到那里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了解到中国政府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真实的现状。

中国世界语者通过世界语这座桥梁，把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民和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世界语文学与文学语言

(一) 世界语文学独特的历史与作用

1. 世界语与世界语文学一同问世，相辅相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不仅要表现人间沧桑、世态炎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还要描述人类所存在的时空，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文化。例如《红楼梦》那样的传世之作，其内容便像百科全书一样地丰富多彩。能够胜任文学写作的文学语言，自然也是最严密、最灵活、最丰富、最完美的语言。它应该满足各种语言风格的需要：不论是优美高雅、朴实无华、深邃隽永、冗赘拖沓，还是简洁明快、诘屈聱牙、诙谐幽默、尖刻辛辣。总之，文学语言是最成熟，最完备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没有语言也便不会有文学。如果把文学比做宏伟壮丽的宫殿，文学语言就是建造宫殿的砖瓦木石。没有材料，如何能够建造宫殿？反过来，文学对于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作家，用他们的文学作品，丰富和发展了他们本国的语言。但丁对于意大利语的影响，莎士比亚对于英语的影响，歌德、席勒、海涅对于德语的影响，普希金、托尔斯泰对于俄语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于汉语的丰富和发展，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了世界语文学，世界语才成了活的语言。世界语文学对于世界语的丰富和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887年出版的《世界语第一书》向世人公布了柴门霍夫博士创制的国际语方案。在那本只有40页的小册子里，就发表了柴门霍夫博士用世界语写的两首小诗《Mia Penso》（《我的情思》）和《Ho Mia Kor'》（《啊，我的心》）。《我的情思》是一首抒情小诗，结构严谨，格律整齐，共有四节，每节八行。

MIA PENSO

Sur la kampo, for de l' mondo,
Antaŭ nokto de somero,
Amikino en la rondo
Kantas kanton pri l' espero
Kaj pri vivo detruita
Ŝi rakontas kompatante, —
Mia vundo reŝrapita
Min doloras resangante.

"Ĉu vi dormas? Ho, sinjoro,
Kial tia senmoveco?
Ha, kredeble rememoro
El la kara infaneco?"
Kion diri? Ne ploranta

我的情思

在远离尘世的田野之上，
在夏日夜幕降临的时光，
有个一同郊游的女郎，
唱起歌儿诉说希望，
述说人生不幸沧桑，
倾诉她的同情满腔。
歌声触动了我的创伤，
使我痛楚，流出血浆。

“啊，睡了？您睡着了吗，先生？
您为什么一动也不动？
一定是记起了什么往事，
想起了您那童年的情景？”
在这夏日的郊游之中，

Povis esti parolado
Kun fraŭlino ripozanta
Post somera promonado!

能有什么来说给她听？
对着一位休闲的姑娘
我怎么能够痛哭失声！

Mia penso kaj turmento,
Kaj doloroj kaj esperoj!
Kiom de mi en silento
Al vi iris jam oferoj!
Kion havis mi plej karan—
La junecon mi ploranta
Metis mem sur la altaron
De la devo ordonanta!

我的磨难，我的思想，
我的痛楚，我的希望！
我曾为你默默奉献
算算该有多大分量！
我最宝贵的青春时光——
义不容辞，不能违抗——
我流着眼泪心甘情愿
奉献在你的祭坛之上。

Fajron sentis mi interne,
Vivi ankaŭ mi deziras, —
Io pelas min eterne,
Se mi al gajuloj iras...
Se ne plaĉas al la sorto
Mia peno kaj laboro—
Venu tuj al mi la morto,
En espero— sen doloro!

我的心中烈火不熄，
我也愿享人生乐趣。
然而假若我要欢乐，
它便总是把我阻拒。
我的奋斗，我的努力
倘若不合你的心意，
不如让我怀着希望
毫无痛苦地静静死去！

《Ho Mia Kor'》 只有短短的八行，读起来却铿锵有声，扣人心弦：

HO, MIA KOR'

啊，我的心

Ho, mia kor', ne batu maltrankvile,
El mia brusto nun ne saltu for!
Jam teni min ne povas mi facile,
Ho, mia kor'!

啊，我的心儿，你不要慌乱地跳动，
你不要跳出我的胸膛！
我已经觉得难以支撑，
啊，我的心儿！

Ho, mia kor'! Post longa laborado
Ĉu mi ne venkos en decida hor'!
Sufiĉe! trankviliĝu de l' batado,
Ho, mia kor'!

啊，我的心儿！经过了长期的劳动
难道在决定的时刻我却不能成功！
够了！不要再不安地 跳动，
啊，我的心儿！

两首小诗真实地揭示了柴门霍夫博士为自己的国际辅助语理想，长时期默默奉献，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希望渺茫，又经常遭受冷嘲热讽，被人误解，在好不容易用妻子的陪嫁出版他的《世界语第一书》时，他无法掩饰自己激动万分的心情。两首小诗，虽然非珠非玉，然而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除了这两首小诗，在《第一书》里还发表了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一首小诗的世界语译文《En Nord' Unu Pino》（《北方有孤松》）。

EN NORD' UNU PINO...

En nord' unu pino en solo
Dormetas sur nuda altaĵo;
Glacia kaj neĝa tavolo
Ĝin kovras per tomba tolaĵo.
Ĝi songas, ke palmo gracia,
En unu dezert' orienta,
Eterne pri lando alia
Malgaje spiras silenta.

北方有孤松

北方有孤松，
假寐在秃岗。
冰雪一层层，
尸布一个样。
孤松梦棕榈，
婷婷立东方，
默默寄思念，
永远在他乡。

柴门霍夫要选译这首小诗，是因为它说出了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类彼此关怀思念之情。这正是柴门霍夫奉献青春年华，不惜牺牲一切创造国际辅助语，以求得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友谊与和平的情感。

这三首小诗在格律形式上，表现了世界语的灵活，也表现了它声音的优美，使人们一眼便可以看出，它是十分适合吟诗作赋的语言。可以说这就是世界语文学的开端。世界语的文学是和世界语本身同时诞生的。这在世界语言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2. 世界语创始者柴门霍夫对于文学的重视

在《世界语第一书》发表之后，柴门霍夫博士又发表了《希望》、《路》、《绿帜下的祈祷》等诗篇，他用自己的肺腑之声鼓舞自己最早的追随者，朋友和同志。《希望》还由一位法国音乐家谱了曲，听起来有些像《马赛曲》和《国际歌》，成了世界语者的颂歌，在世界语者的集会上，随时可以听到这首颂歌。它鼓舞着千千万万为国际语理想而奋斗的人们。柴门霍夫的另一首诗《路》也成了世界语者传唱不衰的歌曲。

柴门霍夫不仅重视世界语文学创作，他还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翻译，认为翻译能够使世界语更加完善。他建议人们选译重要的文学作品，要非常忠实于原作，在困难问题面前决不退缩。这会丰富完善世界语本身。柴门霍夫先后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如：英国狄更斯的《生活的战斗》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德国歌德的《依菲格尼在陶里多》和席勒的《强盗》，法国莫里哀的《乔治旦丁》，俄国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波兰女作家奥尔采斯珂的《玛尔达》以及《安徒生童话》，此外还有《圣经·旧约》等等。柴门霍夫博士的演讲和大量书信、论文，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的文字非常清晰明快，富有逻辑性，给世界语的国际文风树立了典范。

(二) 世界语作为文学语言的优越性

1. 世界语构词巧妙

文学语言必须有丰富的词汇，才能表现世界上千差万别复杂多样的事物、人类的丰富情感、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而词汇数量的巨大却为语言的学习带来困难。让世界语成为既简单易学，而又富于表现力，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世界语运用灵活巧妙的构词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世界语的各类词根，可以通过变换词尾自由转换词类。而且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运用由词缀加词根派生的方法和用词根加词根合成的方法构成新词。

通过这种构词法，用一个词根就能造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词儿来。这是民族语做不到的。

在伦敦大学执教的国际法教授 I.拉派纳 (Ivo Lapenna) 博士说, 他翻译苏联的国际法著作, 有时在英文里找不出相对应的术语。世界语翻译遇到这种情况, 造个新词就行了。

民族语的词语的用法是约定俗成的, 一般只能靠死背硬记来学习。世界语的词语则可以通过合乎逻辑的, 有规律的转化来使用。以汉语的为例, 如“脚”是走路用的, 我们不能说“我‘脚’到公园”, 必须说“我‘步行’到公园”。世界语词儿的转化使用通通按照一个逻辑, 一个规律, 没有例外。Piedo 是名词“脚”, piedi 是“用脚走, 步行”。okulo 是“眼”, okuli 是动词, 表示“用眼看, 瞧”。从这些例子, 我们不难看出世界语的构词是如何自由灵活。

2. 世界语的语序灵活

世界上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表达习惯和不同的语序。例如日语就习惯用倒装的句型, 把宾语放在动词前面, 把主语放在动词后面。把“父亲写信”说成“信写父亲”。世界语有宾格词尾“n”表示宾语, 所以它的句式非常灵活。例如: “父亲 (patro) 写 (skribas) 信 (leteron)”这句话, 不论怎样颠倒主语、谓语和宾语的位置, 意思总是清楚明白的。有了这种灵活性, 世界语就能够吸收不同民族语的各种句式, 反映不同的文字风格。这种句式的自由, 运用在诗歌的写作和翻译上, 便可以获得多种谐韵的形式。

3. 世界语的词语有较大的宽容度

世界语不属于某个民族, 在文化和历史传统上是中立的, 它的词语有较大的宽容度, 可以根据需要表现东方或西方的事物。以 sinjoro 这个词为例, 它既可以表示君、相公、老公、老爷, 也可以表示先生、主人、主(耶苏), 是一个通用的尊称。确凿的词义是由不同的上下文来决定的。根据不同的上下文, 人们不难分辨出它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意义。

4. 世界语的发音悦耳动听

世界语绝大多数词儿(包括名词、形容词、副词、原形动词)都以元音结尾, 读音明快响亮, 富于音乐性, 这和汉语、意大利语相似。在文学作品, 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和翻译上, 这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作为文学语言的世界语十分悦耳动听。

(三) 世界语文学的成就

由于各国世界语者对于文学创作和翻译的重视, 在过去的 110 多年里, 世界语的文学已经拥有 15000 多种作品, 不仅有《圣经》、《古兰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世界名著的世界语译本, 还有许多小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各国的文学作品选集就多达 60 多种。世界语的原文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长篇小说就有 100 多部, 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更是多如牛毛。

在论述世界语文学的成就时, 有人把它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3 个时期。这个分法比较笼统, 但便于叙述。根据这 3 个时期的特点, 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 萌芽时期, 成长时期, 成熟时期。

1. 萌芽时期（1887—1921）

这一时期应该包括 1887 年《世界语第一书》问世前，柴门霍夫博士的世界语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在这个时期，世界语作家、翻译家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向公众证明：世界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塑性，同自然语一样，它完全能够满足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需要。

活动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人物全在欧洲，而且大都在斯拉夫国家。为首的当然是柴门霍夫博士。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在本章第一节作了论述。

与柴门霍夫博士第一个用世界语进行会话的波兰工程师格拉波夫斯基，通晓 30 种语言，创作了《黎明》等著名诗篇，并翻译了波兰伟大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的长篇叙事诗《塔杜须先生》，波兰作家斯罗瓦茨基的诗剧《玛则帕》、《在瑞士》、《瘟疫之父》以及歌剧《哈尔卡》，普希金的《暴风雪》，歌德的《兄弟姐妹》，普鲁士的《童年的过失》，编译了《各国诗歌选集》及其续编《拾遗》。他译的《哈尔卡》曾在世界语大会成功地演出，《塔杜须先生》一版再版。他的《各国诗歌选》的作品译自 30 种语言。在诗词格律和诗的语言运用方面，他大胆创新，给世界语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世界语诗歌之父。

波兰眼科专家卡贝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的主要译著是普鲁士的 3 卷长篇名著《法老王》，其他译作还有波兰作家谢罗邹斯基的中篇小说《苦海》、《格林童话选》、《波兰文选》、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屠格涅夫散文诗》、波兰女作家奥尔采斯珂的中篇小说《中断了的琴弦》和《国际文选》。他通晓多达 30 种语言，1906 年当选国际世界语研究院副主席。他的文字被视为世界语散文风格的典范。世界语作家罗赛蒂评论他的风格时说：“卡贝的译文清澈无暇，象原著一样地流畅。他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技巧，在晓畅的文字里不论何处都不会使人感到翻译力不从心。”

这一时期第四位重要的世界语文学家是德夫亚特宁。他从俄文和德文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他的著作有诗集《不情愿的杀手》、喜剧《结婚》、《未完成的剧本》、《哑语老师》和《世界语讽刺诗初集》等。他还翻译了莱蒙托夫的《天使与恶魔》，普希金的《波里斯·戈都诺夫》、《波尔塔瓦》、《露丝兰和路德米拉》。他的四卷文集于 1911 年出齐。他是早期最出色的诗人，善于用朴素无华的文字，平淡无奇的音韵，写出感人肺腑的诗篇。

除了以上四人，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约瑟夫·瓦斯纽斯基。他创作的小说《在砖厂》获得了第 1 届文学竞赛奖。柴门霍夫的弟弟 F 柴门霍夫出过两本诗集：《人的痛苦》和《菲仔作品集》。安东尼·考夫曼也是最有才华的世界语诗人。他翻译了不少世界名著，如：拜伦的《该隐》，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部分），歌德的《浮士德》（部分）。

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还有瑞士的普里瓦博士。他在童年时期便学习了世界语，16 岁便徒步由瑞士走到法国参加了第 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发表演讲。他的著作有《伴着欧洲的心》、诗剧《吉尼芙拉》、诗集《寂静集》。他是历史学家，发表了《柴门霍夫传》和《世界语史》上下卷。他的文风优美。《柴门霍夫传》深受读者欢迎，他为初学者写的故事《卡尔》在 20 年前就已重印 18 次。他到 60 年代仍然十分活跃，出版了《先辈的冒险故事》和《甘地的生平》。

捷克牙科医生叔尔霍夫创作了诗集：《以希望对绝望》、《生的赐予》、《秋天的花朵》，编译了捷克诗歌选《波希米亚的石榴》。俄罗斯人密尔斯基翻译出版了莱蒙托夫等人的《新诗集》和原作诗集《荆棘的爱抚》。立陶宛人东卜罗夫斯基出版了两个诗集和《大题小想》。

在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小说家当推法国的 H. 瓦连。他不仅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还创作了最早的两部世界语长篇小说《普莱朗格城堡》和《难道是他？》。这两部情节曲折的爱情和侦探故事，深受世界语者的钟爱。英籍德国人亨利·吕肯也是一位多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保罗·德本汉》、《奇妙的爱情》、《奇怪的遗产》、《因为伊史塔尔》等。在《因为伊史塔尔》这部小说里，他讲述了古巴比伦善与恶的斗争。英国斯泰勒写了散文集《山中》。莫忒特写

了中篇小说《三个英国人在外国》和《可怜的克兰》。英国人塔古洛写了长篇小说《新的感觉》，讲述火星上的理想的社会，他宣传裁减军备和社会主义。

俄国也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世界语小说家。席里亚耶夫翻译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左夫兄弟》等长篇小说，还出版了《七个故事》、《吉普赛女人》、《过魔地》、《深刻的印象》、《该隐的罪孽》、《火车上及其他》。沙哈罗夫发表有《太大的野心》，席德罗夫斯卡娅创作不多，但翻译了 100 多部作品，有 9 种出了单行本，包括托尔斯泰的《塞来布连尼王爷》，柯洛连珂的小说《玛卡罗的梦》和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

值得一提的还有芬兰作家诺尔登斯万的《世界语散文集》，英国作家夏普的自传体小说《R S 的经历》，法国女作家弗劳伦思的喜剧《半聋》、《悍女订婚记》，短篇小说集《不倦的奉献》和《明日妇女》，法国森提思的小说《蓝刺蓟》、《熊》，梅耶除了写短篇小说还翻译了莫里哀的《铿吝人》，梅里美的《卡门》等，美国的 L.文德尔翻译了米歇尔的科幻小说《最后的美国人》，也创作了《在午夜的阳光下》、《七笑美洲的幽默》等。

这一时期的原著文学作品，诗歌占了较大的比例，而且比散文的水平要高。它们的重要话题是世界语、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世界语运动、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友谊、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合作。这对于世界语的推广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早期的世界语口语还不发达，很少有戏剧原作。小说比起戏剧来情况要好得多，但也还没有出现十分成功的作品。然而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翻译文学作品，有的水平很高，证明世界语能够满足文学翻译的需要。

2. 成长时期（1922——1945）

我们把 1922 年作为这一时期的开始，因为这一年创办了大型世界语文艺杂志《文学世界》（《Literatura Mondo》）。两位主编尤里·巴基和卡尔曼·卡洛柴都是匈牙利人，他们创建了布达佩斯学派，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世界语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文学世界社还出版了许多文学书籍，对于世界语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影响延续到了二战以后。这一时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人数多，作品多，只能摘其要者，加以介绍。

在这个时期中，有一些在前一时期就已经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人物，象普里瓦、席里亚耶夫等仍然在继续活动。而《文学世界》的巴基和卡洛柴则是闪耀在世界语文坛的双星。

巴基出身于匈牙利的戏剧世家，他自己也是演员。1911 年他接触了世界语，深为它的内在理想所感动，成了一名十分热心的世界语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戏剧生涯。他参军打仗，做了俘虏，在西伯利亚苦度了六个春秋。他在俘虏营里进行了大量的世界语活动，教各国战俘学习世界语。战后他回到匈牙利，成了世界语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进行世界语教学，创建世界语团体，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演出，为各地的世界语刊物撰稿，做了《文学世界》的主编之一。他的信条是：“爱产生和平，和平保持人性，人性是最高理想”。他的最早的诗歌源于俄国的俘虏生活。1922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个诗集《阅历人生》。在这本诗集里，诗人含着眼泪诉说个人的遭遇，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表现对受苦人的同情，对沙皇的压迫的抗议。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世界语诗歌的道路。读者为他的诗的语言、音韵、形象，乃至内容和形式的谐和一致感到惊奇、着迷。1926 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朝圣》，1933 年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流浪者之歌》，1956 年他的代表作诗剧《苹果树下的梦》问世。在这部作品里诗人通过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探讨了许多人类共同的问题，特别是青年一代所面临的问题。1966 年出版了《彩虹》。这是一部用韵文形式写成的故事集。巴基选了 12 个国家的 12 篇神话传说（包括中国的牛郎织女），用动听的音乐语言讲给读者。1970 年在他去世以后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诗集《秋叶集》。巴基是诗人，也是出色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了 13 种语言。有 3

部小说译成了中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牺牲者》1925年问世。它描述了作者在西伯利亚俘虏营中经历的悲惨生活。第二部长篇小说《血染大地》是前者的续篇，发表于1933年。在他的小说出版之后，读者以及评论家都说：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语的长篇小说的代表作。1930年他写了社会讽刺小说《万岁！》和它的续篇《希望之岛》。《万岁！》用幽默讽刺的文笔使人思考人的尊严和人在集体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了各种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作品的文风具有现代气息，创新使用了大量表现方法。1931年发表了他的中篇爱情小说《秋天里的春天》。1937年发表了他另一部关于西伯利亚俘虏生活的小说《绿心》，和专门为初学世界语的人而写的故事《尼奈和卡特茵》。巴基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1927年出版了《跳吧，傀儡们！》。作家把人视为命运恶魔手上的傀儡，生活环境在捉弄人。它成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60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色彩》。巴基还写了一些剧本。除了上面提到的《苹果树下的梦》，还有《面具舞会》戏剧集，《毫无二致》、《荷兰洋娃娃》等等。

布达佩斯学派的另一根台柱子——卡尔曼·卡洛柴博士，是布达佩斯医院的外科主任。他和巴基生于同年并于同一年参加了世界语运动。对于世界语，卡洛柴比巴基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的原文创作活动主要是诗歌。他在世界语刊物发表了许多诗篇，出版了《世界和心》、《紧张的琴弦》、《诗的肖像》，《孤立》、《伊索的智慧》等诗集。《紧张的琴弦》问世时，文学评论家妥彻先生写道：“仅仅为了读这部诗集，我们学习世界语也是值得的。这部诗集给我们的文学开拓了新的天地：业余文学创作的时代终于成了历史...”他的诗作不仅采用了欧洲传统诗歌的多种形式，而且在它们的基础上根据世界语和诗的内容特点创造了新的形式，给后来世界语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他的诗歌非常注意形式的完美，讲究格律声韵。

卡洛柴更是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和格拉波夫斯基、卡贝一样通晓多种语言。他的翻译作品有小说《两只瓢虫》、民歌集《歌唱的乡村》、剧本《明天早晨》、裴多菲的叙事长诗《勇敢的约翰》、匈牙利作家马达的杰作《人的悲剧》、《永恒的花环》（这是从24种语言翻译出来的诗歌选集，其中还有李白的作品）、歌德诗选《罗马哀歌和日记》、与人合译了《匈牙利文学作品选集》、裴多菲诗选《自由与爱情》、但丁《神曲》的《地狱》篇、《艺术史》、《阿纳德传》、小说《罗西尼亚》、与法国G·瓦凌坚教授合译了波德莱儿的诗集《恶之花》和《海涅诗选》。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仲夏夜之梦》、《暴风雨》。世界语作家考克评论说：“这好象是莎士比亚自己用世界语写的诗剧。”在他逝世之后，1981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世界乐府》（译自30种文字的诗集）。

卡洛柴还在世界语学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世界语学论文集《语言，风格，形式》、《世界语诗艺指南》（与瓦凌坚合著）、《世界语语法大全》（与瓦凌坚合著，后来经过增订，改名为《世界语分析语法大全》）、《世界语百科全书》。

席拉基出生于匈牙利，在瑞典创办了世界语杂志《北方棱镜》并担任主编。1931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童话海洋的彼岸》，编辑出版了五卷世界语文选，参加了《匈牙利文学作品选集》的编译，翻译了《古匈牙利的绘画艺术》、《匈牙利短篇小说集》和《瑞典短篇小说选》，还著有短篇小说集《大冒险》、《南北之间》和《鸡鸣》，1958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小小奥秘》。席拉基对于世界发生的事物进行冷静的观察，他的文笔表现出求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爱沙尼亚的世界语女诗人H·德莱森是《文学世界》、《尼斯文艺》、《北方棱镜》等杂志的撰稿人。她从爱沙尼亚文、俄文和德文翻译过许多诗歌。她翻译的作品有M·文德的《诗选》、诗集《地平线》、《爱沙尼亚文学作品选集》、《卡楼坡格》、《爱沙尼亚苏维埃诗歌选》、《它飞向蜂巢》，与他人合译的《爱沙尼亚歌集》、《沉船记》、《东欧之光》，1967年出版了她的世界语诗集《北方大自然》。她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女诗人。她热爱北方的大自然，诗歌充满激情，有时带有一点忧郁。她的同乡H·亚当森著有小说《奥里》，世

界语诗集《黄昏之歌》。

法国幽默讽刺作家 R.史瓦茨因为他的幽默文风而在世界语文坛占有特殊的席位。1912年他在《世界希望》杂志发表了他的韵文，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创办了巴黎的世界语俱乐部《绿猫》，先后出版了三个诗集：《绿猫的遗嘱》、《奇异的商店》、《快乐的讲坛》。它们以幽默机智的文字表现了他对于政治生活和世界语运动的观察。1928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微笑的散文》，1930年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安尼和梦特玛特》，1963年出版了自传性的长篇小说《逝者如斯夫》，1971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小说五十年》。此外他还写过许多滑稽独幕剧本和供世界语俱乐部表演的文艺节目。1933至1935年他主编的世界语杂志《海盗》颇负盛名。他非常喜欢文字游戏，就是在讨论严肃的问题时，也常说俏皮话。

N.库尔霁斯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著有诗集《我的棱镜》。聂威尔翻译过不少英国诗歌。他重译的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更加忠实。他与司徒默翻译了坎宁汉的《常去的船只》，著有短篇小说集《酒钱》。司徒默翻译了布罗福斯的长篇小说《火星的公主》，著有短篇小说集《倘若一个小小的谷粒》和《为了书评...!》，创作了剧本《人道主义的工作》，散文集《实用世界语者的札记》，他最好的短篇小说《陌生的孩子》生动地描绘了作者所熟悉的英国寄宿学校。他善于进行心理分析，他的小说多愁善感有自然主义倾向。他的文字新鲜大胆。

波兰作家费特凯是一位职业作家，著有中篇小说《深渊》、《跳越数千年》、《多德先生买了千只眼》、《绿色的火箭》和讽刺小说集《我的绿色经书》。他的文笔清新活泼，善于心理描写。侦探小说《多德先生买了千只眼》以它荡人心魄的现代生活故事，达到了这种小说的较高层次。它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他的作品对一些青年作家有较大的影响。

瑞典作家 S.恩格霍姆著有长篇小说《激流》、《大地生民》、《生活在召唤》。与他人共同编译了《瑞典文学作品选集》。他是擅长心理刻画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家。1945年他在瑞典出版《小小杂志》，一直出到1952年，成了当时联系世界语作家的纽带。

德国世界语活动家泰奥·庸是著名世界语周刊《世界语先驱报》的创办人。他的著作有长篇叙事诗《爱的高歌》，诗集《投入战斗!》、《祈祷》，长篇小说《幻想的国度》，翻译了德国古代史诗《古德龙》。他的文字严谨，风格高雅。另一位德国作家巴特麦斯著有小说《小鬼们》、《青年的热情》、《保育院》和短篇小说集《不再是游戏及其他》。他也写过一些诗歌。他的主要成就是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出过两版。以后又有新译本。）

圣米兰·阿窿索著有《小说诗歌集》、《沉船》、《我的诗歌》。J.M.罗森挪恩于著有《诗集》、《阿麦丽亚和玛丽娜》。朋普尔擅长诗歌翻译。他的译品一部分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作品选集》，另有译诗集《花环》和长篇叙事诗《沙皇夫拉第米尔的洗礼》。人们对这部长诗的世界语译文评价很高，认为完全可以和原著媲美。

日本世界语学者小坂狷二翻译了一些日本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收入《东方珠玑》、《东方花圃》。日本的伊东三郎的诗歌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和《绿叶集》中。他的作品以自然的冥想为特点。日本作家西村正雄著有诗集《火绒草》。他的作品表现了日本诗歌特有的风格。

匈牙利律师史瓦茨是《文学世界》杂志的创建人。1923年出版了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俘虏生活的《现代的鲁宾逊》，1965年出版了他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如何逃脱法西斯迫害的故事《与死神跳蒙面舞》。克罗地亚作家罗特克维奇以形象生动的文字风格引人注目，他翻译的 M. Jelušić 的长篇小说《凯撒》对于有些作家的文风有着较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无产阶级学派的出现。在革命诗人之中当首推 E.米哈尔斯基。1917年创办了文学杂志《自由奔流》。他的第一个诗集《第一个浪花》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技巧。他的诗集还有《诗二首》、《序幕》、《火疗》、《爱情与思恋之歌》。他的重要作品的原稿遗失了很多，仅在1934—1935期间写的《人的改造》就有五千多行。他的诗篇充满破旧立新的激情。尼古拉·霍洛夫翻译过《十字架》、A.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苏维埃的第

一部轧钢机》、《美丽的周》等俄国作品，也翻译过英国和南斯拉夫人的作品。他写过剧本《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联络员》，著有诗集《潮》。他的诗歌和巴基、卡洛柴的作品一样使读者惊奇。苏联作家 V.瓦兰琴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作家中之佼佼者。他是西洋史讲师、莫斯科外语教育学院的主任、苏联世界语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世界语语言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斯大林肃反大灾难中被捕。他的长篇小说《地铁》以两条主线描述了莫斯科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在柏林战斗着的共产党人。生动的对话和人物的心里描写使作品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它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了民族语文，是第一次大战后的优秀作品之一。

A.格里格罗夫是个工人世界语运动家，作过季米特洛夫的秘书，是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会员，多瑙河流域国家共同出版的世界语杂志《国际文化》的主编和《今日保加利亚》的主编。作品有诗集《赤色的黎明》、《麦捆》，短篇小说集《颂歌》。1950年与 A.拉克夫合作编译出版了保加利亚诗集《风暴》，1980年出版了他的原作和翻译诗集《保卫和平！》。

匈牙利工人世界语运动领导人之一恩芭著有诗集《预言家》、《流放》、《流放和避难》和中篇小说《玛丽亚和她的世界语小组》。他以充满苦涩的现实主义文笔描述了工人的生活。

奥地利作家文亨斯特著有中篇小说《塔街四号》、一些诗歌和翻译作品。比利时的白洁斯的短篇小说集《他们》，进行了不同风格的写作尝试。瑞典的无产阶级记者亚当菝著有《苏俄考察纪行》和《在红旗下》，是瑞典最早介绍苏联的书籍。

E.兰梯是全世界超民族协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将世界语用于阶级斗争，发表过《打倒中立主义！》、《论民族主义》等大量的政论性杂文。他还翻译了伏尔泰的长篇小说《老实人》。他的文字简洁明快，常常避免使用非必要的词缀。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是中国最熟悉的一位世界语作家。他于20年代初从日本来到中国，与鲁迅先生住在一起。他的著作有诗文集《一个孤独灵魂的叹息》、童话集《为跌下而造的塔》，《枯叶杂记》、《爱罗先珂故事集》、《光与影》、《狭的笼》、《爱的创伤》等。爱罗先珂的文字十分朴素而富有激情。1923年他在德国纽伦堡召开的第1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朗诵了自己的诗歌《吉普赛女人的预言》，荣获一等奖。

在这个时期，世界语文学已经成长起来，产生了可以和民族文学相媲美的世界语原著诗歌、小说，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作家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也更加广泛了。原著作品的主要的思潮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翻译作品方面对此也有反映：雷马克的著名小说《西线无战事》和《退路》都有世界语译本。在翻译文学方面世界语还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有一批优秀的、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通过世界语被译成了各种外国文字。

3. 成熟时期（1946到现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语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布达佩斯学派的卡洛柴、巴基等作家仍在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而且有了更高的成就。然而作为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苏格兰学派的出现。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奥尔德、丁伍迪、佛兰齐斯、罗塞蒂等都是吸吮《文学世界》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而1949年奥尔德主编的《苏格兰世界语》对于这个学派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1952年西班牙的 R.佩雷斯教授创建了他的《接力》世界语出版社，来接替《文学世界》。就在这一年出版了著名的诗集《四人集》。围绕着四位诗人建立的苏格兰学派，在战后的世界语文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成就最大的应当推奥尔德。1998年，世界语文艺界建议提名他做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

威廉·奥尔德在第2次大战期间曾参加英国空军与德国法西斯作战。1937年他学习了世界语，后来成为《苏格兰世界语》、《世界语》、《世界文化》、《北方棱镜》、《不列颠世界语者》、《泉》等世界语杂志的编辑，曾任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主席（1977—1980），国际世界语研究院主席（1979—1983）。他翻译了《鲸鱼牙》，在《四人集》中发表了诗集《激

情的呼吸》，1956年发表了她的代表作长诗《幼稚的人类》，1957年编译出版了《英国文选》诗歌部分，1958年编辑出版了《世界语诗选》，1960年发表了诗集《独指弹奏的曲调》，1969年发表了诗集《幽默集》，1973年与希尔合译出版了民歌集《无比的花朵》和《我的歌唱的小鸟》，1976年发表了散文集《世界语面面观》，1976年发表了《诗信集》，1977年与他人合译《彭斯诗歌讽刺文集》，1977年编辑了《二十五年》，1977年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主显节》，1977年翻译出版了《恐怖夜城》，1978年发表了诗集《绿色生活片断》，1978年与他人合作编译了《苏格兰文选》，1979年翻译出版了拜伦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唐璜》，1979年发表了《世界语原文文学创作导论》，1979年与倪尔森合译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亨利·马尔丁森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阿尼阿罗》，1980年翻译出版了《鲁拜集》，1981年发表了文学评论集《真实、趣味、风格》，同年还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984年出版了他编辑增订的《世界语诗选》，1991年编辑出版了《世界语新文选》，1997年出版了文集《拾穗》。他还翻译了傅莱的诗剧《过于平常的凤凰》。奥尔德是一位进步的无神论者。他激烈地谴责战争，主张正义，对于自由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有若干首诗是写给工人的，表现了对于他们的艰难遭遇的关注。他的代表作《幼稚的人类》于1958年由《接力》出版社出版。匈牙利作家本契克认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语文学原著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世界文坛上其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1968年印行了第2版，1980年在德国印行了第3版。它以最新的叙事诗的形式纵观宇宙和人类的历史，指出人类只是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主宰。诗人最尖锐地抨击教会，认为它阻碍人类觉醒。他认为人类还很幼稚，用残酷的战争破坏文明，威胁自身的存在。但诗人相信人的头脑会使问题得到解决。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

苏格兰学派另一位诗人弗兰齐斯著有叙事诗《宇宙》、短篇小说集《五彩窗》、长篇小说《大锅炉》、科幻小说《未完成的使命》。《宇宙》共五章，描述世界的诞生、生活、灭亡和恢复混沌时期。他的诗歌也带有奥尔德的批评精神，但不象他那样激烈。小说《大锅炉》以近600页的篇幅，描写了苏格兰两家亲戚在战争中的遭遇。弗兰齐斯很会讲故事，写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常常带有讥讽的口吻。

苏格兰学派的另一位成员罗塞蒂教授曾任国际世界语协会机关刊《世界语》的编辑，并与《文学世界》等杂志合作。他多年主持国际世界语协会一年一度的文学竞赛活动。著有诗集《绿洲》、《削尖的铅笔》、短篇小说集《袖里》，参加了《英国文选》散文部分的编译工作，成功地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奥塞罗》，与席拉基合编了《世界语原作短篇小说选》，与他人合作编译《彭斯诗歌及讽刺散文集》，与亨利·瓦特莱合作编辑出版了948页的大型世界语散文选集《宝库》。他的文字活泼流畅，喜欢用讥讽的笔调。他的哥哥恺撒·罗塞蒂因为一部自转体的长篇小说《太太，请相信我！》而出了名。该书一版再版，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他以生动活泼的文笔描绘了小商小贩和小丑们的群像，以及商场的氛围。他也可以算是苏格兰学派的一分子。

丁伍迪曾为《文学世界》撰稿，翻译过不少苏格兰诗歌，参加了《英国文选》和《苏格兰文选》的编译工作，他的诗集有《幻想的城堡》。他的抒情诗富有音乐美，或歌颂淳朴的爱情，或抒发对社会不幸者的同情。

英国女作家布尔顿博士也是一位职业作家，1949年她学了世界语，先后出版了27部作品。著有世界语诗集《女低音》、诗集《四只脚的同伴》、《欢歌百首》、《涓滴》、独幕剧和散文集《在国境线上》、《世界语创造者柴门霍夫》、散文集《十二只小脚丫》、喜剧集《我们演戏》、短篇小说集《眼睛》，与奥尔德合著《诗信集》。1984年她编写了世界语高级读本《事实与幻想》。布尔顿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道主义作家，她的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都表现了与人为善和宽容谦让的精神。由于她卓越的文学成就，1998年她获得了德国FAME奖。

在布达佩斯学派和苏格兰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克拉克是新西兰人，教师。他的主要著作是《诗歌往何处去？》一书。在书中举例说明了他对于世界语诗词格律的见解。他的诗歌形式考究，内容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南非作家考克也是一位教师。他不仅用世界语而且还用英语和南非荷兰语写作。他的诗歌有的被收入《世界语诗选》，著有诗集《第四空间的影子》、《我的舌头上的火》、《五行集》和《诗歌散文集》。丹麦教师陶尔森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不属于哪一个学派。他的抒情诗机智幽默，常带讽刺口吻。著有《打破重重黑暗》、《小小文学作品选》、诗集《玫瑰与荨麻》、《没有降落伞》、翻译的讽刺诗集《格鲁克》。与人合作编译了《丹麦文学作品选集》。

巴西的马托斯教授用葡萄牙文写过 100 多部作品，1998 年当选国际世界语研究院主席。他的世界语作品有十多部。他的诗歌和小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于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作品有长诗《青年的诱惑》，五幕诗剧《伊凡六世》，小说《黑斯巴达克》，诗集《短歌集》、《琴弓集》、《生活的节奏》，十四行诗集《内玛集》和《崇拜集》等。

捷克也有一批世界语作家。朋普尔和卢卡史在第二次大战前就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战后仍然活跃在文坛上。皮驰在第二次大战后为多种世界语杂志撰稿。1981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里托米史拉墓地》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随后又发表了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昌布莱的丧钟》和《嚼舌头的地方》。它们可以说是个三部曲。实际上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他便写了八部手稿：散文集《天大的迷信》，诗集《向格奥尔基诺呐喊》、《千弦琴》、《别了，诗歌！》、《陶醉的爵士乐鼓》、《绿色的夏天》、《年历》和《那边的童话》。这些手稿有 1500 多页。1995 年出版了他的世界语学论文集《世界语的内在生命》。他不仅是一位多产作家，而且立意创新，引进了大量的新词。他的幽默打油诗颇像法国史瓦茨的作品。捷克作曲家伍尔班教授和他的妻子伍尔班诺娃也是捷克世界语文坛的活跃分子。伍尔班教授为不少布达佩斯和苏格兰世界语诗人的作品谱了曲，还发表了诗集《新伊索寓言》。伍尔班诺娃著有诗集《三色》、《地下泉》。科里奈克创作了不少诗篇，著有诗集《琉璃片》，翻译了塞非尔特的诗集《妈妈》，与他人合译《彼德·白足弛》和《西里西亚之歌》。科尼查是一位斯洛伐克记者，在 52 个报刊上发表过 300 多篇关于世界语的文章。和匈牙利国籍的夫人合著小说《哭着播种的人》获得了 1980 年史瓦茨文学奖。他还著有小说《再见吧，库兹科！》、散文集《冥想集》和《卡美纽斯与国际语》。冰岛诗人拉格那尔森有 9 部用冰岛文发表的著作，为《冰岛之声》、《北方棱镜》等杂志创作并翻译了一些诗歌。用世界语著有诗集《无名的阶梯》、《探索》，翻译了冰岛现代诗人汉利的诗集《僵星》和《古老的冰岛之声》。他的自由体无韵诗歌是直观的，五光十色，爱用比喻，富于想象。一批老作家认为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瑞士翻译家皮隆是联合国世界语俱乐部主席。著有诗集《与人为善》，侦探小说《你做中国菜吗？》、《他刹车到位吗？》、《他来自太空？》、《我们的会白开了？》、《让她死于车祸？》、《他们捉到了爱尔簪》等。他是一位热心于世界语教学的作家。他的侦探小说文笔流畅，情节紧张，扣人心弦，是学习语言的好读物。《他们捉到了爱尔簪》是特地为中级学员创作的课外读物，很受欢迎。他还发表过许多论述世界语问题的文章。挪威作家罗斯巴赫著有短篇小说集《琐事》、《人与河》、《奇妙的甘露》、《迪斯科号》和长篇小说《绿袍》、《命定的未婚夫》和《单手》，散文集《震颤的时刻》。他的文字朴素、亲切、流畅，深为读者喜爱。在文学语言的教育方面贡献不小。丹麦籍克罗地亚女作家黑德 1970 年发表了描述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我们这些人》，1971 年发表了剧本《我们在做戏》，以后又发表了好几部小说。

里比拉尔德是一位法国上校军官。他的《游荡在棕榈树下》以幽默的笔墨描述了他西撒哈拉大沙漠的八次漫游。另外一本《穆骚德师父的生活和见解》用一头具有哲学头脑的驴子的幻想故事和诗一般的优美文字，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风情，被翻译成爱沙尼亚文。他的优美如诗的文字，幻想与事实的错综交织，再加上他独特的风格，使他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文

学价值。

匈牙利机械工程师扎特马里成功地创作了《卡左西尼之旅》、《机器世界》等 30 部科幻小说。早在 30 年代他就预见了许多科技发明，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如，智能电脑会不会对人类造成某种威胁，与人类抗衡？奥尔德认为“他可以和世界著名讽刺小说作家斯维夫特、威尔斯、佛朗斯、玛达、卡灵西相媲美。”尼迈里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小说家，十几岁便开始给报刊投稿。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从机械制造工人到书店售货员，从救生艇驾驶员到土地测量员，从士兵到大使馆翻译，干了十多种行当。1981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个世界语短篇小说集《第九频道》。从 1982 到 1992 连续出版了他的 12 部长篇小说：《封闭的城市》、《花岗石的道路》、《盲鸟》、《发烧》、《山》、《深水》、《寻梦》、《苔拉》、《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生的危险》、《你只能死两回》、《长夜漫漫》。他的题材十分广泛，从缉拿法西斯逃犯到爱情故事，从民族问题到安乐死问题，无所不谈。他曾经说过，每年他要创作一部世界语小说。

当代最杰出的日本世界语作家应推宫本正男。他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日本文学作品，而且用世界语创作了多部诗歌和散文著作，并为搜集、整理、出版绿川英子和爱罗先珂的文集做了大量工作。他翻译了诗集《心之歌》、《森鸥外短篇小说集》、《原子弹的孩子们》、《顽强》、《日本古代小说集》、《日本文学作品选集》、《日本杂文集》、《五个爱河的女子》、《万叶集选译》、《日本现代诗选》、《和歌选集》和井上靖的小说《楼兰》。世界语作品有《简易读物》、短篇小说集《艺术与死亡》（有葡萄牙文译本），诗集《随想曲》、《请品尝日本式的诗歌》、长篇小说《生于废墟的人》和散文集《讽刺与热情》。

这个时期出版的翻译文艺作品数量更多，质量更好。例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暴风雨》、《仲夏夜之梦》、《李尔王》等有了更好的新译本。《堂吉珂德》出版了有精美插图的全译本，《浮士德》出了新的全译本，世界名著《鲁拜集》出版了两个译本，水平都很高，但丁的《神曲》出版了有精美插图的意大利原文与世界语对照的版本，而且在文学月刊《泉》上又有新的译本连续发表。葡萄牙的著名史诗《鲁纪的子孙》有了插图精美的世界语全译本。芬兰的著名史诗《卡莱瓦拉》有了出色的世界语译本。苏联解体后出版了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世界语本。

在世界语问世后的一百多年里，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带给世界语文学的困难十分巨大。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对该地区世界语运动的摧残也是毁灭性的。但是，世界语作家和翻译家们的创作活动从未停止。这不仅表现了人们对于国际辅助语的渴求，而且也表现了世界语作为文学语言的魅力。15000 多部文学作品，数量不算多。但是，世界语只有 112 岁，比起有数千年历史的汉文来，她还十分年轻，可是她已经不是稚嫩的语言。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世界语的原文创作广泛地反映了她所处的时代，五光十色，绚丽夺目。再加上它翻译的各国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在世界语的文学里通观人类的历史进程。她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作了忠实的记录。过去的一百年也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新的科技成就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值得人类深刻反省的问题。这在匈牙利作家扎特马里等创作的科幻、讽刺小说里得到了一定反映，从中人们可以得到某种启迪。

在文学创作的品种方面来说，诗歌创作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一点与民族语有些相似。小说的创作在近年有较大的发展。据不完整的统计，1887 至 1993 年出版了 108 部世界语原著长篇小说，其中后 48 年每年出版世界语原著长篇小说的平均数量，为前 58 年的两倍。而且作品的水平也有所提高，题材更广泛，和现时生活贴得更紧。而戏剧、电影、电视剧的创作则显得比较薄弱。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世界语者比较分散，虽然有少数世界语专业和业余剧团，但大都在东欧世界语者集体活动比较多的地区演出，活动不够频繁，当然剧本的创作需求也就不大。大概人们不愿只为阅读而写剧本。二是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需要大量资

金，这对于世界语团体和个人都是难题，所以写电影和电视剧本的人也就不多。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世界语有很大的优越性。民族语的翻译家通常是从并不十分熟悉的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民族语的。即使译者花费很大力气也往往会产生一些对于原作的误解。例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精通法文，可是在翻译福楼拜的《希罗底》时，却把希罗底的女儿误译为男孩子。美国朋友沙博里曾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可是在他翻译的《水浒传》里，却把“上手”误译为“右手”。象这样的翻译错误是屡见不鲜的。世界语的译者，一般是从自己的母语进行翻译的，他们熟悉自己的母语，因而更能够避免误译。世界语翻译文学打破了偏重大语种文学作品翻译的倾向，注意介绍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这就促进了弱小民族文学的传播。据不完全的统计，到60年代就有100多部文学作品，从世界语转译成25种语言。其中也包括译成汉语的文学作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四) 中国世界语者对于世界语文学和文学语言的贡献

1. 翻译和创作

世界语传入中国较晚，再加上世界语对于中国人不像对欧洲人那样容易掌握，中国世界语者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开展得较为迟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文学活动仍然不多。

(1) 世译汉工作

1921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对于中国世界语者的文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们努力介绍西方文化，开启民智。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等大力提倡翻译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但当时很少人懂得小国的语言。王鲁彦、巴金、孙用、胡愈之、周作人、钟宪民、金克木、楼适夷等世界语者，从世界语翻译了不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发表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申报》等报刊杂志上，在翻译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以及俄罗斯等国的文学作品方面，世界语起了桥梁作用。获诺贝尔奖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最早就是通过世界语介绍到我国来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叙事诗《勇敢的约翰》和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代表作《欧根·奥涅金》和小说《上尉的女儿》以及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也都是最早通过世界语翻译成汉语的。这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史上写下了值得称颂的一页。

著名乡土作家王鲁彦先生，从1922年开始从世界语翻译文学作品。1926年出版了他翻译的《犹太小说集》，1927年出版了他翻译的俄国西皮尔雅克的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192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了他从世界语翻译的《显克微支小说集》和他编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选》，1929年翻译出版了中篇小说《失去影子的人》，同年翻译出版了波兰作家先罗什伐斯基的中篇小说《苦海》，1930年翻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1931年翻译了南斯拉夫米耳卡波嘉奇次著长篇小说《忏悔》，1933年翻译了莫里哀的三幕话剧《唐裘安》，1934年翻译了莫里哀的喜剧《乔治·旦丁》。1935年翻译了果戈理的小说《肖像》。

巴金从世界语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小小说、诗歌、戏剧，积极向中国知识界介绍世界语原著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国的文艺作品。1929年，他翻译了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1930年他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和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剧本《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首陀罗人的喷泉》。1931年他翻译了尤里·巴基的中篇世界语小说《秋天里的春天》。1947年从世界语翻译了保加利亚D.奈米洛夫的短篇小说《笑》和罗马尼亚伏奈斯蒂的短篇小说《加斯多尔的死》。1951年翻

译了苏联作家 A.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

周作人等翻译了匈牙利作家约开·玛尔的《匈奴奇士录》和《黄蔷薇》以及荷尔泰、米克沙特和荷尔宰戈等的文学作品。金克木教授翻译了保加利亚作家斯塔玛托夫的小说《海滨别墅与公寓》。1929年，楼适夷通过世界语翻译了短篇作品《桥》，以后他又翻译了 A.托尔斯泰的《但顿之死》，从此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1934年钟宪民先生从世界语翻译了巴基的长篇小说《牺牲者》，波兰女作家奥尔采斯珂的长篇小说《北雁南飞》（原名《Marta》），波兰短篇小说集《波兰的故事》。他还翻译了尤里·巴基的长篇小说《在血地上》以及波兰世界语作家费特凯的原著中篇小说《深渊》。30年代中期周尧先生翻译了荷兰布尔修斯的剧本《虚心的人》。1943年魏荒弩翻译了德国世界语作家泰奥·庸先生的长诗《爱的高歌》和《捷克诗歌选》。陶陶然翻译了《屠格涅夫散文诗选》。1944年春许寿真编辑出版了《世界语诗选》。成都出版的世界语刊物《绿帜》发表了卢剑波从世界语翻译的《海涅诗选》。

孙用先生原来只是一名普通邮务员，在鲁迅先生的鼓励帮助下，从世界语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后来还成了颇有成绩的翻译家。1933年他翻译了《春天的歌及其他》，保加利亚作家瓦佐夫的《过岭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一些抒情诗和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爱沙尼亚的诗集《美丽之歌》，1944年他从世界语翻译了普希金的中篇小说《甲必丹之女儿》（后来多次再版，更名为《上尉的女儿》），这是《上尉的女儿》首次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1945年编译出版了《保加利亚短篇集》。1951年，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了它翻译的《裴多菲诗四十首》。

胡愈之先生也从世界语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1922年他翻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为跌下而造的塔》，后来又翻译了他的《枯叶杂记》，1927年翻译了俄国作家陀罗雪维支的《东方寓言集》，1928年翻译了小说集《星火》（包括东欧和近东国家的20篇作品）。1933年《绿光》杂志还刊载了杨景梅从世界语译的《最后一课》、屠格涅夫的《穷人》。1936年蒋齐生翻译了高尔基的小说《我怎样学习的》，在上海出版过世界语汉语对照本。李奈西于1944年翻译了巴基的散文集《戏篮子》。60年代翻译了科幻小说《机器世界》，1997年重译出版了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汉世对照本。

1950年，出版了万湜思从世界语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也通过世界语首次介绍到中国。天津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劳荣翻译的《裁判》。同年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魏荒弩翻译的《捷克小说选》和《捷克诗歌选》。1951年，出版了劳荣翻译的乌克兰短篇小说集《枞林的喧嚣》。1953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为了和平》。1955年大众出版社出版了杨铁婴和吴火翻译的保加利亚米列夫等人的诗集《九月及其他》。同年出版了杨铁婴译的《艾林·沛林短篇小说选》。195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张闳凡、劳荣合译的捷克作家杨德尔达的反法西斯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防御工事》。同年上海出版社出版了张闳凡翻译的保加利亚康斯坦丁诺夫的小说《甘佑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闳凡译的荷兰作家戴克尔著作的反对原子战争的剧本《行动起来》。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闳凡译的波兰雅斯特隆著的《密茨凯维支评传》。

198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机关刊《世界》杂志出版。在这本杂志里，作为对照读物和欣赏作品也发表了一些从世界语翻译的文学作品，如李奈西翻译的世界语抒情诗和连载的《安娜日记》，李玉萍翻译的《小约翰》，李士俊翻译的短篇小说《摩登童话》、《暴风雨》等20多篇作品。还有许多世界语者从世界语翻译了大批诗歌、散文、小说，发表在各地的报刊杂志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2）汉译世工作

在以世界语为桥梁向国内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中国的世界语者也十分注意向世界介绍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前面我们曾经指出，

早在 1913 年就已经有人尝试用世界语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匈牙利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文学世界》也是早期发表中国文学作品世界语译文的一个刊物。1925 年《文学世界》刊登了三首中国诗歌的译文。其中有一首选自《诗经》，一首题为《扇子》，译者为 Tsan Jo-Su，一首是李白的《神笛》（译者 Stanislavo Zausmer，可能是从外文转译的）。1931 年《文学世界》发表了卡洛柴译的李白的《月下独酌》、《静夜思》、《独坐敬亭山》、《悲来乎》和《秋圃》。

徐声越教授是最早用世界语介绍中国诗歌的中国世界语者。他于 1930 年学习世界语，1933 年开始陆续把一些中国古诗翻译出来，寄给《文学世界》杂志发表。1934 到 1937 年《文学世界》发表了他翻译的徐志摩的诗歌《落叶之歌》、《除夕》、《他怕人说出》和《歌》。1938 年他参加了《中国文学作品选集》的翻译工作，翻译了鲁迅的小说《伤逝》和五四以后的诗歌。但是在那战争的年代，出版工作十分困难，1940 年只在香港由《远东使者》杂志社出版了一本《鲁迅小说选》，其他作品未能实现原定计划。《文学世界》还发表了冯文洛翻译的古代寓言《中山狼》、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和《单四嫂子》，张闳凡翻译的陶行知的诗《农民之歌》。他们都是最早用世界语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成绩卓著的世界语前辈。

1927 年德国《世界语传播者》杂志社出版了钟宪民先生翻译的郭沫若的剧本《王昭君》，更名为《叛逆的女性》。这大概是最早通过世界语介绍到国外去的剧本。1933 年 7 月《绿光》发表了丰子恺的《陋巷》的世译。1933 年该杂志刊载了杨景梅世译的巴金的《复仇》。

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叶君健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从世界语原文小说创作开始的。他在 30 年代初学习了世界语，以后便开始用世界语创作短篇小说《岁暮》、《被遗忘的人们》。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翻译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短篇小说，出版了一个集子，题为《新任务》。

从 20 年代创刊的《绿光》到 30 年代出版的《世界》、《希望》等杂志以及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先后出版的《东方呼声》、《中国报导》、《延安世界语者》和《远东使者》等世界语杂志，也发表过不少从中文翻译的文学作品。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以后又出版过几种文艺作品的单行本，如报告文学集《新生活》、《郭沫若先生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李辉英等的小说戏剧集《归来》、宋之的的剧本《转形期》，刘圣亚的中篇小说《小母亲》、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还出版了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的诗文集《暴风雨中的低语》、《在战斗的中国》和她从日文翻译的反战小说《未死的兵》。

在解放战争中，环境十分艰难，但也激发了人们与恶劣环境勇敢斗争的精神。许寿真等同志出版了《新闻记者》和《中国音乐》等不定期刊物，翻译了《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进步歌曲，发表了一些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宣传人民解放区的文章。许寿真、邵融、李士俊等还给多瑙河地区世界语组织的共同刊物《国际文化》撰文，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通过这些活动，也保存并培养了世界语的翻译写作人才。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文学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 1950 年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出版了世界语杂志《人民世界》和《人民中国报道》，在这两本刊物上也介绍了一部分文学作品。1951 年在上海出版了徐声越教授世译的刘白羽的长篇小说《火光在前》和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中国报道》从创刊以来，陆续发表了 330 多篇诗歌，150 多篇小说，87 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100 来篇神话、寓言、民间故事。它还设立了介绍中国文学史的专栏。配合中国文学史的介绍发表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诗歌、小说、散文。在介绍的诗歌当中，有《诗经》的《关雎》、《木瓜》、《伐檀》、《硕鼠》、《君子于役》等名篇，有屈原的《九章》选，汉赋《七发》，《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妇病行》、《陌上桑》等，曹操的名篇《龟虽寿》、《观沧海》、《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马篇》、《七步诗》、

《泰山梁甫行》，陶渊明的《归田园居》、《桃花源记》，北朝民歌《木兰词》。

唐朝是我国诗芭盛开的时代，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的佳作，在《中国报道》杂志中得到了足够的反映。先后翻译发表了鲍照的《行路难》，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兰若生春夏》，陈子昂的《度荆门望蜀》、《感遇三十八首》，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夏日南亭怀辛大》、《春晓》，王维的《渭川田家》、《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山居秋暝》、《少年行》、《鹿柴》、《鸟鸣涧》、《渭城曲》等，储光羲的《垂钓绿湾春》，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祖咏的《终南望馀雪》，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逢入京使》，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王翰的《凉州词》，王之涣的《凉州词》、《登鹳雀楼》，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早发白帝城》、《丁都户歌》、《塞下曲六首》、《望庐山瀑布》、《静夜思》、《赠汪伦》、《菩萨蛮》等，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登高》、《前出塞》、《春望》、《新婚别》、《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白居易的《卖碳翁》、《琵琶行》、《长相思》等，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等，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任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江雪》等，孟郊的《游子吟》、《织女》、《剑客》等，刘禹锡的《乌衣巷》，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等，聂夷中的《伤田家》，温庭筠的《更漏子》、《菩萨蛮》、《望江南》等，韦庄的《思帝乡》、《女冠子》等，冯延巳的《清平乐》、《雀踏枝》等，李煜的《望江南》、《相见欢》、《长相思》、《玉楼春》、《清平乐》、《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李商隐的《无题》、《乐游原》等，杜荀鹤的《再经胡城县》、《山中寡妇》等。

宋朝以及明清的诗歌在《中国报道》发表的不那么多，但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也翻译发表了不少。如欧阳修的《踏莎行》，王安石的《江上》、《饮湖上初晴雨后》、《水调歌头》等，李清照的《渔家傲》、《如梦令》、《醉花阴》、《怨王孙》、《声声慢》、《武陵春》等，陆放翁的《游山西村》、《金错刀行》、《书愤》、《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钗头凤》、《沈园二首》、《示儿》、《关山月》等，辛弃疾的《菩萨蛮》、《青玉案》、《鹧鸪天》、《水龙吟》、《水调歌头》、《破阵子》、《清平乐》、《西江月》、《丑女儿》等。

《中国报道》翻译发表了更多的现代中国诗歌，通过它们反映了我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其中既有郭沫若、何其芳、田间、艾青等等老一辈诗人的作品，也有石方禹、柯兰、舒婷、白航、邵燕祥、牛波、宫玺等新诗人的作品。从这些诗歌的题目便不难了解它们的内容的广泛：《我们解放了》、《担架》、《第四次打击》、《和平最强音》（石方禹长诗）、《长征》（毛泽东）、《哈萨克之歌》、《给聂鲁达》、《给爱伦堡》、《请接受我们带给你们的荣誉》、《橡胶树和甘蔗》、《风雨在怒吼》、《天空和海洋》、《莫让果子碰到头》、《在祖国大家庭里》、《丰收歌传遍澜沧江》、《西双版纳的夜》、《塔里木》、《夜读》、《我们的生活最美好》、《春歌》、《翻身农奴想念毛主席》、《周总理你在哪里》、《天安门诗抄》、《在人类的旗帜下》、《迎接美好的明天》、《五月的歌》⁴⁹。《中国报道》还译载了不少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中国歌曲，如《东方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唱我们的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的祖国》、《他到西线去》、《新疆好》、《路是我们开》、《社员都是向阳花》、《我们走在大道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唱社会主义祖国》、《远航》、《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泉水叮咚响》、《亲爱的孩子们》等等。有一位芬兰朋友还把我们的国歌在当地翻印了，给世界语朋友们传唱。

⁴⁹ 因时间久远，找不到标题原文，部分标题只能从世界语译出，不一定准确。

《中国报道》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的小说。它先后刊载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子夜》、《欧阳海的故事》等长篇小说的节选，选译了我国最早的小说《韩凭夫妇》和《荀巨伯看友》，选译了冯梦龙的《三言》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翻译介绍了鲁迅的《孔乙己》和《故乡》，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罗文应的故事》，谢冰心的《分》，沈从文的《萧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小经理》等，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孙犁的《荷花淀》，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和《狗又咬了》，李准的《解疙瘩》，谌容的《人到中年》（节选），刘绍棠的《不虚此行》，顾工的《宿怨》等等。更有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也出现在这本刊物上，这些作品题材十分广泛，反映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蒋子龙的《修脚师》，李怀峪的《女徒弟》，岑献青的《矿工的妻子》，张弦的《热雨》，戈觉悟的《夏天的经理》，勒仁的《在山路上》，张力群的《今夜丁香花》，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于斌的《雨丝》，张文军的《雨》，周征凌的《平静的河》，张炜的《一潭清水》，冯永杰的《不露面的房东》，刘谦的《新手》，铁凝的《四季歌》，白小艺的《雨的游戏》，邓宗良的《最珍贵的》，马宝康的《斗羊士》，彭达的《女市长的遗愿》，朱士奇的《紫枫树下的邂逅》，莫言的《民间音乐》，聂鑫森的《雪魂》和《沈家灯》，宁泉聘的《新来的女清洁工》，方家骏的《赶场子的歌星》，蔡洪声的《今晚她没有舞伴》，杨咏鸣的《甜的铁腥的铁》，刘志刚的《远方来的媳妇》，柯云路的《哀与荣》（节选），冯骥才的《老夫老妻》，周宣地的《嫡传子弟》，宋学武的《干草》，辜小军的《一个心理学讲师的家庭问题》，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叶蔚林的《梅子沟夜泊》，盛祥兰的《春渡》，才旦（藏族）的《最后的黑帐篷》，裘山山的《相框里的女人》，芳洲的《红草》，刘连群的《别姬》，郭村的《歌王》，赵请田的《坐地户》，邓梅南的《翡翠钻石》，李枝增的《一生只有一次爱》，余秋雨的《老屋窗口》，苏童的《外乡人父子》，池莉的《以沙漠为背景的人与狼》，廖静仁的《资江船夫曲》，李治邦的《我爹和鸟》，迟子健的《日落碗窑》（伊水缩写），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等等，都是文字清新，内容富有时代气息而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

因为剧本一般篇幅较长，就是独幕话剧也难以为一本综合性的期刊所容纳，所以《中国报道》发表的剧本是比较少的。然而它也还翻译介绍了我国一部分著名的戏剧，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第三折），王实甫的《西厢记》（《草桥店梦莺莺》），汤显祖的《牡丹亭》（《惊梦》），独幕话剧《麦收之前》，京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等。

《中国报道》还用相当多的篇幅翻译刊载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古代和现代散文，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庖丁解牛》（《庄子》）、《留侯世家》（《史记》）、《魏公子列传》（《史记》）、《师说》、《喜雨亭记》、《醉翁亭记》、《白杨礼赞》（茅盾）、《荔枝蜜》（杨朔）等；报告文学，如《西沙之战》、《歌德巴赫猜想》（徐迟）、《在熊猫的家乡做客》（刘克平）等。

此外，《中国报道》杂志还大量翻译介绍了流传在我国各民族中的各种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神话、寓言、笑话、相声、曲艺等文学作品。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

1986年在沙市出版了一本题为《世界语文学》的不定期刊物，发表了胡国柱翻译的李白的诗《听蜀僧浚弹琴》、《送友人》和刘禹锡的《陋室铭》等诗六首，石成泰翻译的李贺的诗三首，苏阿芒翻译的陆游的诗《咏梅》，周流溪翻译的屈原的《离骚》和辉金翻译的《儒林外史》节选《范进中举》等。1992年出版了第2期，又介绍了一批中国诗人和他们的作品。

1990年在中国又出现了另一个名为《Penseo》（《三色堇》）的文学刊物，由石成泰任主编。它每期只有16开4页，全部为世界语，它已经断断续续出版了90期。每期可容五六千字。算起来大概有五六十万字了，共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数百篇，其中有胡国柱从《聊斋志异》、《太平广记》、《幽冥录》等古典小说集选译的一些故事；石成泰、胡国柱翻译的陶渊明、王维、李贺等的作品；王崇芳翻译的徐志摩等的诗；曾倩仪翻译的几篇现代短篇小

说。刊物还发表了谢玉明翻译的《红楼梦》的若干章节。也有不少新人的作品，而且不乏佳作。这份刊物在培养新人和介绍中国文学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注目，曾荣获格拉波夫斯基文学奖。

此外有些地方省市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也发表过若干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不大，但也表现了世界语者对于文学翻译和创作的日益增长的兴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用世界语向世界广播。在它的节目中，也经常播发一些文艺作品。它曾设置“中国文学”专题节目，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今名著。

建国后，在图书出版方面，1952年出版了徐声越等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新事新办》和徐声越翻译的石方禹的长诗《和平最强音》。1953年出版了张闳凡等翻译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幸福》。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反映从1949到1959建国十年文学创作成就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著名作家茅盾亲自任这本书的主编并为它写了序言。

《中国文学作品选集》收入了1949—1959十年间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21首诗歌，16篇小说和3篇散文。诗歌有毛泽东的《井冈山》、《长征》、《沁园春·雪》、《游泳》，郭沫若的《新中国赞》，冯致的《韩波砍樵》，田间的《喷泉》，李季的《我们的油田》，贺敬之的《回延安》，严辰的《红旗手》，阮章竞的《风沙》，张咏梅的《骑马挎枪走天下》，闻承训的《美妙的音乐》，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杨星火的《雪松》等。小说有陆俊超的《国际友谊号》，艾芜的《夜归》，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费礼文的《一年》，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和《老孟广泰》，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和《党费》，李德馥的《典型》，杜鹏程的《我的青年朋友》，刘白羽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等，散文有杨朔的《滇池的报春花》，何为的《第二次考试》等。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出版的最大的世界语文学作品选集。它的问世，立刻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

1961年出版了葛一凡等翻译的《不怕鬼的故事》。1964年出版了李士俊翻译的哈尼族叙事诗《阿诗玛》。1980年《阿诗玛》再版，部分章节被收进英国作家威廉·奥尔德编辑的《新编世界语文选》。1963年出版了包括《呐喊》、《彷徨》的《鲁迅小说集》。1974年又出版了增订版，把《故事新编》也补充进去。《鲁迅小说集》颇受读者欢迎，很快销售一空。1964年出版了李士俊翻译的童话诗《姑娘和八哥鸟》。这本由著名画家程十发插图的连环画，销路也不错。刘洪康翻译的高玉宝写的《我要读书》更受欢迎，还转译成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在欧洲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除了翻译出版《鲁迅小说集》（增订版）、《野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彩霞》（浩然）、《上学》（管桦）等作品以外，没有出版什么文学作品的世界语译本。1976年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小组，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世界语译本。

1981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成立，世界语文学书籍的出版更加活跃起来。1981年出版了胡国柱翻译的鲁迅的《朝花夕拾》。1982年出版了杨永森翻译的扬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同年出版了徐声越编译的《中国诗歌选译》和李士俊翻译的巴金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此外还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民间故事的世界语译本。其中有《阿凡提的故事》、《智慧囊》、《幸福鸟》、《蝴蝶泉》、《宝船》、《牛郎织女》、《牧童和仙女》。1984年出版了叶君健反映中国土地革命的小说《山村》，这本书被列入国际世界语协会的东西方丛书。以后又出版了两本微型小说集《献你一束花》和《橘红色的伞》。1985年出版了谢玉明译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和李士俊译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和李香香》。

《中国文学作品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仍在继续。1986年出版了新的一卷600多页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它收进了1919年到1949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有郭沫若、闻一多、殷夫、戴望舒、徐志摩、何其芳、冯至、艾青、臧克家和李季的诗歌，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王统照、许地山、王鲁彦、沈从文、许钦文、丁玲、柔石、茅盾、巴金、艾芜、

吴组湘、叶紫、老舍、萧红、萧军、沙汀、端木蕻良、赵树理、康濯、孙犁、秦兆阳、马烽和方纪的小说；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鲁迅、冰心、朱自清和何其芳的散文。

1987年出版了李士俊翻译的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1988年出版了王崇芳翻译的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1989年出版了周焕常翻译的《离骚》。同年还出版了417页的介绍1949—1979期间的中国文学成就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在这个集子里收进了臧克家、严辰、田间、李广田、冯致、闻捷、郭小川、郭沫若、贺敬之、洛杰巴桑、郭风、流沙河、光未然、布林布赫、舒婷、雷舒雁、邹荻帆和艾青的诗歌，宗朴、萧平、周立波、茹志娟、王愿坚、李准、浩然、王闻诗、王蒙、杜鹏程、高英、玛拉沁夫、张杰和蒋子龙的小说；徐迟的报告文学；巴金、冰心、吴伯萧、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散文。

1990年出版了李士俊翻译的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和《配图中国古诗精选》。这本诗集收入了曹操、曹植、陶渊明、骆宾王、王维、王之涣、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苏轼、李清照、陆游、欧阳修、唐伯虎、郑板桥等的抒情诗50余首。荷兰世界语作家，文学杂志《泉》的主编伯尔维灵先生在他评论《配图中国古诗精选》时写道：“这样十全十美的书真是少见：装帧美观牢实，纸张上乘，每页配有插图，形式多样，引人注目，而风格又和谐一致，每首四句到八句的小诗，文字晓畅，寓意绵绵，发人深思。对于一般世界语者来说堪称必备之书。我多次在静下来的时候，信手翻开它读了起来，一面读一面观赏插图。”然后他举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我一面读一面想：假若我回到故乡去，也会像诗里写的那样，操着乡音，可是青年一代会把我当做远方来的陌生人...人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欣赏它。《配图中国古诗精选》对于爱好美的读者来说是一种乐趣，是像凤凰一样的稀罕之物。”可见集子的出版，引起了西方读者对我国古诗的兴趣。如果不是世界语，恐怕荷兰人是难以读到中国古诗的。

1994年出版了李士俊翻译的《聊斋志异选》。该书选译了《聊斋》最脍炙人口的80多篇故事。

1995年开始出版谢玉明以十年苦战翻译的《红楼梦》。1995年出版了第1卷，1996年出版了第2卷，1997年出版了第3卷。出版这样大部头的文学作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它的问世向世界表明，中国的世界语者有了较为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虽然《红楼梦》已经介绍到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不少文学大国，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国家仍然无缘与它相识。有了世界语译本，便使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有了广泛流传到世界各地的机会。该书的出版受到了国内外世界语者的重视和好评。1997年还出版了谭秀珠翻译的曹禺的剧本《日出》和刘才盛翻译的《雷雨》。虽然这两个剧本在中国文艺界久负盛名，但很多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小国人民仍然未有所闻。继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出版之后，这又给国外世界语者提供了欣赏中国现代戏剧的机会。

1998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选》。这可以说是新的一卷《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它收入了我国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短篇小说46篇。有汉代的关于太子丹的故事、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有选自东晋干宝《搜神记》的干将莫邪的故事，有南北朝时代关于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有唐代关于崔莺莺的传奇，有宋代的关于李师师的故事，有明代冯梦龙关于白娘子的故事和《错斩崔宁》、《买油郎独占花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为中国人熟知的名篇，有选自明代凌蒙初《二拍》的《神偷》，清代蒲松龄的《娇娜》、《胭脂》、《席方平》，吴敬梓的《范进中举》等等。这本选集将把读者带进五光十色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大观园。

198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中外名诗世界语选》的集子，以汉世两种文字对照的形式出版，除发表了柴门霍夫、格拉波夫斯基、卡洛柴、尤里·巴基、裴多菲、海涅、歌德、莎士比亚、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爱罗先珂、高尔基、彭斯、聂鲁达等名家的作品外，还介绍了《诗经》、汉乐府和曹操、曹植、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杜

牧、陆游、鲁迅、郭沫若、毛泽东、徐志摩、闻一多、冰心、臧克家、艾青、曾卓、徐声越、苏阿芒、舒婷等人的作品。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叶君健特地为这个集子题了词。

从前面的概述，不难看到中国世界语者在向国内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成绩斐然。在介绍国外作品方面近年来作得太少。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世界语文学作品，不论原作还是译品，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但是人们忽视了汉译的工作。固然现在我们翻译界培养出了多种语言的人才，但是许多小语种仍然是缺门，不能从原文翻译介绍它们的文学作品。而英语、法语等大语种又忽视小语种的文学。世界语仍然可以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就是在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古今历史上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还没有介绍出去，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付出更多的心血。

(3) 世界语原文创作

世界语传入我国之后，经过了十余年的酝酿才产生了世界语原文作品。1928年在上海世界语学会会刊《绿光》11—12期合刊上发表了巴金先生用世界语写的独幕剧《在黑暗中》，这大概是中国人最早的世界语原文创作之一。1933年7月《绿光》新一号发表了巴金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我的弟弟》，是他用世界语发出的抗日呼声。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叶君健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从世界语原文小说创作开始的。1932年他用世界语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岁暮》，1937年以马耳的笔名出版了世界语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这是中国世界语作家早期最重要的原著小说集。

徐声越教授大概是最早用世界语进行诗歌创作的中国人。他于1930年学习了世界语，一两年之后便开始写作。他把自己创作的世界语诗歌寄给匈牙利的世界语杂志《文学世界》发表。1935年1月号 and 4月号发表了他的世界语原作诗《萤火虫》、《思念》、《时常》、《今天我生活的酒杯美满》、《中秋之夜》、《仙桥》、《浪花》、《星夜》、《空旷的屋、空旷的心》。这些诗后来收入1938年卡洛柴编的《九人集》，其中有七首后来被选入1957年由英国世界语诗人奥尔德编的《世界语诗选》。徐声越是在布达佩斯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世界语者当中，他的世界语造诣最深。

解放后，虽然我们的综合性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也刊载文学作品，但很少原文创作。60年代发表了徐声越教授等改写的中国古代寓言诗十余首，张闳凡、李士俊等写的二三十篇书评和庆祝苏联发射卫星成功的贺诗。80年代以后《中国报道》才开始比较注意刊登世界语原著文学作品。先后发表了李士俊写的《助学小唱》、《旅美诗抄》等诗歌，小说《平安之死》和《南国之行》等散文以及石成泰、刘才盛写的短篇小说，王汉平、孙爱军、向红等写的特写等等。这使得中国的世界语文苑增加了一片新绿。

1992年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苏阿芒诗集》。苏阿芒学过多种外语，早在60年代就开始用世界语从事诗歌创作活动。这个集子里收入了他陆续在国内外发表的和未曾发表的抒情诗174首，叙事诗4首。抒情诗分为以下五个部分：《我爱你中国》、《青年之歌》、《五彩纸屑》、《誓言》、《永不屈服》和《叙事》。集子的前面有石成泰写的序言《真正的诗人的灵魂——苏阿芒》，诗集后面还附有意大利世界语作家米那雅的报告《苏阿芒的诗歌创作》和南非世界语诗人考克的诗一首《解放了的苏阿芒》。

1995年出版了李士俊的世界语诗集《助学小唱》。这本集子收入了儿歌、抒情诗、寓言诗、叙事诗共222首，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有些少年把它作为学习世界语的材料。克罗地亚还有一群少年以它做参加国际朗诵比赛的材料，其中有几十篇译成了越南文、英文和日文。

由叶君健先生任主编的《Esperanta Literaturo》（《世界语文学》）也发表了中国世界语者的部分世界语原作。他在《前言》里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世界语受到政府和

人民的支持，得以较大规模地发展，新生世界语者不是以千计，而是以万计出现，近几年来尤其是如此。中国的世界语者创办了许多刊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报道》，也出版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中国文学的名著。中国的国际广播电台每天有规律地向全世界播送世界语的节目。世界语已经在中国每天得到实际的应用。因此，它必然地在文学方面也有所表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前途的世界语的原作者和翻译家。他们的努力理所当然地得有一个表现的园地。这本《世界语文学》就是这样创刊的。”它用 300 多页的篇幅先后发表了李士俊的世界语原著小说《兄妹》和《嘎子》，胡国柱写的关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李贺、李商隐、白居易的肖像诗八首，魏原枢改写的民间故事《画》，叶树滋写的神话《金子的故事》，杨一庆写的《柴门霍夫博士的肖像》，李威伦写的小诗《海燕和鹰》。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它只出版了两期便停刊了。

在《Penseo》（《三色堇》）发表的三四百篇小说、诗歌、散文中，半数以上是世界语原作。绝大多数是诗歌，也有少数小说和散文。诗歌多为抒情诗。该刊发表了毛自赋、卢纪新、石成泰、胡国柱、李士俊、杨一庆、王崇芳、谢玉明等写的几十首抒情小诗。也发表了方善境和苏阿芒的若干遗作。

在国外出版的世界语杂志上，如《世界语》、《世界语报道》、《月刊》、《泉》、《文市》、《江河》等，以及国内出版的地方世界语刊物上，也发表了石成泰、胡国柱、卢纪新、毛自赋、李士俊、王崇芳、穆丙华，付先沛等人用世界语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如果搜集起来也有一定数量。

总起来说，我国从事世界语原文创作的人数还不很多。然而呈显着日渐发展的势头。如能得到人们更大的关注，会日渐走向成熟、走向繁荣。

2. 中国世界语者对于世界语文学语言的贡献

通过长期的工作和创作实践，中国的世界语者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世界语的文学语言，用它翻译了一批中国文学作品，丰富了世界语的文学宝库，而且出现了一些中国文学特有的表现形式，如中国的绝句、词、信天游、快板等等。特别在表现中国特有事物的词语的世界语化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1) 引进中国词语

1) 量词：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中国特有的数量词，是不好折合成为国际通用的单位来翻译的。如果把“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里”折合成公里，翻译成“一万二千五百里长征”味道就变了。因而就有必要把“里”引进世界语。下面这些常用的量词已经被世界语吸收：里 (lio)、亩 (muo)、斤 (ĝino)、元 (jŭano)、角 (ĝjaŭo)。

2) 名词：有些中国特有的事物，无法用已有的世界语词语翻译，人们便按照世界语的文法规则将其引入世界语。已经被世界语吸收的有下列名词：笙 (ŝengo)、铮 (ĝengo)、二胡 (erhuo)、古琴 (sepkordo)、胡琴 (huĉino)、评剧 (pingĝŭio)、昆曲 (kunĉŭio)、梆子 (bangzio)、围棋 (vejĉio)、麻将 (maĝango)、馄饨 (huntuno)、窝窝头 (vovo)、豆腐 (toŭfuo)、粽子 (zongzio)、馒头 (mantoŭo)、饺子 (ĝjaŭzio)、汤圆 (tangjŭano)、秀才 (ŝiŭcajo)、举人 (ĝŭijeno)、进士 (jinŝio)、总督 (zongduo)、大人 (dajeno)、衙门 (jameno)、气功 (ĉigongo)、经络 (ĝinluo)、阴 (jino)、阳 (jango)。

3) 动词：汉语的动词引入世界语的较少，但也有被引入的，如磕头 (ketoŭi)。

这里只举几个例子。还有很多值得引进世界语的词语值得人们去进一步研究探讨。

(2) 引进中国俗语

通过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世界语者还将一些中国的俗语移植到了世界语中，例如丢脸：perdi vizaĝon，对牛弹琴：ludi bivaĵon antaŭ bovo，易如反掌：manturne facila，雨后春笋：kiel bambu ŝosoĵ post printempa pluvo，百花齐放：kunfloru cent floroĵ，百家争鸣：konkuru cent skoloĵ，百闻不如一见：unu vido taŭgas pli ol cent aŭdoĵ，不经一事，不长一智：Pli da sperto, pli da lerto，塞翁失马焉知非福：Kiu scias, ke ĉeval-perdiĝo ne aŭguras venon de feliĉo ?

(3) 引进中国文学形式和风格

有人尝试将相声、信天游、词牌、俏皮话、章回小说的套语等等移植到世界语文学里来。这种努力表现了中国世界语者积极探索翻译艺术的可贵精神。胡国柱、卢纪新等按照中国词牌的格式，写了一些抒情小诗，称之为 ĉinesko（中国式诗词）；而且有外国世界语诗人，如英国的女诗人布尔顿，南非的爱德温·考克，模仿中国的词牌，写了若干抒情小诗。说明人们对于这一古老的东方诗歌形式颇有兴趣。不过目前对中国文学的特有形式能不能移植到世界语文学里来尚有争论。有人认为相声、词牌、俏皮话等等形式是汉语特有的产物，和汉语本身关系密切，很难移植到世界语文学中去。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实践来验证。

七、世界语与中国的文字改革

(一) 世界语和文字改革是怎样走到一起来的

1. 世界语运动和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是同时代的产物

中国的汉字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楷书，已经有过多次改革，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的政策，就是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运动。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文字要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改革。但在社会变革较小，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文字的改革是渐进的，变化不明显。汉字经过秦汉之间的隶变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相对稳定时期。

直到清朝末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以后，已经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时社会开始了急剧的动荡与变化，长期封闭的封建社会被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打开了大门，人们开始了解世界，也发现了中国的落后。于是要求“法师西洋，自求富强”的维新思想在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中间盛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意识的萌芽。维新思想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就是要求改革汉字。在当时旧民主革命的潮流中，提出了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的新问题，长期稳定的汉字开始暴露出它的笔画繁、字数多、不能表音、学习困难等等缺点，被认为对中国文化再进一步发展有阻滞作用。1892年第一个提出汉字改革方案的卢懋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至聪明者非十余载之苦工不可。”他要求“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⁵⁰从此，长期保持稳定的汉字，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开始出现了改革的新高潮，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始。

世界语恰好也是诞生在这个时期。世界语是在民族语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比民族语更加合理化、逻辑化、科学化、简明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语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字改革运动。它们之间自然会有许多共同点，互相支持、互相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2. 世界语运动和文字改革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1919年的“五四”运动，既是政治革命，又是文化革命；不仅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也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文字改革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它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大众语，反对文言文；提倡拉丁化，反对方块字。它为汉字改革开辟了道路，出现了拉丁化运动的新高潮。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号”特刊，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和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等论文，明确宣布：“汉字应该革命！”“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地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认为“要谋汉字之根本改革”，“非拼音不可”。1924年他们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蔡元培担任了大学院（原教育部）院长，国语罗马字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由大学院正式公布。中国广义的拉丁化运动，就是从国语罗马字开始的，也包括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新青年》杂志曾就

⁵⁰ 卢懋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1892。

世界语问题展开一场为时三年多的大讨论，钱玄同、鲁迅等人发表文章热情支持世界语。胡愈之、巴金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学习和研究世界语，并参加了世界语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吴稚晖等等，都是既支持文字改革运动又支持世界语运动的，这两个运动始终是在互相支持中共同发展的。

3. 用世界语代替汉语汉字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

早在 20 世纪初，一些主张改革汉字的人发现世界语是一种理想的语言，曾经主张用世界语来代替汉语汉字。1908 年章炳麟曾著文驳斥当时留居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的就是世界语者）“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⁵¹”的主张，提出他自己的音标字母方案。⁵² 1918 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说：“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 Esperanto。”吴稚晖也有类似的主张：“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换入万国新语（即 Esperanto）以便渐摈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⁵³ 他认为汉文、汉语太落后了，“倘要改革，大部分的语词，既须采用世界所通用的现代生活的新语词，那么汉语中除去了文言的成分之外，剩下的只是一些“太阳”、“月亮”等类的普通语词，至多只占全部语词的十分之三，那么七分重要的已和世界相同，剩下三分不重要的名、状、动、副、介、连等词，却要为他们另造一种拼音文字是犯不着的，中国还是痛痛快快地采用世界语为好。”⁵⁴

西方人发明的世界语竟被东方的中国人如此看重，甚至想用它来取代汉语、汉字，这一方面说明世界语的确是一种很有魅力的理想语言，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好心的中国人有些过于天真，未免太理想化了。文字改革和语言的取代完全是两回事，记录语言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但长期用惯了的文字要改革尚且很难，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语言岂能轻易用另一种语言来代替，这是不可能的。柴门霍夫在创造世界语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它只是一种国际辅助语，从来没有企图用它取代任何一种民族语。

4.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由世界语者介绍到国内

从 20 年代起，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政治上是新兴的革命力量，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是重要的中坚力量，而且积极参与了汉字改革运动。继国语罗马字以后，一场由共产党人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把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推向新阶段。它最初诞生在苏联，传入中国后，逐步汇入了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长期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先后草拟过多种中文拉丁化方案。“从他的遗稿中可以看出，他是学过世界语的。因为在他起草的几个方案中，可以找到世界语特有的戴帽子的字母。”⁵⁵ 1929 年他在苏联时起草了《中国拉丁化字母》，在莫斯科出版，这是拉丁化新文字最早的草案。当时苏联正在开展拉丁化运动，在少数民族中扫除文盲。侨居苏联（主要在远东地区）的华工有十万人，也是扫盲对象。于是经过中苏两国学者的研究讨论，由中国的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在苏联语言学家龙果夫的协助下，以瞿秋白的草案为基础，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 年在海参崴召开了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吴玉章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和新文字方案。用拉丁化新文字在华工中进行扫盲，效果很好。由于中苏当时没有外交关系，这些情况国内

⁵¹ 即世界语。

⁵²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9 年第 3 版。

⁵³ 《新世纪》第 40 号。

⁵⁴ 吴敬恒（即吴稚晖）：《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⁵⁵ 叶籁士：世界语与汉字改革——《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5 年版。

是不知道的。

1933年，当时在苏联的萧三写了一篇《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被译成世界语登在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的机关刊《新阶段》(La Nova Etapo)上。那时左翼文化团体左联办的公开刊物《文学月报》正在讨论大众文艺问题，已回国的瞿秋白用笔名宋阳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一文中提出了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这引起了当时在汉口的世界语者焦风（方善境）的注意。他把萧三那篇文章从世界语译出，寄给《文学月报》，未被采用。退稿到了上海世界语者叶籁士的手里，他寄给中外出版公司的《国际每日文选》，于8月12日发表。这是国内介绍新文字的第一篇文章。但文章没有涉及具体方案，只列了一个字母表。两天以后，上海《大晚报》登了一条塔斯社电讯：“海参崴苏联企业中之中国工人1500人，已在学习用拉丁字母阅读并书写中国文字。该新字母为苏联语言学家所创制⁵⁶，最近才供诸使用。平均言之，练习三个月即能识字。目前海参崴华侨之驱除文盲工作，进行异常迅速云。”

一篇文章，一条新闻，引起上海世界语者极大兴趣。因为世界语者对语言问题比较敏感，较少保守思想，能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当时叶籁士是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机关刊《世界》的编者，他在《世界》杂志上连续刊登了一条启事，要求苏联世界语者将有关中国新文字的各种资料寄来。由于《世界》与世界各国包括苏联都有交换刊物的关系，相信这条启事苏联同志一定能够看到。果然不出所料，到当年年底，开始陆续收到苏联寄来的资料。乌克兰语言学教授V.P.伊萨耶夫寄来了用世界语写的论文《苏联各民族文字拉丁化与汉语书法拉丁化》，被译成中文在《世界》上发表。接着又陆续收到在苏联出版的大批有关新文字的文件、方案、写法规则、课本、字典、检字、读物和文艺作品，还有全部用新文字编印的《拥护新文字六日报》。这些资料主要是伊萨耶夫和另一位乌克兰世界语者，苏联世界语者联盟语言委员会成员、《俄世大字典》的编者V.科尔钦斯基寄来的。这就是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有关拉丁化新文字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世界语者霍应人在《世界》的副刊《言语科学》上发表了《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是国内介绍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第一篇文章。

5. 世界语者积极参加大众语的讨论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这时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已经成为左翼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1931年，在胡愈之、楼适夷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世联”，为30年代的左翼文化团体之一。⁵⁷从1933年冬开始，世联把引进、宣传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作为自己的一项新的任务，“世联”也改称“语联”了。当时上海文化界陈望道等为了反击国民党提倡文言、读经的复古运动，发动了一场大众语的讨论，世界语者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

为什么世界语者要参加大众语的讨论呢？请看《世界》杂志向世界语者发出的号召：

在大众语的集体创造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中国的世界语者应该来负担最艰难的工作。中国的世界语者没有权利以首先介绍拉丁化来自满自足，我们还要系统地来介绍Marr, Spiridonovič, Drezen⁵⁸诸人的辩证的言语理论，因为只有正确而坚强的理论，才能把纷乱的论争导向正当的解决，而在目下，对于这一工作世界语者是无法推诿的。世界语者还须以50年来世界语集体创造的原则和经验，提供给大众语的建设。……这些都是每一个中国世界语者目前的使命，我们只有在积极参加大众语的论争中，才能增进我们自身的力量，只有积极参加社会的文化的工作，才能开拓世界语的新的园地。

自然，如果有人主张，世界语者应该抛弃了世界语运动来从事大众语的建设，这显然是

⁵⁶ 实际创制过程如上文所述。

⁵⁷ 世联的世界语全称是 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原意为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在国际上是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 (Internacio de Proleta Esperantistaro) 的中国支部。

⁵⁸ 均为苏联语言学家。

应该加以严厉反对的。但是把我们的力量局限得一步也不出世界语的范围，也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语的大众语和国际语的Esperanto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言语的范畴的，因此大众语的建立决不会阻碍了世界语的发展，相反地，只有中国大众获得了民族的笔头语之后，世界语才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才能得到比现在更大的进展。⁵⁹

语联的成员参加了这个讨论，并提出：只有实行新文字，才是大众语问题的正确解决。因为拉丁化新文字最符合大众语的需要。这个主张立即得到鲁迅的热烈支持。他连续发表了《答曹聚仁先生信》、《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论新文字》等一系列文章，用极大的热情支持拉丁化新文字。鲁迅在《门外文谈》里向读者推荐了焦风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和霍应人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1935年春，叶籁士编成《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靠生活书店学世界语的十几位店员捐款出版。接着他又编了一本《工人用拉丁化课本》。这两本书都不能公开发行，只好通过鲁迅委托日本人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代售。这是因为拉丁化新文字是共产党人创制的，是从苏联传进来的，遭到国民党政府禁止，并诬蔑拉丁化要“消灭中国文化”，“拿苏联卢布”等等，迫使拉丁化运动处于地下状态。后来叶籁士又编了《拉丁化概论》、《拉丁化课本》，霍应人编了《拉丁化检字》，胡绳（也是世界语者）编了《上海话新文字概论》，由天马书店作为《天马丛书》出版发行。叶籁士还征得鲁迅同意，把他写的所有有关拉丁化的文章编成一个集子，书名就叫《门外文谈》，也作为《天马丛书》之一出版。鲁迅把这本书的稿费捐给语联作为出版新文字书刊的经费。

陶行知也是热心推广新文字运动的文化界知名人士。1935年冬，他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他和邹韬奋等当选为理事。世界语者也积极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个团体起草了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书上签名的有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陶行知、陈望道等668人，其中包括了绝大部分进步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一部分世界语者。毛泽东在延安看到了这个意见书，于1936年9月26日写信给蔡元培大加赞赏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名列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陶行知后来所到之处，就宣传新文字。在他的影响之下，那时在海外各地的华侨中也成立了许多新文字团体。

1935年8月，语联出版《Sin Wenz月刊》⁶⁰，由叶籁士和王鹭如（王益）编辑，这是国内第一个宣传和讨论新文字问题的半公开刊物。1936年改出《中国语言》，由胡绳编辑。1937年1月，新知书店出版《语文》月刊，由叶籁士编辑。这是一个宣传、讨论汉字改革和国际语问题的公开刊物，到抗战爆发停刊。不仅在上海，各地的世界语组织也和语联一样，积极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许多世界语者都同时也是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等地难民中用新文字扫盲，在新四军中以及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推广新文字，都有世界语者积极参加。30—40年代的新文字运动，同当时的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紧密结合，曾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侨中广泛开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是解放后的文字改革运动的先导。

⁵⁹ 叶籁士：大众语运动和 世界语者，《世界》1934年9月号

⁶⁰ Sin Wenz 即新文字。

（二）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成果

1. 文字改革三大任务取得重大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运动不再是少数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或不合法的“地下”群众运动，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成为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1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决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马叙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12月23日，经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设立，为国务院直属机关之一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吴玉章被国务院任命为主任委员，胡愈之为副主任委员。1958年1月10日，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解放前几十年的文字改革运动，都是以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为目标的。然而，正如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第8次代表大会发言时所说：“我们对于汉字改革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只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以为有了拼音方案就可以立即代替汉字。这种想法是脱离实际的，因此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自从开展文字改革运动以来，汉字要不要，能不能用拼音文字来代替，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解放后，在总结过去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修正了过去的一些观点，端正了文字改革的目标，明确规定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实事求是的，以后几十年的实践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虽然文字改革运动中有过曲折，对汉字有过偏激的提法，有关领导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文字改革的任务作了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字改革运动或拉丁化运动失败了，搞错了。当然也不意味着世界语者积极支持，参加文字改革运动和拉丁化运动都错了。在改革或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争论，出现一些偏激的提法，往往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并不影响运动的大方向。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和偏激的提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语言学家陈原1986年12月2日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回顾一下本世纪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每当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的时候，汉字问题就会突出地显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围绕着汉字问题进行一场争论。这是完全不奇怪的，因为汉字系统是信息传播、存储、交换和加工的必要工具，而在社会变革即社会生产力重大发展时，人们格外需要重新检验这个工具是否适应，是否有效。

本世纪第一次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是在“五四”前后展开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在文化发展史上可以看成是一次近代启蒙运动。汉字问题的争论是在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背景上展开的。这场争论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国语”，创制和完善汉字的标音系统（1913年创制的注音字母到1918年由旧中国教育部公布，1926年创制国语罗马字）。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30年代。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形成了反侵略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汉字问题的争论是在大众语论争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背景上展开的。有过偏激的提法，我们不必拘泥于那些偏激的语句，也许这些偏激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对传统势力的冲击，而不应把它当作科学的论证。这场争论导致了最初在国统区、其后在根据地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拉丁化实验）。可惜由于战争环境以及方言语境的局限，这次实验只能成为一次对改变汉字书写系统的未完成的实验。

当人民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 50 年代，发生了第三次争论。这是在文字改革（即信息载体的革新）的背景下展开的。那场争论导致了：

- ① 创造一个统一民族语的环境，即推广普通话；
- ② 改善这个交际工具，即公布规范化的简化字；
- ③ 制定汉字的标音系统，即“汉语拼音方案”。

这一场争论留下了周恩来同志的名言（1958-01-10）。他说，“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所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将来总是要变化的。”“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争鸣……”⁶¹

现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已经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扩大了工作范围，这也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否定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还是会继续进行下去的。

1992 年 12 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语言文字工作时讲了三条重要意见：“一、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简化字。二、海峡两岸使用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三、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⁶²

1995 年 12 月 25 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充分肯定了文字改革的成就。他说：“40 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在全国广泛展开，取得了显著成绩。汉字简化，方便了初学文字的人特别是儿童识字，对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起了促进作用。现在，简化字作为规范的现代汉语用字，不仅在国内全面普及，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联合国文件的中文文本用的就是规范的简化字。推广普通话已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普通话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通用语言，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有利于扩大国际交往。《汉语拼音方案》在帮助识字、推广普通话以及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汉语的国际标准。”⁶³

1995 年 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社论《在全社会树立语言文字规范意识——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也指出：“实践证明，推行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符合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出了贡献，为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作了前瞻性准备，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回顾这一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40 年前开始的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大历史意义。”

世界语者仍然一如既往，积极支持并参加了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几任会长胡愈之、叶籁士、陈原都先后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原还担任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也是世界语的坚定支持者和热情倡导者。他们都参与了文字改革工作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叶籁士、杜松寿等世界语者更长期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具体的文字改革业务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⁶¹ 《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⁶² 《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纪念手册》，语文出版社 1996 年版。

⁶³ 《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纪念手册》，语文出版社 1996 年版。

2. 《汉语拼音方案》是半个多世纪拼音化、拉丁化运动的成果

解放前 60 年的文字改革运动中，出现过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许多种拼音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收集到的方案有 600 多种。正是在这些方案的基础上，经过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认真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协商，最后才诞生了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推行的规范化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百家争鸣的结果，众多方案的结晶，半个多世纪拼音化、拉丁化运动的可喜成果。无数文字改革的先驱，包括世界语者，为之奋斗终身，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功不可没。大量文化教育界人士，也包括世界语者，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人们在庆幸获得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时，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现在《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在许多方面广泛应用。首先是为汉字注音，在小学生的识字教学上，在扫盲工作中，在词典、工具书的注音和报刊难字注音上，《汉语拼音方案》都成了不可缺少的工具。在词典、工具书、档案、资料、图书馆的书目、医院的病历等等的排序、检索上，拼音字母明显优于部首、笔画、四角号码等基于汉字形体的检字法；发行量很大，使用范围很广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以及国家图书馆的计算机检索书目等等都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是已经写入宪法的重要任务，科教兴国、发展经济都迫切需要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推广普通话的得力工具。它在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些外国人甚至能用汉语拼音写出一些连汉字都很难表达的口语，学会了很地道的中国话，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务院已于 1978 年 9 月正式批准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此外，《汉语拼音方案》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国际上的公认。1977 年 9 月，联合国第 3 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79 年 6 月，联合国秘书处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1982 年 8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出 ISO7098 国际标准文件，规定它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称和语词的国际标准。1971 年，新加坡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1973 年新加坡教育部正式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后，所有的华文课本就只用汉语拼音来注音了。马来西亚也从 1983 年起，在全国各华文小学开始教学汉语拼音和简化汉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作用。由于计算机不能直接读入数量庞大的方块汉字，能否顺利进出计算机就成为汉字面临的严重考验。近年来在汉字编码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汉字已经能自由出入计算机了，这是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重大突破。向计算机输入汉字的方法有许多种，目前我国主要使用的是字型编码法和拼音—汉字转换法。编码法是按汉字的字型根据预定的规则编成代码，通过键盘输入代码，由计算机转换成汉字显示和输出。它有超方言性，不问字音，只看字型，经过培训的专业打字员可以达到较高的速度。但它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样直接输入语言，而要输入与语言无关的代码，多一道“翻译”程序。对创作人员会干扰思维，增加大脑负担。现在编码法已经有好几百种，是万“码”奔腾的局面，还没有找到一种最理想的能达到优化统一。拼音—汉字转换法无需编码，直接输入与汉语对应的汉语拼音，由计算机转换成汉字。拼音法初期只能进行单字级的转换，出现同音字、词的时候需要进行人工选择，这就成了最大的麻烦，而且很影响速度。然而现在拼音法已经经过语词级转换发展到篇章级转换的智能化的高级阶段，就是可以连续输入汉语拼音，由计算机进行整句、整段、整篇地转换，它可以根据上下文自动选择同音字、词，并且能自动学习、记忆使用者的习惯用词，准确率接近百分之百，人们可以像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一样轻松地输入汉字。拼音法又有全拼、双拼两种操作法，声韵双拼法每个字只需击键两次，可以大大提高录入速度。在日本，汉字编码法已被淘汰，普遍采用日语罗马字到汉字的转换技术，相当于我们的拼音—汉字转换法。汉字和拼音，各有优

缺点。拼音好学好写而不易识读，只用其输入，是用其长而避其短；汉字难学难用，但容易识别，只用来显示、打印，也是避其短而用其长。因此拼音法是拼音和汉字优点的结合。中文信息处理是汉语拼音推广应用最理想的场合，二者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但使用拼音法必须懂汉语拼音，目前汉语拼音还不够普及，只能实行拼音法和编码法的一语两制，各取所需。至于语音识别，现在还在试用阶段，还没有达到广泛应用的程度。在语音信息处理方面，当然更离不开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任何一种语音信息处理装置都要求有一种比较规范的语言，那自然是普通话。汉语拼音没有超方言性，它只为普通话服务，这一点正好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实践证明，汉字虽然有许多优点，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毕竟还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它缺乏完善的表音功能，也确实有一些不能使用或不便使用的地方，需要有一种拼音的辅助工具，《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根据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它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在许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汉字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任何人也无法否定它，取消它。正如胡乔木反复强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长时间广泛讨论，并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步骤制定的。现在，这个方案不但是由国家郑重制定并已推行多年的法定方案，而且已得到了世界上的公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推行这个方案发生动摇。”⁶⁴

（三）世界语运动和中国文字改革发展道路的比较和启示

1. 中国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主要特点

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大众化

这是出发点。自古以来，汉字一直掌握在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手中，人民大众大多是文盲。群众文化水平低，是中国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政治、经济上的翻身、解放是首要的，所以首先要进行政治上的革命和经济上的改革。但从长远来看，没有文化上的革命，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不能提高，要想摆脱贫穷落后，求得政治、经济上的彻底解放也是很难的。这次文字改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改革繁难的汉字，以便于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就是进行文化革命，为人民大众求得文化上的解放。所以各种改革方案的研究和提出，都要首先考虑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和应用。这种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

（2）拼音化

这是目标。汉字缺乏完善的表音功能，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工具，显然有不足之处。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拼音文字，有些原来不用拼音文字的也陆续改用拼音文字。清末以来提出了许多文字改革方案，所用的符号或字母各有不同，但都是拼音方案。拼音化是客观需要，否则也不可能形成这样长时间和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决不是只凭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就能推动起来的。虽然企图立即用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是不现实的，但拼音化的辅助工具还是需要的。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不需要再造一种表意的文字工具，因为完全没有必要。而使用汉字的国家就必须要有拼音工具，因为汉字本身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所以，文字改革运动要解决客观存在的拼音化的问题，这个方向并没有错。

⁶⁴ 1982年7月《文字改革》复刊号社论《把文字改革的火焰继续燃烧下去》。

(3) 拉丁化

这是手段。中国人对汉字有深厚的感情，不少人主张采用民族形式，在汉字的基础上来制定拼音字母，也提出过多种方案。1952年毛主席曾经指示：“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从1952年到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了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5年提出了六种草案，其中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两种是国际通用字母式的。这些民族形式的方案毛主席看了都不满意。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也研究了世界上各种字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最后他也主张采用拉丁字母。后来经过政治局讨论，中央作出了决定。1956年1月27日，在对文改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文字改革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说：“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⁶⁵ 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主席有这样一段讲话：

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么？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⁶⁶

拉丁字母是国际上最通用的字母，各国的学生都非学不可，因为数学、物理、化学都必须用它。采用拉丁字母最大的好处是便于国际交流，便于信息处理。世界正在从多方面向一体化发展，人们越来越理解与国际接轨的不可避免和它的重要性。在信息处理上拉丁字母也是最通用的，许多软、硬件设备无需改造就可以直接使用，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只要有点超前意识，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就不难理解拉丁化的优越性。拉丁化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这几个主要特点，正好和世界语不谋而合。世界语本身就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在拼音化和拉丁化上与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方向完全一致。世界语是流行于民间的语言，它来自民间，又服务于民间。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类一家的理想。这和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为人民大众子孙后代求得文化翻身彻底解放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运动有许多共同点，它们会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我们得到的第一点启示，就是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规定适合大众需要而又切实可行的目标，采取便利大众又能为大众接受的手段，才能真正为大众办些实事，并且把事情办好，得到大众的拥护。

⁶⁵ 《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

⁶⁶ 《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

2. 目标定位至关重要

中国现代文字改革运动正值革命高潮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些偏激的提法。如有人想用世界语代替汉语汉字，这不过是少数人一时的过于天真的想法，很快就放弃了，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来又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社会名流，提出打倒汉字的口号，企图立即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虽然是出于为大众求解放，迅速普及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好意，但因调查研究不够，对困难估计不足，脱离了实际，造成了目标定位的失误，使运动走了弯路，增加了很大的阻力，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后来修正了目标，明确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才使运动继续健康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柴门霍夫一开始就把世界语定位于国际辅助语的位置，从来没有企图用世界语来取代任何民族语，也不干涉各民族的内部事务。如果定位不当，企图用世界语来取代民族语，必定会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不仅取代没有可能，连本身的存在都成问题。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世界语定位于国际辅助语是适当的，是很明智的。

世界语运动的实践和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实践，说明了目标定位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3. 平等协商和团结大多数

在文字改革运动中，对于如何实现改革，采用什么手段、方法，自然会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组成不同的团体或机构，甚至形成一些具有不同观点的派别，这是不足为奇的，产生一些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教训。1941年12月，吴玉章在新文字协会第1届年会上的报告中，就专门讲过新文字推行中的经验教训，他说：

第一个错误是关门主义。新文字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开始提出拉丁化方案的是瞿秋白同志和一些共产党员，现行的方案又是在苏联远东中国工人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因此新文字就对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而共产党也以推行新文字看作自己的责任，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倾向。

第二个错误是宗派主义。新文字运动是国语罗马字的一个发展。尽管这两个主张有些不同，如国语罗马字主张统一国语，而新文字则主张发展各地方言；国语罗马字主张一定要四声，而新文字则主张不一定要四声。但是在改革汉字为拼音文字，使中国文字国际化，科学化等根本问题上，是没有大不相同的。这两派的人应该是和衷共济，互相提携来达到共同的目的。不幸有上面的关门主义和政治色彩作了阻碍，而同时还发展宗派主义使他们不但不合作而且互相攻击，甚至还常常不是争论学术问题，而是参杂着政治和党派问题，这样就离开了科学的研讨而落到意气的争执。

第三个错误是主观主义。有两方面的主观主义：一方面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这种主观主义已经被事实打破了，我们不必去讨论它。还有一种主观主义就是认为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的成功，而没有顾虑到事实的困难，只凭主观的愿望，很急躁地要见成效，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不承认新文字本身还有许多缺点，“自以为是”的态度非常浓厚，一遇到别人批评就谩骂，“自高自大”“自满自足”的情绪到处发见，但是有些人因为这种情绪，一遇到挫折就灰心失望，……⁶⁷

⁶⁷ 吴玉章：《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0页。

他在这里把错误的现象和产生的原因都讲得很清楚，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当然对整个文字改革事业是很不利的。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把带有不同观点的各派专家学者请到一起，共商大计，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然也有争论，但谁也不能强加于人，而是平等协商。而且还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扬民主。这样，就增加了凝聚力，团结了大多数，为文字改革运动开创了一个和衷共济的崭新的局面。在这种氛围下，经过认真研究和反复协商，才取得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一系列成果。

国际世界语运动中，也出现过各种派别和许多团体。历史上工人世界语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语运动都曾在一个时期搞得轰轰烈烈，很有声势，适应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但也产生过分裂和派别之争。全球性的最大的世界语组织如 SAT (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 全世界超民族协会) 和 UEA (Universala Esperanto Asocio 国际世界语协会) 也都取得过可观的成就。但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团结人数最多，发展势头最好的还是要算主张中立，对一切政治倾向、宗教、派别、民族、种族都一视同仁的国际世界语协会。这是因为，面向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都有它的局限性，而语言文字是没有阶级性的。民族语是为全民族服务的，世界语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语言文字工作应该面向全体使用者，并平等地对待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更多的人，才能更有效地取得最大的成果。国际世界语运动和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平等协商，团结大多数，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4. 要有足够的耐心、决心和信心

一个运动，能够经历长期的历史考验而不衰亡，必然是有客观需要，否则单凭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也不可能使它坚持生存下去。然而运动的发展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决定于多方面的因素。1988年叶籁士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世界语的生命力极强。世界语已经100周年了，100年来世界语有两件事情很值得注意。一个是它经历了两度世界大战，仍然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巴黎开国际世界语大会，Zamenhof（柴门霍夫）已经在路上，因为战争爆发，几经周折才回到华沙，几年后就去世了。但是，大战后运动重新恢复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语的损失更严重。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世界语组织都被消灭了，许多人受迫害。在希特勒统治下，欧洲许多国家中的很多世界语者被杀害，特别是在波兰，Zamenhof的家族只有几个人活下来，大部分被害了。另外一方面，就苏联来讲，从30年代，由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苏联世界语联盟（SEU）的领导成员，差不多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世界语被禁止。这个打击也是很大的。当时国际世运的两大支柱，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苏联。对国际世运来说，损失极大。

经过那么多的摧残、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运动还能生存下来，这应该说是奇迹。它跟民族语不同，没有哪一个国家支持它。但是它生存下来了，说明人民需要它，时代需要它。因此运动能继续生存下来，还有所发展。这说明世界语的生命力极强。

其次，我要说的另外一点是：世界语运动发展很慢。Zamenhof发表“第一书”⁶⁸的时候，好些热心人士认为世界语能够很快地取得胜利，为世界公认。事实上并非如此。发展是曲折的，高一阵，低一阵，而且是很慢的。可以说是极慢的。因此早期的世界语的老前辈如

⁶⁸ 1887年7月，柴门霍夫用 Esperanto 博士的名义出版了《国际语·序言及读本》，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的国际语方案，以后这本书被称为世界语的“第一书”，这种语言就叫作 Esperanto。

KABE, 翻译很多作品, 还编过一本字典, 在世界语发展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人称“世界语散文之父”。没有几年, 他退出世界语, 不搞了。有种种原因,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感到世界语进展太慢。确实是慢的。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认为世界语很快能够取得胜利, 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世界语不可能很快地取得胜利。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这不是语言问题, 而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在世界语取得最后胜利以前, 我们还要走漫长的道路。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有长远打算, 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做好现在的工作。

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经历了 100 年的考验, 也是高一阵, 低一阵。现在工作还在继续, 而且不断有所进展, 说明还是有客观需要。但进展不是很快, 始终还有争论, 阻力很大。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 哪一项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例如简化字, 明明三五笔就能写出的字, 为什么非要写那好几十画的繁体字? 然而总有些人看不惯, 想不通。在经济发展, 交通发达的现代社会, 推广普通话的好处不言自明, 但要改变旧习惯也决非易事。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有许多好处, 但现在应用的范围还不广, 许多人还没有感到学习的必要。这一切都说明文字改革工作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世界语运动也好, 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也好, 都是客观需要的, 都是有生命力的, 终究是会成功的, 对此应该有信心, 不必动摇。但也要充分认识它们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叶籁士指出的那样: 一方面要有长远打算, 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做好现在的工作。总之, 要有足够的耐心、决心和信心。

八、世界语在中国教育领域

(一) 世界语教学在世界语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世界语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它的教学活动。1887年柴门霍夫公布的语言方案《第一书》实际上就是一本教材，得到《第一书》的人们立即开始学习世界语。后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世界语运动，而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又促进了世界语教学，所以世界语教学与世界语运动是密不可分的。

世界语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时，也是通过教学这一途径。一是外国的世界语者来中国办班，传播世界语。如1905年一位俄国人在上海开办世界语讲习班，陆式楷等人参加学习。第二年陆式楷组织上海世界语学社，举办夜校，教授世界语。二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外国学习了世界语，回国开展世界语运动。如许论博在法国学习了世界语，回国后在广州从事世界语活动。这样世界语就从上海、广州传播到其他地方。

世界语教学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起到宣传世界语的作用。通过教学，让人们亲身感受世界语的优美动听、简单易学、语法规律、逻辑性强和富于表现力的特点，这是对世界语的最好的宣传。二是起到普及世界语的作用。通过教学，让尽可能多的人学会世界语，从而扩大世界语者在各个领域的队伍，不仅使世界语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加强世界语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和渗透。三是起到培养骨干人才的作用。通过办专业培训班，造就一批水平较高的世界语专业工作者和世界语师资，使他们成为世界语运动的中坚力量。

正因为世界语教学在世界语运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级世界语组织对世界语教学都极为重视，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到地方世界语组织都设立了相应的教育机构，专门负责有关世界语教学的工作。实践表明，世界语教学在世界语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世界语教学便没有世界语运动。

(二) 中国教育部对世界语教学的重视和支持

早在1912年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时，就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以便培养世界语的师资，为在小学教授世界语作准备。1921年，在广州举行的第7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上，蔡元培先生又提出一项议案，获得通过。议案敦促全国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将世界语逐渐推广到小学中去。这些倡议虽然在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未能执行，但它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解放后，教育部门对世界语教学更为重视。1963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出公函，通知全国高等院校凡有条件者可在外文系开设世界语第二外语课，其他系科可开选修课，以培养世界语干部。通知全文如下：

“我国对外活动和国际宣传工作急需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通晓世界语的干部。目前国内掌握世界语的人才很少，而且多是老一辈的专家，年龄较大，需要培养一定数量的新生力量。

世界语是一种国际辅助语。它是综合日尔曼语和罗曼语的优点而成的，语法简明、规范，

较易学习。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已有许多人掌握了世界语；建立了世界语的国际组织，并经常有国际性活动；用世界语出版的刊物已有一百余种。对于这个领域的活动，我们必须准备条件，积极参加。

根据世界语的性质和特点，采取在高等学校外文系开设第二外语、在其他系科开加选课程的办法培养干部，比较合适。预计每周学习二、三小时，学习二年即可达到用世界语从事普通会话和翻译的水平。

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现有师资条件，我部希望下列学校从下学年开始，在有关系的高年级开设世界语课程，并建议选修人数如下：

北京大学外文系 40 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30 人；北京外语学院 20 人；北京邮电学院 20 人；中央民族学院 20 人；上海外语学院 20 人；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 20 人；四川大学外文系 20 人；厦门大学外文系 20 人；复旦大学外文系 20 人；西安外语学院 10 人；华中师范学院外文系 20 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 20 人。

由于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世界语人才的需要，没有提倡过开世界语课程，一般学生对世界语可能缺少了解，各校应向学生适当进行宣传解释，说明学好世界语，掌握一门备用工具，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利的，动员学生选修；但要坚持自愿原则，不愿选修的，不要勉强。并要设法做到在上列建议选修人数中，政治上适于做外事工作的学生占大多数。请各校根据以上要求，尽速安排，并将教师情况、选修人数于 10 月份向部写一简要报告。

目前能够教授世界语的教师很少，并大都担负着其他工作。请有关学校适当安排，尽可能减免他们所担负的工作，使其能集中力量教好世界语。

世界语课所用教材，今年暂由教师自行编选使用，今后将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组织力量编选供给。有关业务上的疑难问题，可与该会直接联系。”

从以上通知可以看出，教育部对世界语的作用，对世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充分的肯定，对高校开设世界语课程制定了详实的计划，对师资、教材等问题都有具体的部署。为使通知得到落实，同年 11 月，教育部又下令从全国 11 所大学调来一批教师参加培训，半年后回原校开课。

1982 年 12 月 16 日，教育部又向各省、市、自治区高教（教育）厅（局）、部属各高等院校下达《关于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国内外世界语工作的需要，培养一定数量的世界语人才，现重申我部 1963 年 8 月 13 日发出的（63）教二胡旭字第 1287 号《关于开设世界语课程的通知》，各高等院校可以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一个语种，或开设选修课。今后在学生毕业、干部考核及招考研究生等考试时，世界语可作为第二外语科目。”

教育部除 1963 年和 1982 年发布通知外，还批准举办世界语教师进修班、编审《世界语教程》、制定世界语二外教学大纲、成立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及举行高校世界语学术讨论会等，有些活动还派有关负责人参加，对高校世界语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指导。

我国教育部积极扶持世界语，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几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世界语杂志如《世界语》、《一月间》、《世界语先驱报》和一些国家世界语组织的会刊，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通讯》、克罗地亚的《时间》、加拿大的《光明》、奥地利的《世界语博物馆通讯》、瑞典的《世界》、伊朗的《青年》等杂志都转载了我国教育部 1983 年的通知内容并发表评论。国际世协机关刊《世界语》1983 年第 3 期刊登了该刊编辑的评论性文章，作者认为，“北京的决定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对世界语的推广也将产生影响。”许多外国世界语者也纷纷来信，赞扬我国教育部的决定，认为

这给各国树立了榜样。

(三) 世界语教学活动遍及全国

1. 世界语教学的形式

世界语教学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个别传授、办班面授、函授、刊授、广播教学和电视教学。每种形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不能互相替代,但可以互为补充。

自学是人们最早采用的学习形式。在我国有不少世界语者是通过自学途径学会世界语的。世界语简单而有规律,极便于自学。只要有一本教材和一盘磁带,随时随地都可以学起来。一般来说,自学者读写能力较好,而听说能力较差。为克服这一缺点,许多自学者便组织了学习小组,加强口语练习。为方便自学者学习,解放前后都专门出版过一些自修课本。

个别传授是世界语者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出于推广世界语的目的,许多世界语者热情向亲属、朋友、同事以及身边的人传授世界语。由于采取个别辅导的方式,学习者的口语能力有所保证,学习中的疑点能及时得到解答。不过,由于单个教学,学习气氛差一些,教学时间和精力有点浪费。

办班面授是世界语教学广泛采用的形式。各地世协、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等或单独、或联合举办各种面授班,包括入门班、速成班、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口语班、骨干班、进修班、应试班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办过面授班的有22个省的67个市、县(包括香港和澳门)。解放后办过面授班的有34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249个市、县。

面授班效率高,可以同时教数十人;教学气氛好,有利于培养听说能力;学生的疑难问题能及时得到解答。需要解决的是合适的场地、合格的教师和统一的教学时间。

80年代和90年代初,全国世协、北京世协和中科院世协利用北京世界语专业工作者多、师资水平高的优越条件,举办了一系列世界语脱产班,从全国招生,为各地培养了一大批世界语骨干。

函授和刊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推广世界语和培养世界语人才的有效途径,两者教学形式基本相同,只是函授通过寄发材料从事教学,而刊授则通过刊物指导学习。两者的优点都是远距离、大面积进行教学活动,缺点是学员的疑难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不利于听说能力的培养。为克服这些缺点,许多函授班和刊授班在一些地方设立了辅导站,定期面授和解答问题,同时还配制了录音带。

早在1912年,上海的中华民国世界语会就开办了世界语函授部,从全国招收千余人,著名的世界语老前辈胡愈之曾经在这个函授部学习过。1926年上海世界语学会开办了一所新的世界语函授学校,胡愈之、徐耘阡、巴金、陈兆瑛等人担任过教员,培养了叶籁士、方善境、周庄萍、张企程、李奈西等一批著名的世界语者。1932年上海的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又开办了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由乐嘉焯具体负责。1940年叶籁士、冯文洛、张闳凡、许寿真在重庆创办世界语函授学社。曾禾尧、刘仁、绿川英子参加了部分教学工作。该校学员遍及全国18个省,在5年的时间里培养了2300多名学员,出版了20多种世界语书籍,对我国世运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在武汉、淮南、太原、重庆、合肥、黄石、荆州、昆明、南宁、沙市、北京、阜阳、成都、通化、唐山、柳州、南京、海口等地一共开办了23所函授学校(班)和3所刊授学校(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和中国世界语刊授学校。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是由方善境发起成立的,1980年12月21日在武昌举行开学典礼。在两年中共招生

6 万多人，遍及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该校出版了一批课本、会话、词典和读物，在宣传和推广世界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世界语函授学校于 1984 年 12 月 8 日经文化部外文局分党组批准成立，后在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备案。从 1985 年到 1988 年共招生 13025 人。在其他城市建立了 11 所分校和 31 个面授站。此外，黄石、重庆、淮南等地的世界语函授和函授教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毕业的学员数以万计，同时还出版了大批教材、词典和辅导读物。

广播教学和电视教学都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影响面广，后者比前者还具可视性。解放前由于条件所限，只在 30 年代广州广播电台举办过世界语讲座，昆明广播电台播出过世界语会话，长沙广播电台开设过世界语课程。

上海解放后不久，从 1949 年 9 月初至 1950 年 2 月底，上海合众电台举办了 3 期世界语讲习班。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 6 次世界语广播讲座，后改为定期的世界语广播节目。举办过世界语广播讲座的还有重庆电台（1950 年、1983 年和 1984 年），太原电台（1982 年），锦州电台（1984 年），安徽电台（1985 年），兰州电台（1985 年），武汉电台（1985 年），呼和浩特电台（1985 年和 1986 年），马鞍山电台（1986 年），辽宁电台（1988 年），广东电台（1988 年和 1989 年）。

开办过世界语电视讲座的电视台有：淮南电视台（1981 年）、青海电视台（1986 年）、沈阳电视台（1987 年和 1988 年）、长春电视台（1987 年）、辽宁电视台（1988 年）、广州电视台（1989 年）、青岛电视台（1989 年）、中央电视台（1990 年）、枣庄电视台（1992 年）。

为了开展电视教学，沈阳和青岛分别制作了电视教学片《未来之声》和《希望》。这两部教学片质量较高，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希望》教学片还被评为全国电视教学的优秀教学片，1990 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时，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3800 多人报名学习，还有数以万计的世界语者和非世界语者收看，盛况空前。

2. 世界语教学的层次

世界语教学的对象极为广泛，包括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的人，包括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包括各种不同年龄的人，学习者当中还有不少残疾人，甚至还有在监狱服刑的犯人。据不完全统计，从 1980 年到 1986 年报名参加过世界语学习的人已超过 40 万人次。

为了早期开发儿童的智力，一些世协和世界语者在幼儿园开办了幼儿世界语班。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幼儿园、新疆昌吉州直属机关托儿所、上海田林新村幼儿园、内蒙古师范大学幼儿园、衡阳市一幼儿园、南昌市文化宫书画小班、包头市一幼儿园、温州乌努阿望龙幼儿园、福州台江区世界语学校举办的幼儿园等。此外还有不少世界语者从小教自己的孩子说世界语，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是北京的谢玉明教女儿谢瑞丰和张永乐、刘云霞夫妇教女儿张怡然。

为了推广世界语，在一些中小学里也开设过世界语课。早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广州的知用中学、培英中学、市立中学、市立师范学校、执信中学、广东体专、培正中学、培道中学、番禺师范、知行中学、庚戌中学、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广州市电信学校，上海的澄衷中学、广肇中学、南洋中学、文化中学、新亚中学、北平的大同中学、志同中学、春明女中、汇文中学、市立师范、盐务学校，太原的博文中学、外国语专门学校、职业师范学校、运城中山中学、河东中学、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泉州的黎明高级中学、泉州中学、西隅师范学校、南郊清蒙小学、涂门外的法工小学、石狮的爱群小学、龟湖的震华小学、鹏南小学、海沧沧江小学、沙塘村的江峰小学，天津育才小学、福州师范学校、西北安边高小、银川宁夏中学、广西邕宁县立乡村师范、天水五中、四川岳池中学、綦江中学、广东惠阳平潭中心学

校、桂林中山纪念学校、福建晋江国立海疆学校、成都成成中学、华西中学等 53 所学校把世界语列入正式课程或开办世界语班。

解放后，开展世界语教学活动的中小学就更多了，有 106 所：北京的东升小学、清华附小、中关村三小、101 中学、燕山石油化工学校；上海的田林三中、二中、静安区凤阳路小学、上海港湾学校；天津的南开中学、大沽路中学、郭庄子中学、少年宫、河北区启智学校；重庆的西郊中学、重庆第三师范学校、重庆师专；长春的红光小学、人民广场小学、曙光路小学、长通路小学、应用化学所子弟小学、机车厂子弟中学；昆明的实验中学、11 中、16 中、26 中、中华小学、艺术团少年世界语班；淮南煤矿 16 中；江西于都县平安中学；苏州中小学生世界语入门班；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中科院兰州分院子弟中学；成都华阳中学、年丰巷小学；广东曲江县周田中学；乌鲁木齐矿务局二中；醴陵市第一职业高中；湖北天门县实验小学、杨场潘渡小学；丹东六纬路小学；通化 19 中；延吉六中；常州东方小学；辽宁瓦房店物资职业高中；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第一小学；福建屏南二中；吉林公主岭永发中学；九台市卢家乡碾子沟小学；浙江平湖县城关中心小学、建国路小学；河南南阳三中；江阴申港中心学校；贵州都匀瓮桃中心学校；哈尔滨松花小学；镇江宝塔路中心小学；福建福安县职业高中；长沙南阳街小学；包头白云铁矿职业高中；江苏泗洪县双沟中学；福建霞浦县三沙烽火小学；内蒙多伦县一中、多伦县东仓小学；吉林浑江解放中学；临海市少年世界语学校；广州登峰小学；河北盐山县圣佛中学；唐山铁路二小；内江育才中学；鹤壁中学生世界语入门班；青岛上清路小学；广东东莞少年儿童世界语班；杭州武林路小学、拱宸桥小学；新疆昌吉小学；安徽第二建筑公司学校；绍兴实验小学；新乡世协少年艺术部；山东郯城县实验一小；湖南邵阳东塔学校；山东禹城辛店镇小杨小学；桂林中山中学；连云港解放路小学；扬州中学生世界语学习班；南昌市少年宫；内蒙师大儿童外语实验夜校；江苏盐城绿星小学；沈阳冶金专科学校；延安师范学校；天门县师范学校；黔南民族师专；福州绿桥成人中等专科学校；大连师专；青岛旅游职业高级中学；枣庄经济干部职工中专学校；安徽纺织工业学校；蚌埠师专；邵阳师范学校；浑江市财会中专；郑州医药专科学校；豫西农业专科学校；洛浦美术学校；新疆煤炭专科学校；哈尔滨师范学校等。

中、小学生学习世界语有下列好处：(1)开发语言能力，为学习其他外语打基础。国外有些学校做过实验，通过世界语学习其他外语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通过学习世界语可以了解外国的许多情况。(3)培养国际主义精神和增长儿童的国际意识。通过与外国的青少年世界语者通信和交往建立友谊。

大专院校是世界语教学的重要阵地。大学生文化水平高，有外语基础，能较快掌握世界语。他们当中会涌现一批积极分子，成为世界语运动的骨干人才。

解放前开设过世界语课或举办过世界语班的大专院校有 51 所。它们是：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岭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北京政法大学、长沙平民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长沙世界语专门学校、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上海大学、北京集成国际语言学校、武昌中华大学、武昌商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上海江湾劳动大学、广州新闻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女子学院、中法大学、朝阳学院、朝南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民国学院、警官高等学校、青岛大学、杭州西湖美术学院、上海大厦大学、同济大学、太原国民师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农学院等。

解放后开设过世界语课或举办过世界语班的大专院校有 135 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辅仁大学、培黎大学、中科院管理干部学院、北京智力

开发专修学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分部、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运学院、中国纺织大学、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南开大学、塘沽区科技进修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重庆师范学院、重庆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公路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延安大学、延安教育学院、兰州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教育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化工学院、南京邮电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常州教育学院、徐州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江汉大学、武汉工学院、沙市教师进修学院、沙市职工大学、鄂西大学、中华大学、湖北省汽车工业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学院、厦门大学、鹭江大学、黎明大学、三明大学永安分校、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学院、杭州大学、沈阳大学、辽宁师范学院、沈阳农学院、沈阳体育学院、东北工学院、辽宁体育学院、沈阳教育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大连大学师范学院、抚顺矿务局职工工学院、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青岛大学、青岛化工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烟台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安徽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阜阳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范学院、漓江夜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江西教育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学院、江西中医学院、南昌大学、长沙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湘潭师范学院、吉林大学、长春邮电学院、长春地质学院、通化师范学院、豫西农业专科学院、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师范大学、鹤壁市教育学院、新疆财经学院、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新疆工学院、新疆石油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河北师范学院、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承德大学、承德医学院、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山西大学、宁夏教育学院等。

(四) 世界语师资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教学离不开教师。世界语教学需要大批合格的世界语教师。因此师资的培养是世界语教学中头等重要的任务。

如前所说，早在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曾下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其目的在于培养世界语教师。

1926年广州成立了世界语师范讲习所，由黄尊生任所长。讲习所存在的十年中培养了一大批世界语教师，为当时广州的大、中、小学开设世界语课创造了条件。

1963年11月1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从全国11所大学调来一批青年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语教师进修班，由冯文洛、陈世德任教。

1981年10月教育部批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同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学制为一年。第一期和第二期由李士俊主讲、戴颂恩辅导，第三期由戴颂恩和殷国义任教。从1984年第四期起，进修班改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代办，任课教师为魏原枢、徐文琪和周亦民，直至1987年第七期为止。参加进修班学习的除高等院校选派的教师外，还有部分各地世协派来的同志。七期学员共143人。这些学员结业后，大部分都回到原校或原地开设世界语课。为了满足本地区世界语教学的需要，有些地方世协也举办过短期的师资培训班。

为北京广播电台开办世界语对外广播作准备，全国世协于1961年底至1963年7月举办世界语干部培训班，由冯文洛任教。1962年10月又举办第二个培训班，由冯文洛和陈世德任教。

1964年10月,高教部批准在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世界语班,从全国5所大学调来20名学生学习世界语,为世界语专业单位培养了一批人才。该班学制一年半,由冯文洛和陈世德任教。

1989年秋至1991年秋,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广播学院又开设世界语班,从该院各系二年级的学生中招收12人,毕业后分到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和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组工作。该班由李士俊主讲,李玉萍、刘俊芳、薛梅仙讲口语,张海平讲语法。

1996年11月,中国报道社又招收了6名英语大专毕业生,进行一年的世界语培训,由李士俊主讲、殷秦辅导并上口语课。为世界语专业单位又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

(五)世界语教材的编写与出版

教材是教学当中所不可缺少的。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材的质量。因此编写教材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前提。世界语教学也一样,开班开课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我国编写和出版的教科书共38种,最早的几本教材是1912年出版的,有陆式楷编写的《爱斯不难读》(后改名为《世界语文规》)、疾侵(即陆式楷)编写的《爱世语初阶》、林振翰编译的柴门霍夫原著《汉译世界语》和沈羽编的《世界语进阶》。后来陆续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课本有区声白编的《世界语读本》(1915年)、孙国璋编的《世界语高等新读本》(1923年)、盛国成编的《世界语全程》(1928年)、乐嘉煊编的《世界语初级讲义》(1932年)、索非编的《世界语入门》(1935年)、陈俊卿编的《世界语一月通》(1936年)、钟宪民编的《世界语战时读本》(1939年)、庄栋编的《世界语简明自修读本》(1941年)等。

解放后编写和出版的课本约6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冯文洛编的《世界语初级讲座》(1958年)、方善境编的《世界语初级课本》上册和下册(1980年和1981年)、祝明义编的《世界语课本》(1981年)、谢玉明编的《世界语中级课本》(1981年)、胡国柱编的《世界语初级教程》(1983年)、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一册和第二册(1983年和1984年)、张丹忱编的《世界语中级教程》上册和下册(1983年)、古存华编的《世界语课本》一至四册(1984年和1985年)、魏以达和刘祖军编的《世界语自学课本》(1985年)、潘逸书、钱敏棋和朱钟毅编的《世界语初阶》(1985年)、魏原枢、徐文琪和周亦民编的《世界语教程》(1985年)、王崇芳编的《世界语实用中级课本》(1985年)、李士俊、殷国义和顾建华编的《新编世界语课本》(1985年)、李士俊编的《世界语自修课本》第一册(1985年)、第二册(1989年)、邵融编的《世界语》(1986年)、李士俊编的《世界语初级教程》(1989年)等。

魏原枢等人编的《世界语教程》曾根据教育部(85)教高一司字037号通知的精神,于1985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福建泉州举行了审稿会,来自全国10余所高等院校和有关单位的世界语专家出席了会议。编者根据审稿会的意见对教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于1988年出修订本,为大专院校开设世界语第二外语课提供了教材。

此外,为满足世界语教学的需要,解放前后共出版了34种语法书、24种会话材料、39种词典和56种读物。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已在本书第4章第4节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六) 世界语教学法的研讨

教学方法是决定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我国世界语教学的方法受其他外语教学法的影响，解放前基本上采用传统法，即语法翻译法。解放后在主要采用传统法的同时，也引进了其他教学法，如直接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听说教学法、功能教学法、全身反应法、暗示教学法、集体语言学习法、比较教学法等等（世界语界比较盛行的崔氏教学法和萨格勒布教学法就是其中一些教学法的翻版），逐渐形成了一种综合教学法。由于世界语与汉语差别很大，完全采用直接教学法是行不通的。每一种教学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应博采各派教学法之长，将其融为一体。所谓的综合法，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和教学要求，可以有所侧重。如对于学龄前儿童应采用以直接教学法为主的综合法；对于一般的成年人可采用以语法翻译法为主的综合法；对于外语基础很好的人可采用以比较教学法为主的综合法。

为了探讨世界语的教学方法，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外，世界语教师还利用国内外举行各种世界语会议期间组织教学讨论会或专门开会研讨教学问题。

1989年11月6日至10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第1届亚洲世界语教学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苏联、瑞典、比利时、美国和中国的近40名世界语者参加。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主席希孟斯（Edward Symoens）先生和国际世界语协会领导成员徐吉洙（So Gilsu）先生亲临指导。

为适应我国世界语教学发展的需要，使世界语教学有所遵循，国家教委和全国世协委托上海外国语大学拟定《大学世界语二外教学大纲》。1985年8月在昆明举行第1届中国世界语大会期间曾初步征求过意见。1987年10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在西安举行第1次教学大纲讨论会，来自12所高校的世界语教师和有关单位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责成大连理工大学邵融、暨南大学方惠平、华中师范大学张丹忱、中国日报社李士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李威伦根据讨论会上所提出的意见，会后在进一步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就大纲的正文、词汇表、语法项目表、功能意念表、微技能表作出修订，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魏原枢进行综合，并于1988年12月在无锡举行的第2次讨论会上通过。

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后，加强了世界语教学法的研究，于1990年11月在广州举行了第1次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在曲阜举行了第2次学术讨论会，1993年8月在承德举行了第3次学术讨论会，1995年9月在重庆举行了第4次学术讨论会。每次学术讨论会都有10多位同志宣读论文，会后出论文集，对提高世界语教学的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七) 世界语水平测试与考核

鉴于世界语发展的需要，国际世界语协会和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参考其他外语国际考试的模式，制定了一套世界语国际水平考试的制度和标准，其特点在于十分突出世界语实际运用能力的测试，而且全面要求具有相应水平的听、说、写、读的综合交际能力。这对世界语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世界语国际水平考试由国际考试委员会统一出题，并颁发证书。中国的张丹忱为国际考试委员会成员之一。为便于在各国实施考试，还组成了国际授权考试团。中国的张丹忱、李威伦、胡国柱、韩祖武和高俊铨为授权考试团成员。

中国的第1次世界语国际水平考试于1989年11月在南宁举行，通过初级水平考试的8人，通过中级水平考试的7人。第2次考试于1991年8月在合肥举行，1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6人通过中级水平考试。第3次考试于1991年8月在广州举行，4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

7人通过中级水平考试。第4次考试于1991年12月在唐山举行,3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6人通过中级水平考试。第5次考试于1992年8月在青岛举行,23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14人通过中级水平考试。第6次考试于1993年8月在承德举行,39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第7次考试于1995年11月在承德举行,44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7人通过中级水平考试。第8次考试于1996年8月在上海举行,3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第9次考试于1997年6月在武汉举行,2人通过初级水平考试,2人通过中级水平考试。有些地方,对通过考试获得合格证书者在晋升职称时免考外语。

自从1982年教育部规定世界语可以作为干部考核和报考研究生的第二外语后,已有天津、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四川、福建、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人事厅职称改革办公室把世界语列入考试科目。从1983年到1998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约3千人通过世界语考试获得中、高级职称。另外,河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在招收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时,把世界语作为二外应试任选语种。

(八) 世界语教师组织

成立于1949年的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Internacia Ligo de Esperantistaj Instruistoj)是全球世界语教师的组织。我国有部分教师加入了此协会。1984年以前,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在中国的代表由四川大学的卢剑波担任。1985年建立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中国会员组,由张丹忱任组长,胡国柱和李威伦任副组长,其他领导成员还有于德全、韩祖武和朱恩。1988年7月张丹忱当选为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为了加强世界语教学的研究和交流经验,会员组于1988年5月创办了不定期刊物《世界语教学》;为便于会员沟通情况和联系,还出了内部通讯;为提高翻译水平,还出版了小刊《译苑》。

随着我国高校世界语教学的不断发展,为团结全国广大高校世界语教学工作者,进一步提高高校世界语的教学和研究水平,经国家教委高教一司批准,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Ĉina Societo de Esperanto Instruado en Superaj Lernejoj)于1989年10月在苏州成立。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是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的下属学术团体。全国16所高等院校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国家教委高教司副司长蒋妙瑞、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胡孟浩、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刘铃到会致词祝贺。大会通过了研究会章程,选出了由9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第1届理事会一致推举魏原枢任会长,李威伦和张丹忱任副会长,并由会长推荐施行为研究会秘书长。研究会成立后,即创办了内部刊物《高校世界语》,并多次举行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期间,进行理事会改选。第2届理事会仍推举魏原枢任会长,李威伦和张丹忱任副会长。

九、世界语集邮

邮票是国家的“名片”。集邮可以使人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精神生活，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广泛群众性的一种文化活动。中国从 20 年前改革开放至今，集邮界迎来大发展，集邮爱好者已逾二千万。

和整个集邮界一样，对于邮品和集邮品的概念至今世界语集邮界有不同看法，没有定论。一种认为邮品即集邮品，集邮者收集的一切与邮政业务有关的对象，均在其内，既包括邮票及封、片、简、戳，也包括有关的趣味品及文献资料。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由国家邮政部门发行使用或经其认可发行使用的集邮物为邮品，而其它则通通应称为集邮品或曰趣味集邮品。一般看法，参加国内外正式邮展，应受国际集邮联合会(FIP)的邮展规则约束，即应展出具有邮政性质的物品。群众性集邮活动则可不受其制约。为了宣传世界语，在观摩邮展中展出一些非邮政性质的集邮品也是有意义的，是有益于世界语运动的。

世界语的诞生和发展，早已在邮票和各类集邮品中反映出来。随着世界语邮票的问世，世界语集邮成为世界集邮的一个崭新题材。世界语邮票向世界公众介绍了世界语的发展史，也记载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寸之间寄托着人类使用一种共通语的美好理想。收集世界语邮票和集邮品自然而然成为一种风尚，我们称之为世界语集邮。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 1985 年通过决议，号召各成员国于 1987 年世界语百年诞辰之际，举行纪念活动，建议各国发行世界语纪念邮票。

与此同时，世界语集邮成为世界语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和世界语的不断普及，世界语集邮得到迅速发展。众多世界语集邮者，既是世界语者，又是集邮者，他们在收集世界语邮品与鉴赏、研究过程中，与各方朋友联络切磋，交流邮识，既传播了友谊，弘扬了集邮文化，也推动了世界语的传播。许多国家成立了世界语集邮组织，更有国际集邮家协会跻身于各种国际专业世界语协会之列。在历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世界语集邮家自动聚集在专门会议上，畅叙友谊，开展专业活动。对遍布世界的一千万世界语者来说，世界语集邮则是一个十分亲切的话题。他们中大多数并不集邮，但若有谁有幸获得一份世界语邮品都会十分高兴、珍惜。

在世界各国发行的难以计数的邮票中，世界语邮票数量不算很多。在众多专题集邮中，世界语集邮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专题，同时又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专题，它在世界集邮界已占有一席之地。

世界语邮票指的是国家邮政部门发行的：①有关世界语及世界语运动或印有柴门霍夫肖像的邮票；②票面上印有世界语文字的邮票；③带有印着世界语文字或柴门霍夫肖像副票的邮票。

世界语邮资封、片、简指的是：邮政部门发行或认可发行的载有世界语邮票图案或纪念、宣传世界语图文的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片和航空邮资邮筒。

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世界语文字的邮票是巴伐利亚 1911 年发行的，该票正票图案为摄政王路易·波尔德头像，带有载着世界语文字“世界语素食馆”的副票。苏联于 1925 年发行的无线电发明家波波夫逝世 20 周年纪念邮票，首次在邮票画面上印有世界语文字。世界上第一套以世界语活动为内容的世界语邮票是苏联 1926 年发行的，纪念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 6 届 SAT 大会。据统计，世界上有 18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过 70 多枚世界语邮票，其中包括加字改值票及小型张，不包括变体。世界语邮资封、片、简则有 17 个国家发行了 860 多枚（资料至 1998 年）。

世界各国发行的世界语邮票，数量不多，品种不少。有有齿票，有无齿票；有小全张，有小张；还有票中票。其中票幅小的仅 24×30mm，大票幅的达 48.5×40mm。值得指出的是，世界语邮票大部分是由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发行的。这应和世界语运动在这些国家有较大发展有关。

（一）中国发行的世界语邮票及邮资封

中国先后发行了一枚世界语邮票和一枚世界语邮资信封。

1987年7月26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世界语诞生1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全套一枚，编号 J139，影写版，绿、蓝、黑三色印刷，画面为五个大小不一的“Esperanto”组成的地球，寓意世界语遍及全球。邮票上还有世界语百年纪念图案和纪念文字。邮票设计者许洪茹是天津职工工艺美术学院学生。邮票票幅 26mm×31mm，齿孔度 11 1/2，全张枚数 80 (8×10)。此票面值 8 分，符合当时国内平信邮资。邮票印量 2605.65 万枚。

在五彩缤纷的世界语邮票中，中国占了一项第一：发行量最高。对比《第 38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邮票 (1953 年里雅斯特自由区乙区发行)，该套邮票中 300 第纳尔高值票仅发行一万五千枚。中国这枚世界语邮票随着绿色邮差进入千家万户，进入有二千万人之巨的中国集邮界，使数以千万计人知道了世界语，它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起了无以伦比的作用。

此前一年，1986年7月26日，值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枚邮资信封，编号：JF5。邮票图案主题为三叶绿花，花形五角，花蕊为鸽子组成的 UK (国际世界语大会) 字样。另有世、汉说明文字。在邮资封正面印有为鸽子环绕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会徽，背面有中、英、世三种文字关于世界语和 71 届世界语大会的说明。邮资封发行量 107.6819 万，封大 180mm×105mm，邮票票幅 26mm×31mm。此封设计者为著名邮票设计师任宇。邮票面值 10 分，符合当时中国国内航空邮资。

中国发行的世界语邮票和邮资封填补了中国邮票无世界语内容的空白，扩充了中国邮票发行题材，丰富了世界世界语集邮的收藏。

（二）中国的世界语集邮组织

1994年4月，中国集邮世界语协会在北京成立。协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昊苏和《中国集邮报》总编辑周家奎任名誉理事长。协会理事会由十几名理事组成，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多职。

当时曾印制了一枚协会成立纪念信封。封由第 71 届世界语大会邮资封设计者任宇设计。1995 年和 1996 年，又曾以协会名义印制纪念世界语前辈楚图南和胡愈之的纪念封。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除了印制上述几枚纪念封，协会开展活动较少，没有很好地担负起指导全国各地世界语集邮活动的责任。

活跃在世界语集邮界的，是各地一些世界语集邮组织和个人。

（三）中国的世界语集邮队伍和他们的活动

中国的世界语集邮活动出现较早。从本世纪前叶世界语邮票面世，中国就有收集世界语邮品的活动。早期活动详情已不可考。

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世界语集邮者已有相当数量。例如北京老世界语者秦凯基就是于 40 年代在南京开始收集世界语邮品的。但终究这一时期世界上世界语邮品总数量屈指可数，中国世界语集邮者未形成规模，散于各处。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各地均出现世界语集邮爱好者，他们以收集外国世界语邮品为主。

应当说，中国的世界语集邮是随着世界语运动的兴衰而起伏的。“文化大革命”中，世界语运动停滞不前，集邮文化不复存在，也就无所谓世界语集邮活动了。70 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世界语工作得以恢复，人们对世界语集邮重树信心，世界语集邮者队伍得到发展，中国的世界语集邮活动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阶段。

随着世界语集邮活动的开展，全国许多地方成立了世界语集邮组织，他们出版世界语集邮刊物，举办世界语集邮展览，制作世界语集邮品，参加国际世界语集邮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兰州、北京、沈阳、长沙、武汉、海口、南昌、青岛、上海等地成立过世界语集邮组织。

据资料，兰州世界语集邮组 1983 年 5 月创办的组刊“绿色放大镜”是第一份中国世界语集邮刊物。此外，尚有泾川、沈阳、长沙、青岛、海口等地曾创办过世界语集邮刊物。影响颇大的常熟世界语刊物“绿萤”曾辟世界语集邮专版。这些世界语集邮刊物尽管多为油印，且较为粗糙，但它们终究曾为中国世界语集邮活动起过推动作用。

为了向广大公众介绍世界语，宣传世界语集邮的成绩，许多世界语组织和个人举办了世界语邮票展览，或选送邮集参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地方的集邮展览。有的取得了较好名次。如：曹雄林 1993 年以《世界语的应用与发展》邮集参加了当年的中华全国集邮展览，获镀银奖。

陈珊所编世界语邮集《国际普通话——世界语》获 1987 年四川省第 4 届集邮展览二等奖。

沈明伦在浙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40 周年邮展上展出《世界语——方兴未艾的“国际普通话”》邮集，获三等奖。

1990 年崔海京以 60 贴片邮集《世界语，和平和友谊的语言》获第 3 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展二等奖。

黄国珍以 80 贴片邮集《Esperanto——世界语》获 '97 湖北省迎香港回归邮展银奖。

除了参加各种竞赛邮展外，中国世界语集邮者还和集邮部门联合举办了一些旨在宣传、普及的观摩邮展，如：1987 年 7 月在四川绵阳举办的“陈珊个人世界语专题邮展”，1989 年 7 月在新疆昌吉为纪念昌吉市世界语协会成立二周年举办的“世界语与集邮”邮展，1989 年 11 月在江西南昌举办的“曹雄林个人世界语专题集邮展览”，1992 年 11 月，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和北京西区邮票公司举办的“郭沫若诞生 100 周年暨柴门霍夫诞生 133 周年集邮展览”，1994 年 7 月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和北京市西区邮票公司为纪念第 4 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举办的世界语集邮展览，1997 年 1 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北京西区邮票公司等单位共同举办的“纪念胡愈之诞辰 100 周年集邮展览”，1997 年 9 至 12 月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北京市西区邮票公司、郭沫若纪念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邮票博物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等 11 个单位联合举办的“方寸之间见伟人”（纪念郭沫若的大型邮集，内有“世界语园地”专栏）的集邮展览等。这些集邮展览都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

到 80 年代，中国已拥有数目可观的世界语集邮爱好者，约数百人。他们藏品的数量和品种已具备相当规模。

在整理中国世界语集邮史方面一些世界语者做了有益的尝试。

(四) 独具特色的中国世界语集邮品

多年来，中国世界语集邮者和各地邮政部门、邮票公司协作设计制作了大量世界语集邮品，包括纪念邮戳、纪念戳、纪念信封等。

世界上第一枚世界语邮戳出现在 1912 年，奥地利举行的第 8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

50 年代中国第一枚世界语邮戳问世。1959 年 4 月 25 日，江苏常熟市邮电局为纪念常熟解放 10 周年刻制使用了老世界语者张麟瑞设计的纪念邮戳一枚。邮戳图案刻有带着“E”字样的世界语绿星标志。这是中国第一枚世界语纪念邮戳，也是中国第一件世界语邮品。国际世界语集邮家协会将该戳编号为中国 TJ-A1。

80 年代以后，中国世界语集邮品更如春潮般涌现。其中包括纪念封、片，能盖销邮票或邮资凭证的纪念邮戳和盖在封、片上的纪念戳。

伴随中国第一枚世界语邮票发行，中国集邮总公司和各省市邮票公司均发行了首日封，刻制使用了纪念邮戳。许多地方的邮电部门、集邮协会、世界语组织也印制使用了纪念信封。

在纪念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邮资封发行时，中国集邮总公司、北京市邮票公司和一些地方邮票公司使用了纪念邮戳。

这些邮戳和纪念戳均载有世界语文字或世界语内容。

在举行重大世界语活动时，各地世界语组织和当地邮政部门或邮票公司配合制作了许多纪念信封或明信片。如：1985 年中国第 1 届世界语大会在昆明召开，昆明市邮票公司印制了纪念信封，经昆明市邮电局批准还使用了纪念邮戳。

90 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世界语协会举办第二、三、四届国际世界语科学技术会议时，都印制了纪念信封或刻制了纪念戳，纪念邮戳。

1990 年北京市西区邮局印制了一枚《中国报道杂志社成立 40 周年》纪念信封，刻制使用了纪念戳。

1989 年青岛市邮票公司和青岛市世界语协会联合印制发行一枚纪念信封，纪念“世界语电视教学片‘希望’首次正式播出”，并刻制使用一枚纪念戳。

同一年为纪念柴门霍夫诞生 130 周年，北京市西区邮电局和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合作，印制发行了一枚精美的纪念明信片，上面印有各国发行的 15 枚载有柴门霍夫像的世界语邮票图案。

各地邮票公司、世界语组织和个人还利用重大活动日、邮票首发日等机会制作了不少世界语邮戳和纪念戳。

在世界语邮品的创意、设计方面，张麟瑞、谢绍幸、秦凯基是佼佼者。他们以对世界语事业的赤诚和世界语集邮的热爱，为世界语集邮事业作了大量的工作。

张麟瑞自 1959 年到 1998 年为南至海口，北至呼和浩特，西至拉萨，东至沈阳全国各地设计了世汉及世汉蒙、世汉藏文邮戳、纪念戳共 262 枚。张麟瑞还为各地邮电部门、邮票公司、集邮协会和世界语组织设计了带有世界语文字说明的 27 枚邮票首日封，100 多枚纪念封。如《戊辰年》、《中国共产党第 13 次代表大会》、《第 7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戊寅年》邮票首日发行时，张麟瑞均应邮电部门之托设计了美观大方的纪念邮戳。这些邮戳受到国内外世界语集邮者好评。在设计世界语集邮品方面张麟瑞当属中国第一人。

谢绍幸和谭爱玲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共同为北京和广东江门、新会等地邮政和集邮部门设计了 60 多种精致的世界语封、片、纪念邮戳、纪念戳等集邮品。这些集邮品中有许多是纪念世界语前辈和支持世界语的知名人士，如胡愈之、楚图南、巴金、叶籁士、邓颖超、方善境、陈世德、张闳凡、绿川英子、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茅盾、陶行知、曹靖华、高

尔基、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等，起到了缅怀先辈业绩和宣传、推广世界语的作用。

秦凯基是中国最早的世界语集邮者之一。前述在京举办的几次世界语集邮展览，带世界语邮票图案明信片的发行，都是秦凯基不懈努力的结果。多年来作为北京市世界语协会集邮组的负责人，他策划制作了 40 多种世界语集邮品，纪念世界语节日，世界语名人，世界语支持者。其中以许多图文并茂的纪念明信片最有特色。世纪老人冰心曾六次为秦凯基策划的世界语集邮品和举办的世界语集邮展览题词，巴金老人也曾为其提供帮助。秦凯基还曾几十次向国内各地及日本、匈牙利、德国、荷兰、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国刊物投稿，介绍报道中国世界语集邮品。

中国的世界语集邮者广泛参加了国际交流活动。可以说，他们每个人的世界语邮集都是各国世界语者间纯朴友谊的结晶。许多人在收集世界语邮品中得到外国同行的指导和无私赠予，这里面没有等价交换的概念。如果说世界语者有和各国朋友通信联系的传统，那么世界语集邮者在其中则有着最广泛的联系。

中国有 20 多名世界语集邮者加入了国际世界语集邮家协会，和协会各国会员交流信息，交换邮品。中国世界语集邮者参加了多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举行的国际世界语集邮家协会年会。在 1986 年北京召开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宋绳坦受国际世界语集邮家协会主席伊伐尔·保乌尔松先生之托，主持了协会年会。

1998 年，国际世界语集邮家协会会刊《绿色放大镜》主编鲁道夫·布尔梅斯特 (Rudolf Burmeister) 来华访问。他对中国世界语者制作大量世界语邮戳和纪念戳作了高度评价，对它们的设计者和创意者表示了崇高敬意。他根据近 20 名中国世界语集邮者提供的资料，以协会名义编辑了一本《中国世界语邮戳、纪念戳图录》，内收世界语题材邮戳及纪念戳 159 枚，非世界语题材邮戳及纪念戳 289 枚。

(五) 中国新闻界对世界语集邮的反应

中国中央和地方主要集邮刊物历年来积极反映世界语集邮消息和知识。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刊《集邮》多年来积极介绍世界语集邮。早在 1956 年，《集邮》就曾发表张乃骏文章“绿星闪耀”，并刊有多枚世界语邮票。改革开放后，有关介绍就更多了，如 1982 年第 9 期宋绳坦文章《柴门霍夫和世界语》，1987 年第 7 期邓丰文章《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1997 年第 7 期崔海京撰稿《世界语邮集的组编》。《集邮》杂志还对国内、外获奖世界语邮集作过详尽报道。

《集邮博览》、《中国集邮报》等刊物亦曾多次发表有关世界语集邮文章。如《集邮博览》1995 年第 12 期载文，详尽介绍历年发行的珍贵的世界语邮票，1997 年第 4 期发表崔海京文章《也谈世界语集邮》。《集邮博览》还发表过张麟瑞对世界语集邮的见解。

地方集邮刊物如《江苏集邮》、《浙江集邮》、《新疆集邮》等发表世界语集邮文章有几十篇之多。

全国各地非集邮报刊上宣传世界语集邮的文章数不胜数。

在广播、电视中，世界语集邮也得到反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部，世界语文版《中国报道》，《世界》杂志对于世界语集邮方面的消息更是做了充分的报道。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于 1987 年世界语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世界语版《世界语邮票目录》。这本 114 页的册子收录了自 1911 年至 1987 年已知的世界各国发行的世界语邮品。所有邮品均有详尽说明，并附彩色图片。

这部材料翔实、印刷精美的册子是世界语界唯一的一部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世

界语邮票目录，它成为各国世界语集邮者必备的参考书。为此我们在世界语集邮方面又创下了一个世界第一。

有一件有趣的事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曾于1959年用世界语出版过一本中国集邮公司编辑的精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册中内容为：① 中国邮票史 ② 原票欣赏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精选（彩页）④ 1949年10月至1959年3月中国纪念、特种、普通、航空、欠资邮票图录 ⑤ 新邮存页。

值得一提的是，此册“原票欣赏”部分贴有一枚1958年中国发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小全张原票。此小全张发行量仅20万枚，目前已价值不菲。这本册子也就显得更珍贵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邮票与欣赏》，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366日世界名人邮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邮票中的世界名人》都曾介绍过世界语邮票。

各地出版的中国邮票目录、图录中均详细介绍了中国世界语邮品。

中国具权威性的集邮辞典、书籍多次反映了中国世界语集邮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集邮大辞典》中收入条目，介绍《世界语邮票目录》，计270字。人民邮电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漫话专题集邮》一书以9页篇幅介绍了专题邮集《世界语——人造语言》。

（六）中国世界语集邮界的骄傲

在众多世界语集邮者中有一位著名的集邮家。他的世界语邮集多次在中国国家级邮展和世界邮展获得奖项，为中国世界语集邮者，为中国集邮界争了光。他的成就体现了中国世界语集邮的水平。他就是宋绳坦先生。

宋绳坦先生，中学高级教师。1958年在大学读书时学习世界语，信手收集到几枚世界语邮票，开始仅当作学习世界语的纪念品保存。后来对世界语集邮发生兴趣，潜心搜集世界语邮品。至“文革”前他的世界语邮集初具规模。不幸其邮集在“文革”中损失殆尽。“文革”结束，他在国内外世界语者的鼓励帮助下重新开始世界语集邮。他的收集由邮票而封、片、戳，由近期邮品而早期邮品，内容不断丰富。

宋绳坦世界语邮集《人造语——世界语》（后更名《世界语遍世界》）先后在“1983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中获得银奖（邮展设金、银、铜三种奖，而外国专题邮集中获得奖项最高者即为银奖），在“1989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中获镀金奖（邮展设金、镀金、银、镀银、铜五种奖）。

宋绳坦的世界语邮集在198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世界集邮展览”上首获铜奖，1993年“巴西世界集邮展览”上再获铜奖。1993年“第6届亚洲国际集邮展览”上他的邮集赢得镀银奖，1995年“第8届亚洲国际集邮展览”上进而获银奖（两次邮展均在印尼举行）。

宋绳坦获奖邮集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不断更新内容，质量日臻完美。很多邮品得来极为艰辛，如奥地利1912年第一枚世界语邮戳“第8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巴伐利亚1911年第一枚世界语邮票“世界语素食馆”，比利时和奥地利的样票，但泽自由市纪念邮资明信片及纪念邮戳，奥地利的邮资明信片和航空邮资邮筒均得来不易。

此处仅举宋绳坦在1995年第8届亚洲国际邮展上获奖邮集《世界语》内容为例，这部80张贴片的邮集内容是：

1. 世界语的诞生：(1) 语言的纷繁；(2) 世界语的创始人；(3) 世界语的标志；(4) 世界语的支持者。

2. 世界语的发展：(1) 试验时期(1887-1917)；(2) 成熟时期(1918-1945)；(3) 复苏时期(1946-1957)；(4) 繁荣时期(1958-)。

3. 世界语的应用：(1) 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2) 在各专业方面的使用。

4. 世界语的展望：(1) 世界语一百周年；(2) 世界语的改良——依杜语(Ido)；(3) 世界语的未来。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宋绳坦邮集之完整。

宋绳坦邮集在国内外邮展中屡屡获奖标志着我国世界语集邮已达到世界水准，这是我们中国世界语集邮界的骄傲。

宋绳坦不仅自己收集世界语邮品，而且热忱地指导许多世界语者收集，受到各地世界语集邮者的尊重。宋绳坦是江苏集邮协会理事，南京市集邮协会副会长，同时担任江苏的省级邮展评审委员，《江苏集邮》杂志主编，为江苏集邮事业辛勤耕耘。

宋绳坦关于世界语集邮的著作颇丰，见于各地报刊中。前述《世界语邮票目录》也是宋绳坦编纂的。

在浩如烟海数以千计的专题集邮中，世界语集邮仅是一朵小花。中国世界语集邮者的整体水平仍不为高。对于中国世界语运动，世界语集邮方兴未艾，日益重要。中国的世界语集邮者还应当继续努力学习集邮知识，规范自己的邮集，同时提高世界语水平，加强与国内外世界语集邮家的交流，扩大收藏，掌握信息。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学习世界语，加入世界语集邮爱好者行列，期待着有第二个宋绳坦、第三个宋绳坦出现。

十、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

关于世界语和国际语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的起步比较晚。它大体上反映着世界语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也反映着现代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从早期的零星介绍到当前初步的较正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但是这种研究还要获得进一步的条件，才能真正较好地开展起来。

（一）早期的学术介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世界语的先行者们就比较系统地介绍国际语运动和世界语了。如胡愈之等写作的《国际语运动》、吕蕴儒的《世界语论文集》、郭后觉的《国际语概论》、黄尊生的《中国与世界语问题》、李涪的《世界语丛谈》、徐沫的《世界语新论》。在这些著作里包含着对一般国际语和世界语的比较认真的介绍，也有初步的理论探讨。

30年代从日文翻译的著作不少，如Ossaka著《前置词研究》，高木弘的《言语的发展》、《国际语底历史》、《世界语语源概观》和《言语的本质与起源》，Spiridovič著《言语学与国际语》。当时也有一批从原文翻译的著作，如柴门霍夫的《国际语问题及其解决》和《语言答问》选段，Ch. Lambert的《国际语问题》，V. Varankin的《世界语发音学》、《世界语形态学》和《国际语问题》，E. Ćefeč的《世界语之原素及造字》，H. Seppik的《主动的分词》和《被动的分词》，L. Ĵirkov的《Esperanto和世界底语言》，Efim Spiridovič的《在言语发展史上国际语的根源》、《世界语与语言学》和《柴门霍夫的语言理论及其思想之批判》，Collinson的《语言的结构》和《言语科学底基本知识》。这些译作大部分刊登在《世界语之光》、《世界》、《希望》、《绿帜》等世界语刊物上。少数则由国内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献可以说是国际上关于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的开创性著作；如Spiridovič的著作突出了对国际语的语言学根据之研究，但又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开展新的世界语运动，因为国际语的完成是劳动阶层的任务。这些著作之被及时介绍进中国，是很有意义的。

商务印书馆1931年就出版了Privat的《世界语史》译本（天均译）。同年《广州世界语月刊》刊登了这一著作的另一种译文《世界语语言史》（杨景梅译）。至于E. Drezen的著作，当时介绍得最多，刊于《世界语之光》的就有《柴门霍夫论》（李逊、傅平、璧城译）、《柴门霍夫论（下卷）》（傅璧城译）、《国际语底创始人和理想家的柴门霍夫》（傅璧城译）、《民族文化与国际语》（逸吾译）、《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逸吾译）、《苏联世界语运动历史的一页》（熹至译）。还有《希望》、《世界语周刊》、《世界》等世界语期刊和《文明之路》、《语言文字专刊》等非世界语期刊，也刊登过一些研究文章，如《柴门霍夫底个性和其最后的悲剧》、《国际语底途径》、《世界语——“记号”或“实在意识”》、《语言的起源》、《采用自然语为国际语的不可能》、《现在的世界语（Esperanto）》、《未来的国际语和全世界的语言》、《十八世纪以前初期普遍语方案》、《五十年来的自由人造语言》、《死语言与活语言的改造与普遍化》。Drezen所著的《新兴言语理论》（徐沫译）也由上海新文字书店出版（1936）。

不过，当年这种对国外学术研究的及时跟进毕竟还是偶然的现象，并没有后续的劲头。（况且还有艰难时局的制约。）例如德国学者韦斯特20—30年代论语言规范化和研究介词的著作以及他在世界语学方面的奠基之作《世界语学的三个原则》，我国都未见介绍（他1959年

的世界语论文集还是无人问津)。卡洛柴的著作《语言、风格、形式》(1931)没有完整介绍,只有《世界语的发音》、《谈接头语 Mal》、《语言、风格、形式》的语法片段介绍过。卡洛柴和瓦伦铎合著的《世界语语法全书》(1935)也没有人介绍。Paul Fruictier 的语法书(Kompleta gramatiko kaj vortfarado de Esperanto,1930年补订本)也只由方善境翻译过关于冠词的片段;原本在1934年由北平清华绿星社影印过,直到1981年才有中译本。被忽略的还有一批用民族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撰写的较有水平的著作。这一耽搁就是几十年,直到70年代末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

从语言学界的情况来说,早年在第2届和第6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都就世界语问题组织过专题讨论。舒哈特就极力赞成世界语。萨丕尔也支持国际语的理想(言论见其文集)。他和布龙菲尔德、鲍阿斯等五位学者的讨论载在《国际辅助语问题纪要》里(The Romanic Review, Columbia, 16 (1925). New York 1952)。叶斯泊森和柯林松也都积极提倡国际语。叶斯泊森支持伊多语(后又自创新国际辅助语)。他提出国际语学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分支。柯林松批评伊多语,赞成世界语;他著有《世界语和它的批评者:对某些伊多语者反对意见的考察》(1924)和《国际语言》(1932 [Cambridge 1952])。几十年来各国有不少学者发表过国际语研究的重要著作。但是由于解放前语言学在我国发展非常缓慢,解放后又长期在苏联理论的影响下对西方的研究漠不关心,所以国际语言学界的很多成果我们都不了解。比如《中国语文》上发表过《关于国际共同语的形成问题》(武彦选,1957/7),虽然否定了斯大林关于语言溶合的理论(语言溶合会产生第三种语言),但是并不同意世界语可以成为国际语言。

本来早在国际世界语协会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中国学者黄尊生(Won Kenn)就曾被选入语言委员会。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的活动没有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隔了10年才首次派人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这个接近空档的大半时间里,只有零星的短篇理论文章。例如《国际语创造的途径:从空想到科学》(徐沫著)、《关于世界语翻译的几点意见》、《世界语是不是语言?》、《论国际语的几个问题》在《人民世界》发表过。国内刊物发表这类文章更少,所知的有《国际共通语和世界语》(赵觉诚,《中国语文》1957/4)、《国际语作为地理学科学交流和科学著作工具问题》(?作,《中国报道》,1962/5)、《世界语与语言学》(岑麒祥,《文汇报》1962.10.9)。徐沫在文化大革命前完成了Drezen《国际语史》的翻译,可惜此书并未出版。叶籁士和方善境在30年代就倡议进行世界语学研究;《世界》杂志曾增加副刊《言语科学》刊登这方面的文章。叶籁士在60年代从P. Neergaard那里得到一批《世界语学》杂志;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根本不可能进行这类研究。倒是台湾学者高思谦于1970年发表过较有分量的介绍文章:《国际语问题及其解决》(《中山文化学术集刊》第五集)。该文阐述了国际语的重要性,推崇世界语;又着重讨论了语言中的自然成分和人为成分问题,指出:世界语的词汇和语法的组织及原则是有效的、合理的,没有可以指责之处,目前的讨论实际上对国际语观念不能再有所增加,要取消成见。

随着中国大陆的世界语运动加入国际世界语运动的行列,中国学者的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也开始跟上国际的潮流。

中国世界语界的学者们虽然很少从事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的纯理论研究,但是他们在将理论结合于实践方面,在应用语言学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世界语元老吴稚晖、钱玄同,都积极倡导和投身国语统一运动,鼓吹汉字拼音化。30年代方善境(焦风)率先将中苏学者共拟的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叶籁士、陈原后来都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人。柴门霍夫把东欧语言的字母c引进了世界语;中国的世界语学者又把世界语的c引进了汉语拼音。此事看似微小,然而却永远可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成为中国世界语者的纪功碑。

(二) 正式介绍和研究的开端

1. 语言学著作中的国际语和世界语

1979年常宝儒根据S.N.Kuznecov的著作写了《国际辅助语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语言学动态》第1期),首次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国际语学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概况。1980年,周流溪翻译了威尔斯的著作《世界语的语言学概观》(Lingvistikaj Aspektoj de Esperanto),由北京市世界语协会油印发行(十几年后易名《世界语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是70年代世界语学的重要著作;译者又补充了不少材料,使译本带有国际语学的广泛色彩。

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许多部语言学概论教材;在不少教材里都提到国际辅助语和世界语,与国外的教材相比,介绍的分量还算比较多。比如美国大学的一本通用教材Fromkin & Rodman的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语言导论第3版1983年)在第8章“社会中的语言”有一节介绍“人造语言”,谈及国际语和世界语。这还算不差。别的许多书则很少提及。一些社会语言学概论教材,虽有介绍,但怀疑的调子居多。如特拉吉尔的《社会语言学》(1974, 1983),在第7章(语言与民族)里有一段提到世界语,但说它不是民族语,不像能被人们接受。而在一些大部头的社会语言学著作里则更对国际语连提都不提。

相比之下,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都介绍了这方面的知识。《语言学导论》在第8章(语言的变体)第6节用了一节来介绍世界语。这是我国语言学教科书中较早、较详细介绍世界语的一部。郭谷兮主编的《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在第5章(第5节)也有一小节谈国际辅助语,主要是谈世界语。它总结了世界语同各自然语言相比较具有四大特点:(一)使用拉丁字母,一个字母表示一个音素,重读固定,发音清晰而和谐动听;(二)语法简洁、明晰、精确,没有例外,易记管用;(三)词汇国际化,根词精当,构词规律性强,把人们从死记硬背大量单词的劳苦中解放出来;(四)语言统一,结构规范化而有理据,没有杂乱的难学难记的东西。这些优点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公认。编者认为世界语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工具,“愿绿星(世界语的象征)的光芒辉煌灿烂”。但本书此处也指出:“世界语的最大弱点是没有坚强的民族后盾,没有能成为随母乳而下的一种母语或第一语言。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看,世界语一经广泛使用就得注意发生变体,防止分化而形成方言,因此要极力及时进行规范,统一口径,确保通用性。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中国的语言学界有较多的人了解和支 持世界语,是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复兴和世界语者的参与研究直接相关的。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岑麒祥、金克木和陈原等都是世界语者,它们的学术宣传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周流溪参与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的多部百科全书的编写,在这些书里都能准确地介绍世界语。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有专节讨论国际辅助语。他认为国际辅助语应该超越民族、政治上中立、结构上科学、读写容易、语法灵活、方便学习而不过于简单。这些特点世界语都具备了。

王钢的《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第9章是“社会语言学”,下面有一节(第6节)讨论“国际性语言”;又下一小节(9.6.2)谈“人工国际辅助语”,其中具体谈到世界语的优点。作者最后说:“不过,世界语毕竟是一种人工的国际辅助语,还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用它作为自己的母语(第一语言),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国际交往(无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任何一个方面)用世界语作为主要的工作语言,当然世界语协会的代表大会除外。”这却稍嫌武断。

中国语言学界对国际语和世界语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是好事。国际语和世界语在语言学

著作中被提到，这大大有利于这方面知识的普及。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满足。我们要有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的独立研究著作，包括理论专著。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包含着艰巨的任务。目前，我们还得主要先做一些普及的工作，在普及的基础上更求提高。

2. 蓬勃开展的世界语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语学者通过自印书刊、召开学术会议以及正式出版，发表了很多文章和专著；这些著作大部分属于语言应用性研究，也有一些是理论探讨。

先叙述翻译方面。方善境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联络了一批同志编印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学的资料。在油印小册子《世界语——革命的语言》第二、三集里，有宋绳坦翻译的瓦伦铿在50年代写的3篇著作：《世界语运动史概要》、《世界语在裁判席前》（评曼德尔斯40年代的著作《五种人造语比较》）和《关于英特林瓜语的补充考察》（按：此处“英特林瓜语”是指IALA的中介语），以及祝学礼翻译的庇隆《世界语是欧洲语言还是亚洲语言？》（70年代著作）。这些文章，尽管有的很老，能与读者见面却不容易；它们像报春的燕子，预示了世界语学在华夏大地的兴起。

专著翻译有威尔斯的《世界语学概论》（周流溪译，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小坂狷二的《世界语前置词略解》（周力译，《世界》1981—85年连载，1985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佛瑞克梯尔《世界语语法和构词》（古存华、魏以达译，1981年由重庆《世界语学习》编辑部出版），普里瓦《世界语史》（张闳凡译，1983）和《柴门霍夫的一生》（龚佩康译，1983）两个译本均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谢皮克《世界语中级语法》（张海燕译本，1980年北京油印；余海涛译本，1984年由重庆《世界语学习》编辑部出版）。在《世界》杂志上刊登的单篇译文或摘译有Kalocsay《世界语的文风》，Frank《控制论与国际语》、《世界语和语言学》，Piron《从比较中看世界语》，G. Grisduidh《英语将成为国际通用语吗？》，C.O. Kiselman《世界语的及物和不及物动词》。《外国语》1988年第3期刊载过Collinson《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考察世界语的价值》。其中《世界语的及物和不及物动词》可说是很重要的世界语学新文献，值得重视。

湖北、北京、江苏等地的世协、中国科学院世协和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都召开过学术讨论会。全国还有过大小不等的各种会议，其中也有学术交流。这是世界语学术活动兴旺的标志。在这些会上产生了一批学术论文，如：张丹忱《语际语言学与世界语学》，徐道荣《Kiom da ĉina en Esperanto? (论世界语中的汉语成分)》，张乃骏《论世界语中的英语词》，米济生《世界语中的同源异形词》，刘志强《关于世界语语音规范化问题》，韩德章《世界语植物名称探源》，胡国柱《Por Pli da Aŭtentikeco》（该文考证世界语传入中国的真实史料），张企程《世界语和第三世界》，张闳凡《两种不同的国际性》，谢玉明《La Tendenco de Esperanto》（即《世界语的发展趋势》），欧阳文道《科学交流中的语言障碍的解决途径》，宋绳坦《世界语与人造国际辅助语》，刘镇庆《对世界语基本词汇来源的探索》，朱一桂《论世界语的音位系统和若干有关问题》，张大敏《世界语的语音特色》，任润培《关于世界语语音的几个问题》，王崇芳《一种特殊的插入语》，刘鸿元《论使动动词和自动动词》，卜华度《世、法动词分词比较》，赵达《世、英、法数词比较》，刘志强、朱国华《谈拉英世医学词汇的对比及其转换规则》，周尧《世界语和昆虫学》，曾定之《对中国植物名称引入世界语的高榘》，周流溪《Kunmetitaj Vortoj en Esperanto》（此文论复合词）和《Elementaj Radikoj en Esperanto》（此文论最低限度词根）。上述论文有的后来发表于《世界》杂志。

《世界》杂志提供了这一阶段世界语学者发表成果的主要园地。此外，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小刊上也登载过不少较有特色的文章。王崇芳在《世界》上发表了大量语法修辞研究论文。秦凯基、季银庚也发表过几篇讨论语法的文章。

谈数词的有裴治与秦凯基(1990/3)、李士俊(1991/12, 1992/1)、胡国柱(1992/7)。胡有《促膝谈 E 录》连载于《绿萤》。探讨世界语的民族特色的有汤钟琰(1983/1, 1984/1)、唐裕德(1983/4)、温晋根(1989/1)、刘晓骏(1992/9)。其他文章如:《拉丁语名词进入世界语的转换规则初探》(孙子刚, 1985/9 11)、《中国需要世界语运动学》(林力源,《绿穗》1990/3;再论, 1998/1)。

1980年周流溪试图重建清末民初的世界语运动史(文载《新花》小刊)。胡国柱考证早年中国世界语者参加国际活动的情况,有札记多篇(《世界》1988-89年连载)。李向平编译的《世界语何时诞生》论证世界语第一书发行的日期应为1887年7月26日(旧历7月14日);直接以现行公历7月14日为期是不多(《世界》1986/2)。⁶⁹李益三在整理广东世运史方面作出了贡献,文章载于《世界》和《绿穗》。侯志平对中国世运史实长年穷搜,成绩最大;他在《世界》发表了几十个老世界语者的小传和《中国世界语运动年表》。后者于1985年成书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名《世界语运动在中国》。

由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尤其是魏原枢)的支持,《外国语》1988年第3期出了纪念世界语100周年专辑,发表的文章有:岑麒祥《世界语过去、现在和将来》、李士俊《国际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略论世界语的发展道路》、张闳凡《国际性与国际语》、张丹忱《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和一批语法研究专论。这在较高级别的学术刊物还是首次。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于1993年出了一本《世界语研究论文集》;但似乎难以为继。

9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努力通过出版外语论文集来发表成果,如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宋光庆主编,1996)的有于德全、刘晓骏、冯永(土孚)、张国平的语法论文;《续集》(吕文斌、于德全主编,1997)上有张丹忱的《“语际语言学”?“国际语学”?》;载于《外国语言研究》(于德全主编,1998)的有魏以达的《试论世界语和英语的时制系统》。

80年代出版了多部语法书,如刘洪元著《实用世界语语法》(江苏省世协筹备组印,1981)、魏原枢、徐文琪编《世界语语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张丹忱、曹东海编著《世界语语法详解》(黄石世协,1983)、编辑部编《世界语语法漫谈》(重庆,1984)、周志光编著《世界语介词》(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6)、赵学刚、王仁虎、张家声编著《简明世界语语法》(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曹东海编著《新编世界语语法》(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魏原枢《世界语语法 精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最后说说辞书编写方面。解放前后40年来,人们长期使用的是冯文洛编的《世界语中文大词典》。这书编于战争年代,实属不易,也曾使很多人受益;但是它毕竟比较粗糙,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文化大革命前,只出过一本《世界语新词典》。世运复兴以来,先是有于国健主编的《汉世词典》(安徽世协,1982),后有《汉语世界语词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但真正可以与民族语言词典比美的词典则是张闳凡主编的《世界语汉语词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7),这是集中许多学者之力而编成的,收词众多,释义详备,体例严谨,代表了中国世界语辞书的高水平。此后张欲再组织编写类义词典,但计划未成。多年来王崇芳在独力编纂较大的汉世词典,其宗旨已见自撰的文章(载入于德全主编的《外国语言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还出版了多部世界语专业词典。

3. 国际语学学科定位及名称

80年代前期,湖北的世界语学者及其所联系的一些同志曾提议世界语学界确立世界语的学术标准和开展正规的学术研究。对于国际语理论问题最早从事研究的有张丹忱、周流溪、周力、邵融等人。1980年张丹忱在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论文《语际语言学和世界语学》,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篇语际语言学论文。同年周流溪印行译著,跋

⁶⁹《世界》(1987/11)另有报道称应作7月21日,疑误。

语实际上是一篇语际语言学和世界语学论文。

1982年周力曾提议组织国际语学小组，后因种种原因未成。周力在1982年已草就一篇国际语研究论文，后来以《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为题刊登在《世界》杂志上(1983/1)。我国学者发表“国际语学”的论文，此为首次。可惜，作者认为国际语学是世界语学的分支学科，把上下关系弄颠倒了(可能他的用意是：世界语学里的理论研究就是国际语学)。

接着，张丹忱的《语际语言学与世界语学》的摘要稿也在《世界》刊出(1983/4)。作者(1980)对语际语言学的诞生、研究对象、涉及的领域，及该学科对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周流溪(1980)在前述译本的跋语中，提出国际语研究(“语际语言学”)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部门。⁷⁰张丹忱认为语际语言学不属于社会语言学，它是语言学下面同社会语言学并列的一个独立分支。语际语言学有两个研究方面：一是普通语际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本质、人造语的语言学基础、语言的普遍规律和普遍现象，从而为创立科学的语际语奠定科学的基础)，二是社会语际语言学(包括语际关系、语言接触与溶合、社会对语际语的要求、语际语的推广和应用等)。世界语学里的“世界语运动学”就是属于第二方面的问题。语际语言学里包含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它不属于社会语言学。

显然，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学科进行定义和定名的问题。原来，大家探讨的同是国外称为interlingvistiko (interlinguistique, interlinguistics, Interlinguistik, interlingvistika)的学科。这个术语在刘涌泉、赵世开编《英汉语言学词汇》(1979)中译为“语际语言学，国际语学”；在常宝儒的文章(1979)和商务印书馆《俄汉大词典》(1963)、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中作“语际语言学”；上海译文出版社《德汉词典》(1983)作“国际语研究，语际语言学”；张丹忱(1980)和周流溪(1980)也作“语际语言学”，但周流溪随即与周力一同放弃了这一译名。张闳凡主编的《世界语汉语词典》(1987)作“国际语语言学”(国防出版社《英汉辞海》(1988)作“国际语言学”)。90年代邵融有区别地使用“语际语言学”和“国际语学”。刘海涛开头使用“国际语学”(具体论述见其《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一文)，后来一度改用“语际语言学”；但1998年后，又决定采用“国际语学”。

应该说，使用两个译名的人们总的看来实无太大分歧；不过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学科的定义和研究范围之看法仍有一定的出入。张丹忱一直认为，只有“语际语言学”才是正确的。他在《语际语言学在中国》(《未来》1994/2)一文中，解释了他的观点。接着又发表《“语际语言学”？“国际语学”？》(《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1997)，专门详细地谈了应该如何准确翻译interlingvistiko。他指出：叶斯柏森确定interlingvistiko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结构和基本概念”，也就是研究和认识语言的机理和构造，包括分析语言的普遍现象，然后为创造语际语——即人造的语际辅助语提供一个框架理论。因此语际语言学是研究创制“语际语”(interlingvoj)的学科。“语际语”，这是我们讨论的关键，因为“语际语言学”就是从它派生的。它在构词上是彻底地透明的，在意义上是非常明确的，interlingvistiko是“关于interlingvo语际语的(ist)iko(学问)=scienco pri interlingvoj”。这里，没有任何“国”的概念，只有“语(言)”的概念。Interlingvo显然是“语际语”，而不是国际语(interŝtata, interregna)。“国际语学”的译法，就是将“语”际语改成了“国”际语，而这两个术语含义是不同的。张丹忱还指出：internacia lingvo, 严格地说，应译为“族际语”。他认为语际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民族语言的语言政策(如确定国内各民族的交际通用语)。

张丹忱的观点，从翻译的角度而言，是无可厚非的。至于什么是“语际语”，还可能不同理解。戚雨村主编的《语言学百科词典》有“语际语言学”条，定义为“研究国际辅助语的学科，其对象范围尚未完全确定。狭义的指对国际辅助语的设计机器作用的研究；广义的还包括各民族语言间相互关系、族际语、区域语、世界性语言以及双语现象等有关问题的研

⁷⁰ 他认为这是我国学者给这门学问作出的适当的、不低的学术定位。这个跋语在商务版中被删除了大部分，但是国际语学及其地位之说是保留了的。

究。”国际上各家学者对 *interlingvistiko* 有诸多解释。但是大致可以分成两派：第一派里多有较早用这个术语的人。1911 年 Jules Meysmans 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新学科” *interlinguistique* 来研究国际语（自然语言和人造语言）。1931 年在第 2 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叶斯泊森宣称语言学里诞生了一个新学科 *interlinguistics*：“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一切语言的结构及其基本概念，以便为国际语（母语不同而言语不通的人们之间用于书面或口头交际的辅助语）建立准则。C. W. von Sydow 和 D. Szilagy 也说国际语的拟构需要一个专门的语言学分支来研究。50 年代，W. J. Manders, H. Olberg, E. Wüster, G. Waringhien, A. Bormann 等世界语学者都认为国际交流的语言问题要由国际语学来研究。60 年代以来，Monnerot Dumaine, Istvan Szerdahelyi, D. Blanke, S.N. Kuznecov, Klaus Schubert 等都认为 *interlingvistiko* 主要研究计划语言（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完全一致）。

另一派人，如 E. Spiridovič 认为该学科（他称为“语言技术学”）是语言创造（“综合”）的研究，它探讨如何创建国际辅助语和规范完善民族语言。自 60 年代以来，他们扩大 *interlingvistiko* 的研究范围。苏联女学者 O.S. Achmanova 认为它（作为符号学的分支）研究各种辅助语的构拟和运用问题；但所谓“辅助语”包括国际语及数理媒介语和各种机器语言。V. Tauli 明确提出它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语言规划的各个方面；而“语言规划”包括现有语言（按即民族语言）的调整和发展。德国学者 Mario Wandruszka 认为 *Interlinguistik* 研究多语现象、语言混合现象、混合语、翻译及其比较。《苏联大百科全书》（1979）定义的 *interlingvistika* 研究语言交流的各种通讯手段的建构和功能问题，包括社会语言学、双语现象、多语问题、程序设计语言翻译或第二语言学习（在那里有学不到家的 *interlingvo*（过渡语）！）的问题也扯进来，那就更乱了。但是我们要考虑有无可能把所有这些东西统在一起。

由于不少学者常将计划语言学和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所以把 *interlingvistiko* 归入应用语言学不无道理（虽然应用语言学是个杂物箱）。不过这种科技性的 *interlingvistiko* 和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国际语学是不同的，可以称为“（科技）媒介语学”。（不妨考虑把无所不包的 *interlingvistiko* 译为“中介语学”，“中介语”泛指各种实体的人和人之间、人和非人实体之间乃至非人实体内部之间的语言或类语言媒体。）然则我们可以认为语际语言学（“中介语学”）包括国际语研究和（科技）媒介语研究。当人们把国际语用作科技媒介语（比如把世界语用作机器翻译语言）时，对这种问题的研究应该仍然属于国际语学（应用国际语学）。刘海涛新近有篇文章（《Aplikata Interlingvistiko》，GrKG, 40/1(1999)）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但是人们可能使用任何代码作为任何两个对象的媒介语；要把对其中的问题之探讨都称为国际语学，当然是不合适的。而要说它属于应用语言学，则是可以的。实际上这里有两个领域（虽然互相联系）。不过，以苏联某些学者为代表的那种无所不包的 *interlingvistiko* 作为一个学科是不合理的，语言学界也难以承认。Kuznecov 虽然主张广泛研究多语问题等，但也明确说 *interlingvistika* 不应包括程序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内部应用研究。

1987 年周流溪发表《国际辅助语和国际语学》（《世界》8—10 期）和论如何对待学科名称的文章《Kiel Taksi la Terminon “Interlingvistiko”？》（〔瑞士〕《文学博览》第 5 期）。他从叶斯泊森的经典定义推演，把 *interlingvistiko* 看成国际语学：“国际语学一方面研究各民族语言的关系及世界通用语的前景，研究国际辅助语的实施经验、推广条件和宣传策略，另一方面又从一切民族语言的结构（包括基本概念及其表达方式）入手，研究国际辅助语的创制原则、语言结构和语言规范等方面的问题。他在瑞士发表的文章主张维持 Szerdahelyi 的比较传统的定义，提出国际语学是已经有组织、有刊物、有理论著作的学科，而这几样东西更有实际使用的国际语为倚靠。然而编者在周流溪的文章后放进了一个跋语，说他没有注意西方的文献；而这些“文献”表明：*interlingvistiko* 可以研究包括秘密语言和文学上需要的各种奇怪的语码。周流溪 1988 年发表的“国际辅助语”（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的词条）中也提及国际语学；他把自己上述定义的第一方面称为国际语政治学，第二方面称为国

际语语言学。这同张丹忱的社会语际语言学和普通语际语言学实际上是大体一样的。

但“国际语学”是严格意义上的(或传统意义上的) *interlingvistiko*。这大致相当于无所不包的“*interlingvistiko*”下面的 *planlingvistiko* (计划语言学)。它围绕国际语问题(主要是人造国际辅助语)进行研究。把它归入社会语言学是适宜的;陈原的《社会语言学》里就讨论“语际语言学”。这好像是降低了它的品位或缩小了它的范围;而实际上不然,现在可虑的是(如上所言)社会语言学界有人还轻视它呢。不过,《文学博览》跋说的另外那些东西,尽管可能属于社会语言学,也不属于国际语学。刘海涛在评论一部意大利出版的“奇想语言”大全时(LPLP, 22/3(1998))也认为,只有那些以国际交流为目标而设计的语言,才真正是国际语学所关心的东西。

4. 国际语学研究

国际语的语言应用性研究和理论研究都是必要的;国际语的技术应用性研究也很重要。世界语学的理论研究想要深入,世界语的技术性应用研究想要发展,必须从国际语学那儿汲取有用的思想。所有这些都需要有人去探讨。周流溪(1980)提出:世界语学在我国实际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这与中国的地位和应为世运作出的贡献是不相称的,这种情况必须大大改变。针对“世界语的结构那么简单,对它进行语言学的研究有什么搞头”的疑问,他认为:世界语的原则虽然很简单,可是它牵涉到的问题却不简单;它之得来既难,它之要为更多的人接受也不是那么容易;此外,世界语在实际使用中产生了許多复杂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包括语言学上的解决)。在这些地方都有语言学的用武之地。当然我们不要傲慢的或迂腐的语言学家。如果说世界语可以不要语言学,那就荒谬了。没有语言学,任何一个人造语方案也不会产生。坐等语言“溶合”的黄金世纪,大概可以不要语言学;要是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现在起就有所作为,就非有语言学这个利器不可。而语言学在人造语问题上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世界语运动今天已经形成很大的势头,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去促进它。

但是,想深入钻研世界语学乃至国际语学,并有所成就,也需要献身精神和开拓精神。这是时代对我们的期望。然而,正如张丹忱(1997)所指出:中国 *interlingvistiko* 的研究者,似乎全是业余爱好者,因而必须从学科研究的基础做起,争取尽快进入专业研究的水平。下面叙述一些世界语学者在这方面的探索努力。

1980年周流溪在讨论“国际语和国际语学”,给出了国际语学的定义,在国内首次系统介绍了当时所能知道的国际语学研究情况和世界语学的成果。该文提出了国际语学和世界语学研究者要做或可做的事情。“他们要论证世界语运动的必然性,要论证世界语的自然性、国际性、合理性,要总结语言运用的经验,要在出现混乱的地方揭示流方向。”在该文中他也试着动手这样做了。他着重讨论了世界语的自然性和国际性;也谈到对世界语优缺点的评价,介绍了几个人造语的比较——这是国际语学领域的问题。

关于自然性,威尔斯引用了桑德斯关于自然语言的定义,从世界语已经成功地应用于人类交际,证明了世界语是自然语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前人关于语言之自然成分和人为成分的理论仍然有强调的必要。周流溪在引证舒哈特、格拉尔、叶斯泊森在这方面的论述,指出自然语言里有不自然的成分,而人造语言可以继承民族语言里真正自然的东西;各种语言正在变得更合理、更规则、更简单,在正确的方面体现着人为的性质。人造语并不违反科学,创造人造语像科学上创造别的东西一样是人凭知识改造世界的胜利。语言科学应该向前看,否则研究语言规律到底是为了什么?针对关于世界语人造词尾是杜撰的、歪曲了国际词的面貌、不自然、死板单调的指责,文中列举民族语言里的例子,说明这些指责无一成立。如复数词尾 *j* 和宾格词尾 *n* 都很完美。而且美学标准即令存在,也必须同时考虑学习和使用的方便。

关于国际性，世界语的资格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它是在汲取民族语言的优良成分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世界语的词素是完全独立、固定不变的(这是孤立型语言的主要标志)，语法关系是一目了然的(这又最接近黏合型语言)，在词序和文体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斯拉夫语风；词根主要来自拉丁语族和日耳曼语族，也有的来自斯拉夫语族或别的语言；语音体系也与拉丁语言接近，但也带有某些东欧语音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柴氏已经尽其学识把各种语言材料熔于一炉，而且应该说他做得相当成功。世界语竟能兼有孤立语、黏合语和熔合语的优点，简直是一个奇迹。亚洲人或非洲人学起来也不难，是因为在那具有决定意义的语言深层隐含着孤立语和黏合语的要素。在柴氏那个时代，语言学家都瞧不起孤立语和黏合语；但柴氏为了创造中立的国际语大胆地反了那个潮流，这精神是很可贵的。

在形态和句法方面世界语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值得批评。世界语在抛弃欧洲语言的许多格的同时保留宾格，实在是明智之举。关系词表的人工性许多人不满意；实际上像英语、法语、希腊语都有这种现象，世界语不过使之极端规范化而已。在动词更变方面，世界语是不算很简单的；但是这(正如名词和形容词的递变及其一致)对于提高语言表达的精确性和严谨性是完全必要的。那种认为语法越简单越好的观点是片面的，太简单的语法必然伴随着表达能力的某种欠缺，这有时正好成为贬低人造语的口实。

周流溪在文章中介绍了人造语的类型研究。作者把人造语分为5族：(1) 沃拉普克语族(混合型)；(2) 中立语族(新罗曼语族)；(3) 世界语语族；(4) 英特林瓜语族(英拉语族)；(5) 欧西语族(世界语族和英拉语族之间的折衷方案。在所有这些方案中只有世界语生存下来。国际语学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必须作出解释。只就结构而论，与其他人造语言相比，世界语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当然，世界语既是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对其缺点也无须讳言。但是对它的批评要合情合理，不能在鸡蛋里挑骨头，还要照顾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对世界语的任何修整(包括群众中无意识的行动和语言学家有意识的行动)，只有在无损这个语言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并且经过实践的检验，才会生效。有的语言学家并不反对世界语；但他们过于注重问题的语言学方面，忽视了问题的社会学方面，采取了不适宜的改革行动，结果并无助于世界语的推广。社会学方面，始终是第一位重要的。我们要大力开展运动，加强原文创作和世界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我们还要加强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包括政治家的支持。就整个语言社群来看，规范化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世界语的前途忧虑。

80年代周流溪多次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宣传世界语。他的系列论文《世界语语法的基本问题——“十六条”研究》(《世界》1988—90)是为此而作的努力之一。该文针对“世界语的语法只有16条规则”的通常宣传，拿16条基本规则和600页的《世界语分析语法全书》对勘，要讨个说法，即阐明世界语的基础和语言的发展。文章深入挖掘简单规则背后所潜藏的问题，如把世界语的读音拼写规则放在世界诸语言读写的共性和特殊性背景下来显示其特点；把世界语的词语结构彻底按必要性和充分性原则加以检查来揭示其合理性和规律性。必要性和充分性是世界语语言理论奠基者之一索绪尔(R. de Saussure, 不是“现代语言学之父”F. de Saussure, 但与他是同一家)提出来的基本原则，其重要意义过了很多年才被世界语研究院确认。它是我们同伊多语等作斗争以保卫世界语语言基础的威力强大的理论武器。周的论文首次在我国世界语学界阐发这个理论。

张丹忱的《世界语的类型学特征》(1988)提出：有人认为世界语是在印欧语系基础上建立的语言，因而世界语主要是为欧洲人设计的语言。其实不然。这种看法主要是根据世界语的词汇来源。问题不在“外部表现”，在“语言的本身”⁷¹。在分析了世界诸语言三大类型(屈折语、黏合语、孤立语)的形态特点后，作者指出：世界语的任何语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

⁷¹ 指内部结构。在分析了世界诸语言三大类型(屈折语、黏合语、孤立语)的形态特点后，作者指出：世界语的任何语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恒定不变，在语言里明晰可辨，“透明性”极高。它没有屈折变化和语素的溶合〔ZW〕

恒定不变，在语言里明晰可辨，“透明性”极高。它没有屈折变化和语素的溶合⁷²，也没有元音谐合而产生的语素变体。它的这一特点更接近于孤立语。但在汉语中表示范畴的语素较为缺乏。总的说来，从上述类型特点来看，世界语不属屈折语的类型，而更接近于黏着语和分析语。

人们用传统形态学的理论和术语加在世界语上，这就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世界语是屈折语。形态学是建立在对屈折语的传统语法学说上的。但它对孤立语和爱斯基摩语等就无能为力，也就不能反映语言的普遍现象，也无法对世界上全部的语言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柴门霍夫在另一个基础上建立世界语的语言理论：“将概念完全分属到独立的词中。”（他将一些语素写成我们见到的那种“词”的形式，完全出自人们的习惯。）语素的独立性通过同类语素的置换得到确立。而且从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中，语素本身，无论词基或词缀，都可以独立存在于句子中（只有j、n除外）。世界语与汉语在概念的表述方式上有内在的相似之处。两者在语序上不同，这涉及句法。

在句法平面上，世界语在语素的分布和结构上，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加以表述。一、相关语素的语义结合。世界语用几个语素标示某些语素的范畴类属；这些范畴是语义性的，很抽象，只有黏附在另一些表示具体概念的语素上才能表现出具体的意思（内容）。而它们的语序有规定性。二、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世界语普遍采用一致性形式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包括在短语和句子中的关系，“以便使整个语言完全由无变化的词，而不是以各种语法形式体现出来的词组成。……各种语法形式和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用无变化的词的结合(kuniĝo)显示。”按柴门霍夫的原则，世界语的词并非形态学家所认为的语法“词”；这说明世界语词不存在屈折，语法关系是建立在语义基础上。世界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是语素；语素的一致关系改变，语素的语义关联便发生改变。这种严格的逻辑形式使世界语在这个层次上的语序就非常灵活和自由了。

张丹忱最后指出：“柴门霍夫为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创造共同的第二语言时，全面地考虑了这种语言的要求和应具有的特点。他权衡了语言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而只能在其中作最佳的选择。正是这种客观的选择（而不是偏爱）才使世界语呈现出斑驳的色彩，然而在语言总的表现上呈现和谐统一的全色调。对世界语这类规划语的认识和判断，只有从它的特殊作用和要求上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到相应的结论。”按，这是我们正确了解世界语所应该掌握的关键之处，也是我们宣传世界语时应该准确地说明的问题。

80年代以来有一些文章探讨世界语在科技应用方面的问题，如刘志强的《世界语与术语标准化》、李维（1986）的《世界语汉语 / 英语自动翻译系统》（世界语摘要文本见德国《人文控制论》GrKG, 27期）、乔毅的《Iom pri la Interlingvistika Modeligo》（略论媒介语的模式化），《世界科技》1995 / 4），以及刘海涛的一系列文章。曾定之的《常见花卉手册》、周尧的昆虫学科普作品《La Insekta Mondo Iras》、安文铸译的《未来教育科学入门》（1986）等，实际上开始了高级的世界语应用，里面有许多术语问题；但只有曾定之写过术语学论文。

（三）近年来国际语学在中国的发展

拿中国的国际语学同外国的相比，其差距可以见诸这一事实：匈牙利和前苏联早就在大学开设正规的国际语学课程；匈牙利学者 Szerdahelyi 的《国际语学导论》出版于1980年，苏联学者 Kuznecov 的《国际语学的理论基础》出版于1987年，二者俱为本学科的国际性权威著作。德国 Blanke 也在著名大学讲授国际语学，他的《计划语言学导论》（1985）同样是标准著作。至于大型的工具书、术语集、专门的学位论文集之类，国外也有，而我们连想都没

⁷² 应作“溶合”（fusion / fandiĝo）

有想过；就算想到了，也不敢望能出版。至于像前面提到的动词(及物与不及物)研究那样的世界语学专论，我们也难以写出来。我们需要下大力气做个案研究。总之，中国学者必须在各方面急起直追。值得一提的是：邵融多年来在大连理工学院开设正规的世界语课程，通过他的努力学院添置了一大批世界语书籍，包括一些国际语学著作。可惜邵融去世了，这批书籍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90年代以来，国际语学在中国有一些实质性进展。刘海涛是这一新趋势的代表人物。他是个年轻有为的高级工程师，但业余时间全用在钻研语言学和国际语学上了。他长年同外国学者联络，收集到大量的原始文献。他的计算机专长尤其帮了大忙。他为研究语言学特别是国际语学勤奋地学习外语，能阅读欧洲各主要语言的文献。数年之间，他以过人的精力做了大量探索工作。他考察评论过两种由中国人创造的国际语系统，还编订介绍过外国的一种国际语方案。

除发表了大量文章外，他还翻译了外国一部世界语学专著，又撰写了一部国际语学专著。此外，他编辑了《国际语学通讯》，开设了语言学网上主页。所有这些，不但充实了国内的研究，而且使这种研究走向世界。

《国际语学通讯》(Interlingvistika Kuriero)仿照国际世界语协会世界语言问题研究和文献中心的《国际语学家通讯》和德国《国际语学通讯》而作，报导动态和著述。至1998年已出了10期。该小刊因系由他自行编印散发，流传和反响较少；他颇感孤寂，但仍坚持编印。现在他并在网上发布该刊内容。他翻译了法国著名世界语学家P. Janton的《世界语学引论》。此书论述世界语的语言、文学、运动，是世界语学的必读书。但是由于无法找到出版机会，这部译稿多年来只锁在译者的抽屉里。所幸的是该书的中文版已由山东大学刘晓骏翻译，1993年由山东枣庄世协出版。

刘海涛开辟的网页是国内首次开辟的语言学个人主页(名叫“人类、语言、计算机”，网址为<http://htliu.yeah.net>)由他自己精心设计和维护，非常美观、充实。它共设10个专栏：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国际语学家名录、计划语言和国际语学书目、国际语学新著、“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国际语学通讯》、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网上语言学资源、本人简介、本人在国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方面的著述。这个网页使用的语言有世界语、英语、汉语。从任何一个专栏切入，都可以看到广阔的学术世界。例如从“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栏里，可以访问“虚拟世界语图书馆”，浏览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的藏书目录和别的许多网址。就“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专栏而论，国内的专业部门自己还没有做这项沟通工作呢！于此可见刘海涛的学术热情之高。而打通常规的语言学研究与国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研究，在这个网页上开了先例，读者可以大大受益。

作为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专家，刘海涛已经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其中约半数同国际语学直接相关。这些论文数量之多不但显示了他的勤奋，而且它们都是在国内外的语言学或科学技术专业书刊发表的，因而其价值也高。他的《中国的国际语学研究》用英文在外发表(LPLP, 1998/1)，现在又列于网页作为一个专栏，综述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1993年，刘海涛发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媒介语问题》(《情报科学》14/2)，次年又发表《跨语言计算机网络中语言通讯障碍及解决办法》(同上，15/2)。前一文探讨了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和媒介语(自动翻译中语言之间差别的对应体)的关系，将它纳入国际语学的研究范畴；提出了媒介语的重要性(经济性、工具性)，从媒介语的类型分析中揭示其应满足的条件(规则性、精确性、表达力)，讨论了世界语作为媒介语的优势。由于在自然语言和各种人造符号系统(如谓词逻辑符号、程序设计语言等)之间不存在可逆转的关系(后者不能有效地传达前者的全部内容)，所以人造符号系统不能充当媒介语。而在人造语言里，不少方案追求高度的自然性，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国际性和简易性(某种表面的简易性是用放弃积极运用而换来的)。只有世界语因为使用一种规则的方式去分析和表达意义，而成为具有国际

性结构的语言，能与各类型的自然语言匹配；世界语中表示语法关系的显式标记也特别有利于计算机对语言的处理与分析，它那无限的构词能力对于计算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

刘海涛(1994)进一步从国际语言通讯的角度对媒介语进行深入探讨。他指出：多语现象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在计算机网络出现后变得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要有理想的计算机网络语言通讯结构，而其关键又在于机器翻译特别是媒介语机译系统(即通讯者只用母语，而把排除语言障碍的任务都交给机器去完成)。荷兰研制的分布式语言翻译(DLT)系统采用略加修改的世界语作为媒介语和常识的载体，基本上实现了比较理想的通讯结构(系统采用模块化方式，加入一种新语言时只要研制一套该语言的从属句法和该语言与媒介语之间的转换句法就行了)。DLT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由专家系统支持的二次翻译系统，其知识(或智能)处理部分均集中于媒介语内部，而没有涉及源语和目标语，这主要归功于世界语特殊的结构和它的独立的语义系统。作者认为：DLT这种以机器为主的系统虽然是最终目标，但目前它实现起来非常复杂，因而还可以研究一种人、机分工合作而发挥各自长处的简单易做的系统；后者需要有一种通用语法，而这通用语法(仍以世界语语法为基础)可参照汉字(曾为东方通用文字系统)的表意功能来制定。“通用语法”是一种通用的辅助符号系统，加在民族语言文本上来显式标注其语符的语义范畴和语符间的关系(这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可由计算机或人来做)；做了这一步，就剩下符号之间的转换(查词典)的工作，那可以交给计算机去完成。

由此可见国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是密切相关的。刘海涛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知识表示和获取》(载于《人工智能新进展》，清华大学，1994)、《计划语言和计算语言学》(载于《计算语言学进展和应用》，清华大学，1995)、《计划语言研究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影响》(《术语标准化和信息技术》，1998/4)和《从计划语言研究看术语标准化问题》(同前刊，1996/2-4)。

从总体上对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进行理论探讨构成了刘海涛一批论文的特色。《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现代外语》1995/1)在讨论人类多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语言障碍对人类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国际语学、计划语言、世界语学的概况，说明了国际语学研究的科学价值。文章讨论了国际语学和计划语言的名称和定义，指出国际语学从多种角度研究语言障碍问题，力图引入一种新的、最优的语言通讯方式，其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计划语言。作者叙述了计划语言方案的数量和按年代的分布以及计划语言创制者的动机，这些材料对人们了解计划语言是有用的。

在本文论世界语学的一节，作者介绍了世界语学的重要著作，列举了世界语的主要语言特点；他指出：世界语已经成活并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形成了比较成熟稳定的使用标准，把多义词等现象按计划限制在一定范围。世界语是唯一的可供人们从全方位研究计划语言现象的系统。本文的结论是：(1)作为语言计划领域最高级的产品，计划语言是一种语言事实，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计划语言(和研究它的国际语学)向语言科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问题。(2)世界语语言社团可以看作为一个最优化语言的通讯的原型，它指明了通向合理、平等国际语言通讯之路；这是计划语言和国际语学在国际交流方面的价值。(3)计划语言，特别是世界语，也可以提供其他有益的成果，如作为外语教学的引导课程和观察人格发展的参考、作为自动翻译的桥梁语言和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工具，促进术语学的发展，等等。

刘海涛在另一篇文章《计划语言和语言规划关系初探》(《外国语》1996/5)中提出：民族语言虽然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但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自然有机体，人类有意识地改革语言的事例比比皆是，有时这种参与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还是十分必要的。语言是可以计划的。语言规划学和语际语言学的定义和研究范畴极其相似，它分为语言政策学和语言构造学。计划语言研究对语言规划很有意义。研究计划语言构建的语言学方面，能为语言规划中的语言构造部分提供有益的经验；而研究计划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又能为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

刘海涛的一大成功是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国际语学专著《国际语学导论》。这种性质的著作，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掌握国际语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此书的目录已经在他的网页上公布。全书除绪言外分为8章，外加两个索引。这8章是：(1)世界的多语性和世界语言状况；(2)国际计划语言；(3)几种主要的计划语言方案；(4)世界语的产生、语言结构及发展；(5)多维视野的国际语学研究；(6)计划语言和计算语言学；(7)国际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及将来；(8)国际语学基本研究书目和本书主要参考文献。这部书稿在广泛参考外国新文献的基础上，集中了大量可靠的材料，与前人的同类著作相比毫不逊色；更可喜的是，它是现代型的、多维视野的书，尤其在“建构国际语学”（国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的结合）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至于书里除了常规书目和索引（这也是极其丰富的材料），更多出一项：各种与国际语学有关的网址。通过这些网址我们可以事半功倍地与国内外学术界联系，跟上先进学者的步伐，也可以迅速将自己的成果拿去进行广泛的交流。这是外国的国际语学导论权威著作也缺乏的（因为它们都在互联网大行其道之前出版）；所以，此举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四）为保卫世界语而进行的斗争

中国世界语者还曾投身于另一项理论联系实际的活动：对反世界语的倾向进行批判。为了保卫世界语，中国世界语者进行过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他们对外界向世界语的种种挑战进行了反击。

1. “五四”运动前后有关世界语的辩论

1916年11月《新青年》杂志2卷3号登载了T.M.Cheng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对一些世界语的反对者斥世界语“不能示高深之学术”是“无用之学”的说法提出疑问。陈独秀答复说：“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唯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素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1917年1月T.M.Cheng又写信提出“世界语文法既整齐亦简单易学，而学习者寥若晨星”是何缘故的问题，再次就教于陈独秀，信中还反映他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世界语文法与法兰西文大同小异，习世界语宁习法文，盖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邦而书籍尤富，不若世界语书籍寥寥无几也。夫世界语虽学习而精通亦不能实用，有何益哉？嗟呼，世界语虽名为世界语，然终难普及世界也。”陈独秀答复说：“仆亦赞同尊友之意见，足下可暂置世界语而习法文。通法文者，习世界语当甚易也。”

从陈独秀的两次答复的本身来看，他虽肯定“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但在赞成世界语的人看来实际上这是支持了世界语反对者的意见。因此，钱玄同在1917年6月《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4号发表《给陈独秀书》，不赞同陈独秀认为世界语不能应用于文学的观点。并用“世界语译撰之书以戏曲小说之类为最多”的事实证明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信中还批评了当时一些“名士”认为“世界语文法简单、一义无二字、排列变化有一定这样呆板板的文字不能做美文”，“学了世界语也无若干好书可看，通西文者何必学此等索然寡味的文字”的看法。他感慨地说：“世界进化已至20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对世界语不去竭力提倡，反而抑遏之不遗余力，岂非怪事！”

陈独秀看了钱玄同的信，对自己复T.M.Cheng信之不当处做了自我批评和解释，他说“仆前答某君书，所谓‘华美无用之文学’者，乃一时偶有一种肤浅文学观念浮于脑里，遂信笔书之，非全体文学皆无用也。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同时对钱玄同提出的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表示“极端赞成”，并说“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输诸异域，

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发表后，陶履恭又写信给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8月《新青年》杂志。宣称他“对世界语夙抱怀疑之观”并以“世界语无用之理”质诸钱玄同。他从语言学、民族心理和世界语之功用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 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袭取欧洲各国成语，漫无秩序，文法之构或皆语言学者所不取。世界语之名亦殊未妥当，瑞典、挪威之单语采取极稀、东洋之文字更不在世界语之内，吾民族民数之巨，吾国文学之丰富，奈何于所谓世界语反无丝毫之位置也？

(2) 一种语言乃一种民族表达思想心理之工具，最能表示民族特质，是一种天然之语言，读译本不若读原文。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唯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能保存、传达思想乎？

(3) 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世界大通之局势已具其雏形，但世界语与世界大同之实现是两回事，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而非一致之统一，因此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世界语之观念犹孔子专制之观念，欲罢黜百家也。

意见对立如此尖锐，争论不可避免。陈独秀针对陶履恭的观点逐点作了回答：

(1)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共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

(2) 足下谓世界语为无民族之语言，仆则谓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且国界未泯，民族观念存在期间，各国语与世界语不妨并存。提倡世界语者未尝欲即废各国语也。

(3) 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

陈独秀的答复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紧扣着世界语本身这个主题讨论下去求得共识是不难的。然而这场争论正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时期，而且比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更加与实际相结合，其中就包括了汉语汉字问题。这次争论就和汉字改革联系在一起，而且有的学者提出弃汉文改行世界语的主张。钱玄同是这种意见的主要代表。

钱玄同说：“中国到了20世纪还是用四千年前的象形文字，加以二千年来学问毫无进步，西洋人三百年来发明的科学真理更非中国人所能梦见。现在给人家打败了几次，如什么“甲午”、“庚子”的外患之类。于是有几个极少数的人略略醒了一点，要急起直追去学人家，可是人家崭新的学问，断难用这种陈旧的汉字去表达，……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提倡改用 Esperanto，实无别法。……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 Zamenhof 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赘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他针对陶履恭的观点进一步反驳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 Esperanto”。考虑到 Esperanto 尚在提倡，汉语一时未能遽尔消灭的短暂的过度时期中，钱玄同提出用一种文字如英文、法文作为补助之办法。

钱玄同的主张，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要从复古守旧的“国粹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用新文化思想改造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强烈愿望。但对于世界语之性质和功用并未准确把握，不切实际地提出废汉文汉语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虽然这种意见并不切合实际、但却得到一部分讨论者的赞同。

吴稚晖在《新青年》5卷5号著文支持钱玄同的观点，他说：“钱玄同先生问我：倘使不用汉语制造拼音文字，我们能否直接采用 Esperanto 来做我们的文字？我可以权且先答一句说：倘使能做到，真是一种可以要得的东西。……人类再过多少时候，果否总得要讲一种言语，写一种文字？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早晚的问题，决没有否定的问题。”“汉语拼音文字是不必造的”。

胡天月在同期《新青年》杂志上著文《中国文字与 Esperanto》（《给钱玄同》），赞同废汉文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也认为“不必用他种文字来作过渡品，否则先入为主，阻碍世界语之进行必更甚于今”。

区声白在1919年《新青年》6卷1号著文认为：“若将罗马字母串成音节，只可旁证更须将原字写出，未免多费手续，若直以罗马字代之，则同一音韵，同一意义，而有数字将何以辨别？且各地方言不同，当以何处为标准？用南音则北人反对之，用北音则南人反对之，终必无成。在弟意见，唯有采用 Esperanto 为妥。”

姚寄人也主张“中国文字无须另造，只有废弃它，迳用 Esperanto。”

在陶履恭和多数讨论者之间是既有细致的说理，又有激烈的争辩，有时甚至动感情。

孙国璋质问陶履恭：“以世界语为人造的而轻视之，试问世界各民族之文字那一种是天授的而非人造的？说译本之不若原本，岂独世界语为然？唯世界语所译莎士比亚之杰作《Hamlet》，据英国文学家言，是他国译本无有能及世界语译本之佳者。是可证明世界语文学上之价值矣。”

吴稚晖针对陶履恭说世界语未取世界各国语言尤其未收汉语因而不能称世界语的观点仅驳道：“倘使有一种国粹名士要象形文字来统一世界，那末‘欧洲’必改称‘大秦’，‘英吉利’必改称‘红毛’，‘逻辑’必改成‘名学’；又倘要避欧文面目而用注音字母算做世界语的底子，强人就我，将来 Esperanto 必改为‘——’，‘Lonclo’必改为‘——’。如果普通名词一齐要用汉语又怎么叫做世界语呢？倘满蒙回藏，日本、朝鲜、印度、安南等各各出来主张又何安排？现在 Esperanto 不包括汉语的问题，这不算做 Esperanto 的缺憾，不足为推翻 Esperanto 的条件。有如‘尧舜禹汤’，‘黄河、泰山’之类，凡汉语的专门名词、学术名词，现在习见的英文已经慢慢收进字典。它收进这些词并不碍算做完全英文。那么，Esperanto 也把这些词头慢慢收进字典，怎么就会碍算做完全的世界语呢？所以慢慢的吸收汉语，扩大 Esperanto 的范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陶履恭对孙国璋之质问反问道：“现在不学英文而必欲读莎士比亚之译本，不知其意何居？敢问现代欧美大文豪、大诗家、大剧作家，亦有世界语之译本否？”“卖药者未有不夸赞其药之灵验者，吾之位置是绝对不信世界语可以通用，不信世界语与世界统一有因果之关系。不信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谓余不信，请再俟50年视世界语之命运果为何如？”

陈独秀对陶履恭之妄断答曰：“今之 Esperanto 或即无足当‘世界语’之价值，而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以言语相通，为初民社会之一大进化；其后各民族间去小异而归大同也，语言同化乃为诸大原因之一；以此推知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也，虽不会以‘世界语’之有无为转移，而‘世界语’（非指今之 Esperanto）之流行，余确信其为利器之一。”

区声白发表《论 Esperanto》对陶履恭责难逐条予以反驳：“先生谓卖药者未有不夸赞其药之灵验者，此比喻未免不当，卖药者夸其药灵验在于金钱。至于吾人提倡世界语纯然为良心上之主张，见其结构之完善，主义之光明，故虽牺牲金钱与时日亦所勿恤，斯语果无通行之价值，五洲万国之愚人岂有若是之多也？”“先生绝对不信任世界语可以通用，还要俟50年后视世界语之命运为何如。倘若人人都如先生，不但50年，5千年，5万年世界语亦必无通行之一日。就今日而论，先生一人反对，而驳难者竟纷至沓来，此可为吾语前途予贺者也。”孙国璋对陶履恭诋毁赞成世界语者为“卖药者夸药灵验”，不尊重他人言论的态度表示气愤，

并表示悬陶履恭“再俟 50 年视世界语之命运为如何”之说以证将来。陶履恭表示亦不再作答辩。

至此，讨论已成骑虎难下之势，陈独秀说：“诸君讨论世界语，每每出于问题自身以外，不于 *Esperanto* 内容价值上下议论，而说闲话，闹闲气，是以鄙人不敢妄参末议也。”

钱玄同则想请刘半农、唐俟（即鲁迅）、周启明、沈尹默诸位大师出来讨论 *Esperanto* 究竟是否可行。对此鲁迅写了《渡河与引路》表示了对世界语的看法。他说：“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 *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却无从断定。……但现在既只有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 *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历时三年之讨论实际上并不限于《新青年》杂志，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上均有世界语方面的论文发表。

综观此次讨论，涉及以下问题未能得到明确解决：

(1) 世界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欧战结束是否是世界大同之日的到来？

(2) 世界语的性质与功用。*Esperanto* 是否是人类语言？世界语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民族语言的消亡？

(3) 世界语有无生命力？它是否是能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活语言？

对上述问题作了正确回答的是胡愈之与巴金。

胡愈之 1914 年学会世界语，他非常喜欢阅读《新青年》杂志，关心这次讨论。他在 1922 年《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号发表《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一文，实际上可以说是 对这次大讨论作的总结。他在此文中指出：

“平常人都以为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使一切国语和民族语都完全消灭，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操同一语言，都用同一文字。……其实国际语的理想决不至于这样夸大，国际语决不想侵犯一切的国语和民族语，不但并不侵犯国语而且补助国语的。人类的思想能够互相交通是全赖语言文字的，但是在语言不同的人民互相交际时，还是和哑子一般，什么都不能了解，国际语的目的就只是弥补这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国际语决不想干涉人民内部的生活。所以说国际语是以伤害民族的精神和特质，犹如说邮政寄信足以伤害一般人谈话的能力，这是多么可笑啊！

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各民族内部的事情，因为是补助的，所以更不至侵害国语和民族语。”

关于“世界语是否适合于文学”的问题，巴金的回答最有权权威性。

1930 年 1 日，巴金写了一篇《世界语创作文坛概况》的文章，载于《绿光》杂志第 7 卷第 12 期合刊及第 3 期。这篇文章中说明世界语同样具有良好文学的三大要素：*riĉeco*（丰富性），*precizeco*（表现力）与 *fleksebleco*（灵活性）；而且世界语还有一个极大特点，就是 *ekstrema facileco*（极容易性）。许多古今名著的译文证明，世界语确实能够把人类的情感表现得非常自由、非常微妙，并不比民族语差一点。

在翻译方面，柴门霍夫、卡贝、格拉波夫斯基、希道洛芙斯卡亚、卡洛柴就已经翻译了托尔斯泰、密茨凯维奇、普希金、歌德、普鲁斯、屠格涅夫、果戈理等名家的作品。

在创作方面也已有了不少天才的文学家。巴金介绍了 30 多位世界语文学家及其作品之后，按说从世界语产生后的 40 多年时间内，出现了如此众多的世界语翻译家和作家，这样的成就已是很辉煌了，足以说明世界语是非常适合于文学的。“然而至今还有人在说世界语没有文学的旧话”。于是，巴金在 1930 年《绿光》杂志第 7-8 期合刊和 9-10 期合刊上又发表了

《世界语文学论》。

巴金认为:世界语的每一个语根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每个语根都是被某一个老民族创造出来的,而以后又被别的民族采用,其中有许多已经历过了数千年。从柴门霍夫的《第一书》精选的数百个词根到现在的大辞典中所有的语根都是从活语言中汲取来的,都有着自己的传统。

同时,使用是语言生长、完善、丰富的基础。只要使用无处不在,语言的生命力就无处不在。巴金把使用比作春风,使用使语言像青草一样蔓生得很快,无论怎样用野火来烧它,但是经春风一吹,它又茂盛起来。巴金还把语言比作水,使用是滤器。语言的某些单字与表现,经过多年的使用变得不适宜了,经过滤器而成为废弃的东西,而有生命力的词汇又像纯净清澈的水得以畅快地前流。这就是语言生长繁荣的规律。

巴金文中特别强调共同的使用,说使用是唯一的好字典,靠了使用无论何国人都可以学得每个字的正确涵义,直接用世界语来思想,讲出话来任何国的同志都能懂得,共同的使用保持了语言的一致。现在一个世界语民族已经存在,人们用这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世界语文学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的世界语者创作出来,任你怎样反对摧残也没有用。世界语已经不是一个提议、一个理想,它是事实。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向人们叙说我们的语言是怎样地好,而是不断地去使用它。用世界语文学使处在各种苦难中的人们消除隔膜,联合起来应付苦难,来谋全人类的幸福。

胡愈之、巴金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透彻地论述了世界语生命力之所在,说明了世界语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回答了人们对世界语认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而对 1916 年以来有关世界语问题的辩论作了一次总结。

2. 对基本英语和新国际辅助语的批判

基本英语在 30 年代初正式从英国开始大举宣传。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和《初级中华英文周报》便都在 1932 年作了介绍。北平和上海的世界语者们对此比较敏感。北平《世界日报》周刊《世界语之光》多次登载有关的报道。第 1 期和第 2 期(1933 年 6 月)上刊出了署名昔台的《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在第 2 期刊出了署名野鹏的《基本英语与世界语》。

野鹏主要从社会的角度批判基本英语。他说:“大不列颠研究语言的一群‘有名的学者’们,在剑桥大学言语研究所所长奥格登(C.K. Ogden)氏底领导之下,‘费了十年心血研究试验的结果’,成功了他们语言上的‘新发明’,这‘新发明’底‘商标’叫做British American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English——‘英美科学国际商用英语’。用这几个英文底字首凑合起来成Basic 一字,因而简称这‘新发明’为Basic English ‘基本英语’。……要是基本英语底产生如其名称所示仅仅是为了‘国际商用’,世界语学者没有和它打交道底必要。可是事实上这批‘新发明’底发明者们及其忠实的宣传者杂志编辑却于‘商用’之外更有把它当作国际语用以征服世界语的企图。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把他们对于世界语底愚昧无知与故意曲解严正地检判一下。”他指出:国际交往的发展促使人们研究人工语言,通过实际检验只有世界语最后存在下来。“现在由于各民族间被压迫阶级底联系日益坚固化与广大化,世界语已经深入于人类生活底各部门里而被普遍地应用着。现在全世界使用世界语的人数已经在 30 000 000 以上,图书杂志已超过 30 000 多种,⁷³ 有世界语的统一组织的国家已达 80 多国。这一事实说明了世界语本身底科学性合理性大众性与优美性。世界语底这种种本质赋予世界语以存在和发展底保障,而这种种本质正唯其是人工的语言才能同时具有。大英帝国底这批学者们和我国底介绍者说世界语与其他的人工语,因为是人为的死的而不是自然的活的语言,所以‘虽各有几万乃至几十万的赞成者,但仍是流行不广。’这一方面是企图轻描淡写地掩蔽住世界语正在

⁷³ 今按:这些数字太大,失实。

广大地被群众所应用着的事实，一方面是表现他们对于世界语底曲解与无知。”但我们并不漠视它可能的作用：“现在它既已在英伦改头换面粉墨登场，连国内的一向抱尾巴主义的出版界也居然抢了日本底先把它介绍过来，替它大吹大擂，那末，在大英帝国底政治势力范围以内，它自然有它底戏要唱。例如一方面大量地加速提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内英语教学底效率，替他们预备好更方便的接受麻醉文化的工具，以便向他们实施更高度的压榨；一方面制造大批的速成走狗来替大英帝国服务，这都是基本英语所可能扮演的剧目。（《新中华》明明说世界语‘没有祖国，即学出来，也没有用武之地’。反之，基本英语有其祖国，学好也当然就有用武之地了，这足以证明我们底话一点没错。）”

野鹏还说：“我们可以确然断言这批大英帝国底学者及其忠实的宣传者们底努力，正同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制度一样，完全是劳动力底徒然浪费，其结果绝不会像他们所想的那末乐观。史实已经告诉我们，英美帝国主义底学者梦想用其民族语言当作国际语言的狂妄的企图，这并不是第一次。1907年特立色亨 (Trischen) 底乌拉 (Ulla) 失败了，最近数年前某大学教授底安格里克 (Anglic) 失败了。这次底基本英语，在本质上既和它们没有两样，难道别有什么理由可以保证它底命运会比它们底好些吗？基本英语底出现，告诉我们替大英帝国底利益服务的‘学者’始终不忘其语言侵略的野心。……但是，在大众底醒觉之前⁷⁴，尽管有名流学者杂志编辑给它捧场喝采，其叫座能力之微弱是不问可知的。”

野鹏对基本英语的社会批判，虽然稍嫌过火，但是应该说总体上是正确的。他提到世界语有四大优点，而且指出：正因为世界语是人造的国际语，它才能同时具有这些性质。但他没有具体论述这些优点。

昔台的文章主要从语言方面进行批判。但是该文内容太少。作者提到：“基本英语，是创始者经过十年之久，辛辛苦苦地将字典中大部不重要和不需要的单字，统统删掉，结果仅存有八百五十个单字。其中名词占去四百个，又可图解的事物 (Picturable Objects) 的名字，如纸笔等，占去二百(这也应属于名词范围，故名词实占去六百)。形容词占去一百；又相反形容词，如宽狭长短等，占去五十(这也属形容词领域内，故形容词实为一百五十)。此外所存一百个单字，便是动词及其补字，其中动词仅有十八个，前置词二十，代名词、连续词及副词共有六十二。创始者认为英语中最使学者感到困难的，莫过于动词；而动词多半又是无用装饰品，且大都可由单纯的动词式或表示动作的字 (Operation) 助以副词前置词和名词等来代替。例如：to accelerate 即是 to go more quickly, to climb 即是 to go up, to break the law 即是 to go against the law。这样经过辛苦的试验，几位专家即将多余的动词完全删掉，结果只剩了下面十八个。即是：come, get, give, go, keep, let, make, put, seem, be, take, do, have, say, see, send, may, will。由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基本英语，不过就原有的现行英语，加以整理和删削，而得到比较简单的文规，然而其为英文也如故。”作者认为：“这所谓英语中的新运动，并不是一件天大的发见，充其量，也不过如代数学的化繁为简，将许多芜杂的材料，归纳得一个方便的公式。虽然公式也许很为简单，但是学者假使并不明了公式的来历，却一味死心只要来记公式，也未免过于呆板而太辛苦了吧。”

昔台谓基本英语“其为英文也如故”的话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基本英语歪曲了英语的面貌，已经不是常规的英语了；许多本族语者对这种不伦不类的“鄙准语”(pigino) 有意见。再说它的简单性是以牺牲语言表达的明确性为代价的。正如昔台所说，“学者假使并不明了公式的来历”，学习和使用起来有两个流弊：“呆板”、“辛苦”。昔台没有具体论述他的观点。可以想象：850个词肯定不够用，许多时候不得不绕着弯儿说话(比如“葱”被呆板地说成‘使眼睛流出水的白根’)；但是怎么知道那些用来绕弯儿的词组或复合词该如何构成、或是否符合英语语法呢？那可真辛苦了！

动词在一个语言体系中决不是如基本英语提倡者宣称的那样可有可无的；奥格登作为语

⁷⁴ 今按，即‘面前’

义学家不应该作出这个处置。依照一些语法学家的意见，动词是句子中最关键的成分；它怎么是“无用装饰品”？怎么能简化到那种不能容忍的地步？在“武松”和“老虎”之间怎能没有动词或随便使用动词？又如基本英语缺少 defeat (打败) 一词，连同义的 beat 也没有。我们要找代替说法，是该用 bring down, do down, do out, out do 还是别的什么说法呢，没有人能事先知道（“公式的来历”）。说错了，英国人是不会理解也不予承认的。（这岂不“辛苦”！）可惜，昔台并未在罗列基本英语的动词之后抓住这一点深入进行语言学批判。

《世界语之光》上批判基本英语的报导和文章还有《英语已成为国际商业语了吗？》、《基本英语论战》、《基本英语批判续讯》、《基本英语批判文献续志》、《读〈基本英语讨论集〉》。在《读基本英语讨论集》中，干铁认为：世界语在欧洲诸语言的基础上创造，是“集团的”、自然的语言；而基本英语的词汇语法是少数人头脑中产生的，是“非集团的”、非自然的语言。文中也提及林语堂(从“右”的方面)批评基本英语的言论。

上海的《世界》杂志第 10 号(1933 年 9 月)以《世界语对基本英语的防御战》为总题开始作报导，刊登了《论战中的各方阵容》和编者《展开这个论战！》、Tikos《基本英语批判与世界语理论的充实》、干铁《谈基本英语》、洪启尧《关于基本英语》几篇批判文章。此外，谷尘《所谓 Basic English》（《绿光》1933 年第 3 期）、索原《“祖国”与“用武之地”》（《自由谈》，1933.8.20）、叶籁士：《“用武之地”“环境”与“傲慢”》（《读者月刊》创刊号）等也对基本英语进行批判。

成都世界语学会刊物《绿帜》上也刊登了钟鉴《与基本英语》一文（1 卷 5 期（1933））参加批判。

苏州世界语者苏蜚写了《Esperanto 与 Basic English 的比较》（《斗报》3 卷 35 期），还印成《基本英语用作国际语的检讨》由苏州世界语学会单张散发。

基本英语在中国的宣传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还在继续；最后是不了了之。但是世界语者们后来没有再理会它。

由于厦门大学教授周辨明发表了重在鼓吹叶斯泊森“新国际辅助语”（Novial, 1928）的编译长文《万国通语论》（《厦门大学学报》1 卷 2 期，1932 年）。世界语者们转而批判“新国际辅助语”及文中反对世界语的言论。《世界语之光》于 34-36 期（1934 年）连载了于施《“万国通语论”小评》一文。周辨明此文，主要是编译 E. Sylvia Pankhurst 的《国际语之将来》一书，但也补充大量材料重点阐发 Novial 的优点。原著者对世界语有许多苛评，推崇英特林瓜语；周辨明都加以默认。叶斯泊森批判了英特林瓜语唯拉丁语词是从和取消语法的倾向；但他自己的新发明，如居然保留名词的性、在 s/z 对立中牺牲 z 音，都弄巧成拙。于施逐一反驳了《万国通语论》著者加诸世界语的责难，如：世界语加符字母难学难用、重读呆板、改变了民族语言的词形（出现 birdoj, limo 等奇字）、复数不用最有国际性的 s、用 mal- 来减少词的数量不好（malfermi 像是“关得不紧”），而形容词与名词须在数和格上一致太繁琐、只有一种助动词又不符合最新的分析（表达）法；再者词的分类不是依照意义而是照它们临时在文法上的作用；还有，世界语不像沃拉普克语用英语为主要词干来源而要扩大国际性，但柴门霍夫选词的方法似乎是没有一定的。于施指出：著者对国际语产生和形成的法则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把握住主要的东西，埋头于技术问题。柴门霍夫只确定世界语的最小基础，而把语言的进展、进化、完成的任务交给集体；有些人却用几个人的脑力创造十全十美的语言。著者说了十条国际语应该具备的条件，Novial 的六条与世界语基本相同。译者介绍 Novial 不是从实际出发介绍它，只是以吹毛求疵指责别的方案为能事。国际语是在实际需要、也在实际应用中才能成立的；世界语以此独自取得成功。于施对该书著者、译者和“新国际辅助语”的批评是合理的，捍卫了世界语的基本原则。

稍后，《世界》杂志（1935/2）也发表 F.R.C. 的文章《读周辨明编译〈万国通语论〉后记》进行批判。

他说：“这本书...所谓‘揭出 Esperanto 之不适用’云云，完全是琐屑屑的，凭了个人的传统的成见来挑剔，并且有的地方简直说得无稽之至。”针对本书指责世界语的前缀 mal-，他认为：“假如 Esperanto 真的连‘不好’与‘坏’和‘不年轻’与‘老’都没有一个分别，还成为一种文字，岂非天大的笑话，它的生命怎么能够挨到今日，而且一天一天还在那里发育生长呢！”他还指出译者把 rajto = right（权利）译作“右边”，又把 ido = descendant（名词，作裔或幼解）误植为 descendent（形容词）而译作“传下”（倒像是动词了），实在编译者自己对于世界语未尝彻底了解，“不过道听途说，信口雌黄而已。这于学者风度非常有损的。”

3. 80 年代以来关于世界语的论争

(1) 英文《中国日报》关于世界语的讨论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国逐步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促使我国世界语运动开始复兴，一些省市建立了世界语协会，世界语的函授、面授遍及城乡，学习世界语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形势引起了一些外国人的注意，英文《中国日报》接到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的来信，这封信于 1982 年 1 月 5 日发表后，引起了国内一些人，特别是世界语者的关注，纷纷投书《中国日报》，对这位英国人的观点提出质疑。《中国日报》在《读者来信》专栏里，有选择地发表了几封有代表性的信件，现选择其中的四封信反映双方的观点。

中国日报发表一位名叫 Leger Brosnahan 写的首封读者来信，文章的标题是“最好用活动的语言”，现将全文转录于下：

“读到去年 12 月 8 日新华社的一篇关于世界语之友会成立的文章我感到十分悲哀。

当然，我并不反对任何形式表示友好的东西，对世界语也不例外，并且人们有权利因个人喜好组成某某之友会。

令人难过的是，新华社的文章居然想当然地把世界语看作是有助人类沟通、促进文化交流的有效手段。

从 Mario Per 的《一个世界，一种语言》已清楚表明：人造语在促进人类沟通上，是十分昂贵最终死路一条的方案，而世界语就是这样一种既没有人说也没有人看的语言。

我认为，把精力和财力最好花在一些有活力的语言上，比如普通语，而不是花在注定要失败的人造语上，

这样就会使普通语在国内外更广泛地运用，而不是现在 8 亿人这个数字。若用在推广英语上，也就不只 6 亿人在运用，依此类推，西班牙语、俄语、法语、德语等也都是大致一样的情形。

所有有活力的语言存在于远比世界语基础广泛的民族语基础之上，况且要易学得多。用世界语去和世界接轨，实在难登大雅、劳民伤财。”

一位同样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 Geoffrey Sutton 看了这篇短文后，以“世界语是一种有效的全球语言”为题投书《中国日报》，该报于 1 月 15 日发表，全文如下：

“我很愿意就 1 月 5 日 Brosnahan 先生关于世界语孤陋寡闻的认识谈谈我的想法。很不幸他对世界语运动及其目的实在是一无所知。

Brosnahan 先生不反对任何表示友谊的行为，这很好。实际上，世界语在国际上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上也拥有广泛领域。

世界语表达灵活、韵味丰富，它比任何一种民族语要简单易学，就是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也能熟练掌握。我讲世界语、用世界语已将近二十年了，说世界语的人没有谁会反对教

授其他外语。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语言，现在会说好几门外语。

也许 Brodnahan 先生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毛泽东会支持世界语？为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播出语种中，每天还要用世界语播音？为什么上百种期刊会用世界语出版？而这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出版、颇受好评的《中国报道》杂志。

随着人们对民族和语言平等认识的提高，世界语也会慢慢兴盛起来。各种民族语言为各自的影响和势力而一比高下，这是因为每种民族语都与其价值观息息相关。只有国际语言世界语在国际关系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尊重平等权利和地位的语言手段。”

在一所外国语大学工作的魏以达教授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他的文章被发表在 1 月 28 日《中国日报》上，题目是“世界语在世界上广为运用”，文章的论点如下：

“读了 Leger Brosnahan 先生关于世界语的来信我也感到很‘悲哀’。应该指出的是他忽视了这种人造语言的发展。

人造语，特别是世界语常常是一个被争论的对象，本世纪初，世界语初到中国，争论就开始了，所以在它存在 80 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在争论，这一点也不稀奇。

‘没有人说也没有人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中国报道》的调查显示，有近一千万人在说世界语，还有 40 多种世界语期刊在出版。

世界语‘实在难登大雅、劳民伤财’？我不知 Brosnahan 先生是不是对世界语有过研究，如果没有，对于他这些指责，我敢说完全是一派胡言；如果做过，为什么又不能更有效地说服《中国日报》的读者呢？

只需几个小小例子便能证明一切。国际世界语协会拥有近 40 个团体会员，并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谘询关系，这有力地证明世界语是有前途的。

另一个例子是国际世界语大会自 1905 年起每年在一个国家举行，平均每年都有 1000 人参加。1978 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会有 4414 人参加。”

Leger Brosnahan 在读了以上两封信后，再次投书《中国日报》，标题是“恢复世界语的努力是徒劳的”，该报于 3 月 26 日发表，这位英国人在文章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文章中写道：

“两个月前，我曾给《中国日报》写信商讨在中国恢复世界语组织以达到增进国际了解的做法是否理智。

我认为，把钱财和精力应放在诸如普通话、英语、俄语、印度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日语或任何一种有着广泛使用者的活跃的语言上。我还觉得，去恢复其它活着的语言也比在已有的乱糟糟的争吵中加入没有人或少有人说的语言好，因为那样只能使问题复杂化。

两位读者，也许是忠实的世界语者，用两个理由回答了我的疑问。一个用权威回答我，一个用传统回答我，但是谁也没有批驳自如。Geoffrey Sutton 让我问问毛泽东为什么支持世界语，我会这样说，如果他说过这样的话，那也只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或象语言学家 G.B.Shaw 那样留下他的财产来支持英语拼写改革。

Sutton 认为，由于价值标准不同，民族语言为了各自影响和势力而一争高下，而我认为英语作为 11 国母语，许多年来，在许多英语不是母语的人中，也有不计其数的人从小就学英语，这样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价值观。

魏以达更多地说了——也正是我的观点，承认人造语特别是世界语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更重要的是，承认了只有一千万世界语使用者。是不是还会有一个新团体在已有一千万使用者的基础上再推广匈牙利语，以此来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去实现难以实现的空想？

二位作者的文章使我眼界顿开，让我知道人们在这样一种难登大雅、劳民伤财的语言上所花的时间、钱财和精力远比我所知的还要多得多。”

据一份杂志报道，《中国日报》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共发表 11 封读者来信，虽然没有查到全部来信，但从以上的论争中不难看出一些端倪。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 Leger Brosnahan 在两封信中都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如何解决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问题，如果按这位英国人的观点，大家都把钱财和精力放在各自的民族语上，那么人类交往中的语言障碍问题也将永远解决不了了。

(2) 《读书》杂志关于世界语的又一场论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 1997 年 4 月号上发表了一位名叫周质平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春梦了无痕》，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国近代世界语运动》。文中表达了以下一些观点：

(1) 认为柴门霍夫创始的 Esperanto，本来就叫做“世界语”，或者以为世界各国都把它叫做世界语，评论说柴门霍夫心目中的“世界”只不过是欧洲。中国人提倡世界语，只是一厢情愿。

(2) 认为世界语是一种无人作母语的语言，只是少数人发明的符号和规则，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语言”。

(3) 把中国近代的世界语运动概括为要用世界语来代替汉语。

(4) 认为鲁迅对世界语的态度，只是“不反对”。

(5) 巴金 1980 年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后撰文说：“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通用的语言。”周文认为巴金“对问题的看法，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

(6) 认为世界语是“在‘太虚幻境’中神游的一场春梦”，“Esperanto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不曾从‘死文字’转化为‘活语言’，Esperanto 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包括世界语者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反对，认为《春梦了无痕》的作者对世界语和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一无所知，信口雌黄。

石成泰和章怡分别在《读书》杂志 1997 年第 8 期和 1998 年第 8 期发表文章。

石文的标题为《痴人说梦》，章文的标题为《语言的困扰和理想的追求》。两篇文章都对周文的各种论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其主要论点是：

(1) 世界语不是“世界”语

章文介绍了“世界语”汉语名称的来源，他说：“‘世界语’这三个汉字，是日本大正年间借用汉字翻译（意译）外来语时使用的（日文早已改用假名音译了），是我们的先人从东邻传入 Esperanto 时，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日本人借用的汉字，沿用至今。柴门霍夫从不认为他这语言是‘世界’语。1887 年在沙皇统治下的波兰用俄文书名第一次问世时，书名叫做《国际语：导论和课本》。他用的是‘国际语’（mezhdunarodny yazyk）；两年后即 1889 年在美国出了英文版，也叫‘国际语’（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我国 20 年代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作文介绍时，也用‘国际语’。所以由‘世界语’三个汉字引起的联想或发挥，往往变成对读者的误导。”

(2) 不是“死文字”、“死语言”

石文说：“世界语是国际辅助语，旨在为人类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提供一个比民族语简单易学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世界上没有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它就是‘中立的’（neŭtrala）语

言，较易为各国人所接受。”章文说：“世界语被世界上各个角落里数不胜数的人使用着。好些名著已有世界语译本；还有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家，如我们熟悉的匈牙利作家友尤利·巴基（《秋天里的春天》）。它有自己的语言群体：国际世界语协会，有群众性的年会（第71届年会1986年在北京举行，参加者达2482人）。”石文除谈到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年会之外，还谈到1996年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第1届世界语大会（近500人）。说两次会议的全部议程都用世界语来进行，除开幕式上各国驻华使节到会用母语致词，有过世界语翻译外，其他绝无译员工作。而且与会两千多人所操民族语至少要有几十种，如何能用翻译方式来解决。石文还举例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自1964年起，每天4次，每次半小时向世界广播，很受各国听众欢迎，每年上千封听众来信，足以作证。北京出版的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创刊于1950年，已历时47载，发行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面在我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中可说最广，其印数虽不能言多，但几乎等于英、法文版两个语种的《中国文学》之和，这可不是‘死语言’，‘死文字’能胜任的吧。藉世界语介绍中国文学给世界的工作，成绩斐然，世译本《鲁迅小选集》、《聊斋》、《中国诗选》、《寒夜》、《虎符》等等都拥有不少读者，而近年谢玉明用世界语译的《红楼梦》，显示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雄厚实力。”

针对周文说世界语是“死文字”、“死语言”的论点，国际世界语研究院院士李士俊在《北京社科联》1998年第2期的《“春梦”终究会成真》一文中谈到：“现在世界语网络很厉害，可以看到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的2000多人的世界语网址。打开电脑，就可以随便和哪个国家的世界语者在网上交谈。在计算机互联网上，显示出世界语有很大的优越性……刚才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给今年国际世界语大会的贺信，说明国际组织也很重视世界语。”

(3)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不是要用世界语代替汉字汉语

周质平在文章中说：“钱玄同在他《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甚至主张废灭汉语、汉文而使用世界语代之。”“提倡一个人为的、虚幻的世界语取代汉语汉字，这不是梦，又是什么？”

石成泰在文中指出：“80年以前那场拥护与反对世界语的讨论，不能构成‘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充其量只是中国世界语运动史初期的一场争论而已。而讨论中钱玄同先生主张废除汉字，而用世界语代之，也非世界语本身的目的，只是钱先生的一家之言。”章怡的文章也指出：“（周的）文章特别揪着钱玄同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思潮影响下爆发的个别偏激论点——说中国文字太难，不如用世界语来代替的论点——，概括为中国近代的世界语运动就是要用世界语来代替汉字汉语。这种概括是无视历史的大字报体裁。”

(4) 鲁迅赞成世界语”

鲁迅对世界语到底是积极的“赞成”还是消极的“不反对”？对“学Esperanto”这件事是不是‘认为是荒诞不经的空谈’？石成泰在文章作了具体的论述，他写道：“其实，鲁迅先生一生是支持世界语运动和赞成世界语的。先生的《全集》中有《答“世界社”问》一文，写于1936年8月15日，在先生辞世前不久，那可信度也就极强。文不长，不妨抄上几句：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20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

- 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
- 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

鲁迅注重世界语在文学领域的应用，是许多事实所证明的：30年代初，当时是邮局小职员的孙用，从世界语文版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在先生多方奔走支

持下得以出版，这在《鲁迅书信集》中留有历史的记录。更早些时候，胡愈之把爱罗先珂介绍给鲁迅后，这位用世界语和日语创作的‘俄国盲诗人’，就住进了北京周宅。爱氏在北大教世界语时，常常有一些中国青年用世界语和他交谈，有证可查的就有王鲁彦等人。鲁彦本人也从世界语文版译介过不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5) 对巴老的嘲笑是对历史的无知

周质平在文章中说：“就是这样一个虚幻的人造语言却让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神魂颠倒达数十年之久。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小说家巴金。”

周文接着说：“巴金在五四前后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往后六、七十年之间，他对世界语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关切和兴趣，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还抽空看看世界语的书。

“1980年，他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65届国际语大会。回国后，写了一篇后记，收录在1989年出版的《随想录》第2集《探索集》中，在这篇冠以‘世界语’的短文里，我们看到一个早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到了年近八十，依旧对世界语抱有无穷的信心和充满浪漫的幻想，说：‘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我看了这篇短文以后，一方面觉得这位当年勇于批判旧家庭制度的小说作家，到了垂暮之年，依然对世界语一往情深，他的浪漫情怀，老而弥笃，这是可佩的；但另一方面，我不能不感到有些伤心，有些失望，怎么巴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呢。到了1980年，居然还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周文对巴老的嘲笑和奚落引起许多世界语者和非世界语者的愤慨，石文说：“巴老一直对世界语一往情深，他曾把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 (Julio Baghy) 用世界语创作的一个中篇《秋天里的春天》译成中文，30年代初在开明书店出版后，连续再版，至50年代竟再版达17次之多...至于《家》中的觉慧，并不是世界语者，倒是在外国语学校攻读英语的学生。论及巴金的晚年，他在思想上应该说是绝没‘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而是在不断反省过去，解剖自己，提倡讲真话中，积极身体力行参与社会生活，圆自己少年时的梦，包括率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深得他的读者（包括几代人）的敬重，不失为一个寻梦者的赤子之心。”

对于周质平文中对巴老的责难，章文提出了这样的质问：“难道巴老的思想境界（尽管加上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竟然停留在少年觉慧的水平吗？随便问问今日中国大陆任何一个读书人，看谁会作出这样的概括？只有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一无所知，对中国现状也一知半解，而又去嘲笑历史的人，才会对巴老这样一个真正的人说出这样的话。”

对于周文中所说的巴金的《随想录》的评价，章文引用了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季羨林教授为《人世文丛》系列写的一篇序言中的一段话：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30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章文接着说：“这部大书的第48篇，题名《世界语》，亦即《读书》那篇文章所抨击的‘少年觉慧’水平之作。巴老讲了真话。他表白了他仍然相信世界语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国际辅助语，是各国善良的老百姓互通音讯的交际工具。他坚持这种理想。他坚持这种信念。你可以不赞成世界语，你甚至完全可以反对世界语，但是你不能禁止别人赞成和使用这种工具。你可以斥责古往今来哲人的理想为春梦、为残梦、为恶梦，但你没有权力遏制别人持有这种或

那种理想，即使是空想、幻想、奇想，甚至是痴想。讲英语的美国总统也没有这种权力，也没有这种权利。”

章怡在文中还谈到他 1989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和巴老会见时的情景：“他回忆去斯德哥尔摩（1980）参加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事——会上他接受了国际世协授予他的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参加大会 1807 人的热烈掌声。那次大会，同每年举行的国际大会一样，全场讲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即世界语，彼此对话无需翻译，真是一种奇景！巴老提到许善述和他编的书（我真惊骇于巴老的记忆力这样好：许善述是一个热忱的世界语者，前几年患了绝症，却以惊人的毅力编成了 403 页的《巴金与世界语》；书是 1995 年出版的，许在出书前就离开了人间）。他说他喜欢这部书，也喜欢我为这部书写的序言。我听了，很激动，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可爱可敬的老人啊！然而更使我激动不已的是，巴老托我向国内外的世界语同道致意，他严肃地认真地对我说：‘我本来还想为世界语多做点工作，看来不行了。’这句话代表一个真正的人的信念，反映着一个毕生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学人对理想的永远追求。”

（6）世界语是理想者的梦

周文说“世界语是在‘太虚幻境’中神游的一场春梦”，章文针锋相对，说“世界语是一个美好的梦，是善良的人的梦，是理想者的梦。”

章文中谈到，“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本世纪 60 年代信息革命以来，英语（严格地说是美国英语）在这个地球上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又极力抵挡着英语的渗透。”

章文接着谈到，“欧洲一体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而民族文化传统是各个民族所要全力保卫的。那么，英语呢？能让它取代各民族文化的载体而横行无阻吗？不是说即将到来的世纪面临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吗？那么，民族语 vs 英语，怎么办？这个拉丁语词 vs（即 versus）是个妖怪：据说古时解作‘面对’，到了中世纪解作‘对抗’。不得不面对，甚至不得不服从，但心里又想对抗，想把它赶走，至少别让它干预自己的文化圈。”

问题怎么解决呢？章文接着谈到，“难啊！可是我的一个世界语朋友说，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使用一种非先天的（即人工制定的）、超民族的、中立的、又富有弹性能表达各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国际辅助语（比如世界语）作为国际交往的媒介（国际辅助语），同时不排斥英语在许多领域和许多场合畅通（类似前时代欧洲把拉丁语作为某种共通的传播工具），不就解决了吗？”

章文在后面的章节里又谈到，“忽然想起，1963 年夏天，听到陈老总（陈毅）讲他对世界语的印象。太妙了，不可不记。他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学了世界语，大家互称同志，坐下来，就亲切得很，不管是不是同一个民族，也不管什么阶级什么信仰，坐下来聊聊，你家长我家短，这样有什么不好？也许他会做你的工作，你也可以做他的工作嘛。就算是仅仅闲话家常，这就进入‘人’的世界，有什么不好？”

章文接着说，“1963 年！那是什么日子？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啊。难得有这么一个明白人，对世界语了解得那么深刻，讲得那么透。简直如坐春风，春风化雨！世界语是一种语言（没有死：），但不仅是一种语言，它是一个梦（不过那不是什么残梦恶梦幻梦），是一个美好的梦，是善良人的梦，是理想者的梦。请走进世界语者的群体中去罢。去看看罢。我那位朋友说，在那里功利少一些，人性多一些，你会发觉在那里人际间是人对人的关系，而不是狼对人或狼对狼的关系。”

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上这三次论争，都涉及到几个中心的问题，一是认为世界语是

人造的，非民族的，没有一个民族作支撑，很难发展。二是认为世界语太简单，不能表现丰富的文学和人类的感情，没有文学的语言只能是僵死的文字，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三是认为提倡世界语就是要消灭民族语，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四是认为英语在国际上比较流行，可以把英语（或改造后的基本英语）作为国际语来推广。这四个观点中，有的对世界语不了解，从而发生种种误解；有的是强加给世界语的，其论点根本就不成立；有的是从传统观点出发，观察问题，自然看偏；有的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自然对世界语很反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关于世界语的论争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而且所涉及的中心问题大致也就是这三四个，但是历史将证明：人类需要一种国际语，而世界语是首选方案。

附录：

一、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

(1891—1998)

1891年

海参崴成立太平洋世界语学社，出版用12种文字注释的《三三课本》。以后一部分懂得世界语的俄国商人到哈尔滨经商，先将世界语带进中国。

1904年

许论博留学法国，向法国人学习世界语。林振翰自学世界语。

1905年

陆式楷（又名陆式卿、陆疾侵）在上海向一位俄国人学习世界语。

1906年

中国世界语者第一次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陆式楷组织上海世界语学社，举办夜校，传授世界语。

1907年

6月22日，吴稚晖（吴敬恒）、李石曾（李煜瀛）、褚民谊、张静江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La Tempoĵ Novaj*）华文周刊，大力提倡世界语。

同年，刘师培（刘申叔、刘光汉）、张继（张溥泉）、何震、景梅九、钱玄同在日本向大杉荣（*Oosugi Sakae*）先生学习世界语。

1908年

4月，刘师培、何震（刘师培之妻）、张继在日本出版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衡报》（*Egaleco*），主张世界各国革命家利用世界语为互通声气、互相理解的工具，声称《衡报》是亚洲最早提倡世界语的杂志。何震在日本主办《天义报》（*Justeco*），经常刊载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材料。留日学生张修爵主办《医药学报》，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宣传世界语的。张继在东京《民报》社开世界语讲座，宋教仁、章太炎、朱执信、鲁迅、周作人、汤增璧、苏曼殊参加学习。

同年，刘师培等人回国，在上海从事世界语活动。杨曾诰在英国利物浦学习世界语。蔡元培先生在德国自学世界语。

1909年

5月，华南圭在巴黎创办《中国语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Ĉina Esperanta Scienca Literatura Revuo*），共出版5期。

同年，陆式楷、盛国成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会（*Ĉina Esperanto-Asocio*）。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杨曾诰写《万国新语》一书，宣传世界语，该书由文明书局出版。在北京译学馆供职的林振翰翻译《汉译世界语》一书。许论博在广州开设世界语班和夜校。

1910年

11月，中国世界语会会刊《世界》（La Mondo）创刊。

1911年

2月，林振翰的《汉译世界语》由科学会编辑部出版。

同年，奉天（沈阳）开办世界语学校，请上海的熊子英讲授。宋善庆在福建漳州设立世界语学社，宣传、推广世界语。在上海同盟会总部大楼开办世界语班，由陆式楷任教。

1912年

5月，中国世界语会改组成中华民国世界语会，有会员300多人。在上海设中央事务所。中央事物所下设世界语函授部，并在常熟、漳州、南京、广州、泉州、青岛、长沙、厦门等地陆续设立地方事务分所。

9月至11月，《世界语初阶》（La Unua Ĝupo de Esperanto）、《爱斯不难读》（Esperanto）、《爱世语中国语会话指南》（Konversacio）、《世界语进阶》、《世界语小字典》、《世界语函授讲义》、《世界语汉文字典》出版。

同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下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在教育部内开设夜校，由杨曾诒先生讲授。蔡元培在上海中国世界语会发表支持世界语的重要演说。许论博在广州西关“平民公学”附设世界语夜校教授世界语。秋天广州世界语学会成立，柴门霍夫致信祝贺，并赠送一批世界语书籍。黄华瘦、狄昂人在长沙创办世界语学会。许论博与刘师复、黄尊生创建广州世界语学会。

1913年

1月，安真、盛国成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主义者》（Ĉina Socialisto）杂志。

2月，中华民国世界语会在上海开设世界语高等专门学校。

8月20日，刘师复在广州创办《晦鸣录》（La Krio de Koko），从第3期起，该刊更名为《民声》（Voĉo de la Popolo）杂志。

同年，中国社会党为培养干部在北京创办平民学校和北京世界语学会。邓颖超在平民学校学习世界语。胡愈之学习世界语。南京世界语会和世界语学社、台湾世界语讲习会相继成立。黄华瘦在长沙创办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华民国教育部范总长下令继续实施在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课。

1914年

2月，由蒋爱真、潘柄生等人发起的常熟世界语学社、常熟世界语讲习所成立。

5月，胡天月在常熟又发起成立 Antaŭen ĝis la Venko（向前直到胜利）组织。以后常熟县城水北门外新造桥大街被命名为柴门霍夫街。

同年，广州成立世界语学院和世界语专门学校、世界语星期讲习所。澳门世界语讲习会、香港世界语讲习所也在这年成立。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由世界语研究所编辑的《世界语中国语分类字典》出版。

1915年

南京发起绿星社。胡天月在常熟成立绿帜社，创办《绿帜》（La Verda Standardo）。孙国璋和其他世界语者在上海成立世界语学社，办世界语夜校。

1916年

1月，盛国成、陆式楷在上海创办华星世界语传播社，出版《华星》（La Ĉina Brileto）月刊，该刊在国内影响很大。

5月，区声白编辑的《世界语读本》出版。

8月，北京世界语会、佛山世界语陈列所成立。

9月，成都世界语俱乐部成立。

11月，《新青年》杂志在通信栏中开展关于世界语的辩论，历时三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吴稚晖、钱玄同等人参加了讨论。

同年，福州、天津、常熟、南京、漳州、厦门、香港相继成立新的世界语团体。

1917年

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定在中文系开设世界语选修课，邀请孙国璋到北大任世界语讲师。

4月，中国革命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世界语。

1918年

9月1日，江勤农在成都湖广街兴隆庵小学创办成都世界语专科学校。

11月4日，鲁迅以“渡河与引路”为题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支持世界语。

1919年

9月，广州世界语学会成立。

同年，俄国青年斯托帕尼（Stopani）在上海开班教授世界语。楚图南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世界语。台湾世界语者学会创办《绿影》（La Verda Ombro）

1920年

3月，胡愈之、陆式楷、斯托帕尼、汪千仞、王克绥等人发起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Ŝanhaja Esperanto-Asocio）。

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该校开设了世界语课，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为培养中国革命的后备干部、输送各地革命青年赴俄国学习设立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时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公开办学形式掩护革命活动的所在地。除开世界语课而外，还开设英、法、德、俄、日语。世界语课由斯托帕尼任教。同月，徐庆誉发起成立长沙世界语研究会。

12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第1届国际联盟大会上签名支持在各国国立学校中正式教授世界语。

1921年

8月，蔡元培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檀香山太平洋教育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在各国小学教授世界语的提案。

10月，爱罗先珂（Eroŝenko）应胡愈之邀请到上海世界语学会讲学。

同年，第3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蔡元培提出的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教育部为此专门下达训令。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成立，蔡元培兼任会长。

1922年

3月，爱罗先珂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课。

6月，上海世界语学会创办《绿光》（La Verda Lumo）杂志。

12月，北大举行世界语联合大会，2000多人出席，黎元洪总统派代表顾维钧出席大会并致词，蔡元培在会上发表重要演说。

同年，新的北京世界语学会成立，周作人被选为会长。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Revuo por Studentoj）开辟“学生世界语”专栏。瞿秋白、茅盾等在上海大学执教期间，提倡世界语，丁玲当时在该校曾加入世界语班的学习。孙国璋编著的《世界语高等新读本》（La Nova Krestomatieto de Esperanto）、《世界语高等文典》（La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盛国成编著的《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由东方世界语传播社出版。无等编著的《世界语汉文辞典》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1923年

6月，著名作家王鲁彦到长沙协均中学任教，曾在该校和平民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开办过世界语班。

同年，蔡元培、吴稚晖、陈声树等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Pekina Esperanta Kolegio），鲁迅被聘请为董事，并同意在该校教授《中国小说史略》，直到1925年3月。胡愈之编的《国际语运动》一书由上海东方杂志社出版。冯省三编著的《世界语初级读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汉口、平湖、杭州、成都、宜昌、安庆、苏州等地相继成立世界语团体，并开设世界语班。

1924年

3月，黄尊生当选为国际世界语运动中央委员会（Internacia Centra Komitato）委员。

8月，蔡元培在黄尊生陪同下出席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9月，中国代表在第5届国际联盟大会上投票赞成承认世界语在电报中成为明码语言。

12月，作家高长虹在《国风日报》上创办《世界语周刊》。

同年，景清萍、张剑影在陕西安边成立西北世界语学会。

1925年

1月，吴先忧创立成都世界语研究社。

6月，上海等世界语团体拟定“致全世界之抗议书”，分致国际联盟、各国世界语学会和各国世界语杂志，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抗议日本军队暴行。

11月，吕蕴儒编的《世界语论文集》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同年，太原世界语学会宣告成立。作家柔石在北京大学选修世界语课。音乐家吕骥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世界语。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世界语夜校、星期学校和函授学校，由胡愈之、索非、陈兆璜、蒋爱真、王鲁彦、郭后觉、孙义植、陆式楷、盛国成、徐耘阡等人任教。黄果一、狄昂人、李云杭发起成立长沙世界语学社。

1926年

7月，广东省第6次教育大会通过设立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Kantona Esperanto-Instituto）和将世界语加入中小学课程的议案，黄尊生任讲习所所长。

同年，中山大学开设世界语课，黄尊生任教。广东大学、岭南大学、广州国民大学、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执信中学、培正中学将世界语列为课程之一。黄埔军校开设俄语、世界语、日语、德语、法语、英语六种外语，每种均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要求每位学员需学习一门外语，世界语教官是伍大光。世界语课一直开到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后觉编的《世界语概论》。

1927年

5月29日，符恼武发起成立镇江世界语学会。

9月，庞祝如发起成立绍兴世界语学会。

同年，薛慕桥在浙江陆军监狱里向上海世界语函授学社报名学习世界语。钟宪民将郭沫若的戏剧《王昭君》译成世界语出版

1928年

12月，范天均等在泉州组织福建世界语学会。巴金从法国回国，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工作。

同年，卢剑波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中华绿星社（La Verda Stelo-Asocio）。上海南洋中学和江湾劳动大学把世界语列为必修课。广东全省教育会议通过将世界语列入高中课程。

1929年

6月30日，肖从云、方善境、傅壁城、徐豪生、薛诚之等人创建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出版《光明》（Hela）会刊；12月，该组织更名为汉口世界语学会（Esperanta Asocio en Hankoŭ），建立“绿星书店”。

同年，由杨景梅翻译的《柴门霍夫传》（柏里华著）出版。

1930年

1月，傅小奇、徐吾行等人创建福州世界语学会。汉口世界语学会会刊《光明》改为《希望》（La Espero）月刊，该刊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与上海世界语学会会刊《绿光》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广州电台举办世界语讲座。景梅九发起成立太原世界语学会。胡乔木自学世界语。

1931年

1月，胡愈之从巴黎回国，月底途经莫斯科时作了一周的访问，2月11日回到中国。以后他写《莫斯科印象记》。许多青年阅读此书后走向革命。

2月，清华世界语学会成立。

7月，苏州世界语学会成立。

9月，“九·一八”事变后，汉口世界语学会联络全国20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是中国世界语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开端。

11月3日，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乐嘉煊、陈世德、覃净子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亦称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出版《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Ĉina PEK Bulteno），以加强国际联系。

12月20日，杨令德发起成立绥远世界语学会。

同年，泉州世界语学会成立，创办《新声》（Nova Voĉo）。王锡周、李孕育发起成立呼和浩特世界语协会。刘澜涛、冯基平、刘尊棋在监狱里学习世界语。

1932年

1月16日，符恼武等人重新发起成立镇江世界语学会，并出版《黎明》（Mateniĝo）会刊。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侵沪战争，上海世界语学会被炸毁。

2月，北平世界语者联盟宣告成立。

4月24日，北平世界语学会联合会成立。

5月1日，南京世界语学会成立。

7月，北平世界语学会联合会出版《红星》(Ruĝa Stelo)杂志。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在上海成立。

12月15日，《世界》杂志(La Mondo)创刊，该刊历时4年多，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叶君(叶籁士)、雪尘(张企程)负责主编。17日-18日，上海举办大型世界语展览，影响很大。

1933年

1月22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Ŝanhaja Esperantista Ligo)宣告成立，以后，它成为团结中国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的核心。

3月29日，周尧在南通发起成立农通世界语学社。

4月9日，成都世界语学会成立。

6月18日，杭州世界语者协会(HEL)成立。23日，华北有影响的报纸《世界日报》增设《世界语之光》周刊。同月，成都世界语学会创办《绿帜》(Verda Flago)杂志。

8月18日，无锡世界语协会成立。

9月10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2次大会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的口号。

11月21日，陈原、梁叔仁等人发起成立广州中山大学踏绿社。同月，《世界》杂志创办“言语科学”副刊，专门讨论大众语运动和汉字拉丁化问题，全国各地世界语者积极投身新文字同年，青岛世界语学会和南宁世界语学会成立。全国世界语者投入对“基本英语”的批判。劳荣、周达甫、罗石均、瞿白音、孙克定、洪启尧等组织南京世界语学会。焦凤(方善境)从苏联世界语刊物《新阶段》(La Nova Etapo)1932年第2期上翻译肖三写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一文。第一次在国内介绍了有关汉字拉丁化问题，引起了文化界的重视。《世界语语法纲要》(李泮编)、《世界语汉文模范文选》(钟宪民编)、《世界语捷径》(钟宪民编)相继出版。

1934年

1月15日，广州世界语讲习所创办《广州世界语月刊》(Kantona Esperanto Gazeto)。

同年，傅振伦编的《汉语世界语辞典》，周庄萍编的《汉语世界语小辞典》，钟宪民编的《世界语模范文选》，影印的《世界语原文词典》出版。

1935年

2月24日，扬州世界语学会成立。

5月25日，香港世界语学会成立。同月，北平世界语者协会编辑国际通讯刊物《无线电》(Radio)出版。

8月，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出版《Xin Wenz月刊》，宣传新文字和世界语。

同年，长沙电台开辟世界语广播讲座。周尧发起“昆虫趣味会”的学术团体，出版《趣味昆虫》(Insekto Interesa)和副刊《中国昆虫界》(Ĉinaj Entomologistoj)。西安世界语学会成立，出版《西安世界语者》杂志，创办人许寿真、景梅九。周庄萍、徐文、郑竹逸合编的《现代中文世界语辞典》由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杨景梅译的《柴门霍夫传》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肖聪编的《世界语会话指南》、《汉世辞典》由上海绿叶书店出版。

30年代中期王若飞在太原陆军监狱学习世界语。女作家肖红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办的讲习班里学习世界语。姚雪垠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学习世界语。

1936年

4月,《中国怒吼》(Ĉinio Hurlas)创刊。

8月,鲁迅答世界社问,进一步阐述他为什么赞成世界语的理由。在《世界》第9-10合刊上同时发表了鲁迅、唐弢、伯韩、周木斋、徐懋庸、张天翼、聂绀弩、苏群等作家对于世界语的意见。

同年,杭州世界语学会成立。邱及在泰国团结当地的世界语者组织泰国世界语者协会,抗战以后又在《中华日报》上出版《世界语》副刊,宣传抗日,开展募捐活动,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肖军学习世界语。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徐沫著的《世界语新论》。世界书局出版陈俊卿著的《世界语一月通》(Esperanto en Unu Monato),次年5月再版。曙光出版社出版周庄萍、郑竹逸编的《世界语国际通信集》第一集。

1937年

1月,中国世界语书店在上海创办《世界语》杂志,由乐嘉煊编辑。

4月,绿川英子从日本来到上海,不久,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7月14日,“庆祝世界语诞生50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上海、北平、天津、汉口、广州等地的500多名世界语者。大会就如何动员和组织全国世界语者参加抗战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成立中国世界语协会。

10月,世界语者凤永益在江苏木渎镇组织8位青年成立流亡宣传队。途经安徽、江西,抵达湖南,沿途宣传抗日和世界语,一直到1939年被国民党查禁为止。

11月,《走向新阶段》(Al la Nova Etapo)在广州创刊。

同年,马耳(叶君健)的世界语原作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由上海绿叶书店出版。周庄萍的《世界语五十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周庄萍、郑竹逸编的《世界语国际通信集》第2集由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

12月,刘仁、丁克等创办广州国际协会,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下设世界语、日语和英语三个科。刘仁、绿川英子在世界语科工作。

同年,为纪念世界语五十年,光未然创作《在绿星旗下》,由张曙谱曲。柳倩创作《世界语五十年纪念歌》,由冼星海谱曲。

1938年

1月28日,陈世德、杭立、郑旦等人发起成立长沙世界语者协会。在世界语协会内成立党支部,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如排演歌舞、戏剧节目等,特别是在长沙广播电台用世界语作国际宣传,播发了宋庆龄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告英国人民书”等重要文章。

3月,方善境(焦凤)、傅壁城(傅平)在汉口创办《东方呼声》(Voĉoj el Oriento)杂志,宣传抗日斗争。

4月,郭沫若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了政治部第三厅,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

5月6日,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匈牙利世界语者布劳恩(Braun,中文名字叫蔡岩)在香港创办《远东使者》(Orienta Kuriero)杂志。

6月26日,中国世界语协会在汉口成立。汉口无线电短波电台举办世界语节目。

1939年

1月1日,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后重新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出版对外宣传半月刊《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该刊发行63个国家,在850个城市有自己的读者。

同年，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延安文化协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延安世界语者》（Jan-an Esperantisto）杂志。香港远东使者社和东方呼声社联合编辑出版世界语的《鲁迅小说选》（Elektitaj Noveloj）。

12月9日，毛泽东主席为延安世界语者协会举办的展览会题词，题词的内容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也题了词，其内容是：“国际主义的武器——世界语。”

1940年

3月，叶籁士、秦德纯、刘仁、冯文洛、钟宪民在重庆创办世界语函授学社（Koresponda Esperanto-Lernejo）。许寿真、张闳凡、曾禾尧参加了教学工作。该学社学员遍及全国18个省，在5年的时间里培养了2300多名学员，出版了20多种世界语书籍，对我国世运作出了重要贡献。

12月，中国世界语者月刊社在重庆创办《中国世界语者》（Ĉina Esperantisto）。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世界语战时读本》、《世界语战时读本讲义》、《世界语初级文法》和描写抗战建设的报告文学集《新生活》（Nova Vivo）。

1941年

延安文化沟设有延安世界语者协会举办的世界语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开办世界语讲习班，成立世界语歌咏队。延安文化协会、抗大、鲁艺、自然科学学院、社会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都曾开办过世界语班，或建立过世界语小组。当时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有会员300多人。

中国报导社出版《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La Arĝenta Jubileo de la Literatura Agado de S-ro Kuo Mo-ĵo）、绿川英子散文集《暴风雨中的低语》（Flustr' el Uragano）和《未死的兵》（Vivantaj Soldatoj，石川达三著，绿川英子译）。

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世界语词典》（亚克编）、《世界语文选》（第一册，叶籁士编）。

1942年

中国报导社出版抗战文艺选集《归来》（Reveno，李辉英等著，钟宪民译）、戏剧集《转型期》（Transformiĝo，宋之的等著，冯文洛译）。《中国抗战歌曲选》（亚克编）、《各国谚语选集》（叶籁士编注）也在这一年出版。

1943年

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小母亲》（Patrineto，刘盛亚著，钟宪民译）、《世界语语法》（冯文洛编）、《世界语歌曲集》（许寿真编）。同年，中国报导社出版《中国抗战木刻选集》（丁正编）。魏荒弩翻译的德国著名世界语者 Teo Jung 的名诗《爱的高歌》（La Alta Kanto de la Amo）由成都莽原出版社出版。

1944年

2月，孙用翻译普希金的小说《甲必丹女儿》（即《上尉的女儿》）由永安东南出版社出版。同年，成都世界语者协会成立，由著名的世界语者许寿真（Eltunko）担任会长，李士俊任秘书兼会刊《Nia Rondo》编辑，并开办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成都分社。冯文洛编的《世

界语中文大辞典》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

1945年

12月，孙用译的《保加利亚短篇集》由上海世界语言出版社出版。

同年，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柴门霍夫评传》（德雷仁著，阎凡译）、《在战斗的中国》（En Ĉinio Batalanta，绿川英子著）。

1946年

2月，重庆世界语者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协会。成都世界语者协会接收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业务，成立成都世界语函授学社。

同年，黄尊生、谭亮晖发起成立广州世界语学会。成都广播电台用世界语播送《兄妹开荒》和广播剧《一个绿星章》。《成都晚报》刊出《语声》及《绿叶》副刊，定期介绍世界语及拉丁化新文字。

1947年

1月，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逝世。4月，他的丈夫刘仁（世界语者）病故。

3月，重庆出版《中国世界语者》（Ĉina Esperantisto）。

4月，《中国音乐》（El Ĉina Muziko）在成都创刊。

5月，《新闻记者》（Ĵurnalisto）在成都创刊。

同年，张阎凡、李奈西等同志发起成立南京世界语俱乐部。周尧、路进生创办《天则昆虫研究所》，出版《中国昆虫》（Entomologio Ĉina）杂志和它的副刊《昆虫通讯》（Informo de Entomologio），该所决定将世界语作为两份刊物使用的国际语。《福建时报》增出《世界语》专页，由谌震编辑，从年底出版，次年二月起改为半月一期，该刊积极宣传、推广世界语，为国内少见。

1948年

4月3日，福建泉州《大众报》开辟《世界语》周刊，经常刊登国内外世界语消息和世界语读物。

8月，上海世界书局再版陈俊卿编著的《世界语一月通》。

同年，广州世界语学会创办世界语函授学社。

1949年

3月，《美丽之歌》（孙用译）由上海中兴出版社出版。

4月，李士俊等在四川出版《Fajrero》（火花）油印世界语刊物，刊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内容。

8月，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召开复会会员大会。同月，胡愈之在北京饭店召集十多名世界语者举行座谈，就如何开展世界语工作交换意见。

9月，上海合众电台举办世界语广播讲座。北京世界语者在中山公园举行第2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会后，由亚克、张企程拟定一份计划，向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申请成立世界语全国性组织，并筹办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

10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6次关于世界语的广播讲话。

12月6日，许寿真、杨求真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

同年，上海光华出版社出版魏荒弩从世界语翻译的《捷克艺文选》。

1950年

1月，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创办《人民世界》（Popola Mondo）杂志。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继续举办世界语广播讲座。

2月，李士俊在成都华阳中学开设正式世界语课程，并编了教材《Lernu》。

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由新闻总署领导。

5月1日，《人民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即现在的《中国报道》）创刊。

同年，成都世界语者协会与重庆世界语者协会成立，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专题讲座，讲授世界语。广州中山大学、北京辅仁大学举办世界语班。

同年，万湜思从世界语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劳荣译的苏联、东欧诗歌集《裁判》由天津知识书店出版。《柴门霍甫传》由文化生活丛刊再版。《爱罗先珂童话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综合书店出版希拉奇博士编的《世界语初级课本》。

1951年

3月11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胡愈之当选为理事长。《人民世界》改为全国协会的机关刊。

9月，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孙用译的《裴多菲诗四十首》。

12月，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劳荣从世界语译的乌克兰短篇小说集《枞林的喧嚣》。

同年，周尧、路进生等19位农业科学家、教授联名发表“致世界进步科学家”公开信，提倡科学家用世界语写科学论文，请科学家充分利用世界语，使科学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上海艺文书局出版世界语版的《野草》（鲁迅著）、《火光在前》（刘白羽著）。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共产党宣言》世界语译本。

1952年

3月，冯文洛编著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再版。

5月，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孙用从世界语翻译的《可爱的祖国》。

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的中国诗歌集《和平最强音》和中国小说集《新事新办》。

1953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中国小说集《幸福》。

年末，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报请中央，批准《人民中国报道》从1954年起停刊。

1954年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劳荣从世界语翻译的保加利亚短篇小说《为了和平》。

1955年

北京群众书店先后出版杨铁婴、吴火从世界语翻译的保加利亚盖欧·米列夫等人著的《九月及其他》，出版杨铁婴从世界语翻译的《艾林·沛林短篇小说选》。

1956年

5月，胡愈之应邀到莫斯科参加“五·一”观礼，接着去捷克访问。在苏、捷访问期间，他了解了当地世界语活动情况，回国后向国务院申请恢复全国世界语协会工作。

7月，陈毅批示同意全国世协恢复工作。同月，又批准叶籁士、陈原、张企程赴丹麦参加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9月，国务院批准恢复全国世协组织，改由对外文化协会领导。

10月，叶君健参加波兰、捷克的世界语大会。

同年，上海云海出版社出版张阅凡从世界语翻译的保加利亚康斯坦丁诺夫的著作《甘佑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张阅凡翻译的荷兰名作家 M. Deker 著的《行动起来》一书。

1957年

1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恢复工作。27日，全国世协在青年团中央大礼堂举办世界语报告会，胡愈之、叶君健作报告。

4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会刊《Bulteno de ĈEL》。

5月，劳荣译的捷克女诗人普伊玛诺娃写的访华诗《中国的微笑》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8月，文化部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联合发出通报，令各省、市、自治区的对外文协分会及文化局支持并指导各地世界语运动。

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人民中国报道》复刊和出版世界语书籍。

同年，杨永森代表中国世界语者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北京世界语俱乐部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世界语课，为期一年。上海、北京、重庆、西安、武汉、天津、太原、蚌埠、贵阳、杭州、昆明、恩施等19个城市的世界语组织相继恢复活动。

12月，《人民中国报道》复刊，复刊后改为双月刊，成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

1958年

7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举行会议，选出新的理事会，胡愈之继续担任理事长，叶籁士任副理事长，陈原任秘书长。同月17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翻译家孙用劳动勋章，以表彰他通过世界语翻译匈牙利文学作品、促进中匈文化交流所取得的成绩。

1959年

7月，叶籁士赴波兰参加第4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同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决定编辑世界语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该文集由茅盾任主编，并亲自选定。《新事新办》（小说集，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集》出版。

12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编的《世界语新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0年

10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进行会员登记，共有321人。

同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从这一年开始出版《和平》（Paco）中国版。由茅盾主编的世界语版《中国文学作品选集》（1949-1959）出版。《列宁主义万岁》世界语版出版。台北出版韩文蔚编著的《世界语概要》。

1961年

5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世界语版出版。

6月，《实践论》世界语版出版。

7月，《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世界语版出版。

10月，《不怕鬼的故事》世界语版出版。

同年，北京外语学院将世界语列为第二外语，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学期两年。

1962年

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文委专门讨论世界语工作，6月24日就加强世界语工作发了专门文件。

4月，经汉口文化局批准，汉口市世界语小组成立。

6月，中宣部发函批准世协对外宣传工作改由对外文委领导，对内工作由文化部领导，各城市分会由当地文化局领导。北京世界语者决定建立定期会见制度，每月一次。哈尔滨世界语学习小组成立。

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世界语选修课，由李士俊任教。全国世协为北京广播电台培训世界语干部，为开办世界语对外广播作准备，由冯文洛和陈世德任教。

1963年

4月，中国人民大学再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7月，在北京举办“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陈毅、胡乔木、刘长胜、包尔汉、孔原、张彦、张奚若、张致祥、丁西林、方方、楚图南、朱光等领导同志先后参观了展览。7月25日，全国第1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开幕，北京、上海、武汉、成都、西安、沈阳、哈尔滨、广州、杭州、天津十大城市的世界语者出席了会议。陈毅副总理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对世界语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今后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8月，高教部发出《关于开设世界语课程的通知》（1287号文），全国高等院校凡有条件者可在外文系开设世界语第二外语课，其他系科可开选修课，以培养世界语干部。

9月，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外文系开设世界语课，分别由卢剑波、张丹忱任教。

10月，“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改组为“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

11月，高教部发出通知，从全国11所大学调来一批青年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以便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世界语师资。由冯文洛、陈世德任教。

同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批世界语小册子和书籍，其中包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鲁迅小说选》世界语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止与世界语者和平运动的联系与合作。

1964年

1月，胡愈之到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和该校新闻系世界语班发表演说，勉励大家学好世界语。

6月，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在文化部礼堂举行结业式，学员们演出话剧，吴玉章亲临观看。以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外语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范学院、四川大学、西安外语学院、厦门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相继开设世界语课。成都大学将世界语列为第二外语，由刘洪康任教。北京大学由岑麒祥教授任教。

10月，高教部批准在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世界语班，从全国5所大学调来20名学生学习世界语，培养了一批世界语的专业干部。

12月19日，北京电台世界语广播正式对欧洲播音，每周两次。

同年，世界语版的《矛盾论》、《中国地理概述》、《中国针灸疗法》、《阿诗玛》出版。

1965年

4月，北京电台开辟对东南亚、日本、朝鲜的世界语广播。

7月，全国世协、北京广播电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合作，为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配世界语的解说词。

1966年

元月初，北京世界语者举行新年联欢会，胡愈之出席，并讲了话。会上放映了我国第一部世界语配音纪录片《光辉的节日》。

2月，外文出版社成立世界语组，出版世界语图书。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倍遭摧残，一批世界语者受到审查和迫害，各地世界语组织相继停止活动，时间长达10年之久，这是我国世运史上遇到的又一严重挫折。

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大量的世界语版的政治性书籍。除“文化大革命”的小册子外，也出版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将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

《中国报道》从这一年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毛主席语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反对自由主义》等13种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和政治小册子。

1968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25种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世界语版的《收租院泥塑群象》（美术画册）同时出版。

1969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等17种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1971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

1972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1973年

3月，胡愈之、叶籁士会见日本文化代表团团长土岐善磨和世界语活动家德田六郎。

8月，由叶籁士、陈原、祝明义组成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应日本世界语学会的邀请，出席日本第60届世界语大会

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

1974年

4月，日本世界语代表团一行8人应我国邀请，在中国访问了两周。

10月，越南保卫和平世界语者协会秘书长陶安柯率代表团（团员是阮廷锋）来华访问，受到胡愈之的亲切接见。

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鲁迅小说集》、《野草》、《中国地理知识》。

1975年

在著名世界语者方善境的倡议和主持下，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80年止，通过国内世界语者自愿集资，油印出书的办法，出版了20多种世界语课本、读物、会话、语法、词汇、论文、回忆录和文艺作品。

10月，由陈原、李玉萍、龚佩康组成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应越南保卫和平世界语者协会的邀请访问越南。

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

1976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

外文出版社在北京友谊宾馆成立毛主席诗词翻译室，全国部分世界语者参加了初稿翻译，由方善境、刘铃、谢玉明、张家声组成的定稿小组在友谊宾馆完成了世界语版的定稿工作。

1977年

外文出版社从各地借调干部在北京友谊宾馆成立了毛选翻译室，从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翻译定稿工作。世界语版也包括在内。

1978年

2月，出席第5届全国政协第1次会议的7名老世界语者胡愈之、叶籁士、邱及、叶君健、方善境、金克木、黄乃就世界语工作交换了意见，并就如何开展世界语工作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建议。

7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派出以张企程为首的世界语代表团，出席第6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8月，苏州世界语小组在陈世德、杭立领导下恢复活动。8月18日至9月1日，日本“中国报道之友”代表团在德田六郎、梅田善美先生的率领下应邀来我国访问。

9月，中国木偶艺术团赴南斯拉夫参加了第12届国际戏剧节和第11届国际木偶节。演员们用世界语演出的《大闹天宫》获得艺术奖、儿童奖和集体语言荣誉奖状，演员安子明获语言奖第三名。

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中共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等世界语版图书。

1979年

5月1日，湖北省世界语协会成立。

7月，张企程、叶君健率代表团出席第6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8月27日至31日，全国第2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13个省、市、自治区5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世界语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标志着我国世界语运动跨入一个新的时期。张麟瑞独自编辑刻印的《绿萤》创刊。

10月，北京电台世界语广播改为每日分别对欧洲、东北亚、东南亚播音，每次半小时。《昆虫分类学报》创刊，该刊附有英语、世界语摘要。

11月18日，成都世界语协会成立。

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各省、市、自治区下达文件，要各地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地方世界语组织开展世界语活动。9日，内蒙古自治区世界语协会成立。湖南省世协筹备小组

成立。成都大学中文系从这月开始将世界语列为选修课。

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毛泽东诗词》。武汉、天津、长春、成都、重庆、昆明、个旧、杭州、拉萨、上海、太原等 17 个城市开办世界语班，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杭州大学、吉林省委机关干部业余大学、天津大沽路中学也开办了世界语班。全国有 41 种报刊，71 次介绍世界语或报道世界语活动，15 个省、市电台、电视台多次播送世界语消息，这是多年未见的好现象。

为统一规划世界语书刊的出版，充分利用世界语人才，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组并入中国报道杂志社，社内设世界语图书部，负责世界语图书的编译出版工作。

1980 年

1 月，吉林省世界语研究会成立。西安世协筹备小组成立。27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开会，选举新的常务理事会，理事长胡愈之，副理事长巴金、叶籁士、陈原，秘书长张企程，副秘书长李奈西。

3 月 6 日，山西省召开世界语工作会议，会上宣布成立太原世界语小组。30 日，重庆世界语协会成立。

5 月，安徽省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黄石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成立。同月 22 日，《中国报道》杂志社在北海公园悦心殿举行座谈会，庆祝《中国报道》创刊 30 周年。胡愈之、楚图南、张香山、罗俊、叶籁士、陈原等出席。同月 22 日至 6 月 2 日，中国报道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书店联合举办《世界语书刊广播展览》，14000 余人参观展览。

6 月 1 日，重庆世协刊《春天》（Printempo）创刊。8 日，武汉世界语协会成立。南京世协筹备小组成立。15 日，日、中合拍的第一部有关绿川英子的电视片《望乡之星》在中央电视台播送。21 日，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上海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宣布成立上海市世协筹备小组。《山西科技报》从 6 月至 12 月开辟《世界语自学入门》讲座，受到读者欢迎。

7 月 15 日，蚌埠世界语协会成立。淮南出版《爱好》（Maroto）小刊。同月 26 日，薛诚之率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 2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

8 月 2 日至 8 日，巴金率代表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会议期间，国际世协执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接纳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为团体会员。同月 31 日，西安市世协成立。

9 月 21 日，淮南世协成立。28 日，山西省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学院的外语系将世界语列为第二外语。

10 月，北京电台增加对拉丁美洲的世界语广播。4 日至 6 日，湖南省世界语协会成立。20 日至 24 日，湖北省世协举办世界语学术讨论会。

11 月 20 日至 21 日，安徽省世界语协会成立。

12 月 5 日，江西省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成立。21 日，由方善境发起成立的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在武昌举行开学典礼。在两年中共招生六万多人，遍及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该校出版 10 多种教材、辅导读物和 9 期《内部通讯》。

同年，中国报道社出版世界语版《春天里的秋天》（巴金著、李士俊译）、《中国诗歌选译》（徐声越编译）。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王步融编著的《华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卢剑波从世界语翻译的《米诺斯的公牛》一书。

1981 年

1 月 1 日，辽宁省世界语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广州世协筹备组成立。25 日，北京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广西大学的《语文园地》从 1 月起开设《世界语讲座》，由苏阿芒撰写。

2 月 9 日至 25 日，国际世协秘书长芙洛拉·萨波费尔索博士偕同丈夫应中华全国世界语

协会的邀请来华访问。

5月，龚佩康编译的《绿色的五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汇集了绿川英子的世界语作品和世界语者回忆绿川英子的文章。5月4日，北美世界语协会访华团一行16人访问我国，同北京、杭州、桂林、上海、苏州、南京的世界语者举行亲切的会见。24日，黄石世界语协会成立。

6月6日，贵州六枝特区世界语协会成立。14日，天津市世界语协会筹备小组成立。20日，呼和浩特市世界语协会成立。

7月7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根据5届人代会第3次会议的有关提案，在南京召开世界语者座谈会，决定成立江苏省世界语协会筹备组。11日，四平市世界语协会成立。月底，陈原率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巴西举行的第6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巴金在会上当选为国际世协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8月，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开学。

9月12日至14日，云南省世界语协会召开成立大会。

10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国内机关刊《世界》（La Mondo）试刊，全年试刊三期。

11月1日至翌年1月3日，《江西日报》开辟《世界语漫话》专栏。同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同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开学。23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成立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2月6日，由知名人士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夏衍、谢冰心、赵朴初、叶圣陶、白寿彝、朱九思、叶籁士发起的中国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周培源、胡绳、刘导生、杨蕴玉、荣高棠、雷洁琼、黄乃、张天翼、肖军、杨沫、曹靖华、姚雪垠、贺绿汀、端木蕻良、楼适夷、周谷城、杜埃、马宁、华嘉、刘海粟、李桦、董寿平、张乐平、姜椿芳、林丽楹、陆诒、郑森禹、陈沂、兰干亭、杨康华、王铎、王再天、杨令德、朱家璧、密加凡、郭兆华、方仲伯、王仲方、张玉麟、戈宝权、吕骥、舒群、吴大琨等知名人士积极响应入会。楚图南当选为会长。同月，黑龙江省世界语研究会成立。淮南市电视台开办“世界语讲座”，每周一次，每次45分钟。

同年，中国报道社出版世界语版《中国概貌》、《青春之歌》（上集）、《朝花夕拾》。

1982年

1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在北京正式成立。《世界》正式创刊。4日，太原市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世界语广播讲座”，至4月30日结束。15日至16日，北京世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1982年年会，250多人出席，宣读了15篇论文。

5月9日，镇江市世界语协会成立。

7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与日本世界语作家宫本正男合作编辑的《绿川英子文集》。张企程率团参加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第67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8月1日，兰州市世界语学会成立。26日，李士俊率团出席第69届日本世界语大会。

9月15日，第2期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学。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追认日本著名世界语者绿川英子为国际主义战士。19日，广东、广州世界语协会成立。

10月，魏原枢、徐文棋编的《世界语语法》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8日，中央电视台在最佳时间播放以《世界语在中国》为题的专题节目，介绍了世界语的由来、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22日，《泰山绿星》创刊。

11月11日，上海世界语协会成立。巴金当选为名誉会长。14日，石家庄市世界语研究会成立。

12月1日，广西世界语学会筹备组成立。16日，教育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发出《关于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通知》（〔82〕教高一字107号），规定毕业生毕

业、干部考核和考研究生可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科目。

1983年

1月，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北京世协编的《汉世小词典》。

2月，锦州世界语研究会成立。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柴门霍夫的一生》（埃德蒙·普里瓦特著，龚佩康译）。

3月，《中国报道》杂志副总编辑李士俊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上海外语学院成立世界语教研室。黄石世界语函授班开学，入学者达数万人，出版了一批教材和辅导读物。

4月，安徽省电视台播放该台拍摄的世界语专题节目“人造语——世界语”。成都大学英语专业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5月，湖北省荆州世界语协会成立。广西南宁市世界语协会成立。知识出版社出版《世界语史》（E.普里瓦著，张闳凡译）。

6月，鞍山市语言学会下设世界语研究组。9日至14日，江苏省邮电管理局、江苏省总工会联合举办“江苏集邮展览”，南京世界语者宋绳坦的世界语邮票专集获得三等奖，并被推荐参加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会。

7月5日至7日，江苏省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暨第1届世界语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19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开辟世界语广播讲座，为期四个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世界语协会成立。同月，张企程率团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68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大会将当年的费恩杯授给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以表彰近几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8月8日，黑龙江佳木斯市为绿川英子暨刘仁合冢墓举行隆重揭幕仪式，并举办“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文物展览”。安徽大学外语系举办世界语函授班。

9月，华东师大、成都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江西教育学院、内蒙古师大、湖南师范学院、上海外语学院、四川财经学院、福建师大、华中师大等相继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10月2日，四川省世界语协会成立。3日，著名世界语翻译家孙用先生逝世。10日，第3期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在北京外语学院开学。18日，河南省语言学会外语研究会决定成立世界语研究组。同月，青海省翻译家协会成立，下设世界语组。吉林省世协筹备小组成立。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李威伦编的《世界语读本》（第1册）。

11月6日，我国著名世界语者方善境逝世。20日，长春市世界语协会成立。29日，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在北京开幕，宋绳坦的“人造语——世界语”专题邮集获银奖。

12月15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世界语协会成立。昌吉回族自治州世界语协会成立。28日，福建省世界语学会成立。

同年，重庆世界语协会创办世界语刊授学校，有学员数万人，并出版大批教材和世界语书籍。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四十景》、《智慧囊》。黄石世界语协会出版《世界语诗词格律》（胡国柱编）。

1984年

1月5日，呼和浩特铁路局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成立。9日，苏州市世协成立。12日至13日，吉林省世界语学会召开成立大会。13日，广西教育厅向全区各高等院校发出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通知。27日，美国合众社北京分社社长和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同时采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张企程。

2月，安徽大学开始开设世界语第二外语课。《未来》杂志创刊。

3月，重庆世协和重庆电台联合举办第二期世界语广播讲座。23日，“美国之音”驻北京局长卫葛利先生采访张企程。同月，中国医学世界语通讯组成立。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正

式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4月4日，山东省世协筹委会成立。20日，辽源世界语学会成立。英国南希·德拉姆女士率领七国世界语者旅游团一行21人再次访华。

5月4日至5日，三明市青年世界语协会召开成立大会。20日，吐鲁番地区世界语学习会成立。17日至23日，国际世协代表、副主席梅田善美、总干事米诺耶维奇访问北京，就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有关问题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有关部门进行会谈。

6月15日，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成立，卢嘉锡任名誉理事长。同月，安徽世界语专科学校成立。

7月15日，广西世界语学会、山西省世界语协会、杭州世界语协会和江西省世界语协会成立。20日，抚顺市世协成立。同月，长春市世协医学研究会成立。陈原率团出席在美国波特兰举行的第3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6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胡愈之当选为国际世协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8月20日，湛江市世协成立。23日，泉州世界语学会成立，巴金应聘为名誉理事长。28日，武汉科技世界语研究会成立。29日至9月2日，全国第3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愈之、楚图南、胡绳、叶籁士、陈原等同志出席，大会就全国世运的情况和经验交换了意见，并就搞好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大会决定1985年8月下旬在昆明召开首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并将国际世协赠给全国世协的流动奖杯费恩杯转赠给重庆世协，以表彰该会近年来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

9月9日，佳木斯世界语研究会成立。23日，桂林市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同月，山西世界语专科学校成立。第4期全国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开学。

10月14日，沙市世协成立。15日，中科院沈阳分院科技工作者世协成立。28日，洛阳世协成立。同月，安徽世界语广播函授学校成立。

11月9日至15日，全国第1届科技世界语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17日，莆田市世界语学会成立。21日，景德镇市世协成立。24日，盐城市世协、六盘水市世协成立。25日，锦州世界语研究会同锦州市电台联合举办的世界语广播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同月，长治市世协成立。云南省世协和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世界语专科班开学。《世界语之声》创刊。

12月15日，吴忠市世协、包头市世协成立。16日，永安市世协、太原市世协成立。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世协成立。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山村》、《中国十六城市》、《北京名胜》、《我的生活》、《献你一束花》、《宝船》、《蝴蝶泉》等。其中《山村》被国际世协列为东西方丛书第21种。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劳荣从世界语翻译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诗人的诗集《西里西亚之歌》。

1985年

1月1日，商丘市世协成立。19日，徐州市世协成立。同月，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组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叶籁士任主席，陈原、张企程、叶君健任副主席。重庆教育学院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2月4日至13日，国际世协副主席梅田善美、总干事米诺耶维奇对北京进行工作访问，就进一步落实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同全国世协进行会谈。9日，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85届开学典礼在武汉举行。

3月3日，中国世界语函授学校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黄华、周培源、乔晓光、叶君健、端木蕻良、岑麒祥、周尧等知名人士亲笔题词或写信表示祝贺。9日，天津市世界语协会成立。17日，赣州市世协成立。31日，陕西省世协成立。同月，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开设

世界语课。兰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世界语广播讲座”。

4月1日,合肥工业大学开设世界语选修课。7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回顾成立三年来的工作,并对开好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提出许多建议。18日,合肥市世界语协会成立。24日,哈尔滨市世界语协会成立。28日,烟台市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同月,沙市世界语函授学校成立。

5月19日,柳州市世协成立。21日,中国报道社举行庆祝《中国报道》创刊35周年招待会、宴会、座谈会等活动,姚依林、胡愈之、黄华、楚图南以及首都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有关人士共300多人出席,国际世协的代表以及波兰、匈牙利、美国、法国、日本、南斯拉夫、英国的代销人也应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26日,江西省世协、鹤壁市世协、齐齐哈尔市世协成立。27日,泰安市世协成立。

6月9日,辽宁省世协、丹东市世协成立。16日,新乡市世协、沙市科技世界语协会成立。30日,鞍山市世协成立。

7月24日,沈阳市世协成立。同月,浙江省世协筹备小组成立。

8月3日,张企程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联邦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第7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5日,常州市世协成立。29日,首届中国世界语大会在昆明开幕,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和香港地区的600多名世界语者出席了会议,胡愈之任大会名誉主席,黄华、巴金、楚图南、叶籁士、刀国栋、陈原任副主席。会议就开好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月,《老世界语者》杂志创刊。

9月7日,郑州市青年世协成立。10日,第5届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开学。28日,河南省世协、九江市世界语学习会成立。同月,长春邮电学院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10月13日,内蒙古哲里木盟青年科技世界语学会成立。27日,扬州市世协成立。29日,通化市世协成立。

11月4日至16日,国际世协总干事米洛耶维奇再次来华访问,就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有关会务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民航总局、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市政府进行会谈。10日,韶关市世协成立。24日至12月1日,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世界语教程》审稿会。

12月1日,桂林市世协、济南市青年世协成立。15日,深圳市世协、宁波市世协、潍坊市世协成立。16日,湘潭市世协成立。21日,宁德地区世协成立。23日,中科院地学分会成立。25日,孝感市世协成立。同月,陈原在圣马力诺举行的国际科学院第2届年会上当选为该组织五人最高委员会首席成员,并被聘请为该院名誉院士。太原地区世协成立。

同年,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中国会员组成立。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25种世界语书籍,其中重要的著作有:《汉语世界语词典》、《世界语进修课本(一)》、《虎符》、《世界语前置词略解》等书出版。李士俊出席德国柏林举行的世界语成人教学研讨会,并作了报告。

1986年

1月1日,福州台江区世界语学校成立。12日,甘肃省世协成立。14日,盐城市世界语教师联谊会成立。15日,焦作市世协成立。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胡愈之同志逝世。同月,青海电视台开始播放“世界语语音讲座”。四川外语学院成立世界语研究室。南京化工学院开办“世界语讲座”。

2月2日,昌吉州医学世界语研究会成立。27日,全国世协召开常务理事会,选举叶籁士为代理理事长。

3月2日,马鞍山市世协、浑江市世协成立。11日,西北师范学院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中华全国世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纪念会,庆祝协会成立35周年。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有

黄华、楚图南、刘德有、陈昊苏、叶君健、叶籁士、陈原。23日，内江市世协成立。

4月7日，延安地区世协成立。同月，谢玉明当选为世界语学院院士。

5月10日，万县地区世协成立。26日，青岛市世协成立。

6月12日，重庆青年世界语者协会成立。28日，山东省世协成立。30日，长春市科学技术工作者世界语协会成立。同月，岳阳世协成立。

7月5日，蚌埠市世界语俱乐部成立。6日，长沙世协、大连世协成立。12日，北京老世界语者协会成立。聘请黄华、楚图南、郭献瑞为名誉会长，选举叶君健为会长，陈世德、汤逊安、力一、沙地为副会长。22日至24日，中国科学院主办1986年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讨论会，来自18个国家290人出席了大会。26日至8月2日，在北京举行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482人报名参加大会。彭真委员长任大会最高监护人，黄华任国家委员会主席，胡愈之、楚图南任副主席。叶君健任国际大会大学校长。27日，世界语民族文艺协会成立。28日，衡水市世协成立。

8月2日，南阳地区世协成立。24日，郑州市世协成立。

9月，沈阳大学、新疆财经学院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全国世协委托上海外语学院举办的第6期高等院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开学。国际世协执委会选举我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原为国际世协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沈阳大学开设世界语课。

10月1日，温州地区世协成立。4日，黑龙江省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5日，酒泉地区世协成立。12日，北京电台首次播放该台自己拍摄的世界语专题片《绿星之邦》。25日，黄冈地区世协成立。同月，呼和浩特市广播电台举办世界语中级讲座。《世华词典》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11月16日，怀化市世协成立。23日，济南市世协成立。

12月14日至15日，浙江省世协召开成立大会。14日，广西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筹委会、金昌市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衡阳市世协成立。15日，唐山市世协、包头市世协成立。21日，天水市世协、沈阳青年世协成立。28日，株洲市世协、郴州市世协成立。

同年，周尧教授编著的《中国向昆虫进军》一书的世界语版出版。《世界语读物选》（上、中、下）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国际世协为纪念国际和平而编辑的《和平诗选》出版。曾定之主编的拉丁语、英语、世界语、汉语对照的《常用花卉名册》出版。《辽宁导游》世界语版出版。兰天强编的《世界语常用词手册》出版。周光志著的《世界语介词》出版。北京世协编写的《世华词典》出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作品选》（1919-1949）、《世界语歌曲集（一）》、《未来教育科学入门》、《中国之旅》、《桔红色的伞》、《菌儿自传》等世界语书籍。潘逊书编的《世界语初阶》、李士俊、殷国义、顾建华编著的《新编世界语课本》、张雅文、周贺玉创作的《绿川英子传》出版。上海中国纺织大学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华东师大、湖南大学、华中师大、湖南师大、河北师范学院、天津外院、安徽大学将世界语列为考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外语。叶君健、李士俊被吸收为世界语作家协会会员。叶籁士、张企程被选为国际世协荣誉会员。

1987年

1月7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绿星之邦》世界语专题片。

2月23日，比利时读者查理·吉斯林先生立下遗嘱，他去世后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中国报道》杂志社，以用于发展世界语事业。同月，大连工学院、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外语系开设世界语课。

3月15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世界语学会成立。吉林省盲童世界语艺术团成立。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成立。

4月23日，沈阳市世协与沈阳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世界语讲座开播。

5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刘铃、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孙晓燕参加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展览中心举办的国际书市。24日，十堰市世协成立。30日，鞍山世协成立。

6月6日，湖南长沙青年世界语者协会成立。27日，中华全国世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世界语诞生100周年纪念会。28日，江门市世协、内江市世协成立。

7月，陈珊的《国际普通话——世界语》邮集在四川省社科院首届邮展中获得最高奖——荣誉奖。以张企程为团长、叶君健为顾问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十人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72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北京世协、中国日报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中国国际电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科院世协为庆祝世界语一百周年联合举办世界语展览，肖克、刘导生、陈原、戈宝权等出席开幕式。26日，昌吉市世协成立。

同月，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世界语诞生100周年特发行纪念邮票一枚，数十个城市的邮局或邮票公司分别发行首日封或纪念邮戳。

8月1日，中国世界语“八·一”学校成立。1日至13日，以李士俊为首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应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世协的邀请到萨格勒布参加克罗地亚世协和国际世协共同举办的世界语第一百周年文化节活动。16日至19日，首届中国青年世运研讨会在郑州举行。16日，梧州市世协成立。27日至9月4日，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葛一凡、戴颂恩、周茜云一行3人应日本世界语学会和国际世协东京分会办事处的邀请，参加了第74届日本世界语大会和国际世协召开的第1届亚洲会议。28日，枣庄市世协成立。

9月6日，宣城地区世协成立。14日，长春科技干部局与长春市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世界语电视讲座开播。

11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世界科技》杂志出版。11日至17日，高等学校世界语二外教学大纲讨论会在西安外国语学院举行。同月，全国铁路员工世界语者小组联合会召开1987年年会。

12月2日，唐山市教委批准建立唐山市世界语函授学校。8日，北京世协等举办大型文艺晚会纪念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肖克、吕骥、陈昊苏、戈宝权等出席。12日，东莞市世界语协会成立。13日，南昌市青年世协成立。20日，沈阳市世界语者集邮协会、仪征市世协成立。27日，宜昌市世协、临沂世协、中科院世协经贸分会和青年分会成立。

同年，曹东海编写的《新编世界语语法》、张家声、王仁虎编著的《世界语》一书出版。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世界语汉语词典》（张闳凡主编）、《世英汉分类词典》。

1988年

1月23日，吉林省通化铁路分局世协成立。

2月28日，长沙市世界语集邮协会成立。

3月，唐山市世界语函授学校正式开学。

4月3日，世界语之友会在京举行座谈会，会上各界知名人士呼吁加强世界语的宣传、推广，重视世界语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使世界语广泛进入实际生活。增选黄华、胡绳、罗俊、陈昊苏为该会副会长。淄博市世协成立。同月，烟台世协成立。

5月，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中国会员组会刊《世界语教学》（Esperanto Instruado）创刊。辽宁省电视台、辽宁省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省世协、辽宁教育出版社、辽宁省科技干部继续教育中心联合举办的世界语广播电视讲座开播。

6月7日至9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制定了新时期世运的方针，修改了世协章程，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名誉理事会，在中国世运史上具有特殊意义。22日，我国第一部电视教学片《希望》首映式在青岛举行。

7月9日,河南省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15日至22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戴颂恩、中国报道社潘毓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刘俊芳出席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44届国际青年世界语大会。16日至8月8日,中科院世协举办首届国际世界语针灸班。23日,由祝明义、戴颂恩、谭秀珠等组成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了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第7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张丹忱当选为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领导成员之一。

8月1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与广东社会科学大学联合举办世界语广播专修班开播。2日,辽宁广播电视大学、沈阳电视台、沈阳市世协联合举办《未来之声》世界语电视讲座。10日至16日,由中科院举办的第2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

9月4日,上饶地区世协成立。11日至20日,祝明义、戴颂恩等组成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第4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会议决定1992年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在中国举行。18日至19日,河北省世协成立。同月,北京师范大学从这一年起在该校开设面对全校的世界语二外公共选修课(有学分)。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外语系、阜阳师范学院也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10月9日,贵州省世界语协会筹委会成立。

12月1日,中国医学世界语协会新疆分会经自治区卫生厅批准召开成立大会。4日至9日,中国高等学校世界语二外教学大纲讨论会在无锡举行。会议审定并通过了《高校世界语二外教学大纲(草案)》,并将上报国家教委批准。同月,开封市世协、秦皇岛市世协、安徽省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骆驼祥子》、《屈原》、《中国传统节日》、《中华五千年》、《智慧的火花》、《昆虫形态图解》、《中国保护动物图谱》、《事实与幻想》、《世界语邮票目录》和《世界屋脊上的西藏》(画册)。由魏原枢主编的《世界语教程》(修订本)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由绿川编著的《世界语会话读本》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1989年

1月15日,国防科技大学世界语学会在长沙成立。

3月12日,广州电视台开播世界语讲座。同月,泰安市与波兰帝国影视公司合拍世界语影片《皇帝出巡》和《十亿人温饱后的欢乐》。

4月20日,洛阳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

6月4日,黔南布依族自治州世界语协会在都匀市成立。20日至25日,国际世协副主席梅田善美先生访华,商讨建立国际世协亚洲教学中心事宜。

7月7日,醴陵市世协成立。29日,以谭秀珠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英国布赖顿举行的第7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同月,常务理事会通过世协领导班子预选名单。

9月9日,延安教育学院开办世界语进修班。10日,广东省茂名市世界语协会成立。28日,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委托北京广播学院开办的世界语专业干部培训班举行开学典礼,12名学生参加学习。连云港市世协成立。

10月5日,世界语教学片《希望》在青岛电视台首次播出。23日,中波合拍的世界语片《皇帝出巡》、《十亿人温饱后的欢乐》在华沙举行首映式,受到欢迎。29日,淮阴市世协成立。29日至11月2日,中国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苏州举行。

11月6日至11日,由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ILEI)和广西民族学院主办的亚洲世界语教学研讨会在南宁举行,出席的有来自日本、南朝鲜、苏联、瑞典、比利时、美国和中国的世界语者近40人。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主席Symoens和国际世协领导成员徐吉洙亲临大会。会议就亚洲世界语教学工作今后的发展和协调以及国际合作和交流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期间进行了首次由中国国际考试团成员和考试人进行的世界语语言水平的国际标准考试，有15人通过了考试。Symoens在闭幕式上宣布今后中国同行可以按有关考试的章程、规则和程序举行世界语语言水平的国际考试。13日，山东省世界语协会医学会成立。30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公布领导班子通讯投票选举结果。名誉会长巴金、叶籁士，会长陈原，副会长叶君健、张企程、谭秀珠、李玉萍，秘书长蒋鸿章（蒋鸿章因故未到任，由刘铃任代秘书长）。

12月3日至10日，以德田六郎先生为团长的日中友好静冈县世界语协会代表团一行3人来华访问，在上海专程访问了巴金。12日至19日，原国际世界语学院主席、著名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先生和夫人来北京访问。1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世界语之友会、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国图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日报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世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世协隆重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生130周年。聂荣臻、楚图南、吕骥等为大会题词，400多人出席。北京世协、北京西区邮局发行一枚印有15枚柴门霍夫头像邮票的纪念明信片和世界语纪念戳。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中国文学用品选》（1949-1979）、《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国少数民族婚俗》、《世界语自修课本（二）》等著作。学术期刊出版社出版世英汉法德西文的《图书情报文献学词典》。

1990年

1月1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教育台举办世界语中级班讲座。21日，广州电视台开始播出《世界语初级班》教育节目。

2月27日至3月1日，第1届全国省级和计划单列城市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会议在青岛举行，会议分析近10年来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和问题，并就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央电视台世界语电视教学讲座的招生和辅导工作、《世界》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了研究。

3月23日，云南民族学院开设世界语选修课。30日，全国世协常务理事会决定成立教学委员会，负责世界语教学研究、教材编写、水平测试等工作。

4月18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青岛世界语协会会签“关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青岛市世界语协会合办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暨在青岛设立该刊编辑部的请示”行文。2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介绍世界语的短片。

5月1日，为庆祝《中国报道》创刊40周年，北京西区邮局发行纪念封一枚，并制作一枚纪念戳，于当日使用。2日至9日，李玉萍参加苏联第3届世界语艺术节。3日，广州大学函授部、广东省世协、广东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世界语电视教学辅导班》开学。3日至6月12日，中科院世协在北京举办国际世界语针灸班。4日，合肥大学开设世界语课。13日，中央电视台、青岛大学、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世界语电视教学讲座班在京举行开学典礼。15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开始播讲世界语。24日，《中国报道》杂志社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茶话会，庆祝该刊创刊4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胡绳、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柴泽民、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罗俊、全国世协领导人叶籁士、陈原、叶君健、张企程以及各界人士和世界语者300余人出席了会议。南斯拉夫、日本、韩国、法国的《中国报道》读者访华团专程来华参加庆祝活动。25日至30日，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第3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比利时、日本、法国、南斯拉夫、波兰、苏联以及国内各地的600名世界语者参加了大会。

6月中旬,由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协和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共同创办的世界语科技学院成立。17日,台湾省世界语协会成立。

7月11日,北京电视台在《大观园》节目中播出专题片《绿星连友谊——记〈中国报道〉创刊40周年》。14日至21日,以刘铃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5人出席了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第7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8日,新闻出版署下达“关于同意全国世界语协会与青岛世界语协会合办《世界》杂志的批复”。26日至29日,辽宁省世协在南戴河举办1990年世界语夏令周暨第2届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战略研讨会。同月,青岛海洋大学第5期世界语班结业,73名学生通过考试,各得两个学分。世界语纯文学刊物《三色堇》(Penseo)创刊,该刊成为世界语者发表世界语译作和原文创作的文艺园地。

8月1日至16日,以西川丰藏为团长的日本高(木规)市世界语代表团一行5人访问常州、上海、苏州等地。15日至28日,石成泰应忍冈守隆邀请访日。在日期间作“世界语中的李白”的学术报告。

9月1日,在第8届全国优秀社会教育节目评选中世界语电视教学片《希望》荣获教育类二等奖。6日,辽宁省青年世界语协会成立。14日至15日,全国世界语友好城市工作座谈会在天津举行。铁路职工世协同时举行年会。17日,全国世协常务理事会开会,作出以下几项决定:同意提议青岛市委副书记、世界语之友会会员刘镇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的候选人;聘任祝明义为全国世协副秘书长;同意合办后的《世界》杂志,由楚图南、巴金、叶籁士、陈原、叶君健、刘镇任顾问、张企程为主编。23日至27日,由中、日、韩、美等国代表参加的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预备会议在青岛举行,会议就大会议题、议程及食宿、旅游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达成一致意见。同月,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北京培黎大学外贸英语专业将世界语列为必修课。山东大学外语系开设世界语二外选修课。

10月1日,中山市世协成立。20日,全国世协公布理事会通讯投票结果:刘镇当选为副会长。同月,崔海京的邮集“世界语:和平和友谊的语言”在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5周年的集邮展览中荣获一等奖。

11月11日至14日,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首次学术讨论会暨第2次理事会在广州举行。12日至21日,日本熊本县水产实验室主任世界语者野村中冈先生到广州专访了南海水产研究所和广州水产研究所,后赴珠海考察鱼类生长情况,并交流了养殖经验。

12月9日,益阳市世协成立。张掖市世界语学会成立。22日,昌吉市医学世界语学会成立。23日,都匀市世协成立。25日,图们市世协成立。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北京风景集萃》、《世界语汉语词典》(再版)、《周恩来传略》、《人体解剖学名词》(世英汉)、《牧童与仙女》、《十一种语文经济贸易词典》、《寒夜》、《中国古代科学家》。

1991年

1月1日,中山市世协成立。20日,承德市世协成立。《世界》从这年起改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青岛世界语协会合办,编委会设在北京,编辑部设在青岛。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会刊《高校世界语》创刊。同月,《国际地质》第8卷由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协和国际科学世界语者协会联合编辑出版。经市教委批准,福州台江世界语培训学校升格为“福州世界语学校”,连年被评为台江区和市的成人教育办学先进单位。

5月,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审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被批准予注册登记,成为全国首批获准登记的社会团体之一。证号:社证字第0167,社团代码50000062。

6月,大连邵融教授和张晓霞讲师合著的《中国世界语正规教育史料》(第二版)出版,

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建国后我国进行世界语教学的情况。

7月7日，邯郸市世协成立。27日，以刘铃为团长、刘镇为副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7人出席在挪威卑尔根召开的第7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28日，邵阳市世协成立。

8月23日至9月6日，以山东省世协副会长黄泽存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78届日本全国世界语大会。25日至29日，巴基斯坦世协主席 Abdul Salam 先生访问北京，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就加强世界语出版和教学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26日至9月1日，崔海京、周子奇的两部世界语集邮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91年全国职工集邮展览会上分别荣获银奖和镀银奖。31日，亚美尼亚世协代表团应邀访问上海，就在文化、经贸、出版、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9月21日至25日，上海世协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举行“鲁迅与世界语”学术研讨会，中、日、韩世界语者出席。28日，应比中友协主席马赛尔·德普雷先生的邀请，《中国报道》社谭秀珠、卢传标、王士荣赴比利时参加吉斯林先生新墓的揭幕仪式。同月，湘潭师范学院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10月2日至9日，由中科院科技工作者世界语协会同比利时奥斯坦德市世界语组织联合举办的“中国工业技术和产品展览会”在奥斯坦德市举行，中国近百家厂商参展。21日至25日，全国高校世界语教学大纲研讨会暨第2次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

11月20日至21日，全国世协、山东省世协、青岛世协在青岛开会研究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筹备工作和工作方案。同月，大会监护委员会成立。黄华、楚图南、巴金、胡绳、陈原等任名誉主席，刘镇任主席。

12月6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40周年暨世界语之友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陈昊苏、张致祥、罗俊、林成荪、吴大琨、柴泽民、方知达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15日，滕州市世协成立。28日，青海世界语协会成立。30日至92年1月3日，第2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唐山召开，大会议题是“改革开放和世界语”。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协会第4届理事会。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特别奖金》、《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中国近代史题话》、《谈天说地》、《中国医药史话》、《世界语科学论文集》、《世界语谚语集》、《配图古诗精选》。

1992年

2月，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中国分会主办的《译苑》(Traduk-Gardeno)创刊。

3月25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第4届常务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了第1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了第4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选人名单。后经通讯投票，陈原任会长，叶君健、张企程、艾青春、刘镇、谭秀珠、李玉萍任副会长，邹国相任秘书长。

4月8日至9日，山东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在济南举行。30日至5月中旬，法国世界语友人佐尔卡·埃尼赞率法国旅游团来中国访问。

5月22日至29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派出由邹国相和于涛组成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参加俄罗斯海参崴《太平洋》世界语学社举行的百周年成立庆典。

6月22日，重庆市教育电视台播出《希望》电视教学片，200多人参加学习。

7月25日，以祝明义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5人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77届国际世界语大会。7日，辽宁电视台开始播送《希望之星》世界语入门电视讲座。

8月17日至22日，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在青岛召开，参加大会的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856名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国家语委主任、中华全国协会会长陈原等出席了会议。会议议题是“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与进步”。

同年，世界语被正式列为四川省专业技术职务外语水平考试语种之一，每年由四川省专业技术职务外语考试委员会指定四川省世协负责出题阅卷。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上帝保佑你》、《中国古代笑话》、《苏阿芒诗集》、《中国神话故事》、《小约翰》、《世界语初级教程》。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类大会合》；青岛出版社出版《世界语英语双解词典》。

1993年

1月，《世界》杂志转回北京出版，改为双月刊。

2月，大连大学外语系世界语第二外语课开课。

3月13日，中国青年世界语协会和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于涛任中国青年世界语协会会长；王瑞祥、王建兵、姚红任副会长。李森任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会长；韩祖武、成林斌、刘才盛任副会长。25日，国际世界语协会领导成员、分工负责亚洲世运的徐吉洙先生来华访问。在北京期间，和中华全国世协领导商讨了中国世界语者明年参加在汉城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事项并与几个专业单位进行了座谈。同月，承德大学将世界语列为选修课。

4月1日，由上海世协和大阪世协访华团联合举办的世界语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5月，由刘凤义、张梅芝、王建兵组成的世界语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的海参崴、伯力、彼得堡和莫斯科。

7月24日至31日，以邹国相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3人参加了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举行的第78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电视片《承德与世界语》在大会电视片展评中被授予一等奖。同月，萍乡市世协成立。

8月1日至4日，由辽宁省世界语协会与丹东市世界语协会共同承办的第3届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丹东市举行。6日至15日，谭秀珠、薛梅仙应邀出席日本第80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和日本大本世界语普及会成立70周年纪念会。12日至16日，高等学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承德举行第3届教学研讨会。18日至21日，第2次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会议在承德举行，会议就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如何开展世界语运动进行了探讨。

11月14日至16日，浙江省世界语科技学术交流会在黄岩举行，来自北京、天津和本省的科技世界语者出席了会议。同月，曹雄林的“世界语的专题邮展”在全国集邮展览中荣获镀银奖。

12月2日至4日，中国青年世协在北京举办了部分省市青年世界语者座谈会。25日，中国报道社、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北京世协联合召开会议，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和为延安世界语者题词55周年。月底，萧山市世界语爱好者协会成立。

同年，宋绳坦的《世界语》邮集在巴西举办的世界邮展上获铜奖。国际世协经贸专业集团中国分部编辑的《世界语商业公报》（Bulteno de Esperanta Komerco）在西安出版，每月一期，刊登大量商贸信息。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世界语研究文集》、《南离子邱及》、《刺猥头彼得》、《世界语读本（上）》、《新实在论》。

1994年

1月，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将世界语作为硕士研究生考试的第二外语科目之一。

2月2日，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叶籁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24日至25日，山东召开全省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同月，山东省人事厅考试中心确认世界语为晋升高、中级技术职务的报考语种之一。

3月3日，大连大学外语系世界语二外选修课开课。

4月11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世界语之友会会长楚图南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13日，法新社北京分社记者白文采访全国世协，了解中国世运的历史和近况，并就世界语的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15日，中国集邮世界语协会、中国围棋世界语协会在北京同时成立。祝明义当选为集邮协会会长。梅洛当选为围棋协会会长。18日，中国医学世界语协会在枣庄成立，涂冰教授当选为会长。

5月1日至8日，于涛应欧洲青年中心和全世界世界语者青年组织的邀请参加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主题为“跨越欧洲的界限——欧洲在当今世界的地位”的研讨会。26日，冰心为第4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题词：“懂得世界语就懂得世界。”

6月，天津市再次确认世界语作为职称考试的外语语种之一。

7月23日至30日，以邹国相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13人，参加了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7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21日至22日，国际世界语经贸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日本、比利时、英国、中国和香港地区的22名世界语者出席会议。

8月6日至10日，第2届中国青年世界语运动研讨会在郑州召开。14日至20日，全国世协和唐山世协在秦皇岛联合举办“世界语与改革开放”研讨会。20日，辽阳市世协和辽阳市邮电局168信息台共同创办的“世界语知识介绍”特别节目正式开播。在该市只要拨通16888000-16888006中的任何一个号码，便可立即获得什么叫世界语，世界语的产生，世界语的特点，世界语的实用价值，世界语组织简介，世界语协会快讯以及英语能成为国际通用语吗等等知识。22日，中国铁路员工世界语者协会在秦皇岛举行1994年年会。

9月15日到22日，梅田善美率“沿着绿川英子足迹寻访团”一行9人访问了上海、武汉、重庆、哈尔滨、佳木斯。

10月6日至9日，在杭州举行的首届中国残疾人集邮展览上，湖南一位世界语者制作的专题邮集“世界语遍世界”荣获三等奖。

12月19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召开纪念世界语开播30周年座谈会。同月，国内第一座世界语者开设的个人业余电台BG8AU在四川内江市开通。

同年，合肥工业大学开设94-95年度世界语选修课，考试合格者可获8个学分。《三色堇》（《Penseo》）获格拉波夫斯基（Grabowski）荣誉奖。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中国小百科》、《世英汉微生物遗传学词典》、《中国陶瓷史话》、《聊斋志异选》、《祝你健康》、《初学者150天》等。

1995年

1月2日，青岛世协与韩国大邱世协缔结为友好协会。同月，河南省政府人事厅正式批准世界语作为全省干部晋升职称的统考语种之一。

2月，大连大学外语系世界语第二外语选修课开课。

3月，王瑞祥代表中国青年世界语协会参加了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远东国际志愿者联谊会。山东大学继续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4月8日，福州市世界语协会成立。

5月10日，中国报道社举行茶话会，庆祝《中国报道》创刊4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美大使、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柴泽民，人民日报总编、原外文局局长范敬宜，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陈昊苏，全国世协会会长陈原到会祝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外文局局长杨正泉在大会上致词。

7月13日至16日，第2届浙江省世界语科技学术交流会在舟山市普陀山举行。22日至29日，以谭秀珠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者代表团一行3人参加在芬兰坦佩雷市举行的第8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会上谭秀珠、戴颂恩、于涛当选为国际世协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月，毛自赋荣获国际世协95年度“文艺竞赛”新人才奖。这是“文艺竞赛”创办45年中第二个获奖

的中国世界语者。

8月5日至13日，宁波友好城市德国亚琛市世协主席沃夫尔冈·比能一行3人到宁波访问。11日至14日，第14届中、日、韩青年研讨会（La 14-a Komuna Seminario）在天津召开，大会议题是“青年与传统文化”。同月，宋绳坦的邮集《世界语》在雅加达举行的第8届亚洲邮展上荣获银奖。

9月29日至10月3日，第3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重庆举行，本届大会议题是“世界语与和平”，改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经选举，名誉会长为：巴金、陈原、叶君健、张企程；会长：谭秀珠；副会长：陈昊苏、刘镇、邹国相、刘俊芳；秘书长：邹国相（兼）。大会期间代表们游览了三峡。15日，中国报道社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北京市世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同月，国际世协主席李种永荣获中国政府1995年度“友谊奖”。该奖是中国政府于1991年设立的，旨在表彰为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和海外华人专家。

10月4日，吉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了世界语作为1996、1997年晋升中、高级职称外语水平考试的任选语种。12日至15日，重庆世协代表团应日本横滨世协的邀参加了第82届日本世界语大会，会后游览了东京、町田和金泽市。同月，上海世协派出以魏原枢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日本、韩国，介绍第1届亚洲世界语大会筹备情况，并为开好大会与日本、韩国世界语协会交换意见。

11月，自本月起北京世协会员在紫瑞酒家举办世界语者沙龙聚会，坚持每月一次。通化师范学院继续将世界语作为选修课。由枣庄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市世协、市摄影家协会联合制作的世界语版明信片《枣庄风光》出版。这套明信片在当年山东省外宣品的评选中荣获二等奖。同月，李士俊应邀出席日本世界语之家周年纪念会，并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奈良等市作了关于中国世运、中国古典诗词的报告。

12月9日，吉林省南部地区世界语发展研讨会在东丰县举行。23日至29日，亚洲世界语运动协调委员会和第1届亚洲世界语大会组委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会议，就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行了落实。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红楼梦（一）》、《老鼠嫁女》、《叶籁士文集》、《助学小唱》、《巴金与世界语》。

1996年

1月13日，湖北省世协世界语沙龙开展第一次活动，以后每月一次，旨在交流信息，提高水平，增强向心力。同月，长春市世协为了加深会员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提高世界语水平，决定每月第一个星期六在该市的蒙古包饭店举行协会例会。

2月，由蓝天强编著的《桂中旅游胜览》（汉世对照）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3月21日，召开全国世协成立45周年座谈会，柴泽民、陈原、陈昊苏、赵常谦等领导出席。

6月6日，周尧昆虫博物馆在浙江鄞县正式开馆。博物馆馆名和主要展品说明用中、英、世三种文字。15日，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世界语研究中心。30日，湖北东湖世界语馆正式开馆。同月，中国世界语图书馆开始筹建，由刘铃同志负责。

7月16日至18日，湖北世协举办的'96世界语文化及教学研修班在武汉举行。20日至27日，以谭秀珠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4人，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第8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8月6日至13日，中国青年世界语协会秘书长孙爱军应日本世界语学会和日本青年世界语协会之邀赴日本参加在冈山举行的第15届中日韩青年世界语者研讨会和在广岛举行的第83届日本世界语大会。9日至11日，第6届辽宁省世界语大会在锦州召开。22日至25日，

第1届亚洲世界语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议题为“亚洲与21世纪”。来自18个国家的584名世界语者出席了会议。世界语铁路专业座谈会和中国铁路世界语协会年会以及亚洲医学研讨会同时在上海举行，上海集邮总公司和上海世协联合制作纪念封一枚。25日至27日，应全国世协的邀请，国际世协主席李种永访问了北京。

9月2日至7日，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第5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大会在北京举行。15日，浙江上虞市人民政府在该市龙山公园为胡愈之建立一尊半身铜像，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化、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30日，全国世协、中国日报社、北京世协联合举办胡愈之诞辰百周年座谈会。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制作纪念封一枚和世界语纪念戳一枚，以兹纪念。冰心亲自为纪念封题字。

10月14日至11月1日，沈阳市世界语协会代表团访问了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比利时、西班牙、摩纳哥七国，拜会了当地世界语组织，参观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各国高科技区。1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第261期“东方之子”栏目中播出著名昆虫学家、老世界语者周尧先生的专访，主持人介绍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和世界语诞生的社会环境、世界语的理想、传播现状及发展前景。

12月1日，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介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立55年来的发展和成就时，专门介绍了该台世界语部的有关情况。10日，克罗地亚驻华大使布·斯特雷纳代表克罗地亚议长帕夫蒂奇将一本30年代出版的中译本《环》赠送给全国世协。《环》是克罗地亚著名作家Dinko Simunovic创作的，1926年由Fran Janjic译成世界语，1936年由徐方西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帕夫蒂奇在10月访华期间把《环》作为礼品赠送给我国领导人乔石、荣毅仁。18日，召开庆祝世界语之友会成立15周年座谈会，会议由柴泽民主持。会上通过了世界语之友会新的领导成员名单。名誉会长：胡绳、黄华、罗俊、陈原；会长：柴泽民；副会长：叶君健、范敬宜、叶公琦、陈昊苏、杨正泉、刘镇、艾青春、张振华、张企程；秘书长：邹国相。同日，中国世界语图书馆挂牌成立，陈原任名誉馆长，刘铃任馆长。26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会议同意邹国相因退休辞去秘书长职务，选举戴颂恩为秘书长。31日，阜阳市世界语协会成立。

同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中师大、合肥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内蒙古师大、山东大学、通化师范学院、厦门鹭江职工大学继续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上海、辽宁、吉林、新疆、山东、福建、天津、内蒙古等省、市、区继续把世界语作为专业技术职称考试语种之一。吉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长春市人事局分别下达通知，确认世界语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外语考试语种之一。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论语》、《红楼梦（二）》、《世界语汉语翻译教程》。

1997年

2月，李士俊在美国休斯顿世界语协会作了关于世译中国文学的报告。

3月，全国世协与北京世协共同举办了纪念绿川英子诞辰85周年纪念会，并与北京邮政管理局联合制作了世界语纪念明信片一枚。

4月19日至20日，世界语文化旅游网络研讨会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来自14个省市的70名代表和香港、澳门的世界语者出席了大会。

5月中旬，桂林市中山中学合唱团世界语歌咏队成立，42名女生参加了活动，她们用汉语、世界语演唱歌曲，桂林电视台录制了专题片。24日至26日，宁波世协举办世界语对外友好经验交流会，浙江、广东、上海、安徽的世界语者在会上交流了经验。

6月6日至8日，东北地区世界语大会在丹东市举行。7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日报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北京世协、中科院世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联合举办迎香港回归座谈会。全国各地世协也在7月1日前后开展各种纪念活动。

7月11日至13日,湖北省世协和国际世界语者教师协会中国分会联合举办的第2届世界语文化与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市东湖世界语馆举行。19日至26日,以侯志平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6人出席在澳大利亚阿得雷德举行的第82届国际世界语大会。7至9月,香港世协秘书长麦文彪先后访问深圳、广州、桂林、南京、武汉、上海、西安、北京等地,就加强香港世协与内地世协的联系与合作进行了探讨。

8月9日,云南省世协在昆明召开“世界语与'99世界园艺博览会暨旅游文化研讨会”。

9月20日,内蒙古包头民族旅游学院与武汉世协达成协议决定联合创办世界语旅游专业。同月,大连大学外语系1997-1998学年第一学期世界语二外选修课开课。厦门鹭江职业大学在全校96级学生中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10月,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联合小组被接纳为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者联盟的第20个会员。

12月11日至14日,第4次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会议在广州从化召开,来自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位同志出席了会议。香港世协主席李仁芝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回顾了近几年的世界语工作,总结了经验,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今后工作的设想。在会议期间还召开了'97全国世界语文化交流会议,其中包括“第6届世界语国际科技大会筹备工作会议”、“全国医学世界语协会'97年会”、“全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97年会”、“广东省青年世界语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世界语与经济”、“世界语与旅游”、“世界语与传销”、“世界语与中国文学”、“世界语与教学研讨会”以及“老世界语者座谈会”、“世界语实体负责人座谈会”等等。同月,辽宁省世协荣获省社科联授予的“96-97年度省先进协会”称号,该会已连续四年获此殊荣。国际铁路世界语联盟领导成员汉宁·豪格(Henning Hauge)和该组织会刊《国际铁路员工》杂志编辑埃尔娜·豪格(Erna Hauge)到北京,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铁路职工世界语协会负责人就推动铁路职工世界语运动交换了意见。

同年,《三色堇》出版电子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上网的世界语刊物。

由国家教委人文学科司下达的学科代码表中,世界语被正式列为人文学科,属语言学中外国语言学下的三种学科,其学科代码是740.5094。长春世协发起“世界语21世纪网络”计划,建立了绿星经济实体网络。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红楼梦(三)》、《日出》、《雷雨》、《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续)》、《汉世英法中医学术语词典》。

1998年

4月10日至7月15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举办首届“绿星杯”国际少年儿童美术、摄影大赛。28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世界语之友会、中国报道社、国际电台世界语部、北京世协和中科院科技世协在京联合举行座谈会,庆祝国际世协成立90周年。《中国报道》从本月起上网,国外读者可从互联网上查阅该刊。同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河北省职改办将世界语列入职称考试语种之一。

5月16日至22日,中国铁路世协成员朱命合出席在丹麦阿尔堡市举行的第50届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大会,这是中国世界语者首次出席国际铁路员工世界语大会。他代表中国铁路职工世协致词,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30日至31日,辽宁省第7届世界语大会在沈阳举行,会议决定由辽宁世协、黑龙江世协、内蒙古世协、吉林世协于次年7月在长春共同举办首届东北亚地区世界语大会。辽宁省世界语协会业余无线电台也于30日开播成功。

6月14日,由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世界语作家协会举办的98世界语文化与教学研讨班在武汉召开。中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荷兰的44名世界语者参加了研讨班,其中二人是通过因特网参加的。同月,广州创刊《Agado》(行动)月刊。

7月24日至27日，中日韩青年世界语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波兰、中国和香港地区的70多名世界语者出席了大会。

8月1日至8日，以戴颂恩为团长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5人出席在法国蒙彼利埃市举行的第8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22日至9月3日，应友好城市波兰罗兹世协的邀请，天津社科联组团参加了罗兹市世界语运动90周年庆典活动，并参加了在罗兹召开的第29届波兰世界语大会。

9月，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刊载章怡撰写的题为“语言的困扰与理想的追求”的长篇文章，全面回顾了本世纪世界语在全世界的推广情况，展望了世界语在下一个世纪人类文化交流方面将发挥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在该校继续开设面对全校的世界语二外公共选修课，该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已坚持10年之久。

10月，湖北省黄石市人民政府第236号文批准同意黄石市世界语协会上报的“徒步跨越亚欧大陆桥”活动方案。跨越队由9人组成，领队魏光亮，队长郑学军，队员中包括来自湖北、内蒙古、河南的世界语者。徒步考察队定于1999年元月1日从亚欧大陆桥的东端中国连云港市出发西行，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6省区，由阿拉山口出境，再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德国，于2000年8月前到达大陆桥西端国际世界语协会总部所在地荷兰鹿特丹，行程11000多公里，历时20个月。同月，以出口京太郎为名誉团长的日本大本青年文化交流团和世界语访华团一行63人访问上海。

同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图书主要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孔子圣迹图》。

二、本书参考书目

- 杨曾诰：《万国新语》，文明书局, 1909
- 吕蕴儒等：《世界语论文集》，上海民智书局, 1925
- E. Privat: 《世界语史》(Historio de la Lingvo Esperanto)，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 伍大光：《世界语运动拉杂记》，广州作者本人出版, 1928
- 周泽：《世界语运动概况》，上海世界语学会, 1928
- 胡愈之：《世界语四十年》，上海新知书店, 1928
- UNUEL: 《国际语问题及其解决》(Esenco kaj Estonteco de la Ideo de Lingvo Internacia)，上海世界语书店, 1928
- 黄尊生：《中国与世界语问题》，上海世界语学会, 1929
- 郭后觉：《世界语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 周辨明编译：《万国语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 卢剑波：《为世界语主义的世界语》，成都中华绿星社, 1933
- 孙伯坚：《言语学与世界语》，上海辛垦书店, 1935
- 徐沫：《世界语新论》，上海新知书店, 1936
- Andreer Drezen: 《新兴言语理论》，上海新文字书店, 1936
- 后觉公学编：《世界语是什么？》，后觉公学, 1947
- 卢剑波：《世界语之通俗的应用》
- 吴天民：《奉天世界语学社发生之历史》，奉天世界语学社, 1911
- 胡愈之等：《国际语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 周庄萍：《世界语五十年》，上海世界语协会, 1937
- 李泮等：《世界语年刊》，广州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 1931—1932
- 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章程一览》，上海世界语书店, 1936
- 黄尊生：《国际世界语教育概况》
- E. Drezen: 《柴门霍夫评传》，世界语函授学社, 1945
- Privat: 《柴门霍夫传》(Vivo de Zamenhof)，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5
-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董事会：《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计划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 1923
- 一工：《世界语问题》，长沙岳云中学, 1930
- 李泮：《世界语丛谈》，广州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 1932
- V. Varankin: 《世界语导论》(Enkonduko en la Teorio de la Internacia Lingvo)，成都中华绿星社, 1935
- 周尧：《世界语是什么？》，西农世界语学会, 1950
- 《世界语之钥》，西农世界语学会, 1950
- 《世界语六讲》，上海世界语者协会, 1950
- 《世界语工作资料简介》(内部资料)，吉林省世界语学社, 1984
- 布鲁恩：《国际语理想历史概要》(Historia Skizo de la Internacilingva Ideo)，新华世界语函校, 1981
- 侯志平：《你知道世界语吗？》，中国报道杂志社, 1980
- 劳荣：《世界语运动二、三事》，新华世界语函校, 1982
- 《江苏省世界语论文选》，江苏省世界语协会, 1983

- 《漫谈世界语》，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4
- 《世界语者们》，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3
- E. 普里瓦：《世界语史》，知识出版社，1983
- 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
- 黄石市世协：《文件汇编》（湖北省世界语协会 1981 年年会（筹委会）学术座谈会），1981
- 龚佩康：《绿色的五月——纪念绿川英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乌努尔：《国际语理想的本质和前途》，新华世界语函授，1980
- 苦舟、邱关瑾：《柴门霍夫时代》，安徽世专，1985
- 埃德蒙·普里瓦特：《柴门霍夫的一生》（Vivo de Zamenhof），知识出版社，1983
- 黄石市世协编：《方善境纪念文集》，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4
- 胡愈之：《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86
- 《怀念何增禧（徐沫）同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0
- 杨白冰等：《南离子邱及》，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
- 《世界语研究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
- 许善述编：《巴金与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 刘铃编：《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 侯志平编：《胡愈之与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
- 《世界语发音学》，成都中华绿星社，1934
- Doi Ĉieko:《亚洲世界语运动指南》，日本海鸥书社，1995
- Ulrich Lins:《危险的语言》，德国 Gerlingen Eleicher 出版社，1988
- 《柴门霍夫演讲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
- 威廉·奥尔德：《世界语现象》，国际世界语协会，1988
- 陈原：《记胡愈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加斯东·瓦伦金：《世界语运动史概要》，宋绳坦译
- 卢懋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1892
-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
- 吴敬恒：《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 《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 《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40 周年纪念手册》，语文出版社，1996
- 《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

ESPERANTO UND WISSENSCHAFT, Zur Plansprachenproblematik, de D-ro D. Blanke, Berlin: Kulturbund der DDR.

ESENCO KAJ ESTONTECO DE LA IDEO DE LINGVO INTERNACIA, de D-ro L. L. Zamenhof, Tokio

ACTA INTERLINGUISTICA, Red. Ryszard Rokicki. Varsovio

LA BONA LINGVO de Claude Piron, Budapest: HEA

JAZYK ESPERANTO de M.I. Isaev, Moskva: Nauka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 d-ro H. Tonkin, Rotterdam: UEA.

LINGVISTIKAJ ASPEKTOJ DE ESPERANTO de J. C. Wells, Rotterdam: UEA

TRANSL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 C. Piron kaj H. Tonkin

AKADEMIAJ STUDIOJ (1983—1990), Red. R. Eichholz.

ESPERANTO EN PERSPEKTIVO, de Ivo Lapenna k.a. Roterdamo: UEA
 ESPERANTO: LERNEJA EKSPERIMENTO de Helmut Sonnabend. Pisa: Edistudio
 HISTORIO DE LA MONDOLINGVO de E. Drezen, trad. N. Hohlov. Moskvo: Progreso
 LA INTERESO KAJ UTILO DE KOMUNA INTERLINGVO de div. aŭtoroj. Brusel:
 AIMAV
 INTERLINGUISTICA TARTUENSIS II-VII. Teorio kaj historio de internacia lingvo. Tartu:
 Tartuskij Gosudarstvenni Yniversitet.
 INTERLINGUISTICS. Aspects of the science of planned languages. Red. Claus Schubert.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INTERLINGVISTIKO KAJ ESPERANTOLOGIO de W. Manders. Saarbrucken: Artur E.
 Iltis.
 KIAL VENKIS ESPERANTO? De I. Ĵirkov. Oosaka
 KOMUNIKADO EN LA EŬROPA KOMUNUMO de H. Erasmus. Antverpeno: EEC
 LANGUAGE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d. J. Edwards, H.
 Tonkin. Novjorko: CED
 LANGUAGE IN RELIGION 1988-1989 2 volumoj, Red. H. Tonkin. New York
 LANGUAGE PLANN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Red. H. Tonkin. K. Johnson
 Weiner. New York.
 THE LANGUAG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vo Lapenna. London /
 Rotter dam.
 LINGVO KAJ VIVO de Gaston Warienghien, Rotterdam: UEA
 MARKSISMO KAJ LINGVOSCIENCO de J. V. Stalin. Jjekaterinburg: Sezonoj
 METODIKO DE LA ESPERANTO INSTRUADO de Rudolf Rakuša. Rotterdam: UEA
 MEZDUNARODNYE VSPOMOGATEL'NYE JAZYKI. A. D. Duliĉenko (Kronologia
 katalogo de 912 planlingvoj, kun indikoj pri ties aŭtoroj, karakterizaĵoj kaj bibliografiaj fontoj).
 Tallinn: Valgus
 NAPRAVLJENIJA SOVREMENNOJ INTERLINGVISTIKI de S. N. Kuznecov. Moskva
 PLURILINGUISME ET COMMUNICATION. Edit. Francois Lo Jacomo, Paris: SELAF
 THE PROBLEM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Rotterd am: CED.
 DANĜERA LINGVO, de Ulrich Lins, 1990 Moskvo
 ENCIKLOPEDIO DE ESPERANTO 1986 Budapesto: HEA.
 ESPERANTO IN THE MODERN WORLD Komp. R. Kaj V. S. Eichholz, Bailieboro
 JUBILEO, JARCENTO DE ESPERANTO, Red. Mark Fettes, 1988 Rotterdam: UEA.
 PANORAMO DE ESPERANTA LITERATURO de M. Ĝivoje, Zagreb: Internacia
 Kultura Servo
 KVAR PRELEGOJ PRI ESPERANTA LIERATURO de Kral Drago, Ljubljana
 ESPERANTO EL LA VIDPUNKTO DE VERKISTO, de d-ro Claude Piron, Vieno: Pro
 Esperanto.
 ESPERANTO, LINGVO, LITERATURO, MOVADO de Pierre Janton, 1988, Rotterdam:
 UEA
 LA FENOMENO ESPERANTO, de W. Auld, 1988, Rotterdam: UEA.
 ANTOLOGIO DE ESPERANTO, komp. W. Auld. 1984. Rotterdam: UEA.
 NOVA KRESTOMATIO, komp. W. Auld. 1991, Rotterdam; UEA.

后 记

今年是建国 50 周年，也是迈向新世纪的最后一年，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为了展示一个世纪来社会科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尤其是 50 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对各学科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予以总结，并对未来学科发展进行研究，组织北京市社科联直属学会编辑出版本学科的有关专著，这对于繁荣社会科学事业、推动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发 展，以及进一步搞好学会的各项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世界语传入中国已经一百多年。一百年来，它作为一种国际交际工具和有用的斗争武器，不仅在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再立新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好评。但是一百年来，还没有一部专著对中国世界语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认真的总结。承蒙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及其领导人对世界语事业一贯的支持和关爱，把世界语学科也列入庆祝建国 50 周年献礼的专著之列，我们这批新老世界语者在感慨之余，油然而产生一种使命感，尽管大部分执笔者已年愈花甲，而今年又遭受百年不遇的酷暑高温；尽管没有任何稿酬可以获得，甚至自己还要作经济上的付出，但是大家仍然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力求通过大家的努力和集体的智慧，把中国世界语运动这本专著写好。

首先，我们成立了编委会，拟出了全书的大纲，并进行了分工。由每一位编委按照分管的专题收集资料，拟出细目，经编委会讨论和确认后，写出初稿，然后由各编委相互审阅、修改。在此过程中我们分专题进行了多次研讨，从篇章结构到立论观点，集思广益，统一认识，对文稿进行反复修改，最后由正副主编对全书进行协调和文字加工。可以说这是一部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

“世界语的起源、特点及其发展”一章由王彦京执笔。

“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一章由邹国相执笔。

“世界语与中国的民族解放”一章由王建兵执笔。

“世界语在新时期的新任务”一章中“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的创办及其影响”由侯志平执笔；“中国的世界语对外广播”由南由礼执笔；“用世界语出版各种图书”由刘铃执笔。“世界语在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章由侯志平执笔，其中“世界语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一节由邹国相执笔。

“世界语文学与文学语言”一章由李士俊执笔。

“世界语与中国的文字改革”一章由刘铃执笔。

“世界语在中国教育领域”一章由李威伦执笔。

“世界语集邮”一章由南由礼执笔。

“世界语学和国际语学研究”一章由周流溪执笔，其中“为保卫世界语而斗争”部分由秦凯基与周流溪共同执笔。

“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由侯志平执笔。

本书不是以时间为序，不是像讲历史那样，分阶段叙述各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及其特点，而是以专题为序，阐述中国世运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分析这些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反映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也许这种办法更有助于社会各界加深对世界语事业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事业。本书对世界语界也提供了

翔实资料和对中国世运的一些主要观点，既有助于宣传世界语，也有助于日后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研究，更有助于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吸取必要的教训，指导我们当前的工作。一百年来，中国世界语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无数世界语的先烈和广大新老世界语者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和无私奉献的结果。这本书的出版就是对他们的最好慰藉，也是对正在积极奋斗的年轻世界语者的巨大鼓励。

本书从立意到成书仅用一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想去总结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很难的，何况在建国前我国经过多年的战争，加之“文化大革命”的洗劫，所能查到的史料极少。许多知情的老世界语者在近十多年里又纷纷仙逝，使我们能获得的活资料也濒于枯竭，再加上过去我们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研究不够，专著甚少，致使本书在掌握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上，在立论的正确程度上，存在着众多的缺憾。本书由10人执笔，在材料的取舍上，在文笔的运用上也会带来若干毛病。我们不揣冒昧地将全书呈献给读者，诚恳地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世界语运动虽然经历了112年的历史，但对人类说来，还是一项新的事业。在今后的岁月里，它可能还要经历许多险滩、暗礁和风暴，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和挫折，但是它同火车、飞机的发明和推广过程一样，总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否定到肯定到发展，直至繁荣昌盛。我们深信，世界语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因为它对社会有利，对人民有益。时代呼唤它，人民需要它！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特别令我们高兴的是陈原老和张企程老一直关心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除答应作本书编委会的顾问外，还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陈原老甚至满怀激情，为我们写了精彩的序言。胡绳、卢嘉锡、柴泽民、陈昊苏、戈宝权等领导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也十分关心，他们欣然同意作本书的顾问。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日报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同志们也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

在这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一并对他们多年来对世界语事业的一贯支持表示莫大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

责任编辑：刘 铃
装帧设计：张延宁